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冈村宁次回忆录

〔日〕冈村宁次著

天津浦成社编辑部译

中华书局

K265.3/1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冈村宁次回忆录

〔日〕稻叶正夫编

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



20838743

中华书局

1981年·北京

838743



内 部 发 行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冈村宁次回忆录

〔日〕稻叶正夫编

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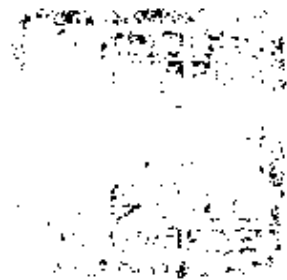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1/32·15 1/4印张·306千字
1981年12月第1版 1981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1,000册
统一书号：11018·1001 定价：1.40元



译者说明

本书原名《冈村宁次大将资料(上)》(战场回想篇),日本原书房1970年版,是日本政府防卫厅为了对自卫队军官进行“教育”,由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编修官稻叶正夫编辑而成。内容主要为前日本战犯冈村宁次(1884—1966)的日记、随感及回忆。冈村宁次早年任职北洋军阀孙传芳的军事顾问;后曾任日本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日军第十一军、华北方面军、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和侵华日军总司令官;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期间任蒋介石的秘密军事顾问,1950年被蒋介石聘为台湾“革命实践研究院”的高级教官。在数十年时间里,他对中国人民犯下了累累罪行。书中立场、观点之反动,自不待言,其所叙事实,也有部分歪曲。尽管如此,书中却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我国的阴谋和罪行。特别是对与蒋介石反动政府互相勾结的情况,记述颇详。此外,还暴露了战后日本政府所采取的新的战争阴谋。例如:大本营致冈村的密电称,“将红色势力引进中国,使之与美方势力发生冲突,引起东亚之混乱,从而日本可坐收渔翁之利”。而冈村根据当时的情况,却采取了“与国民党紧密结成一体断然对付中共”的方针,直到1949年蒋介石政权垮台前冈村回到日本后,还立即向驻日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进言,“美国如不早下决心,采取有效对策,不

出半年，中国大陆必将尽归共产党掌握之中。”怂恿美国进一步阻止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但是，由于此书出自多年直接主持侵华战争的日军高级将领之手，其中确有不少重要资料，故特予译出，供研究中日战史及日蒋关系等问题时参考。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对书中与史料关系不大的琐事，概予从略。至于冈村的自我辩解、吹嘘以及歪曲事实之处，均按原文译出，希望读者注意。

本书由政协天津市委员会编译委员会主持翻译，参加翻译者：孙雷门、申泽福、高学洲；校订者：孙立民、李作民；审校者：冯厚生同志。因限于水平，难免有错译之处，尚希读者批评指正。

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

一九八一年四月

目 录

内容说明：日本、中国、陆军	(1)
统率之道	
战场上的生死观	
第一篇 从投降到归国	(21)
前 言	
第一章 停战前概况及投降前兆	(22)
一、停战前概况	(22)
二、投降前兆	(23)
第二章 投降及投降后的状况	(29)
一、8月15日及其以后	(29)
二、日军官兵的态度	(31)
三、中国官民的态度	(33)
四、共军	(35)
五、国共矛盾	(37)
六、苏军	(38)
七、我国侨民	(41)
八、和平后对中国处理纲要	(44)
九、投降手续及签字	(47)

第三章	接收	(56)
第四章	1945年后半年日记抄	(60)
第五章	撤退、复员	(92)
一、	复员	(94)
二、	山西省之现地退伍	(96)
三、	俘虏	(99)
四、	归国运输	(106)
五、	留用与征用	(109)
六、	会计、卫生及法务	(112)
七、	停战对人物考核发生极大变化	(116)
第六章	1946年上半年日记抄	(119)
第七章	战犯	(134)
一、	与美国有关的战犯	(134)
二、	与中国有关的战犯	(135)
三、	中国关系战犯全部释放	(141)
四、	关于冈村的处理经过	(142)
第八章	总联络班时期日记摘抄	(162)
第九章	第二联络班时期日记摘抄	
	(自 1946 年 12 月 16 日	
	至 1947 年 10 月 6 日)	(179)
第十章	单独拘留——南京时期日记摘抄	
	(自 1947 年 10 月 7 日	
	至 1948 年 3 月 29 日)	(206)
第十一章	单独拘留——入狱时期日记摘抄	

(自 1948 年 3 月 30 日	
至 1949 年 1 月 28 日)	(213)
第十二章 归国	(233)
第二篇 由汉口到南京	(239)
前 言	
一、异常人事调动	(239)
二、离奇的占卜	(240)
三、赴任路线	(241)
四、汉口就任后的感想	(241)
五、标语式的训示	(242)
六、丧失制空权的空路交通	(243)
七、“四十日雨”	(244)
八、占领城市	(244)
九、美空军的攻击目标	(246)
十、未雨绸缪	(246)
十一、诏书	(247)
十二、进攻四川问题	(247)
十三、美军通讯技术精湛	(250)
十四、对重庆和平工作	(251)
十五、大连会议	(253)
十六、王牌军	(253)
第二篇补遗	(255)
前 言	

第一章 出征前的处境与感想	(256)
一、陆大教育的重大转变	(256)
二、战局前途堪忧	(256)
三、令人叹息的空军境况	(257)
四、缺乏基本教养的青年军官	(258)
五、预见与全局的统一	(258)
六、最高领导人的地位与重责	(259)
七、日、德前途暗淡	(260)
第二章 方面军参谋长时代的回忆与感想	(262)
一、再赴难忘的汉口	(262)
二、当前作战的特点	(262)
三、冈村司令官的训示	(264)
四、申请在方面军后方增派一个军司令部	(266)
五、汉口的方面军司令部	(267)
六、与“旭”(第十一军)司令部之间的联络	(268)
七、武昌军仓库被炸	(270)
八、方面军参谋长对各部参谋的要求	(271)
九、冈村将军访问第二十三军司令部	(272)
十、第十一军后方归方面军直辖	(272)
十一、忙中偷闲之乐趣	(274)
十二、由汉口前往南岳战斗指挥所	(275)
十三、南岳战斗指挥所	(277)
十四、赴南方“波”司令部联络	(281)
十五、统帅与战略战术——“旭”司令官的心地	(286)
十六、畑总司令官来访并传达诏书	(288)

二十七、桂、柳作战的综合成果	(289)
二十八、方面军移让后方地区	(292)
二十九、冈村大将就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	(293)
三十、新司令官到任与我的调离	(296)
三十一、任方面军参谋长期间的感想	(300)

第三篇 北京三年 (309)

前 言

一、行前琐事	(309)
二、灭共爱民	(312)
三、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的心情	(313)
四、煤矿	(314)
五、一级军功	(315)
六、令人悦服的工矿警卫	(316)
七、旅团长、步兵团长聚会	(317)
八、拒绝进入政界	(318)
九、对重庆联络工作	(319)
十、对重庆和平工作与开罗会谈	(320)
十一、对华处理方针的转变	(321)
十二、日本人的通病	(322)
十三、现地听取战斗汇报的习惯	(322)
十四、将 850 人提交军法会议	(324)
十五、肃正作战(剿共指南)	(325)
十六、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态度	(326)
十七、投降的将领	(327)

十八、河南作战琐事·····	(328)
十九、关于俘虏·····	(330)
二十、战区强奸罪·····	(331)
第四篇 攻占武汉前后(第十一军司令官时期)·····	(333)
前 言	
一、第十一军建制,出动·····	(334)
二、战场上的第一印象最为重要·····	(336)
三、今昔战场的军、风纪问题与我的决心·····	(336)
四、首先巡视第一线·····	(338)
五、攻占黄梅、九江·····	(341)
六、陆海军协同作战·····	(344)
七、有关军纪、风纪见闻之一·····	(345)
八、从报纸上了解所属部队的行动·····	(348)
九、军纪、风纪见闻之二(战区强奸罪)·····	(348)
十、军纪、风纪见闻之三·····	(350)
十一、回忆五万分之一比例地图·····	(353)
十二、田家镇要塞·····	(355)
十三、第一批随军作家·····	(356)
十四、攻占武汉作战的特点·····	(357)
十五、特设师团的战斗力·····	(361)
十六、勿蹈南京事件之覆辙·····	(362)
十七、军、风纪见闻之四·····	(365)
十八、占领下的汉口治安状况·····	(366)
十九、有关攻占武汉的日本国内舆论·····	(367)

二十、我在攻占武汉时的心情·····	(368)
二十一、再谈今昔之感·····	(371)
二十二、中国军队之道义·····	(374)
二十三、俘虏·····	(376)
二十四、有关南昌作战·····	(378)
二十五、关于使用被称为弱兵的两师团·····	(380)
二十六、襄东会战·····	(389)
二十七、内地情报(其一)·····	(396)
二十八、反对汪精卫工作·····	(398)
二十九、对小学校长团的讲话·····	(401)
三十、昔日之军队与今日之军队(今昔感之三)··	(403)
三十一、关于赣湘会战·····	(404)
三十二、人事局长来访·····	(413)
三十三、关于1939年冬季作战·····	(413)
三十四、内地情报(其二,并附感想)·····	(415)
三十五、指挥官的性格·····	(417)
三十六、爱民方针的彻底程度·····	(419)
三十七、听取实战谈话·····	(420)
三十八、授与战功奖状·····	(423)
三十九、日本人的国际感·····	(424)
四十、离阵心情·····	(425)
四十一、复命·····	(426)
第五篇(上) 关东军参谋副长时期·····	(429)
前 言	

一、参谋副长第一、第二号	(429)
二、永田、小畑两者间的不睦 (“一夕会”的分裂)	(431)
三、匪患猖獗	(434)
四、满铁社员理事问题	(435)
五、对华、对满根本政策之我见	(437)
六、热河工作与作战	(440)
七、上奏要点	(441)
八、突破长城线	(442)
九、指导第八师团作战	(443)
十、塘沽停战协定(1933年5月31日)	(444)
十一、停战协定的善后处理	(446)
十二、何应钦的预言	(449)
十三、再次上奏	(450)
十四、形势的缓和	(450)
十五、帝制	(451)
十六、在满行政机构改革问题	(453)
附录 石井极密机关	(456)
第五篇(下) 第二师团长时期	(460)
前 言	
一、破例从新潟港口出航	(461)
二、与苏军的冲突	(461)
三、芦沟桥事件爆发时的感想	(462)
四、共产党的暗中活动	(463)

五、地方文化程度和运输工具·····	(463)
六、紧急派兵的服装问题·····	(464)
七、石原莞尔的论点·····	(464)
八、战斗与训练的配合·····	(465)
九、适应地方民性的教育·····	(466)
十、北满河、湖冻结的情况·····	(467)
十一、全歼管界内匪寇·····	(468)

内容说明：日本、中国、陆军

稻叶正夫

自明治维新到大东亚战争（太平洋战争——译注。后同）战败为止约八十年间，说日本的足迹几乎踏遍中国大陆，并非过言。而且可以认为，日本陆军一直以极大热情对待抓大陆问题，或作政治外交上的发言，或采取行动，虽然引起了国内纠纷及混乱，但其势力终于发展为推动现代日本的动力。因此，明治百年历史的关键，就在于说明中国，即大陆问题。《冈村宁次大将资料》，是研究这一问题的最好资料。

在此，首先介绍冈村将军的军历如下：

冈村宁次大将军历（原籍 东京）

明治 17（1884）年 5 月 15 日生

陆军士官学校第 16 期

1904 年 11 月 步兵少尉、步兵第一联队补充队附

1905 年 4 月 步兵第四十九联队附

日俄战争末期，入新编第十三师团，任小队长，参加攻占桦太作战，其后任职于北韩国警备队。

1907 年 12 月 步兵中尉、陆军士官学校学生队附

任清国学生队第四、第五、第六期区队长。当时学生中有陈仪、阎锡山、孙传芳等。

1910年12月 陆大(第二十五期)入校

立志研究中国。1911年,武昌爆发辛亥革命。井户川辰三少将被派往中国,据说出发前曾召见当时陆大在学的冈村宁次、山中峰太郎二人研究策略,山中峰太郎以研究语学为名,由陆大退学,随井户川前往中国。

1913年8月 步兵大尉,步兵第一联队中队长

1913年11月 陆大毕业

1914年8月 参谋本部工作

1915年2月 参谋本部部员

日德战争爆发,攻占青岛要塞。冈村大尉任职于参谋本部时,最初内定在中国班,但实际上在第四部负责编纂日德战史。由于这一原因,在此期间以参谋本部派遣人员身分,在“青岛围攻军”司令部工作。

1917年2月 参谋本部附

奉命出差中国,辅佐在北京的青木顾问。1918年出兵西伯利亚。在此期间,缔结日华军事协定。(中日共同防敌协定——译注)

1919年7月 步兵少佐、陆军兵器总厂附

在陆军省新设的新闻班工作,以后,在军务局军事课负责中国问题。

1921年7月 步兵第十四联队附

欧洲旅行,同年10月27日,于德国之巴登巴登,与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结成所谓“三杰盟约”。

1922年2月 步兵第十四联队大队长

1923年3月 参谋本部部员

1923年8月 步兵中佐

在第二部中国班工作，正式研究大陆问题。辛亥革命以来，中国连续内战。

1923年12月 参谋本部附

长期出差中国，任驻上海武官。

1925年12月 步兵第十三联队附

以军务局定员以外的人员，作为应聘武官，任孙传芳的顾问，参与中国内战。

1927年3月 步兵第一联队附

为视察山东问题，随政务次官出差中国。

1927年7月 步兵大佐，步兵第六联队长

下达紧急动员令，开往山东省青岛。

1928年8月 参谋本部课长

任战史课长，主编中国事变(济南事件)出兵史。

1929年8月 陆军省人事局辅佐课长

当时川岛义之任人事局长。据该川岛说冈村系冲直道大佐(高知县人、第十四期)推荐。在此期间，于1931年9月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译注。后同)爆发。

1932年2月 上海派遣军参谋副长

以最初的陆军参谋副长参加上海事变(“一·二八事变”——译注。后同)。此职务是在派遣军司令官白川大将送别会上，因参谋副长一职出缺，当场任命冈村大佐充任这个职务的。

1932年4月 陆军少将，陆军兵器总厂附，临时军事调查委员长。根据第一次欧战的教训，主持陆军现代化的研究。

1932年8月 关东军参谋副长

1933年2月 满洲国(伪满——译注。后同)大使馆武官(兼职)。热河作战后,作为关东军代表签订塘沽停战协定。

1934年12月 参谋本部附

预定任命第二部长,暂时担任闲散职务。

1935年3月 参谋本部第二部长

“二·二六事件”中,与石原莞尔作战课长、武藤章军事课高级课员等,同为省部的骨干,很是活跃。

1936年3月 陆军中将,第二师团长

“二·二六事件”后转职,虽然内部规定中将晋级后,一年内不得任命为师团长,但冈村晋级后立即任命为师团长,因此这是一次破例的人事调动。冈村赴仙台就任第二师团长后不久,即去满洲驻在哈尔滨附近。中国事变(“七·七事变”——译注。后同)发生时,其属下篠原旅团,作为关东军蒙疆兵团,参加察哈尔、山西方面的战斗。

1938年6月 第十一军司令官

指挥攻占武汉作战,此时开始与宫崎、天野两参谋发生关系。

1940年3月 军事参议官

1941年4月 陆军大将

1941年7月 华北方面军司令官

全力以赴对共军进行“扫荡作战”(“治安战”),同时,指导一号作战中的京汉作战。

1944年8月 第六方面军司令官

再次与宫崎参谋长、天野第一课高级参谋合作,并以之为

幕僚，主持攻占广西省桂林、柳州作战。

1944年11月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

原定由朝香宫大将任总司令官，但天皇未予批准，决定起用冈村大将。

1945年8月 停战

1949年4月 归国

停战时冈村大将的军职，正巧是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他到1966年去世为止，与蒋介石、陈诚等中华民国政府要人是知心朋友。如其军历所示，自1907年任陆军士官学校清国学生队区队长，充当陈仪、阎锡山、孙传芳等人的教官以来，其全部军人生涯几乎都与中国有关。特别是满洲事变、中国事变、大东亚战争中，在大陆战场历任重要职务。在所有将军中，具有如此经历的只他一人。这是他的第一个特征。

另一个特征，是作为陆军骨干在昭和动荡时期十分活跃。为了陆军的现代化，打破了长州阀（长州即长门，属山口县，该地出身的军人，逐渐形成日本军部最有势力的派系之一——译注）的人事弊端，并为适应欧洲大战后现代战争的需要，力求改善体制。1921年10月27日，于巴登巴登结成永田、小畑、冈村“三杰盟约”以来，不仅参加“一夕会”活动，成为军内革新的核心推动力量，而其影响所及，甚至发展为整个日本的革新运动。

编者确信，具备这样特征的冈村大将的日记和札记，是国家的伟大遗产，它对众所关心的这一段史实，将赋予清新活泼的生命。

本书是冈村大将历任上海派遣军参谋副长、关东军参谋

副长、第二师团长、第十一军司令官、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第六方面军司令官、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期间的札记。其“战场体验录”的第一篇至第五篇，字字珠玑，尤以第一篇“从降服到归国”更是本书的精华，其中未公开的秘录，扣人心弦。奉劝各界人士务必一读。

又，在第十一军司令官、第六方面军司令官任内，被冈村将军所器重的高级幕僚宫崎周一中将（最后的大本营陆军作战部部长）的补遗部分，对后人也是很宝贵的资料。此人已于1969年10月16日逝世。往事茫茫，不胜感慨。

自明治建军以来已有八十年历史的帝国陆军，其间共产生大将134名。

历代陆军大将名册

注：期别栏中“士”指士官生，“○”指陆大毕业。

晋升大将年月	元帅	氏名	期别
1873年5月	元帅	西乡隆盛	
1877年10月		炽仁亲王	
1890年6月	元帅	山县有朋	
1890年6月	元帅	彰仁亲王	
1891年5月	元帅	大山巖	
1895年3月	元帅	野津道贯	
1895年11月		能久亲王	
1898年9月		佐久间左马太	
1898年9月		川上操六	
1898年9月		桂太郎	
1903年11月		黑木为楨	

1903年11月	元帅	奥 保巩
1904年 3 月		山口素臣
1904年 6 月		冈泽 精
1904年 6 月	元帅	长谷川好道
1904年 6 月		西宽二郎
1904年 6 月		儿玉源太郎
1904年 6 月		乃木希典
1904年 6 月	元帅	贞爱亲王
1905年 1 月		小川又次
1905年10月	元帅	川村景明
1905年10月		大岛义昌
1906年 5 月		大岛久直
1906年 5 月		大迫尚敏
1906年 5 月		立见尚文
1906年11月	元帅	寺内正毅
1908年 8 月		井上 光
1908年 8 月		大久保春野
1910年 8 月		土屋光春
1911年 9 月		鲛岛重雄
1912年 2 月		上田有泽
1912年 8 月		浅田信兴
1912年11月	元帅	载仁亲王
1914年 9 月		福岛安正
1915年 1 月		安东贞美
1915年 1 月		中村 觉

1915年2月	元帅	上原勇作	3士
1915年8月		一户兵卫	
1915年8月		内山小二郎	○3士
1915年8月		大迫尚道	2士
1916年6月		神尾光臣	
1916年11月		井口省吾	○2士
1916年11月		大谷喜久藏	2士
1916年11月		秋山好吉	○3士
1918年7月		松川敏胤	○5士
1918年7月		仁田原重行	○6士
1918年7月		本乡房太郎	3士
1918年7月		明石元二郎	○6士
1919年8月		柴 五郎	7士
1919年11月		岛川文八郎	7士
1919年11月		宇都宫太郎	○7士
1919年11月		大井成元	○6士
1919年11月		由比光卫	○5士
1920年8月		立花小一郎	○6士
1920年12月		大庭二郎	○8士
1921年4月		河合 操	○8士
1921年6月		田中义一	○8士
1921年12月		福田雅太郎	○9士
1921年12月		山梨半造	○8士
1922年5月		尾野实信	○10士
1922年5月		町田经宇	○11士

1923年8月	元帅	邦彦王	○7
1923年8月	元帅	守正王	7
1923年8月		菊池慎之助	○8士
1924年8月		田中弘太郎	9士
1924年8月		铃木庄六	○1
1924年8月		奈良武次	○11士
1925年3月		白川义则	○1
1925年8月		宇垣一成	○1
1925年8月		菅野尚一	○1
1926年3月		森冈守成	○2
1926年3月	元帅	武藤信义	○3
1927年2月		井上几太郎	○4
1927年7月		铃木孝雄	2
1928年8月		矶村年	○4
1928年8月		金谷范三	○5
1928年8月		田中国重	○4
1929年8月		菱刈隆	○5
1929年8月		岸本鹿太郎	○5
1930年3月		吉田丰彦	5
1930年3月		南次郎	○6
1930年5月		畑英太郎	○8
1931年8月		渡边锭太郎	○8
1931年8月		绪方胜一	7
1932年4月		林铣十郎	○8
1933年6月		真崎甚三郎	○9

1933年6月		本庄 繁	○9
1933年6月		阿部信行	○9
1933年10月		松井石根	○9
1933年10月		荒木贞夫	○9
1933年12月		松木直亮	○10
1934年3月		林 仙之	○9
1934年3月		川岛义之	○10
1934年11月		西 义一	○10
1934年11月		植田谦吉	○10
1935年10月	元帅	寺内寿一	○11
1936年8月		岸木绫夫	○11
1936年11月	元帅	杉山 元	○12
1937年11月	元帅	畑 俊六	○12
1937年11月		小矶国昭	○12
1938年6月		中村孝太郎	○13
1939年5月		古庄干郎	○14
1939年8月		鳩彦王	○20
1939年8月		稔彦王	○20
1939年8月		西尾寿造	○14
1940年8月		梅津美治郎	○15
1940年8月		山田乙三	○14
1940年12月		莲沼 蕃	○15
1941年4月		冈村宁次	○16
1941年4月		土肥原贤二	○16
1941年7月		多田 骏	○15

1941年7月	板垣征四郎	○16
1941年10月	东条英机	○17
1942年8月	后宫 淳	○17
1942年9月	前田利为	○17
1942年12月	塚田 攻	○19
1943年2月	山下奉文	○18
1943年2月	冈部直三郎	○18
1943年2月	藤江忠辅	○18
1943年5月	阿南惟几	○18
1943年5月	今村 均	○19
1943年9月	田中静壹	○19
1943年11月	富永信政	○21
1944年1月	安藤利吉	○16
1944年9月	山胁正隆	○18
1944年9月	小畑英良	○23
1945年3月	河边正三	○19
1945年3月	喜多诚一	○19
1945年3月	栗林忠道	○26
1945年5月	下村 定	○20
1945年5月	吉本贞一	○20
1945年5月	木村兵太郎	○20
1945年6月	铃木宗作	○24
1945年6月	牛岛 满	○20

以上134名丰富多彩的新旧阵容，其本身就说明了陆军的历史。但是，笔者列举上述人物，其本意在于：陆军虽然如此

大将辈出，究竟是否都具有各级指挥官、特别是战场指挥官的经历呢？

简言之，冈村将军自日俄战争末期任小队长身临战场以来，除旅团长以外不仅历任陆军平时和战时各级指挥官以及最高指挥官，并且具有除中队长、大队长以外所有战场指挥官的经验。大将固然不少，却没有具备这样经验的人。因此，他的战场体验札记，是极宝贵的记录。

本书所收录的札记以外，还有冈村将军在各个时期的阵中随感录，在本书的札记中也屡屡提及。其内容有“战场上的军风纪”、“统率”、“生死观”、“个人所见、他人评论”、“日、中关系”、“共产党关系”等，已成为后人的教材。另外，还有“统帅”部分，但在停战后已经烧掉。

本书原拟将上述一切资料全部收录，但因一概禁止发表，故而割爱。然而，如前所述冈村大将是唯一具有丰富的战场指挥官的经验的人，在此意义上，其札记堪称“统率之书”。为使本书更臻完善，故将“统率之道”及“战场上之生死观”一并摘录附记如下。

统 率 之 道

1938年9月7日(九江 第十一军司令部)

余自联队长时期以来，幸得部下相助，得无大过，晋升至今。此间，自信对统率之秘诀，有所体会。综合部下酒后直言及其感谢之辞，或间接见闻，确信余虽不敏，然至今颇赢得部下之信任。

回忆上述有关统率之体验，并综合他人之言行及读书修养所得，试举统率上必要之性格及德操如下，作为今后之参考。

(一) 宽宏大量。容纳部下之进言，不干涉其提案之细节。

(二) 忍耐及宽恕。但对有关人事问题，有时须注意其细节。

(三) 诚恳及热情。心怀感激，富于同情，重视人和。公私分明，身先士卒，苦乐与共。

(四) 明朗豁达。

(五) 果断及勇敢。

(六) 着重考虑大局。部下幕僚日常事务繁忙，往往无暇顾及大局。为领导者，对此必须特别修养磨练。

1938年9月12日(九江 第十一军司令部)

如前所述，统率切忌干涉细节。但有关世道人情之事虽属细节，却应考虑其对统率的重大影响。而辅佐者由于忙于事务，往往对之考虑不周。因此，统率者应亲自指示此等细节，并付诸实现。

九江的二、三事举例如下：

1. 参拜遗骨、慰问伤病患者等。如待辅佐者提议，往往贻误时机，因此需要自己提出。

2. 负责收集粮秣及供应人员，在当地收集的蔬菜、鸡蛋等，在分配时，如对优先供应住院伤病患者缺乏同情心时，应予以指摘。

3. 出差之际，辅佐者往往不太注意必须首先安排慰问伤

病员的计划。

1941年12月29日（北京 华北方面军司令部）

如同时、同地发生应对某一部下表示悲痛而为另一部下表示欢庆的情况时，即同时出现悲喜交集情况，应如何处理？12月4日我在徐州即遇到这样情况。曾三度任我直接部下的楠山少将，于3日在徐州因飞机事故突然死亡，4日去陆军医院弔祭。是日又参加樱井兵团举行的联合慰灵祭。樱井兵团在华中创建时即隶属我部，最近在华北又系我直属部下，战功显赫，现今要离开中国战线转向遥远的南方。因此，我必须满怀深情举杯欢送，为其壮行。但是，如果避开今天这个悲哀日子，把祝贺延期到明天，时间又不允许，于是，我就在当晚设宴招待樱井兵团干部。席间我致词说：“让我们暂时忘记追悼战友的悲伤感情，祝贺我们的前途”，做到了愉快送别。

1944年5月28日（北京 华北方面军司令部）

情爱是构成人性的一大要素，同时亦为统率的根本。爱护部下必须深入体察部下的立场。

行军宿营时，如有沐浴设备，宿营的最高长官应注意迅速入浴并尽量缩短时间。如有人来访或其他事项时，也应使之稍待，而先行入浴，以免使多数部下失去一天最大快乐的入浴时间或因入浴而推迟睡眠时间。

以上是我任大队长时的体验，至今严格遵守，从而养成快浴的习惯，一般只用十分钟即可。

不论平时或战时，拥有多数部下、随员者，必须注意上述问题。

十几年来，据我观察，即便是具有相当优秀人格的将官、

团队长等，不少对部下入浴问题是不关心的。实为遗憾。

1944年7月19日（北京 华北方面军司令部）

这次河南作战，独立步兵第九旅团是在日本国内仓促编成，旬日之后即于一个月前调来中国，其素质低劣、装备不良又缺乏训练，本来预定用于维持治安，但这次也使用于大战役中。考虑到他们的不良条件，对其作战颇为忧虑。但是，作战开始后，在汜水附近的持久战，攻击洛阳城、转进陕西省境及灵宝会战等，均取得相当优良战果。特别在最后的会战中，攻击国民党嫡系最精锐的胡宗南部两个师时，激战两日，虽然三名大队长战死，其他伤亡也较多，但终于将其击退，获得预料不到的战果。所以能如此，大家一致评论，旅团长长岭少将勇敢顽强，行军时在尖兵中队，战斗时常在最前线指挥是首要原因。这说明指挥官的为人及其身先士卒的精神，对提高部队战斗力具有何等巨大影响。

1944年10月6日（湖南南岳 第六方面军司令部）

部下在完成某项任务时，如果认为大体满意，则应立即加以表扬。这虽是理所当然，但在军务繁忙之际往往容易忽略。信赏必罚的原则必须坚持。从精神方面或事务方面都应如此。当部下完成了某项工作，而担心上级是否会满意时，必须立即解除他的担心。我有时曾因忘记及时表扬，日后才知道部下为此长期不安，颇为后悔。

1944年11月25日（湖南南岳 第六方面军司令部）

统率杂谈（身边琐事及统率）

综合过去所想到的问题，再加来南岳后领悟到的一些情况，记述如下：

838743

(1) 在华北方面军时期，饭后经常送来罐头菠萝二片，我为省下一片，就命令勤务兵今后可只送一片。到此地后又碰到完全相同的情况。我发现这些饭后菠萝是由主任下士官交给我的勤务兵的，因此，我想如果我不命令改送一片而是自己吃一片把另一片留给勤务兵，这样在统率上岂不更好。于是，这次我未加干涉，并且后悔当初在华北军时，未能这样做。

这使我想起来，在接受家庭宴会吃中国饭菜时，不能因为大鱼好吃就把鱼的两面都吃光，而应把底下的一面留给主、客的随从、佣人等吃。这是一种不成文的道德规范。这和菠萝的情况是颇为相似的。

(2) 澡塘的勤务经常要给我擦背。我从前述统率的观点出发尽量快洗，往往就不让他们擦背，但在时间富裕又不影响别人入浴的情况下，则尽量接受他们的好意。这是因为勤务兵们过去在部队里习惯地把中队长当做军中最大的人物，而今在陆军大将身边照料生活，感到光荣，因而，诚心诚意要为我服务。理解他们的这一心情，就不应辜负其好意。

(3) 在住家或旅馆等处脱掉木屐或拖鞋进入房间时，由差役或使女整理这些脱掉的鞋子，是一般的习惯。在军中看到这些由差役、使女干的活，都要由勤务兵来做，我不禁有些同情他们。我认为在进入房间时，应该自己把鞋子摆好，这样既可以使繁忙的使女或差役省些力气，也可以改变日本人缺乏公共道德的恶习。我在一年前认识到这一点，在旅行中或在自己房间里，尽量这样做。但有时一忙就忽略了。此次出发以来，看到勤务兵干着这些差役、使女的活，深以为耻，因此，一定要自己动手。

以上三点，虽属细微小事，但也是统率之道。

1946年3月（南京 总司令部）

1907年秋，在栃木地方举行日俄战争后首次特别大演习。预备兵也被召集了。我作为步一小队长参加了演习。

某夜，我担任小哨长在第一线值勤，按照当时惯例，晚饭在午夜才送到最前线。因此，晚八时左右向小哨供应一次烤白薯。因为经过一天的激烈活动，士兵们早已饥肠辘辘，见到烤白薯皆大欢喜，都聚集到我的身边。我召集了分队长，先查明了当时因站岗、侦察以及其他勤务不在场的人数，把他们应分的份留出来，再向在场的士兵分配，这样就费了相当的时间，这可能使某些士兵不满。我偶尔听到一个象预备役的老兵对着发牢骚的新兵大声怒骂：“你们不明白小队长的心意，这个说慢了，那个说磨蹭，这是些什么话！你们不懂，当放哨和侦察出发时，想到后方有小队长惦记着自己，他们心中就感到有依靠。象我们这些有实战经验的老兵，对于小队长的心意只有感谢。你们真是混蛋……。”

1936年冬，在第二师团长任内驻哈尔滨时，侍从武官送来御赐清酒。我让副官拟出分配各军官的办法。当时有几名军官因重要任务外出，要在国境线等地过几个月的半露营生活。但是，副官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我不忍心看到他们回来时喝不上御赐的酒。因此，吩咐副官先把他们的份给留出来。这使副官大为感动，当即遵照办理。

作战中，大家都密切注意主力方面的战况，为了主要作战的成功，参谋们对于以少数兵力与优势之敌进行苦战的次要作战方面，往往缺少注意和同情。我作为军司令官，在多次战

斗中，屡屡提醒参谋们注意这方面的情况，从而获得了好结果。

以上数例是要说明首先应想到不在你身边的部下，然后再考虑在你身边或容易见到的部下，这在统率上是有必要的。

战场上的生死观

1942年10月14日（北京 华北方面军司令部）

我在学生末期十八、九岁时，被禁止读课程以外的书籍，当同学们孜孜不倦专攻学业之际，我却为人生问题、生死问题而烦恼，因此，私自阅读这方面的书籍。后来，虽然收获不大，却在模糊中悟出了安心立命的根本，进入了“肉体虽死灵魂犹存”、“贯彻忠节无死无生”的修养境界。

我任少尉后不久，即作为小队长参加日俄战争桦太作战，曾二次出入于枪林弹雨之中。第一次是初上战场，在森林中遭遇敌军，我比较沉着地指挥小队进行战斗。在树林中为了便于观察情况，我站在一棵树墩上指挥作战。当晚，部下某分队长（有满洲战线经验）给我提意见说：“您作为年轻的小队长（当时我21岁）应当勇敢。但今天站在高处指挥，并不是真正的勇士。今后应把姿势放低，要充分利用地形。”对他的好意，我深表感谢。

第二次是率领一个小队进行侦察，当潜入谷地密林敌阵时，突然遭受来自三面的射击。当时任务是侦察敌情，因此草草应战即行后退。回顾这次战斗，对当时自己的惊慌失措感到羞愧。更因这次战斗，部下一死二伤，尤为悲痛。

大尉时期，我以参谋本部派遣人员身份，在“青岛围攻军”司令部工作。在攻城期间，我时常冒着弹雨视察最前线的攻击情况，有时整夜在最前线度过。当时自己是既无部下又不具备真正出征者的身份，因此，有一种说不出的寂寞和空虚之感。虽然自己并不过分惧怕枪弹，但比起有部下在一起，怀着共同的心理去作战的人，士气是不高的。

其后，常驻中国各地，或担任顾问，或参加中国内战，也遇到过土匪之类的人物，但自己从未胆怯过，只是深深感到作为一个日本人，在外国人中间，只身遭遇危险时，比在战场上指挥多数部下进行作战，必须具有更大的胆略。

回想少将时期在关东军参谋副长任内，参加第八师团对古北口、新开岭三天的阵地攻击战中，曾进入第一线联队长、大队长的位置，遭受过猛烈射击。此时，虽然也没有部下，但由于职务的关系，却决心十足，斗志昂扬。

如上所述，我在战场上出入于枪林弹雨的经验，极为不足，愧无讲述战场生死观的资格，由于没有中、大、联队长的战场经历，自难触及这一问题的真谛。然而，我有幸出征八次，尽管职务是幕僚或高级指挥官，不具备下级指挥官的经历，但有关这一问题的见闻，自信相当丰富，综合见闻，官兵的生死观大体可分为以下两种：

(1) 准备好遗书，决心一死者。

(2) 完成任务第一，不过分考虑生死，生也可，死也可，生死置于度外者。

战阵训示中有关生死一节，大体按第(2)项训示，在其他章节中也有(1)的要求。

我由于读书及其他修养，如今的心情有如第(2)项。特别和多数部下不同，我有幸已升至大将，并获一等功的最高位置，因而能有轻松心情，而今，唯有忠实奉公完成任务，死亦无憾。

1945年12月1日（南京 总司令部）

我由于常年的战场生活及读书修养，大体上对生死观已有定见，但随着今夏境遇之剧变，感到过去主要以完成任务为基础的生死观已有动摇，因而愿在人生本来的道路上重新确立生死观。于是开始坐禅和诵经。无师之禅，尽管无多大效果，但也只管打坐以待未来。

第一篇 从投降到归国

前 言

中国派遣军的投降，不是由于本身战败，而是随着国家的投降，不得已投降的。因此，保持了整齐的姿态。同时，中国方面并未采取解散日军、官兵分别收容的按俘虏对待的形式，而是以徒手官兵（解除武装的官兵）的名义，由我以下各级指挥官继续执行指挥权，并允许日军本身办理复员工作。由于中国方面对日本军民的遣返，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使复员遣返工作得以顺利进行。与此有关的各项记录，也得以较好地整理保存。即，厚生省援护局（前复员局）保存了《有关由中国复员的记录装订本》、《有关停战当时中国派遣军的情报记录装订本》及《有关中国派遣军兵团长幕僚手记装订本》等，防卫厅战史室也保存了《中国派遣军情况报告》（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中将向复员局提供）。根据这些记录，可以相当详细地了解投降、复员、遣返等情况。

但是，这些毕竟是官方记录，有关当时当地的客观形势，秘密事项以及我本人身边可写的琐事等，其中均未记载。因此，尽管与这些记录有某些重复，也不厌其烦，予以叙述。特别是复员完毕只剩我一人时，完全没有官方记录，只能依靠我的日记，以我个人的观点加以叙述。

第一章 停战前概况及投降前兆

一、停战前概况

中国派遣军自 1945 年春以来,根据大本营命令为防备美军在中国登陆,决定以扬子江下游三角地带(上海、杭州地区)为主要战区,其他在中国的作战则以广东及山东地区的所谓“光号作战”为主,进行准备。八月中旬,除某些尚需准备、补充事项外,大体部署完毕。深入到广西省桂林、柳州地区的部队,作为派遣军对美决战的兵力,在战斗中陆续后撤,向上述三角地带集中。

在北方,与苏军进入满洲相呼应,苏蒙联军经由内蒙古、热河省正向张家口及古北口方面侵犯。但总军未必有充分侦察这一情况的办法。

1944 年 12 月初,我于南京就任总司令官后,全面考虑了我军的前途,认为有必要打击一下重庆,制订进攻四川的作战方案,向大本营提出建议,但未被采纳。关于这一问题,以后曾有某些批判,战史室也进行过热烈讨论。但当时我却未敢表明自己的真意。我的本意在于将美军牵制在中国大陆,以便使在我国本土的作战,得到充分准备的时间。对此,将在第二篇中加以详述。

由于小矶内阁把对重庆工作委托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一

手处理，因此我在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时代，除已建立的对重庆无线电联络路线（通过汪时璟、王大桢）之外，又新辟了第三条路线（无线电报），努力与重庆进行联络。但下手已迟，未获任何成果。盖因我们完全不知道在1943年11月22日到26日，罗斯福、邱吉尔、蒋介石三人在开罗会议上，已以相当强硬的态度决定了停战后对日方针。对这些谋略问题，将在第二篇中略加叙述。

二、投降前兆

我于1941年就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以来，继续了四年多的战场生活。在这期间，一次也未回国。因此，国内的事情，虽然片断地听到一些，但实际情况如何，既不知道也不让我知道。虽然大体上对战局的前途感到颇为暗淡，但认为还有相当的余力。不料，8月8日左右，总司令部情报课从欧洲、重庆等地的无线广播中收听到有关日本投降的消息。这一消息除高级干部外一般的未予传达。择录8月10日收听的二、三则消息如下：

1. 杜鲁门就日本要求投降，正与英、苏、中三国联系中。
2. 日本皇室是独裁政治的根源。可能以天皇退位结束战局。
3. 日本通过瑞士、瑞典政府，向美、英、苏、中各国政府提出，如允许维持天皇制，则接受波茨坦宣言。

然而，另一方面同夜接到大本营如下命令（大陆命第1378号要点电报）；

1. 大本营企图在完成对美主要作战同时，为摧毁苏联的野心，重新开始全面作战。击破该方面苏军以维护国体、保卫皇土。

2. 关东军总司令官应将主要作战针对苏联，就地击破来攻之敌，保卫朝鲜。

将投降前兆与此命令相对照，使我等驻外人员迷惑不解。

为了商讨向满洲转调兵力问题，大本营命令西浦、野尻两参谋去东京，当即命令 11 日赴京的该两参谋，搞清真实情况。

8 月 11 日欧美各国有关日本投降的广播，愈加频繁。直到今天，才由中央传来了如下停战意向。

陆机密电第 61 号

帝国由于苏军的参战，必须同时完成强硬的作战，正按照下列条件与苏、美、英交涉中。

1. 帝国对最近苏联参加的波茨坦宣言的条款，准备以不变更天皇统治大权为条件，予以接受。

2. 对上述条件的确切保证，如有任何疑义，帝国应坚决为完成战争目的而迈进。

陆军大臣、参谋总长

这对于百战百胜的中国派遣军来说，真是晴天霹雳。

同日，又接参谋总长来电：“为维护国体、保卫皇土，全军宁可玉碎决不收兵。勿因各国之和平宣传攻势及区区情报，

而削弱斗志，务期彻底完成任务(要点)。”

我根据 8 月 12 日参谋总长电报，向全军下达如下训示：

对派遣军将士的训示

“苏联终于向我进犯。皇国如今面对美、英、苏等大敌，已进入关系国家兴亡之决战中。

苏联参战早在预料之中。我数百万精锐皇军正严守皇土及大陆。必须发挥建国以来最大勇猛之传统，为维护国体、保卫皇土，只有断然决一雌雄。本官决意率吾百战百胜皇军之最精锐部队，抱全军玉碎之决心，誓将骄敌击灭，以挽狂澜于既倒。

全军将士勿为敌之和平宣传攻势所迷惑，全军应愈加精诚团结，再现大楠公‘臣一人在，圣运可保无虑’之忠诚及必胜信念，和时宗公之壮烈斗志，克服万难，一心一意为击灭骄敌而奋斗。

昭和二十年 8 月 12 日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

当天中午，我向陆军大臣及参谋总长提出继续作战的请求。同日还接到外务省向当地大使馆发来有关“处理金融”的公电的通知。

8 月 13 日，东京的西浦参谋来电，要点如下：

(1) 为使关东军打开危局，已决定由派遣军抽一个军司令部及二个师团基干兵力，转调南满。

(2) 一般任务应以对美、英、苏、中持久战为主，同时，应对关东军予以协力。

(3) 有关指导战争的政治策略，陆军中央部决心坚定。

但预料尚有若干波折（后来得知，西浦此项电稿，经过参谋次长的修改）。

仅有这些材料仍不足以了解真情，我们仍然处于迷惘之中。

8月14日12时30分，又接大陆命第1380号电，内容如下：

(1) 大本营企图在完成对美主要作战同时，为摧毁苏联的野心，重新开始全面作战，击溃苏军以维护国体保卫皇土。

(2)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应就地击溃来攻之敌，以期对苏、美、中进行持久战，并为帝国本土的全军作战作出贡献。

对照昨日西浦来电，我于15时再次致电大臣及总长，要求继续作战。又因西浦参谋来电建议：“观大本营之气氛，应奏请继续作战。”乃于16时，通过参谋总长发出上奏电报，请天皇批准继续作战。

我将继续作战意见的电报以及上奏电文，一并向属下方面军、军司令官及第一、第二总军、关东军、南方军各总司令官，发出了通电。

但是，17时20分接西浦来电称：“最坏事态，已成定局。”形势突然有变。

当晚 21 时，上海中国方面舰队司令官福田良三中将来访，当即邀来谷正之大使，三人进行了长达四个半小时的谈话，互相交换情报。谈话中间噩耗频频传来，但仍然未能掌握真相。

我和福田中将认真讨论了在最坏的情况下，将尽一切可能将陆、海军兵力向山东东部集结，并以烟台、青岛为根据地，形成半独立占领地区，以等待祖国命运终结的方案。当时，无法辨明国内的情况，竟至如此程度。

后来，西浦参谋告诉了我有关停战前不久东京的情况。其要点如下：

“8 月 13、14 日左右，在中央部纷纷传说，最反对停战的必然是中国派遣军，其理由据说是：（1）中国派遣军没有战败；（2）总司令官的积极性格；（3）在中国投降，将使我军民遭受最残酷的报复等。对于西浦的重返南京归任，中央部同僚中，有的认为是走向地狱，有的甚至向他建议立即办理退伍手续留在国内。”

西浦还谈到，当时中央部也有以冈村总司令官的强硬意见为依据而主张继续作战的气氛。因此，我的上奏意见正是中央部所最欢迎的。

上海第十三军司令部的市川情报主任参谋 8 月 8 日夜在收听外电中得知日本向联合国申请投降的消息，大为吃惊。其后，每天收听到同样消息。据说他只报告给军司令部首脑，对一般人员保守秘密。但是，在上海市民中，已纷纷传出了这些消息和一些谣言。有的庆祝胜利，有的为和平而喜悦，并发生了侮辱日本人的行为等，在全市骚动中迎来了 8 月 15 日。

这期间，我的生活大体是早7时起床，上午到总司令部。几乎每天都听取参谋汇报。午后如果天气好，就到兵器厂大水池垂钓。夜间读书、下围棋消磨时光。我原来睡眠状况极好，足睡8小时左右。但这两、三天来，不知是因为华氏90度的酷暑还是什么别的原因，夜半总是醒来，醒来就考虑到国家的前途和如何处理这百战百胜的105万大军的善后，辗转不能成眠。面对从未考虑过的，日本将退回到日俄战争以前的状态等问题，使我受到很大打击。

第二章 投降及投降后的状况

一、8月15日及其以后

九时半到总司令部。获悉大本营陆军部次长昨夜紧急播送的“天皇陛下将于15日12时亲自广播，应谨拜闻”的消息。

小林总参谋长偕冈田、今井两总参谋副长回来，提出了如今派遣军的态度，除谨遵诏命以外别无他策的意见。我表示同意。

10时10分收到陆第68号密电如下：

(1) 目前，正以维护帝国国体保卫皇上之条件，与敌交涉中。但，敌所提示条件对达到上述目的有显著困难。为此职等曾想尽一切方法，并屡屡上奏，强烈主张敌方所提条件非吾等所能接受者。但天皇陛下基于以下理由亲自决定接受四国宣言条件。

鉴于内外形势及战局之转变，如今日不收拾战局，必将陷于国体破坏、民族灭亡之绝境。敌所提出帝国最后之政体应依日本国民自由意志决定之条款，不应视作有损帝国之国体。此际应忍痛予以接受，以冀国家之存在并缓解臣民之艰辛。

(2) 圣断既已下达，全军必须谨遵圣谕。(以下略)

(3) (略)

(4) 职等含泪谨以传达。

大臣、总长

正午，总军司令部全体人员，按平时遥拜式队形，于广场东面集合，拜听广播诏书。悲极无泪，我即席向全体人员作了谨遵诏命的训示。并于午后对全军将士下达训示如下：

“蒙亲赐敕语，忧及圣虑诚惶诚恐，不知所措。

值兹圣战中途，而逢建国以来从未曾有的最恶事态，实无限悲痛，然事已至此，本职惟谨遵圣谕，以慰圣怀。

派遣军将士切勿削弱斗志，应愈益严肃军纪，坚持团结，根据唯一方针，分别为完成新任务而迈进。”

虽说我在战地，对东京的情况不详，但上奏继续作战，已违背圣虑。因此，我以此为理由电请辞职转役。15时归舍，默默沉思。

久经战阵生活的军司令官，虽有闲暇沉溺于阅读宗教书籍，但处此变局，使我不得不感到无限忧烦。首先涌上心头的是如何把105万大军和80万侨民安全地撤回祖国。其次是怎样处理自己等等。据报道阿南陆相昨夜剖腹自裁。今天铃木内阁又总辞职。但我身负撤退重责，既不能自裁又不允许辞职。8月15日我在日记中只写道：“余决心置身于不求生

亦不求死之境地。”

夜，福田司令长官来访，交谈结果，认为除谨遵圣谕外，已别无他策。

南京的骚动

自8月15日前后，南京城内人心浮动，形势不稳。17日有自称为周镐者，预料到日军已不会再采取武力行动，率领名为行动总队的武装团体，占据行政院副院长兼上海市长周佛海邸内，并在城内中心显目的中央银行附近，设立了重庆政府的前进指挥所。胁迫南京国民政府要人，枪击陆军部长、监禁了市长，终于与南京国民政府陈公博主席的卫队发生冲突，展开了巷战，市中乱成一片。经总军参谋小笠原中佐挺身而出，妥善说服，使冲突停止，结束了巷战。这场骚动宛如火花一闪而告终。由于蒋总统有名的广播演讲，对侨民很少压迫，治安大体得到维持。

注：后来审判汉奸，汪精卫政权的高级官员，全被处死。独周佛海判无期徒刑（死于狱中）。使人怀疑周从最初可能与重庆即有联系。其一派的周镐等人此举可能是为了抢先立功。

二、日军官兵的态度

中国派遣军与其他方面军不同，前后八年百战百胜，至今尚保持了足以战胜敌人之力量，而今竟因本国业已投降而不得不投降，确实面临异常尴尬的场面。前线部队未能全面收听8月15日天皇广播，据说不少人还以为圣谕广播是让他们更加努力进行奋战！

接奉大陆令第138号“8月16日19时7分即时停止战斗行动（在中国必须于六天之内贯彻到基层部队）”的电报。据此，我立即向所属全体官兵发出即时停止战斗行动的命令，并如期于六天之内贯彻到基层部队。

当时高级将领在某种程度上已想象到大体战败，但多数预料可能要“在日本本土和中国沿岸，再进行一、二次大决战，在比较对我有利的情况下讲和”（前线某兵团长的札记）。至于一般官兵，因完全不了解全面情况，几乎还认为胜利在望。在这样心情下，突然听到8月15日天皇的广播，大为震惊，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前线的少壮军官及一部分下士官或愤慨，或哭泣，或胁迫部队长强烈要求继续作战等情况不断发生，各部队长为说服他们，费了几天的功夫。军官及下士官悲愤之余有自杀者。各部队对自杀者都倒填日期按战死处理，因此人数不明。但当时据我所知，仅长江下游地区，即有某大队长（少佐）以下二十余人自杀。

值此大转变时期，各部队长为安定官兵精神，转变情绪，煞费苦心。纷纷开展了武术、体育运动、歌曲、音乐、书画以及下棋等活动。

停战不久蒋介石委员长就发表了对日本人宽大处理的方针，因此，中国军民对我军的态度大体良好。日本除下述与共军接触地区之外，基本上保持了稳定的秩序。

在长江以北驻有共军的地区，随着停战，国民政府军和共军的矛盾激化，都要夺取我军占领区域内的要地。8月16日清晨以来，由于到处发生了企图占领交通干线及要求我小部

队解除武装等情况，为此，我派遣军通告中国方面：“对不法扰乱治安者，不视为蒋委员长统制下的部队，不得已将断然采取自卫行动。”同时命令所属部队，未得统帅系统命令，对敌人的任何要求，坚决予以拒绝，必要时应断然实行武力自卫，毋庸踌躇。

有关共军的行动及苏军的不法行为，容待后述。

停战时中国派遣军的兵力，约为 105 万（华北方面军 30 万，第六方面军 35 万，第十三军 30 万，第二十三军 10 万）。

三、中国官民的态度

停战后，中国官民对我等日人态度，总的来看出乎意料的良好。这可能与中国人慷慨的民族性格有关。但我认为其最大原因，是广为传闻的蒋介石委员长 8 月 15 日所作的“以德报怨”的广播演讲。（广播全文译略）

这个演讲与当时苏联斯大林之“讨还日俄战争之仇”的声明比较，应该说中国之豪迈宽容，无以复加。我认为，这一思想及方针，如后所述，已成为中国官民在接收中对待日军投降手续及战犯等一系列问题态度的基础。

这一大方针，大体上得到遵守。但由于在基层军民中执行的不够彻底，因而也发生了不少小的纠纷。地方杂牌队伍中，有肆无忌惮索要武器者，有强索金钱财物者，甚至也有捏造罪名无理扣押者。

蒋介石委员长对日本人最集中的北京（约 10 万）、上海（约 10 万），分别部署其嫡系胡宗南、汤恩伯的精锐部队。因此，这些地区彻底贯彻了上述方针，接收及遣返等事宜得以圆

满进行。

其他地区总的也表示了好意。汉口的中国军司令部在旧历9月9日重阳节时，向日军司令部赠送了满满一卡车月饼。

只是共军，如上所述与国民政府军的矛盾加剧，在中共势力范围内，此一大方针未能实行。

8月17日、18日，北京、上海中央政府系统的报纸即已复刊，在其第一期报上，根据蒋委员长的方针，刊载了大意为“勿以暴力代替暴力”的社论。新任上海市长蒋伯诚、副市长吴绍澍两氏，也发表了同样内容的谈话。

此外，借此时机，重庆政府内部广泛兴起中日合作的风气。此等情况从后记许多事例可以看出。

有关处理投降日军的情况，后当述及，但其基本方针具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不称俘虏而称“徒手官兵”，一是到遣返为止不解除军队的组织，保持部队的指挥体制。官兵二字，在日语中是将兵之意，徒手官兵即意味着失去武装的将兵，这在精神上使人产生好感。有关指挥体制，则命令改变职称，将我的总司令官改称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长官”，各方面军司令官改称“某某地区善后联络部长”。

总之，中国军、官、民对我方的态度，一般良好。但中国地域广阔，局部地区也曾发生对日本军民侮辱暴行及不法行为。以致侨民中有的表示要恨中国人一辈子。另一方面，也还存在根深蒂固的反日情绪。（参照第四章9月24日、26日，10月1日，12月6日的日记）

但是，总的来看，与其他方面比较，可以携带比较多的物

品，不到一年，200万军民即能返回日本，这应该说主要是由于上述蒋委员长的方针及中国官民善意才得以实现的。然而，随着时间的转移，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参照第四章10月1日日记）。

四、共军

共军以陕西省延安为总根据地，分散驻在华北、内蒙一带。其新四军占据江苏省北部。华中、华南没有共军。

8月15日午后4时左右，有一自称新四军军使名叫章克的人，前来南京派遣军总司令部，强要面会总司令官。接到这一报告的今井总参谋副长令卫兵司令询问其面会事项，答称协商有关接收日军武器问题，故拒绝会面并令该人离去。这是停战当时发生的事实。缺少武器的共军，其急欲获得日军武器的迫切情况，由此可见。

8月16日以来，华北一带及江苏北部日军，由于拒绝共军提出的缴械要求，到处发生了战斗。仅举二、三事例如下：

江苏省松相镇警备队，12月份受到共军的猛烈攻击，丧失三分之一的兵力突围而出，中队长战死。

同一时期，江苏省高邮警备大队受共军攻击，激战二日，受重大损失，终于被共军解除武装。

山东省泰安附近的第十一独立警备队（司令官洼田少将以下约四千人），接到中国总司令部命令，全副武装向济南集中。但被优势的共军包围，要求交出武装而陷于窘境。其结果如后所述。

1962年2月11日的《读卖周刊》刊载了停战当时在济南

的第十二军参谋铃木一郎少佐的札记，以《共产八路的进攻》为题记述了停战后的情况。

总之，停战后华中（除江苏省北部）和华南，几乎未闻一声枪声。但华北及江苏省北部，我军为对共军之攻击实行自卫战斗，共死伤七千多人。从这一情况可以推知，共军非法要求及非法攻击次数之多。战后，日本的左翼文人，照搬中共的宣传，写了一些当时日军向共军挑起战斗的情况。但是谁都可以想象出，不论日军多么勇敢，停战后也不会挑起这样毫无意义的战斗。1964年2月号的《世界》杂志，载有竹内好撰写的《再论日中问题》一文，文中有“把已经解除武装的日军重新武装起来，用以讨伐共产党的秘密交易，共军是不答应的”云云，纯属谎言。

战争中，我高级司令部照例收听敌方无线电报。对延安发出的中共电报固然也曾截收并努力破译，但因与苏联的密码相似，始终未能破译。然而，停战不久却破译过一次。那是一道军事命令，主要内容是命令从张家口至承德一线、山海关附近一线以及从烟台附近的海路，形成三个纵队，火速转进满洲。

推测这一措施，可能是和苏联协定的结果。之所以如此推测，是因为苏军不顾8月15日之停战，恣意强行进攻，竭力打开张家口、承德等要地。这自然使人联想到，共军向满洲转进的目的与当时占领满洲的苏军有关。从以后苏军将接收我关东军之武器移交共军一事，也可做出上述推测。

五、国共矛盾

国、共两党本来冰炭不相容，战争期间，暂时在表面上采取了一致行动。共产党以周恩来为代表驻在重庆负责与国民党进行联系。同时中共利用与日本的作战，努力掌握华北民心，逐步巩固了地盘。

另一方面，蒋介石将其嫡系最精锐的胡宗南部队，集中于接近中共根据地延安的西安附近，几乎不用于对日作战（仅在河南作战时出动过一、二个师），专门监视延安。

随着停战，国共关系再度恶化乃是自然的趋势。如前所述，共军于各地恣意要求日军解除武装，地方杂牌部队也提出非法要求，群情骚然。为此，我对中国方面提出“凡不法扰乱治安者，不视为蒋委员长统制的部队，不得已将断然采取自卫行动”的通告，并命令部下未得统帅系统命令，对敌人的任何要求，坚决予以拒绝，必要时断然实行武力自卫，毋庸踌躇。

国民政府中央军，由于大部在中国内地，到达华北一带接收地区旷费时日。相反，共军却长年盘踞于华北一带，在中央军到来以前，共军和日军的纠纷及战斗即已发生。

关于重庆和延安的关系，山西阎锡山于9月初，曾有如下谈话：

（一）最近毛泽东为和蒋介石会谈去重庆。这是由于重庆的再三邀请和赫尔利美国大使斡旋的结果。苏联对于由重庆统一中国，伪装不干涉内政的态度，也劝毛赴渝。会谈可能在形式上取得政治上合作等结果，但未必能成立包括军事在内的全面合作。

(二) 苏联之所以强行进入张家口、热河、山海关(注,后述),是为了使满洲成为对冀东、内蒙方面共军武器、资材的补给基地,因而共军的武力将成倍增加。

(三) 由于延安企图进行共产主义革命,势将不顾抗日目标消灭后惹起内乱而招致的批判,径向革命迈进。

(四) 苏联在表面上虽然承认由重庆统一中国,但与过去的对外蒙政策相同,也将采取双重政策。

8月下旬在重庆的蒋、毛会谈,关系到中国国内将来的形势发展,世界各方面寄予期待和担心。正如后来历史所表明,阎锡山的预言大部说中了。

美国也参与了渝延合作的活动但以失败告终(参照第九章1947年1月31日日记)。详情在魏德迈将军的“魏德迈将军报告”中有所评述。

六、苏军

8月15日以后,在中国的日本报道机关一律停止活动,因此有关中国的消息全是外国的报道。关于在华日本军、官、民发生的事件,很多根本没有传到日本国内。其中,我要大书特书留之后代的是停战以后苏联军队不法至极的行动,严格说来是苏蒙联军,但蒙古兵不过是附庸,因此仍称苏军。

作为同盟军的一员,拥有飞机、坦克、大炮的苏军由外蒙南进,明知8月15日停战,却仍然继续前进。8月17、18两日,以少数飞机轰炸张家口,18日迫近张家口北侧我军阵地,19日开始向我军攻击。

对此,我方立即派出揭起白旗的军使(参谋),但苏军非法

向之射击，致使军使负伤，交涉工作未能进行。20日10时30分，再次派出军使向苏军要求停止战斗行动。但苏军强硬要求必须在本20日17点以前占领张家口并解除全体日军之武装，不肯中止进攻。

我虽接到苏军非法前进的报告，但因大本营已下达有关与苏军进行就地停战交涉的指示，因此8月19日13时30分对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发出了如下命令：“当苏军突入承德地区及内蒙地区时，应即停止战斗行动，适当进行就地停战交涉并交出武器等。如情况允许，应于苏军侵入以前提前撤退。”

驻蒙军司令官提出了“张家口附近住有约四万日人，从20日晨已开始撤退，但全部撤出至少要到22日，为使军队后撤至少能有两、三天剩余时间，拟在长城一线要地，断然抑止敌之前进”的意见，对此，华北方面司令官8月20日下达如下命令：

“对于蒙疆方面苏军之非法行为，深知贵军之苦衷，但体诏书，遵大命，此正忍辱负重之时。本职基于大命，忍泣吞声，严令采取一切手段迅速停止战斗，并进行就地停战交涉及交出武器。”（下略）

于此，驻蒙军排除重重困难，立即开始撤退军民，使用汽车、火车以及徒步离开张家口附近，历经数日艰辛，好不容易才集中于北京、天津地区。包头、大同方面军民，集中大同后，再向山西太原方面撤退。

由于张家口的撤退过于仓促，我日侨抛弃财产，多数人除

身上衣服外，一无所有，因此，不少人对军的措施不满。但，如果不在苏军侵入张家口以前撤出，我日侨将陷于何等悲惨境地，从后述山海关事件中，可想而知。军之措施实非得已。

热河省一带原来是关东军负责地区，停战同时，盟军指定为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向蒋介石总统的投降地区，但在这一地区由于苏军恣意进攻，无法遵照执行。曾电告日本中央部，期望国际处理，但未得任何回音。

8月23日晨，拥有坦克数辆、炮若干门的一支苏军，到达长城线古北口，侵入市区，以步枪、机枪狂乱射击，强要解除我混成第八旅团武装。如上所述，负责接收这一地区的为蒋介石政府，并非苏军，作为盟军之一员的苏军，理应充分了解这一情况。苏军的行动虽极端无理，但我旅团忍耐自重，避免战斗，将部分武器移交苏军，部队撤退到后方约五里地的石匣镇集中。

翌24日晨，苏军竟顽固地追到石匣镇，强要解除全旅团武装。我方当即指责其非法行为并要求其撤退，但苏军借口奉上级命令不肯后撤。我方以与上级司令部联系需一定时间为理由，拒绝缴械，双方进入相持状态。在此期间，我当地部队，向华北方面军司令官请求派遣正式军使及增援兵力。

在此以前，8月21日我接到华北方面军提出“如苏军非法向京、津地区进攻时，为保护侨民及自卫，拟断然行使武力”的意见。作为总司令官，我立即表示同意。

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已下定决心与进攻到接近北京的石匣镇的苏军一战，于8月21日增援了装甲部队，派出了军使，并通报苏军于明日（30日）回答解除武装问题，但苏军趁29日

黑夜全部向古北口方面退走。

总之，苏军在张家口、古北口两方面，明知8月15日停战，却硬向似已预定的目标前进（据说桦太方面也发生同样情况），虽不知其原因何在，但可以想象似与中共气息相通，以便迅速解放这些地区。

山海关事件

前章提及未传到日本内地的有关日本人发生的事件中，最大最悲惨的事件，即下述的山海关事件。

8月31日正午，约三百余名苏蒙军突然侵入山海关。我特别警备队为避免发生战斗，努力进行交涉。但对方态度强横，我军如留在该地势将发生冲突，不得已乃向秦皇岛撤退。当时下定决心，如对方继续前进，则不惜一战。撤退时，曾劝说我侨民一同撤离，但我国领事认为停战已经半月，通过外交交涉可以充分保护侨民安全，因此未与部队一起撤退。

但是，我军一撤走，苏军即将领事监禁，把我侨民中的男人装上火车运往满洲，将全部妇女囚禁在一个地方，然后叫出来施加暴行。在当地从事火线招待职业的妇女，因自己本是不洁之身，为保护良家妇女，主动出应召唤，当时情景惨不忍闻。我领事为此引咎自杀。在这一事件中，男侨只有一人逃脱，从而听到这些情况，估计事实可能更为严重。

停战后，满洲好象到处发生了类似的事件，但很多情况未能传到内地。不过书刊、杂志已有片断记载。

七、我国侨民

我国侨民对于意想不到的战败，虽然受到了极大的打击，

但停战以后的态度尚属镇静。然而也有一部分表现不好的。

从来日、华两国之间，屡屡发生局部事变，当地我侨民虽或多或少蒙受某些损失，但从来没有丧失全部财产的情况。住在有治外法权的租界内的人们自不待言，就是住在南京这样没有租界地和中国人杂居的人们，也能临时到别处避难，而委托中国朋友照料其财产。但是，这次由于全面结束战争，情况则大不相同，不少人把几十年积累起来的财产白白扔掉，身无分文地回到日本。然而，也有自私自利的卑鄙人物。老实说，我在当时很同情他们的处境，但是没有办法。

就连我这个当时高高在上的很少知道下面情况的人，停战后三、四周内，也听到了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举例如下：

- (1) 从满洲撤退到南京的数百侨民，前来诉说没有钱用，我总领事馆非常同情，发给他们数亿储备券。但是，后来开始向日本内地办理汇款手续时，这些从满洲来的侨民中的大多数人，都涌向银行和邮局汇款。他们实际上有钱，却来哭穷。
- (2) 我军部向侨民分发了三个月的粮食及其他物品，似乎有不少人卖给了中国商人，据说现在上海虹口地区，不少中国商人在街头叫卖我陆海军的军用品。
- (3) 上海、南京的高级饭店里，至今仍有相当多的日人出入，醉酒纵歌。他们的这种不正当的行为，也受到了某些中国人的责难。
- (4) 最近上海街头上有一美国兵，被一日本人的过分傲慢的态度所激怒，就把这个日本人的衣服扒光，把衣服

给了看热闹的中国。

- (5) 据上海财界元老亲日的周善培向他的一个日本友人透露：刚一停战，日本中、小公司的社长们陆续来访，纷纷提出想把他们会社的名字改在我的名下，继续营业，平分利润等，我一律拒绝了。我多年标榜亲日，但很少象今天这样瞧不起日本人。
- (6) 据说在北京，有些日本人运动重庆政府方面先遣参谋和官吏，谋求职业以便留下不走，也有的日人过分非难日军之行为，以博取中国人之欢心。
- (7) 张家口紧急撤退之际，最早逃到天津的一部分我方官员，出入于当时还在继续营业的日本餐厅，激起了一同撤退来的侨民之愤怒，吓得他们逃之夭夭。
- (8) 到南京居留民团商谈所的侨民，所谈的问题都是只想使自己一个钱也不要损失，或者尽可能多捞些钱的自私自利事项。当局对此非常厌烦，自然也缺乏诚意。为此，侨民责难当局不关心他们，真是丢脸。
- (9) 有人来函指出：南京某妓院老板因停业，把四名妓女赶走。她们走投无路，找到总领事馆和居留民团苦苦哀求，也未得很好解决，后沦为乞丐流浪街头。
- (10) 某航空公司南京营业所职员，在停战同时，即专心用大型飞机将家属和家具等运回内地，回国前夕还痛饮纵歌，因此，侨民极为愤慨。
- (11) 在侨民向集中营移动或撤退情况见闻中，大部是光顾自己，缺乏同舟共济的感情。

这不禁使我回忆起，当年关东大地震，我在戒严司令

部任情报主任参谋时所见到的日本人，对于恐慌是何等脆弱。

我国侨民当中，原来无正当职业潜入中国社会谋生的人，在南京各处有相当数量，他们在侨民全部撤退后很可能偷偷地继续留了下来。在后述我的日记中也有这方面的记载。

八、和平后对中国处理纲要

我在士官学校学习时期，即以中日合作振兴东亚为理想，与同期盟友立志研究中国问题。我的一生经历大部也与中国有关。不幸事与愿违，两国干戈相见，遂至今日之败，对此感慨万端。

8月15日在呆呆沉思中度过。16日考虑了今后中日关系应如何处理？思想虽不明确，但认为东亚之振兴，有赖于中国之繁荣富强，对此，日本必须竭其所能予以协助。然而没落的日本，此时所能协助中国者，惟有技术及经验而已。因此心想，在接收之际也须本此宗旨办好移交。

同日，总参谋副长、上海陆军部长川本芳太郎来访，就今后中日合作问题提出了意见，该等意见与我不谋而合。同日午后，我又拜访了南京国民政府最高经济顾问小仓正恒，交换了意见。他对我的想法全面赞成。

我作为高级指挥官，在长年军旅生活中经常对各项计划、命令、方针等作出指示，但从未自己执笔，唯有这一设想是我亲手写的。8月18日我起草和平后对华处理纲要草案，由参谋补充修改。其内容如下：

和平后对华处理纲要

第一 根本方针

中国是东亚残存唯一大国。鉴于今后必须在列强压迫下进行兴国大业之艰难形势，帝国此时更应贯彻宿愿，一扫日华间的旧怨，极力支援、加强中国，以期有助于将来帝国之飞跃及东亚之复兴。

第二 要领

(一) 在整个停战及撤兵期间，皇军及侨民应坚持不屈气魄及斗志，同时要从大局着眼衷心协助中国繁荣，实践年来对中国的道义，贯彻帝国真意，以奠定日、中结合及东亚复兴的巩固基础。

(二) 停战及撤兵要在严格的军纪及巩固的团结下，做到有条不紊，光明磊落，使中国方面心悦诚服。在此期间应确保治安以保卫民众。对民众要加以爱护，秋毫无犯。

不得已需以武力自卫时，应不失时机地采取断然态度，发挥皇军的实力。

(三) 撤兵时应与中国方面密切联系，加强我军主动精神，妥善安排，扼止有人在部队调动间隙乘机蠢动，同时皇军应自始至终以自己的力量做到完全撤退与接收。

(四) 有关加强对华支援，应以真正掌握中国民心为主。首先须促进重庆中央政权的统一，以此协助中国的复兴建设。至于渝、延之间的关系，本来须由中国本身处理，但延安方面如有抗日侮日之行为，则应断然予以讨伐。

(五) 应向中国移交的武器、弹药、军需品等，根据统帅命令按指定时间、地点，完全彻底地交付中国方面，为充实中央政权的武力作出贡献。

(六) 在华一切军用及国有各种设施、器材等，严禁破坏损毁，如数向中国方面移交，以利其复兴。

由帝国投资的设施，在可能范围内以之充当对华赔偿的一部分。

(七) 在华我侨民(包括中国方面新编地区)在中国方面之谅解与支援下，以努力在中国大陆工作为原则，特别是民间工厂、企业，以及个人工商业者，应改变与中国进行无用的竞争，发挥技术才能为中国经济作出贡献。

但是，必须清除阻碍日、中友好的不良侨民。

对我侨民为正当活动所必需的配备、保卫、生活等，将迅速给予适当的指导与援助。

(八) 对交通、通信、重要企业、工厂及公共事业等，日、中合办国营企业中的日方社员，如一齐撤退，将使机构丧失机能，对社会及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因此，应在日、中间重新订立办法，使日方社员逐步撤退。

(九) 日本新的技术专家，尤以日本的保密工业部门及采矿、农业等技术，应广泛向中国公开，以利中国的发展。

(十) 对在华各企业、经济部门等遗留、固定或新增设置等，应彻底抛弃旧有权益思想，诚心协助中国的复兴建设，以促进日中合作为原则。

(十一) 对国民政府(南京)、华北政务委员会及蒙疆自治政府有关要人以及曾与帝国合作的中国人，在与中国方面协商基础上，采取万全措施以确保帝国之信义。

(本纲要要在当地与中央之间，以及当地陆军、海军、大东亚省的派出机关之间取得完全一致，以期彻底实现)

本纲要经与当地海军及大使馆协商取得同意后，已上报中央。

其后，当华中振兴株式会社总裁高岛菊次郎、华北交通株式会社总裁宇佐美宽尔两氏来访之际，就此纲要与之交换了意见，二人也完全赞成。

九、投降手续及签字

根据蒋委员长的要求，为进行预备交涉，8月20日派遣今井参谋副长等人飞往湖南芷江。今井参谋副长一行，在当地与中国委员就投降手续等问题进行交涉后，于8月23日返回，汇报交涉情况约达二小时。

其主要内容是：在芷江与何应钦及经其同意的参谋长以下人员，并美军参谋长等进行了会谈，对待日方的态度比较礼貌并表示了善意。会谈指定派遣军总司令官，为全部遣返中国战区、台湾及北部法属印度支那地区日本陆、海军及全体官兵及其他善后工作的责任者。特别是命令非经何应钦批准，严禁与其他人员交涉及破坏销毁一切武器、军需品及各种设施。必须做好完整无缺向国民政府军移交的准备。

据说中国方面的委员，大部分是日本留学生出身，对我方持有好感。8月27日总司令部前进指挥所所长冷欣中将，到达南京就任。根据他的要求，28日我去铁道部长公馆，同他进行了会谈。

冷欣亲手把何应钦总司令部的备忘录交给了我，谈话约一小时，并谈了二、三件其他事项。其中，他强调在任何情况

下,也必须确保南京、上海、北京、天津、青岛、武汉、广州、香港等八个大城市。我回答八大城市可能不会发生问题。冷欣中将是完全不了解日本情况的人,在初次见面时表现了胜者对败者的严厉态度。但是,8月31日来访时,与前次截然不同,态度殷勤,对粮食等问题表示了相当的同情。我也因治安情况不好,请求他转达何总司令在军队遣返时准许携带武器直到乘船地点。

8月24日大本营发来命令,指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合并指挥所属全部官兵及第十方面军(台湾)、第三十八军(北部法属印度支那)并统辖中国方面舰队,向蒋介石投降。

8月25日,为了与盟军方面顺利进行停战交涉,在总司令部内组成外交委员。任命今井参谋副长为委员长,尾川、小笠原、桥岛、相山、船木参谋等为委员,清水大尉及其他人员为助手。

停战后最使我担心的是怎样使二百万军民安全回国的问题。特别在国共矛盾激烈、治安状况不好地区,如何使深居中国内地军民安全集中到乘船地区,必须以极大关心妥善安排。为此,参谋部在多次商讨后,9月2日向何应钦司令提出如下“有关停战协定之请示事项”。(注:结果,大部得到同意,拒绝部分以△符号表示)

(一) 解除武装:

- (1) 请允许携带武器到乘船地区。
- (2) 请允许指挥官携带刀剑返回日本。△

(二) 回国运输:请尽量向联合国多借船只。

(三) 粮食:

(1) 请允许保留日本方面现有粮食，作为停留期间生活之用。

(2) 至乘船地不足部分，请中国方面给予补充。

(四) 组织领导：

到最后为止，运用日军之领导组织，所有中国方面的要求事项，统由日本方面负责处理。

(注：如后述，中国方面似乎已主动决定了联络部长官、徒手官兵的名称)

(五) 归国日侨：

(1) 由日本方面保护同行。

(2) 请准予优先乘船。

有关投降手续等，因中国方面连日提出了一些小的抗议、质问和调查等，参谋们昼夜忙于事务，其忙碌程度与进行大作战的情景无异，对他们高度的责任感，我深为敬佩和感谢。由于中国总司令部的交涉委员（参谋），全部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基本都会日语，在这一点上，十分方便。

9月7日，王武参谋来访今井参谋副长，当询其9月9日签字仪式，是采取总司令官携带军刀入场，然后向对方呈交的形式，还是采取不带刀入场的形式时，小林总参谋长等也参加了协商，对方回答采取不带刀入场的形式。

9月9日是在投降书上签字的日期。9时半率领小林总参谋长、今井总参谋副长、小笠原参谋、谏山第十方面军参谋长、三泽第三十八军参谋，偕同福田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官，从我军总司令部出发，到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军官学校）少憩。10时在王俊中将、王武参谋的引导下，进入会场。

在投降书上交换签字，并领到第一号命令（见后）。约15分钟投降书签字仪式结束，随即退出。

对方除何应钦总司令外，陈绍宽、顾祝同两上将、萧参谋长，海军将官等也列席，在旁边列席的还有象似美国军事顾问团的人员。

以后据中国参谋透露的内部消息说，会场布置，最初中国方面为避免威胁感，拟采取圆桌方式。但由于美军方面的干涉，才改为长方桌对立方式。另外，还规定投降者必须敬礼。即：一到会场即向何应钦总司令官敬一次礼；小林总参谋长向何总司令领取投降书时再一次敬礼，我在投降书上签字盖章后，小林总参谋长向何总司令呈交时再一次敬礼，前后共敬礼三次。中国方面对此均不回礼。这恐怕也是出自美军的建议。但是，在第三次小林总参谋长呈交降书敬礼时，何总司令却不由得站起来作了答礼。看到我这位老朋友的温厚品格，不禁想到：毕竟是东方道德！

我面临投降这一未曾有过而且是意料不到的事实，心中非常不快，但尽量保持不失沉着冷静。在会场上我不时凝视着何应钦的举动。由于是向我最亲密的中国友人何应钦投降，心中也有安然之感。

日、中两军迄今已缔结过三次停战协定。第一次是1932年5月5日上海事变结束时的协定；第二次是1933年5月31日塘沽停战协定；第三次是这次投降签字。第一次正面出头交涉的是田代皖一郎军参谋长，我作为军参谋副长辅助交涉。而且其后不久，中国政府派遣到上海的陈仪指名与我商谈满洲问题。第二次我作为关东军代表（当时任该军参谋副长）在

协定书上签了字。这回第三次，却陷入了率领一百二十万大军（包括台湾、法属北部印度支那）签字投降的命运。想到自己和这三次停战都有关系，确属奇缘，使我无限感慨。（参照第四章9月9日日记）

10时，在中国南京是9时。中国人喜欢九九九这个数字，这个纪念时日可能是特意选定的。

第一号命令（译文）如下：

中国战区中国总司令部命令

军字第一号 中华民国34年9月9日于南京

- 一、自本9日午前9时以后，本总司令对贵官所发一切公文，均作为命令或训令。
- 二、本9日午前9时以前，由本总司令送交贵官之中字第一号至第二十三号之备忘录，除另有规定者外，一律认作命令。
- 三、本9日午前9时，由贵官签字之投降书及受领的蒋委员长之第一号命令，贵官应以最快之方法转送中国本部（除东三省）、台湾（包括澎湖列岛）、安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之日本陆海空军。
- 四、贵官及属下中国本部（除东三省）、台湾（包括澎湖列岛）、安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之日本陆海空军，自本9日午前9时始，全由本总司令领导指挥，不准接受日本政府之任何领导。
- 五、由本9日始，取消贵官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之名义。由10日始，改称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

部长官。

六、由 10 日始, 贵官之总司令部改称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

七、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的任务为执行或传达本司令部的命令, 并处理日军投降后的一切善后事务, 不得自行发布任何命令。

八、本部中字第二十号备忘录所划分的各地区代表日本投降部队的司令部, 统改为该地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 并一律取消代表投降长官的原有名义, 改称该地区联络部长。列表如下:

受理投降主官姓名	日本官兵地区善后联络部名称	联络部长姓名
第一方面军司令官卢汉	越北地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	土桥勇逸
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	广州海南地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	田中久一
第七战区长官余汉谋	潮汕地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	田中久一 (兼)
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	长衡地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	坂西一良
第九战区长官薛岳	南浔地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	笠原幸雄
第三战区长官顾祝同	杭州、厦门地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	松井太久郎
第三方面军司令官	京沪地区日本官兵善后	松井太久郎

汤恩伯	联络部	十川次郎
第六战区长官孙蔚如	武汉地区日本官兵善后 联络部	冈部道三郎
第十战区长官李品仙	徐海地区日本官兵善后 联络部	十川次郎 (兼)
第十一战区长官孙连 仲	平别地区日本官兵善后 联络部	根本 博
第二战区长官阎锡山	山西地区日本官兵善后 联络部	澄田睐四郎
第一战区长官胡宗南	新淦地区日本官兵善后 联络部	鹰森 孝
第五战区长官刘峙	郾城地区日本官兵善后 联络部	鹰森 孝 (兼)
第十一战区长官李延 年	青岛、济南地区日本官 兵善后联络部	细川忠康
第十二战区长官傅作 义	包绥地区日本官兵善后 联络部	根本 博 (兼)
台湾行政长官陈仪	台湾地区日本官兵善后 联络部	安藤利吉

根据这一命令，9月9日20时，我下达有关投降命令，要点如下：

- (一) 余遵奉大命，率领在华(满洲除外)、台湾及北纬16度以北法属印度支那之全部陆军向蒋委员长无条件

投降。

(二) 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第六方面军司令官、第十方面军司令官、第六军司令官、第十三军司令官及第二十三军司令官、第三十八军司令官，应按附表之划分，指挥所辖地区内一切陆军部队(包括非部队成员)向各地受降主官投降。

为此，目前应执行另附降书及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第一号命令的有关事项。

(三) 各方面军司令官在执行上项有关命令时，应与所在地区海军指挥官密切协作。涉及陆海两军有关事项，应负责对海军部队的领导，为此，在与受降主官交涉中，应包括有关海军事项之执行。另外，有关各方面领导下的辅助部队，应按帝国陆军部队办理。

(四) 第十三飞行师团长及第二船舶运输队长，其在第六军及第十三军管内之部队，在执行第(二)项规定时(中略)，分别受第六军司令官及第十三军司令官指挥。

(五) 各方面军司令官在执行本命令时，必须迅速、确切，赏罚严明。

(六) 执行本命令时，应根据当地具体情况，书面请示当地受降主官，就地妥善处理。

(七) (以下略)

同日，又以总司令官名义，下达如下训示：

对中国派遣军将士之训示

今奉大命，率我武勋赫赫战史辉煌之中国派遣军，不得已投降敌军。念及我征战万里、确信必胜、英勇善战之将兵，以及皇国之苦难前程，万感交集，无限悲痛。

然圣断既下，事已至此，全军将士面临冷酷事实，宜彻底遵奉圣旨，毋趋极端，含辛茹苦，更加严肃军纪，保持铁石团结，进退举措，有条不紊，以显示我崇高皇军最后之真姿。

异域瘴疠之间，望全军将士珍重自爱。泣血训示如上。

9月10日，何应钦总司令提出会见。当即偕同今井参谋副长、小笠原参谋赴总司令公馆。就座后，何应钦迎头第一句话是：“日本现在已无武装，我想今后将能实现真正的中日和平互助。愿我等共同为之努力。”我对此感受颇深。

会见中，就我方先前书面申请的有关借用自卫武器、联络用飞机、借用通信器材以及粮食、运输、技术援助、解除武装、命令系统、处罚问题等，中国方面表明了态度。会谈约两小时辞去。

在此会谈中，美国方面仅马库奇中将一人参加。会谈始终在和缓气氛中进行。

第三章 接收

停战同时，国民政府系统的地方杂牌军及共军，意欲接收南京及其他各地日军武器与重要地点等情，已如前述。我方根据“对华处理纲要”，除正式的中央政府系统外，对此等蠢动则断然拒绝。但因当时中央政府远在内地重庆，正式的中央军也多驻在内地，因此，中央官员及军队，到9月以后才来接收，此乃势不得已。何应钦总司令于9月5日才到南京。在各地负责接收的中国官员及部队干部，基本上根据蒋介石8月15日广播演讲的方针，对我方态度殷切诚恳。我方也根据前述对华处理纲要，认真办理移交。因此，各地接收大体得以顺利进行。

9月某日，为做好接收准备，中国总司令部派某中将到津浦线南部各地视察。该中将对所在地日军将士作了如下的谈话，使我将士大为感动：

“日军并非战败，中国军亦非胜利。尽管如此，我等应停止一切争议，让既往之事付诸东流，而致力于中日之合作。”

当时，如此言论到处可闻。可见蒋委员长的对日方针，向部下贯彻得相当彻底。

试举二、三实例，说明民间会社及军队接收的部分情况。

华北电信电话会社（北京），10月11日被接收。接收人

员开始对我方社员作了要点如下的指示：

1. 中日社员应互相合作进行工作。
2. 日人应感戴蒋介石主席之温情，安心坚守岗位。
3. 今后必须杜绝不法行为。
4. 日人社员如受华人社员侮辱时应即报告，上级将秉公处理。

华北交通株式会社(北京)之接收情况，也与此相似。

南京丰田汽车修理工厂接收后，中国方面接收人员与日人社员同住厂内。日人照旧继续工作，待遇也未变更。

上海具有世界大规模的多数日本纱厂，有数百名日人职员留在工厂三年以上，指导生产经营。

总的情况是，一般侨民大部收容在集中营，逐步撤退回国。但接收后工厂及会社的日侨，时间虽长短不同，一般均留在厂内进行技术及经营指导。

有关军队之接收，试举最为和睦之一例如下：

“广州地区第一百二十九师团参谋长石原恕之允大佐札记(要点)：9月中旬始判明前来接收的是从缅甸调回的新编第一军。该军第一师负责接收我师团。该第一师师长于10月25日到达淡水之广九铁路附近。据报告，其前日，曾有部分中国军队，开来我守备地区。我守备队长提出在协定成立前不准进入。对方接受这一抗议，很和气地撤走了。

10月25日，我为协商今后问题，单身拜访第一师师长。我先向师长祝贺胜利，然后提出，日军事已至此，将正大光明地将武器移交贵方，并说明已准备完了。该师

长一一表示满意。最后并问我：‘贵官心情如何？’我答称：‘身为军人，心情不佳’，彼此握手哈哈大笑。接着，与接收主任谢中校参谋，商讨有关移交防地及接收武器等问题，该中校极口称赞在缅甸与之作战的我第十八师团之勇猛顽强。他敬佩日本陆军大学之教育并向我请教。会谈在和睦气氛中结束。

新编第一军是蒋介石嫡系美式优良装备的精锐部队，在加尔加答受过美式训练，军纪严明。其年青将校擅长社交，态度明朗，对与日本作战，深以为憾。有的甚至高喊：‘我们黄色人种之团结，乃亚洲当务之急。看一看香港！想一想鸦片战争！’当夜，两国军官在当地饭馆举行联欢会。中国第一师司令部除师长外全体军官出席；我方包括我、参谋及守备队长以下全体军官出席。两国军官携手进入饭馆。这一情景使麇集的人山人海的群众和士兵，投以惊奇的目光。席间，拉起胡琴，中国姑娘唱出了‘我要胜利归来！勇敢……’军歌。（中略）夜深始尽欢而散。（下略）”

以战争结束为转机，中国方面特别是上层人物之间，掀起加强日、中合作之热潮。这一情况，我曾在第二章之三中述及。各地接收中也到处可见。中国甚至有将日本的高级技术、军事技术及技术人员等，引进中国之意图。但因美国对此不满，此风遂被扼止。

10月21日，应何应钦之邀举行第二次会谈。这次会谈的气氛变了，日方只我一人，对方有何应钦、萧参谋长、钮少将、王武上校（除萧氏外均精通日语）。谈完公事后，拿出甜

酒，大家闲聊了两个多小时。席上，何应钦极力高唱中日合作。（参照第四章 10 月 21 日日记）

12 月 23 日晨，突蒙蒋介石委员长召见，遂去总司令部作短时间面谈。蒋和蔼之情溢于言表。他主要谈了以下几点：

一、从何总司令处听到接收工作顺利进行，非常高兴。

二、贵官健康如何？生活上有何不便，请不要客气向我或何总司令提出。

三、日本侨民有何困难，也请提出。

以上 10 月 21 日和 12 月 23 日都是在星期日的早晨突然召见，这使我不得不多想了一些。

以上只是好的一面，但综合 12 月中旬的各接收工作报告，在基层以检查为名，强索物品或要求接收物品清单以外的东西（此部分均为接收人员吞没）等不法行为，也有不少。

总之，到本年末的接收情况是，华中、华南均基本结束，但华北的河北省一部分地区，刚刚解除了武装，至于山东、山西两省，我军则尚在以武力维持治安及确保交通。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共军不断与我军交战，而中央军迟迟未能到来之故。

第四章 1945年后半年日记抄

8月16日

8月16日以后,也和以前一样,午前去总司令部,出席参谋汇报会。午后归舍,读书或与人面谈。钓鱼已停止,但还时常下围棋。

15时往访国民政府最高经济顾问小仓正恒。征求前述对华处理纲要之意见,彼完全同意。

临别之前,小仓正容对我说:“处此难局下,目前您最重要的任务是,把二百万军民安全撤回内地。这虽是很艰巨的事业,但您在重庆政府内有很多朋友,希望妥善与之联系。”军部以外的这位老前辈的直言,使几天来正在苦闷沉思的我,深受感动。

注:以后,以小玉吞象占卜师为中心,组织了研究易经的易经恳谈会小组,小仓和我都是小组成员。除小玉占卜师外小仓最精周易之道。该氏为财界伟人,德高望重。

南京的国民政府,于17时召开中央会议,自动解散。18时陈公博来访,报告了这一情况。我对他过去的好意表示感谢,这真是一次不愉快的会见。

东久迩宫稔彦王殿下奉命组阁。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下村定大将归国就任陆相,驻蒙军司令官根本博中将继任华北方

面军司令官。

8月17日

16时许突然接到朝香宫鸠彦王殿下下来访通知，立即与小林总参谋长及正在南京的福田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官，同去南京城外机场迎接。17时30分，殿下着陆，立即下榻于前参谋副长公馆。

在下榻的客厅里，殿下对我和福田长官的第一句话是：“为向出征中的将士传达陛下之真意，特派遣我及年轻皇族二人分别到三位总司令官处。按惯例，我应当到资格最老的总司令官那里去，但在东京风闻这里陆、海军的态度最为强硬，有被扣留的危险。因此，大家的意见，让我到最新的总司令官这里来。殿下要扣留我吗？”

我回答说：“绝对没有这样的情况。自前天敬聆陛下诏书广播以来，一心一意谨遵圣命。”

不知因何竟有这样的传闻，在混乱高潮中，是容易发生误传的。

19时，在总司令部广场，殿下对总司令部全体人员传达圣旨。我在奉答时，泫然泪下不能自己。传达完了后，殿下对我和小林总参谋长详细介绍了皇族会议内容以及陛下在最后御前会议上所讲的话。我唯有始终潸然流泪而已。

8月18日

8时半，前往鸠彦王殿下住所上报军情。殿下用一个半小时对我一人谈了各种内部机密问题。

殿下于13时乘机归国。

15时于总司令部广场，召集总司令部全体人员及在南京

各部队长，举行陛下赐予陆海军诏书的奉读仪式。

16时，上海市市长周佛海来访，略谈即去。

夜，出差东京的西浦、野尻两参谋归来，听取了停战前后情况的报告。该参谋当时之感想见后。

我本来是乐天派，过去指挥过多次大的作战，必胜的信念很强，遇事心胸开朗，故平时睡眠极好。然而，最近几天以来，遭此剧变，彻夜辗转不眠，为国家前途忧虑万端。自己的心情是：为使二百万军民安全撤退，不惜献出个人的一切。迄至今日心情方始稍定，前述“对华处理纲要”也逐渐考虑成熟。

过去的日本对外政策，其侵略的污点，确实必须反省。但其解放东亚之大目标，从人道及人类进步的角度来看，我认为还是光明正大的。然而，如今在东亚民族中能取代日本完成此大业者，当前只有中国。因此，日本首先必须支持和帮助中国的繁荣富强。战败的日本所能协助中国者，也只有技术与经验而已。

在这一思想基础上，我开始起草“对华处理纲要”。（参照第二章之八）

西浦的感想：

“我归任报告中，有如下附件。即：我从东京出发前，让我看了已由总长批准的准备拍发的电报文件。（此文件以后由东京的电报做为正式指令发出）该文件是由第二课朝枝参谋起草的，其主要内容如下：

“‘此际莫如将红色势力引进中国本土，使之与美方势力发生冲突，引进东亚之混乱，从而日本可坐收渔翁之利。’

“在总司令官邸报告上述情况后，总司令官立即表示不同

意,并表明了:‘与国民政府紧密结成一体,断然对付中共’的方针。

“我在任期间,总司令官大都同意幕僚的方案,这次的自主决定,给我很深的印象。至今我仍认为这一决定使以后总军的路线极为明确。”(1965年2月)

8月19日(星期日)

根据蒋委员长的要求,派今井总参谋副长等明日出发,乘飞机去湖南芷江。

共军到处强要我部队交出武器,国民政府系统杂牌军也是如此。苏军如第三章所述不肯停战,继续猛进。

8月20日

今日将宿舍转移到总司令部附近前副长官舍。

8月21日

谷正之大使来,协商有关陈公博去日本问题。

十川第六军司令官进驻南京,前来会面。

8月23日

任援道(南京国民政府国防部长)来访。

18时半,奉命出差赴南方总军的闲院宫春仁王殿下,归途抵南京,宿于借行社。21时前往参见并上报军情。今井总参谋副长于今晚归来,报告芷江预备交涉的情况约两小时。

8月24日

8时于城内机场恭送昨日来宁之春仁王殿下。

华中振兴株式会社总裁高岛菊次郎来访。交换今后对华政策意见,完全一致。

台湾军中村参谋来访。

8月25日

昨、今两日都有关于接收准备的汇报，今后也会经常有这样汇报，记述省略。

陈公博等八人，清晨乘MG飞机，经由青岛赴日。

8月26日

我军参谋于停战后每日忙至深夜，对事务的热诚使人感佩。今夜于偕行社招集全体幕僚，举行慰劳宴会。

8月27日

第三师师长辰巳中将来访。

8月28日

9时去铁道部长公馆，会见昨日来宁之冷欣中将（参照第二章九）。

谷正之大使、上海川本少将来访。

8月29日

出席参谋会报。这种会报每周有一至二次。

8月30日

冈田总参谋副长为接受命令去东京。

蒋介石、毛泽东会谈开始。

接到盟军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到达厚木的报告。

8月31日

(一)冷欣中将来谈有关接收重要事项一小时（参照第二章九）。

(二)空军第一路司令张上校来访，就有关空军事宜谈话约20分钟。

(三)侍从室参议邵毓麟来访，邵系熟悉日本情况的亲日

派,为我旧友,共进午餐,并就目前各问题及日、中之将来,恳谈约二小时。

从重庆发来“必须夺还已失陷的张家口”的电报命令。可能对苏军强行占领的实情,还未知晓。

9月1日

最近总理大臣东久迩宫殿下及石原莞尔,都指出我国失败主要原因之一是国民道义之低落。对此,实有同感。我前后经历了四十年的战场生活,长期观察了“战场上反映的国民精神”,与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义和团事件时称日本兵为神兵的时代相比,近代战场上日军道义之低落情况,令人慨叹,每举实例屡有所感,故均记载之。

9月2日

最近期间虽照例每日出勤,但事务不多,午后即不去总司令部。午前有时也提前归舍。

接报告,本日9时15分,重光、梅津两全权代表,在横滨海面美舰密苏里号上签署投降条约。

9月3日

对这次战争结束有感。

归根到底,地大人多的国家既是大国又是强国,中国夸称地大物博,即此道理。苏联之未败于德国,中国在军事上未战胜日本但并未屈服,此亦地大人多、人海战术之故。日、德之所以战败,正由于其条件相反。以下棋之胜负来说,即便车、马、炮无多,但仕、相、兵俱全,也不会轻易就被将死。

英国虽说是大国,但因是联邦的连锁关系,不能说人多,所以要走下坡路。将来的大国是美、苏。中国虽也具备大国

条件,但内部不团结,走上大国前途尚属遥远。日本虽有相当的人口,但土地狭小,此次终于大败,由一等国降为四等国。然而,从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看,并非没有重新成为一等国的希望。日本呀!你将走向何方!

至于朝鲜的现状和将来,我的看法是:

苏军占领满洲并继续进入北朝鲜,目前似乎已将北纬 38 度协定线以北地区全部占领完了。并且从很久以前就在其领土内赤化了很多朝鲜人,组织了朝鲜民族复兴委员会。这次已将其委员们带入朝鲜,行将封锁三八线,开始独特的政治。也有情报说:当苏军进入朝鲜时,潜伏在各地的共产党系统的朝鲜人,挥动红旗,大事欢迎。

另一方面,美军根据预定,将于本月 7 日进驻南朝鲜并着手进行整顿。由于苏军的强行占领,南北分割对立的局面恐怕不易改变。

在朝鲜合并于日本的当时,朝鲜志士深以为耻而逃亡国外,到西伯利亚、满洲、上海、美国等地,从事独立运动。我在大正末期,任上海驻在武官时,当地就有金九的纯独立派和共产党系统的独立派,我对这两派都进行过谍报战。他们在中国事变爆发后,因无法再住在上海,前者去了重庆,后者可能去了苏联。

根据情报,重庆有金九派的韩国临时政府和韩国光复军。后者有若干官兵,如今他们正策划把我军内朝鲜籍官兵全部吸收到光复军内。

目前,这个纯独立派和同是非共产系统在美国等地的一派,形成南朝鲜,而共产党系统则固守北朝鲜,两派分别以美

苏为背景，成为互相对峙的局势，看来南北统一绝非易事。

综合我派遣军内部朝鲜人官兵的意向，他们从来对日本多少怀有反感，因此，为朝鲜的独立欢欣鼓舞，不少人愿意迅速回国充当部队的骨干。他们中间也有强烈反对共产主义者，也有认为与其依靠美、苏援助，莫如仍然和日本合作的好。

总之，朝鲜国内形势复杂，能否成为独立统一的国家，值得怀疑。不变成东亚的巴尔干就是万幸。

9月5日

一、台湾军参谋长谏山中将，为报告台湾情况来访。

一、前满洲国公使中山优来访。

9月6日

一、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副总裁津田秀荣，为陈述华北企业移交等问题，约谈40分钟。

一、华北方面军高泽参谋来访，报告华北情况。

9月7日

9时半至12时，听取各军参谋现状报告，各地情况多种多样，有令人安心者，亦有令人忧虑者。

福田方面舰队司令官来访。由14时闲谈一小时许，他系来慰问，对其厚意深表感谢。

9月8日

13时于城内机场，迎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多时未到南京街头，见到祝贺战胜景象，情绪不佳。

何应钦是我中国好友之一。这次他来使我想起了1935年秋同他相见的情景。那时，我任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曾出差南京，正值排日运动高潮，很难与中国要人会面，因此，我和须

磨总领事在旅舍接见了来访的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中国军官们后，即拟回国，但突然接到何应钦（当时可能是总参谋长）电话，约我吃晚饭，并约定不谈一切政治问题，我大喜之下，前往欢谈。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亲日派。如今向这位亲密友人何应钦投降，这是一段微妙的奇缘。

邵毓麟来访，这次今井副长也来参加，就上次所谈两国关系问题继续深入地交换了意见。他很理解我方的主张，对将来日、中两国之关系尤多考虑，使我非常钦佩。

9月9日

午前投降签字仪式结束（参照第二章之九）。

在北京的长子忠正（当时在大东亚省任职）及亲戚宫崎吉利来访。

晚，与福田海军中将、小川海军少将（驻南京）、重友海军少将（高雄警备府参谋长）共进晚餐。

随感之一：

8月10日以来，虽不断受不愉快心情的折磨，但其后，因“对华处理纲要”业已确定，并决心亲自掌握处理，加以所接触的中国方面要人态度颇为亲日，而又是向友人何应钦投降，从而产生一种轻松之感。在今天的签字仪式上也未特别紧张和耽心。然而，这总是从未意料到的痛苦处境。因此，一进入会场，就试用白隐禅师夜船闲话的内观法，安心定神。对陪席的美国人默念着“座禅如在桥上，把往来行人当作深山树木”一语，借使自己镇静下来。签字时的心情，和过去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或处理公务签字时的心情并无不同。

将来即便走上断头台时，也愿持此心情。

随感之二：

我不甚了解日本国内的实际情况，因此，观察也可能是盲目的。但停战迄今，我考虑战败的原因如下：

(1) 对敌国特别是美国的战斗力，评价过低（据说开战前，后宫大将及岩畔少将等不主张对美开战）。

(2) 对北方没有信心而只图向遥远的南方进展，实属下策。我的观点是，以确保满洲为第一，然后慢慢相机行事。回想中日事变爆发不久，石原莞尔由参谋本部转任关东军参谋副长，到任后即到哈尔滨访我（我当时任第二师团长驻哈），他告我以中央的情况，互相交换了意见。对于满洲第一主义，我俩意见完全一致。

(3) 陆海军的对立竞争。事例颇多，仅举最后一例如下：

9月1日于横滨海面投降签字时，梅津参谋总长也代表海军统一签字。而指示我等对中国方面舰队只作事务性领导。签字之际，参谋次长又指示陆、海军应并列签字。在我的幕僚中也有人认为对海军只是事务领导，理当并列签字。但我不愿多一人卷入这样不快之事，加之福田方面舰队司令长官也明确表示，不管中央如何指示，他将在我的指挥下投降。于是，我决定自己一人签字。福田中将因为只是列席，本可象台湾军、法属北部印度支那军那样派出代表即可，但他为与我同甘共苦，特意来南京参加仪式，其高尚风格殊堪敬佩。

(4) 我方战斗力显著削弱。

(5) 原子弹之爆炸。

(6) 苏联之参战。

(7) 国民道义之低下。

随感之三：有关日美开战之我见

(1) 1933年5月塘沽停战协定以后，我屡屡对军中央部的友人闲谈，我提出：我们不应采取大矶的别墅尚未建成就在热海又建别墅，甚至又要在沼津物色别墅那样力所不及的政策。但对这种主张赞同者不多。

(2) 1939年秋，我在汉口军中，有日裔美人飞田来访，征求我对传说中的日美开战有何意见。我回答说：“日美开战，是极愚蠢的。日本与美国加强经济合作才是。希望你们日裔美人为此而努力。”(这番对话，我自己完全忘记了，以上是根据偕同飞田来访的大岛高精1949年2月17日来信摘出的。)

(3) 我返回内地不久，1949年3月11日有名的高岛嘉右卫门的弟子已故小玉吞象占卜师来访，讲了如下一段话：“1941年爆发了大东亚战争，急忙卜了一课，问了吉凶，但不便透露，曾走访阁下(当时小玉师住在北京，我作为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同在北京居住)，当问及这次战争结果将如何时，您说如攻占了新加坡，就必须停止战争。而且这样作要有卓越的策略家和外交官，但现下找不到小村寿太郎那样的人物了。您对我说的这些话，还记的很清楚。”(对此我自己怎么讲的也忘记了。)

9月10日

晨，往访何应钦总司令(参照第二章之九)。从这次会见，看到接收复员等很有可能顺利推进。心情稍为宽慰。

9月11日

第六军司令官十川中将来访。又，长子忠正来告知，他在北京与正金银行之伊集院、广田以及其他亲友等，组织了日华

青年同盟。以此为基础，决意留在华北。因生活也有保证，故而同意。

注：此计划，如后所述，由于中国方面采取全部遣返日人的方针，未能实现。

9月12日

奉命自9月10日起，我总司令部改称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总司令官改称总联络部长官。（参照第三章之九）

9月13日

邀见大使馆留下的太田参事就侨民的来电，协议。

9月14日

中央通知对投降书的词句有疑义，遂与中国方面交涉，增加谅解事项。

9月15日

听取松木参谋有关复员计划的说明。

由于同盟通信社（日本通讯机关——译注）被停止活动。今后有关日本国内一切消息，只能依靠外国的通信报道。

9月16日

从今日起，将手表拨迟一小时，改用中国时间。

9月17日

在南京街头，突然发生扣留我军卡车、自行车及马匹等事件。可能由于我军已是徒手官兵，稍有不慎，即易触怒中国方面之故。同时负责接收的中国军队远在内陆，迟迟不能到来，以致大大推迟接收工作也是原因之一。

自今日始，南京市内夜间实行戒严。

9月18日

随感：

最近以来，我在考虑由于环境突变所暴露的日本国民性格的缺点。

停战之际，某些侨民的可鄙态度，已如本篇第二章之七所述。至于军队方面，虽有组织领导，但值此环境激变下，甚至日本内地的部队，也暴露出某些缺陷。

听说上月15~17日，日本内地陆军部队中谣传美军登陆，顿时恐慌异常。大本营的卫兵、宪兵等自行解散（据说几天后又归来），省、部各课课员惊慌失措，将极密文件全部烧毁，甚至连复员军籍也一并烧掉，为日后复员造成困难。第六航空军情况更为严重，该军参谋飞往所属各地部队，命令复员解散，引起更大的混乱。官兵中有的自行驾驶汽车回乡；有的带走大量粮食、被服；有的偷走飞机零件，机场完全丧失机能，据说该军已呈自然解散状态。我总军一参谋还报告称，曾目睹某机场只剩下一个师团长。更有笑话，据说总司令部一士兵，接到其母从日本来信，信中说：“同村的某某牵来三匹马回家，你也要带点什么回来……”。

可以想象，不仅第六航空军如此，其他方面恐也有类似情况。这不禁使我想起了关东大地震时（1923年9月东京等地的一次大地震——译注），谣传朝鲜人来袭而发生的大恐慌：

大地震翌日（9月2日），从横滨附近传出了朝鲜人武装暴动前来袭击的谣言，顿时从东京传向关东一带，造成了极大恐慌。东京市民则自行武装，逮捕杀伤朝鲜人，并封锁了各街道的交通及派人提刀巡夜等，秩序大乱。9月3日颁布戒严

令,当时我担任东京戒严司令部参谋。

世田谷附近市民涌至该地野炮兵旅团驻地,强迫旅团长放空炮,恫吓来袭的朝鲜人以安民心。旅团长虽再三拒绝,但禁不住民众的强求,遂放空炮。世田谷附近民心虽暂告安定,但青山一带市民听到炮声,误认朝鲜人果真袭来,引起更大骚乱。我曾亲眼看到,立川航空队的联络官,仓皇奔至陆军省,要求紧急派遣增援部队,阻击从八王子方面攻来的朝鲜部队。以后并听说,当时驻习志野的骑兵旅团长,错误判断朝鲜部队已攻进东京,竟下达了“旅团在市川一线拒敌”的作战命令,出动了部队。

我于9月4日巡视了市内,认为事态严重,提出将市民持有的一切武器暂时收缴由警察保管的意见,5日以戒严令得到实施。

9月19日

老政治家田川大吉郎,由东京突然来访。据说为商谈日、中将来问题将去重庆。就上述问题交谈约一小时。

9月24日

据报告,上海一伙美兵夺走松井军司令官的汽车,对我侨民强夺、扣押、侮辱等情况不断发生,中国暴民也有参加者。我官兵、侨民终日惶惶不安。

9月26日

在南京也屡屡听到中国兵和暴民抢夺我官兵、侨民的手表及其它物品等情况。另一方面,反映负责接收的中国军官一般都很殷勤和蔼,以及邀请我方共同进餐的报告也不少。

真是明暗两面,截然不同。

9月27日

决定将南京侨民集中于江岸下关之兵站营房。

9月29日

降服以来，我还能继续在官舍生活，并有专用汽车。三餐中有一餐是面包，自昨日起面包不好买，但其他食品，仍由炊事员去市场购买单做，一切没有变化。虽然这是中国方面的好意，但想到国内和其他生活困难地方的人们，对比之下深感惭愧。

9月30日

在华的日文报纸均被接收，已经停刊。自今日始，参谋部把自行誊写油印的时事通信送我参看。

10月1日

如第二章之三所述，根据蒋介石主席有名的训示，中国官兵对我方的态度基本良好。但随着时间的转移，象我在9月26日日记中所记述的那样，对日人的不正当行为似乎并未绝迹。

报纸最初的论调是对日本宽大，但近来频频非难日本的过去，强烈批评日本现在的政治社会等，甚无好意。

在接收方面，无论军事单位或企业经营单位，都留有日人给以相当待遇，使之继续工作，好象也要为再建日、中亲善发挥作用，但实际上，却是由于没有日本就无法继续工作的缘故。因此，能留用到何时，尚属疑问。总的来看，由于中国在战争中受到极大损失，这样做固然是很自然的，但中国人的反日感情是相当根深蒂固的。这些是我近来常常想到的问题。日、中合作，今后还必须做更大努力。

10月2日

驻上海第十三军曲参谋来访，报告上海情况。据说汤恩伯部队对我军民极为友好，但美军则蛮横无理，因此，不愉快的事情不少。

今天又把时钟拨迟一小时，改用重庆时间。这样，东京的12点是南京的10点。

10月3日

前者中国政府曾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引渡陈公博等人，为此，曾派笹川、相山两参谋乘中国飞机去陈公博等人亡命的所在地日本米子市。两参谋于今日15时左右归来。据他们报告，陈等一行抵宁后即去总司令部自首。我坐视几年来共事的南京政府要人之末路，束手无策，实为痛心。

10月4日

相山参谋汇报福冈、米子方面见闻。

停战后一个半月，国民仍处呆然若失、精神恍惚状态，充满被人抛弃的悲惨气氛。每人配给米约0.16升，粮食问题严重，黑市猖獗，处境可悲。

按照现在用以复员的二十一、二万吨船舶的运输力量，估计需要三年半以上的时间才能完成。

日本没有战败的经验，国民也缺乏处于逆境的锻炼，大有迷途之感，国家复兴前途堪忧。

10月5日

我在停战前也和幕僚不同，大体上是个有闲之人。办公仅限于上午，午后接待来访或钓鱼，夜间读书、下围棋，并且常常旅行。停战后接收工作业已就绪，最近每天办公只用一、二

小时阅读电报及文件，更有空闲，但钓鱼、旅行已不可能，只有过昼读夜奔的生活。读书厌烦时，即沉思默想国家的前途。

今日接到东久迩宫内阁总辞职消息。

10月8日

由15时开始听取为与华北各军联系工作出差归来的宫崎参谋的有关情况的报告，约1小时40分钟结束。

10月9日

接到币原内阁成立的报告。

10月10日

今日是中国的国庆节。从今天开始三天内，南京举行盛大祝捷仪式。我们住的城内北部地区，大部是住宅区，节日狂欢的影响不大。据说自本日起，市内加强警戒，日人通行已不自由。

10月13日

总领事田中彦藏及南京居留侨民团长前田市治来访。根据前述中国方面命令，应将一万余南京侨民集中于下关兵站营房实行集体生活，现已组织就绪，特来联系。

据情报，满洲尚有我侨民约百万，北朝鲜有十几万，遭受掠夺、缺衣少食，除身穿衣服外一无所有。寒冬来临，将有冻死之虞。军队作为俘虏，官兵隔离，被带往苏联西伯利亚各地，强迫劳动。与我等相比，实属悲惨。

另据情报，苏军攻占满洲后，到处对我日侨进行掠夺、杀伤、强奸等暴行。由于苏军切断其占领区与外部的所有交通通信，真象不明，但综合逃出者透露的消息和停战后8月31日山海关事件(参照第二章之六)等情况，认为近乎事实。

因为这是人道上的大问题，听说我政府已向联合军司令部、国际红十字会、罗马教皇等提出申诉并努力救济中。尽管如此，舆论界毫无反映，不知原因何在？

10月14日

午前，偕今井副长、西浦、尾川两课长及清水经理部长等至下关，视察兴中门外兵站营房我南京侨民集中营。由田中总领事、前田居留民团长引导巡视营内，检阅学生体操，并向集中一起的人们致词慰问。集中营虽小但环境不错。当时我说了些什么已全忘掉，也没有记录下来。然而，以后有人将在小田原市出刊的小杂志（《女性》1957年10月7日号）寄给了我，上面刊有下述一段：

“战后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曾预见地说过：‘我想我将在此地被判刑，但愿大家回到日本后，要努力做好家庭教育，勿作战后美国教育之奴隶。’”

我对南京侨民只讲过一次话，我想这可能就是当时所说的。（冈村当时的讲话情况当为1957年后所补写——译注）

10月15日

二船司令官伊藤中将来访。

今日，参谋本部及教育总监部解散，梅津大将被任命军事参议官。第一、第二总军，分别改为第一、第二复员司令部。河边大将、畑元帅分别被任命为第一、第二复员司令官。

10月16日

堀内公使来谈时事约一小时。

10月18日

为使我总司令部职员交流专门知识，以资来日之用，决定

举办讲座分别讲解有关专门知识。今昨两天，由田边主计少佐先讲“战争与经济”。

近读泽木师之《论证道歌》及谷口雅春氏之《老子》，感受颇深。

10月21日

何应钦总司令邀我一人前往会谈，8时许，由米满专属副官陪同去总司令部住所。我方只我一人，对方何应钦外有萧参谋长、钮少将、王武大佐共四人。何总司令先用日语问候，我也用蹩脚的中国话回答，会谈在旧友重逢的和睦气氛中开始。由钮、王两氏作翻译，研究了有关接收等问题。公务完后拿出了甜酒，大家干杯畅叙约二小时，11时回部。

何应钦谈话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有如下一段：

“由于贵官认真负责的态度及贵司令部职员热诚勤勉，使接收工作顺利进行。应趁此机会培育中、日合作的趋势，使子子孙孙继续下去。我任军政部长以来，就提倡中日合作，但因国内情况未能如愿以偿，而日本军部内，也有不谅解蒋委员长和我等真意者，因此遂启战端，诚不胜遗憾之至。我曾对矶谷、喜多两武官提出，如果日本侵占中国，外国势将介入，事态将向困难发展。7月3日芦沟桥事变前夕，喜多武官迫使中国放弃亲苏政策，并接受广田五原则时，我也曾说过中日相战两败俱伤，结果将使共党势力扩大。此事不幸为我言中。”

午后，听取延原参谋之华北视察报告。

10月23日

去年12月中旬在汉口附近虐待美军俘虏事件，最近已经查明。当事者为已移驻朝鲜的第三十四军所属，均已转调其

他方面。当时，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部大将，正向湖南出动，与本事件无关。尽管如此，前天美军方面却提出要拘捕冈部大将。因此，小林总参谋长向萧参谋长提出意见，表示反对拘捕与事件无关的冈部大将，并说明拘捕他将会影响接收工作。这一要求立即得到同意。

10月24日

午后，日高参谋报告上海视察情况。

日本内地连日广播共产党系统活跃情况，我总司令部职员等均表愤慨。今天东京广播榎桥渡氏批判共产党的演说，多数人对此表示赞赏。

前述交流知识的讲座，也决定让我讲讲长期中国生活的见闻，因此开始起草。但是，没有记录也没有参考书，只有想起什么来就写什么。由于前后有着三十年左右的经验，不少印象深刻的事物，源源而来，于是，尽收入以“大陆之自然与风物”为讲题的文中。

10月26日

麦克阿瑟司令部下令停止我外交活动。

10月27日

前述拘捕冈部大将问题，中国方面也同意我方提出的冈部与事件无关及日军是向中国投降，美军直接拘捕于理不合的主张。中国总司令部并已向第十一战区发出不要拘捕冈部大将的命令。

虽已降服，但对非法无理之事尚能申诉，实感快慰。

11月2日

今天又规定将重庆时间再改为南京时间，因此，我们又要

把表拨快一小时。

午后菊地法务少佐继续昨日宪法讲座。

综合由华北交通株式会社汇总的停战前后满洲各地情况，苏联士兵到处对日人进行掠夺、杀伤、强奸。不少妇女因羞耻而自杀，男人则被强制劳动，饥寒交迫，处境悲惨。由于通信断绝，上述惨状未能传到日本及世界各地。

11月3日

10时总司令部全体成员在广场集合，照惯例举行明治神宫遥拜式。感到由于战败，明治天皇之宏伟事业终成泡影。不知明治节又将如何？

午餐一起品尝小豆饭，据说内地因粮食困难吃混合粮，而我们吃的非常好，深感惭愧。

午后，宫崎、船木两参谋就遣返运输计划进行说明。

复员本部先遣人员（后述）预定最近归国，托其往家中捎信，未被许可。

11月5日

前述“大陆之自然与风物”已脱稿（共110页），从今日起分三次向军官讲述。午后第一讲，因采用漫谈形式，不时引起大笑。

11月6日

（一）第四十三军参谋中佐前来报告山东共军破坏交通情况。

（二）美军大佐声称奉美国国防部命令，有相当数量的美军官兵在中国战区失踪，要求详细调查被日军枪杀者情况，并上报何应钦总司令部，当即表示同意。

午后继续昨日之讲座。

11月7日

如后第五章之二所述，中国派遣军在取得中央（指日本——译注）及中国方面谅解下，以自己力量进行复员工作。复员本部主要人员最近即出发赴九州，因此，午后在广场接受全体复员人员之申报，并进行训示。

战时运输局王中校来访，他作为上述人员所乘第五美轮（中国改称风快号）的监督官将去日本，特来联系。

11月8日

今天将各自所持军刀、手枪及望远镜集中交给中国方面。

午后，柏兽医讲座，题为“畜产与日本”。

注：据说我交出的军刀，后来何应钦将它赠送给美国MRA运动（1938年在美国组织的和平运动，总部设瑞士——译注）的创始人李普曼博士，该博士作为和平象征用以装饰自己的住宅。然而，长谷川峻国会议员却说他在北京军事博物馆看到刻着我名字的军刀。这是中共虚假宣传之一例。特别是有人似把当时偕行社的军刀称为总司令官用的军刀，以之赠送有关人员，也可能因此而误传。

11月9日

风快轮搭载复员本部第一批一百二十余名归国人员，今天从南京下关启航去博多。

我在近二、三年的军旅生活中，早餐后还要吃些茶点，停战后也是如此。点心从来也不缺少，但近来点心来源断绝，今天终于不得不取消茶点了。想到物资缺乏的国内，未免过于奢侈，但终有些凄凉之感。

11月11日

我嵎山参谋与第四十三军中村参谋，在飞往郑州途中失踪。又接报告称，第四十七师团主力（约四个大队），向津浦线徒步北上中，于滕县附近受到优势共军的包围攻击，虽在防卫中，但弹药不足，因不能象以前那样空运，忧虑异常。随后，又接到情况稍见缓和的报告。

11月13日

讲座“中国淡水鱼”主讲中央研究所滝理博士。

昨、今两天美国军官来我等宿舍参观。虽不明其动机，但从美国方面来看，俘虏住着相当好的房子，甚至还有汽车，对此，可能有所不满。或者是要为他们自己选定宿舍亦未可知。

11月14日

讲座“内外思想概论”，主讲大使馆羽中田书记官。

讲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通货膨胀情况”，主讲经理部高桥军曹。

11月15日

复员本部主力二百余名，由南京出发去上海，预定由上海归国。

讲座“以英苏外交为中心的第一次大战以来之外交”，主讲吉村事务官。

11月16日

近来每早生活：7时许起床，体操，早餐，焚香吊祭日、中阵亡将士英灵，朝拜亡母遗像，茶点（只茶无点），习字。顺序大体如此。

11月17日

担心遣送船只不足，但美军提供多艘坦克登陆舰，分别由塘沽、青岛、连云港、上海、广州等地进行遣送。今日其第一船已由塘沽启航回国。接此报告深以为慰。

接到中村、栢山两参谋等五名在永城附近迫降，被共军扣留的报告。

与小村总参谋长商谈救济回国后的同事问题。自1941年6月以来，我一直过着军旅生活，四年间各方友人送我很多礼物，金制品也不少。因此，刚一停战就和清水主计中将研究，将这些礼品换了一大笔钱，准备汇回日本，作为救济身边同事回国后之用。但不许可汇款，这笔款等于付之流水。

11月19日

南京管理处长吴少将来访。

宫崎参谋视察海州方面后，回来报告。他日前去北京、山西、济南、郑州、汉口、广州，以及辽远的法属印度支那，视察他所主管的事项，制定了详细的遣返计划。对他的高度责任感，不胜钦佩。当然，不只宫崎。随着停战，道义感普遍低落，而我总司令部幕僚们却一如既往，继续热诚认真服务，使我敬服之至。

11月20日

我总司令部原住外交部大厦，今日遵照命令，向以下各处迁移。

涉外部迁至日本总领事馆。

一般官兵迁至中华门外集中营。

将官共同住在总司令官官舍与经理部长官官舍。

(其他数十所房屋被接收)

11月21日

自今日始，去鼓楼日本总领事馆涉外部办公。

我历任北满第二师团长、第十一军司令官、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第六方面军司令官、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等。在此期间，我一共写了十一本阵中随感录。但是，盟军禁止邮寄历史文献，日记中涉及历史情况的也在禁邮之例，甚觉可惜。因此，我从中剔除战史及作战用兵的内容，选出了一部分感想编成阵中随感。其中，1941~1944年仅摘录人物往来及自己的行动。从今天动手编辑。

注：我共摘录了五部，幸被允许带回，已寄赠防卫厅战史室，多少会起些作用。

11月27日

集中营开始自制点心，时常送羊羹来，感谢。

11月28日

满洲形势

苏军根据中苏条约开始从满洲撤兵，但只是部分撤兵，并借口国军进驻迟缓，仍继续占领各大城市。据报告，前者拟进驻长春的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因苏军无理阻挠，已经撤出该地。传说苏军已将满洲的日本各种设备及机器，作为战利品运回苏联，而将从日军接收的武器装备等，交给了共军。南满各要地，在苏军支援下已完全由共军占领。

杜聿明指挥的国军（两个军），乘美舰拟在大连、旅顺上岸。因遭到苏军阻止，而转向营口，但共军固守营口不让，无法和平上岸，迫不得已又转向秦皇岛登陆。终于在山海关与共军交战，最近才逐渐进入锦州。

苏联最近声明，不干涉中国内政，不阻碍国军（共军）进驻满洲，但在背后却积极扶植共军。这一情况从停战以后的行动（参照第二章之六）推测，不难想象。

11月29日

最近，中、美两方都特别要求我参谋部提供对苏资料。美国参谋军官，每周两次左右来我参谋部，学习有关苏军形势等材料。

11月30日

宫川第四十师团长来访。

今日中国报纸详细报道了本月20日总司令部官舍移交的具体情况。盛赞我移交时扫除整洁，物品设备完整，秩序井然，真不愧为总司令部，如此夸奖却觉羞愧。

12月1日

中国新闻报道，何应钦在重庆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国战区所有日本官兵，将在九个月时间内全部遣返。总司令官冈村亦同时遣返，交付盟军审判。”

注：遣返大体按预定实现。我个人战犯问题与上述不同，未提交盟军而按中国战犯处理。（参照第七章）

12月2日

小林总参谋长、今井副长及各幕僚，根据昨日何应钦谈话中有关我个人部分，结合合众社电及日本广播的报道等，深入研究可能发生的情况，对我之处境深为忧虑，使我不胜感激。

12月3日

初霜，庭院皆白。

据报：陆海军省于11月30日撤销。复员工作由新成立的第一、第二复员省担当。

我谢绝会见来访之中、美记者。理由是，按我现在的身份，无中国方面的命令或许可，不能会见。

12月4日

9时应邀赴中国军总司令部，与中国战区美国作战军司令官麦克罗尔少将会谈。总司令部萧参谋长及钮少将列席。

会谈主要就有关促进日本军民遣返问题交换意见，并要求向美方提供有关资料。

会谈伊始，我对美军当局大力协助遣返表示感谢。美方亦以停战至今未发生大的事故，皆因日军之努力，向我致谢。

会谈中三方协商了有关中、美记者希望与我会见问题。最后按我的意见，约定明日9时在鼓楼办事处会见。会谈约一小时结束。

午后，堀内大使来谈上海情况。

12月5日

9—12时在王武参谋陪同下，如约会见美、中两国记者。

(一) 美国《时代》及《生活》杂志记者马裘里·萨班斯小姐，27、8岁的美人，头脑极为聪敏。她就日军在中国之作战、美军航空部队行动之影响，大东亚战争开始时之感想以及日军之将来等，详细提问约二小时。其军事素养之丰富，观察之敏锐，远远凌驾日本记者之上，令人敬佩。特别是她提出了诸如“日本进入满洲或在塘沽协定后，即行停止岂不更好”等与我所见相同的意见，使我对其卓越见解，不胜惊叹。最后，她

表示作为最早会见我的记者感到光荣，向我道谢后离去。

(二) 中央社两名记者，就有关中日两国关系问题、华北之将来及停战时情况等，问答约一小时。

据说，东京陆海军、文官及民间人士等 99 名，被指名为战犯嫌疑，守正王殿下亦包括在内。不胜痛心。

12 月 6 日

接中村、楢山两参谋今日平安由徐州归来的报告，颇感欣慰。

今天中国报纸刊载了我昨日会见记者的报道。但有关中日两国之合作及对我方有利的事项，一概删掉，只报道了些有关胜利者的琐事。虽因不知我之真心，但必须体察中国民众根深蒂固的反日感情。

我在壮年于军务演习出差中丧父，两年前的今天作为华北方面军司令官领导作战中，又接母丧讣告，作为军人，终于未能亲自为两亲送葬。今天是亡母三周年忌日，于床间设亡母遗像，焚香为她祈祷冥福。

12 月 7 日

浦口车站司令官儿玉德乡少佐(同期同学)来访。

晚，与参谋等会餐，杂谈约二小时。见参谋们和和睦睦，开朗豁达，欣慰之至。

12 月 8 日

在东京，又有不少名士被指名为战犯，最亲近的棋友平沼麒一郎、大达茂雄亦在其中。颇有两邻失火我独幸免之感。

午后，组织官舍之宪兵、卫兵、差役等约 50 名，举行小型运动会。

12月13日

直接在我身边服侍的差役新森宏，是个十七岁的少年。热心诚恳，用心周到，服务认真，值得称赞。故将常用之手表，割爱赠之。

注：1955年10月27日在宫崎市旅馆又与该少年见面，他回到故乡宫崎县庄内町西岳，入赘村冈家务农，被赞为县内模范青年，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我二人的奇遇，感动了宫崎县新闻记者，第二天报纸上刊登了附有照片的显目报道。此后，村冈每年将自种的香蕈送给我。

由于封锁消息，我对西伯利亚、满洲、北朝鲜、桦太等苏联势力范围内同胞的情况完全不明，但综合各方面情况，处境相当悲惨。正当痛感政府对此等同胞缺乏关心之际，传来最近众议院已决定予以救济并诉诸世界公正舆论的消息。

12月18日

根据中国总司令部的要求，今天将我乘用的高级轿车，换为对方的一辆小型车。

午后因蒋委员长来宁，市中禁止日人通行。因此，王武参谋来我办公室用车将我送回宿舍。其后，至22日未外出，当然也未到鼓楼办事处办公。

12月23日（星期日）

9时突接电话称蒋委员长要会见，通知我9时20分到中国总司令部，因此，立即偕小林总参谋长前往。从9时30分会谈约15分钟。对方有商震参谋长、钮总司令部第二处长、曹副处长及王武参谋等列席。我先就停战以来，对日本人的好意，表示感谢。谈话要点如下：

蒋：您身体健康吗？生活上如有不便，请勿客气向我或何总司令提出，尽量给予便利。

我：深感厚情，生活满好。

蒋：从何总司令处得悉接收顺利进展的情况，殊堪同庆。日本侨民有何困难，也请提出。

我：目前没有，如发生困难，当即奉告。

蒋：中日两国应根据我国孙文先生之遗志，加强协作实为至要。

我：完全同感。

蒋委员长始终面带微笑，和蔼近人。他特意安排了这次会见，以好言相慰，深感敬佩。

12月28日

延原参谋报告华北视察情况。

按惯例，于鼓楼办事处与高级官员等进行年末祝辞，祝辞要点如下：

“在从未预料到的特殊事件中，已到年末，无限感慨。此情无法以过去知识经验表达。仅就诸君的态度愿表钦佩之意。我等日人大都不堪打击，在战场及关东大地震中即有不少实例。一旦遭到大打击，陷入逆境或前途难卜之际，往往易于产生心慌意乱、团结涣散，以及内部争吵的现象。但我总司令部自停战以来，以参谋为首的全体人员，均与大作战时无异，热心精诚服务，认真负责，和睦相处，坚强团结一如既往，实在令人敬佩。考虑到国家前途及个人之将来，虽然处境极不乐观，但对诸君如此态度，实不胜钦佩、感谢之至。愿今后永远如此。”

年末随感

共军于停战伊始，立即着手解除华北我军武装及占领满洲。前者由于我军之严拒未能实现，而后者由于苏联支援，似获成功。

停战不久，由于赫尔利美国大使的斡旋，毛泽东去重庆与蒋介石会谈。国共和平或有可能，但近来华北国军与共军到处交战，绥远包头方面、津浦路中部地区尤为激烈。共军为阻止国军北上，破坏了津浦及京汉部分铁路，因此，对我军之集结及侨民之移动，也受到不少影响。

据报告，沿京汉路北上的国军两个军，在磁县附近遭共军猛烈攻击而大败。军长高树勋、马法吾被俘（高树勋将军起义——译注）。

由于上述情况，为确保要地维护交通，至今华北仍有我相当数量未被接收的武装部队。其中，山西的第一军、山东的四十三军等，几乎全部以原有的武装继续执行任务。

另方面，从11月初开始分别从塘沽、青岛的遣返工作，虽经美军督促我军向港口集结，但因上述情况，集结工作很难顺利进行。

满洲方面，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11月末左右经山海关已到达沈阳，正与苏联交涉将其一部军队派赴长春，但交涉似不顺利，因此迟迟未能占领满洲。

本月末，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同时，美国新任大使马歇尔到任后，估计将致力于国共妥协及中国的统一，然而即使政治上的妥协暂时或可成功，但军事上的合作，看来几无可能。

总之，中共问题将成为东亚之大问题，作为美苏外交之暗礁恐将长期存在下去。

中共之中也有日人，而且，在日本内地再建共产党的活动也相当活跃，因此，我等对共产党问题的注视，也不能有丝毫放松。

第五章 撤退、复员

前言

我在停战后，朝思暮想的问题是如何把二百万军民安全地撤回日本。

根据最早去日本联络回来的参谋报告，由于船只问题，全部撤退估计需要三年半时间。综合其他情报，分配给中国地区的船只更不敷用，全部撤退可能需要五年时间。夜长梦多，在如此长的时间内，将会发生多大变化，实难预料，为此深感不安。但事实却意外顺利，仅十个月，二百万军民（除极少数外）都已安全撤退，实不胜庆幸。

如此顺利撤退（包括复员）的主要原因，大体如下：

（1）驻日美军为撤退提供之多数坦克登陆舰（LST）。

（2）为帮助我军民向港口集结，中国政府动员全部水陆交通部门，为此甚至影响了一般交通，造成了经济恶果。

（3）由于中国方面允许我军保持指挥机能直到上船为止，从而使运输及其他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4）根据蒋介石主席停战时发表的对日人态度的命令，中国官宪对撤退表示了热诚支持。

（5）在日本中央部及中国方面同意下，我派遣军本身事先向日本派出一部人员以便办理复员事务。

（6）以总军参谋为首的各军各部队干部，以极大热情计

划并执行撤退及复员工作。

最初，南京的美国军事顾问，曾让我提供从我兵力最多的华中腹地迅速撤退的方法，我回答最好是让坦克登陆舰开到汉口，但中国方面坚决拒绝。估计可能由于中国多年来将外轮在内河航行看做殖民地受辱的现象，胜利后，即便是同盟国的船只也不允许在内河航行。为此，中国将其极少的船只充分动用起来，同时并利用汉口——郑州——徐州——南京的铁路，大力提高运输能力。如汉口——南京间之船只运输计划，我参谋根据阵中勤务命令，一人占三吨，一马占九吨为基本单位，而中国参谋则决定采取超载计划，连甲板也要装满，从而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对这一大体顺利完成的撤退，日本内地却有人将它错误地归功于我。我归国后也曾受到已故绪方竹虎为首多数名人的称赞，还有不出名的人，如广岛市公务员文野森，于1960年2月来京时，一定要见一见把二百万军民圆满撤回的人。由于受到善意的误解，所以，每逢此时我就用上述六点原因，加以说明。

自遣返运输一开始，即每天检查讨论各地电报报告，计算遣返人员，当确认全部军民已离开大陆时，顿感如释重负。唯一使人惦念的是，山西方面尚有相当多数的日本官兵被阎锡山说服而留了下来。对此，只得按现地退伍的手续办理。

当撤退宣告结束时，我患了肺结核病，又加战犯嫌疑，前途吉凶未卜。但重任完成，从此可以安心听命了。

一、复员

停战时，我对一般部下明确表示：“切勿轻举妄动，必须谨遵诏命。对外要服从降服，对内要严格地进行复员。作为复员一般方针，凡属派遣军之一兵、一马、一物、一钱，均应交待清楚，全部归公以报陛下及国民。”

105万大军安全复员归国是一件大事，考虑到日本的混乱状态，为不依靠中央部并尽量减轻中央的负担，我想以派遣军自己的力量进行复员。即先向内地派遣一部兵力，并制订由派遣军自行办理复员的计划（原来曾要求中央给予协助）。1945年9月15日，听取了主要责任者松木参谋说明复员计划后，由我作出了决定。计划确定以冈田总参谋副长为领导，伊藤、松木两参谋为副手，由各部队抽出所要人员组成复员本部，并要求中国方面提供船只，使先遣人员先期返回日本九州，进行安排。经与中国方面交涉，10月7日计划被批准，同时也得到我中央部之同意。

复员工作是一件大事，存在很多困难。为使一兵、一马、一物，清楚明确，不但必须检查中日事变爆发以来九年间情况，并须在大陆战场全部地区进行清查。但部队几经改编及转调，各人所属也频频变更，且人员转移，缺乏联系等等，致使正常复员工作完全失去依据。

另外，停战后华北、华中一带，如上述由于与苏军的纠纷及中共的不法攻击等，使我不少部队统制紊乱。加之，停战当时重要文件已经销毁，致使不少事情原委不明，但是，尽管如此，到日本上岸的当天又非复员不可。为复员付出的资金达数

千亿日元之巨，作好这一决算，决非一般的辛苦工作。而且登岸当天就必须精确算出官兵的薪俸等，并立即交付。估计到这些情况，复员本部的组成，必须有相当规模及周密准备。因此，经与中央部不断联系，仔细研究，才逐步诞生了复员本部。

11月7日下达复员本部开始工作的命令。复员本部第一批人员(120余名)，于11月9日乘“风快轮”由南京出发，中国方面王中校作为监督官同行。11月15日复员本部主力二百余名，由南京出发至上海再回日本(参照第四章11月9日、11月15日日记)。

11月17日第一艘遣返船由塘沽启航。由于遣返复员已经开始，我于11月22日向全体官兵下达最后离别训示：

“告征战数载空怀伤感而回国复员的将士：皇国面临空前危机，国民之惨状亦不难想象。当兹举国一致为战后复兴而勇往直前之际，余深信归国将士必将成为骨干力量。

诸君宜重下决心，缅怀忠勇阵亡战友之英灵，以趋祖国之急。基于多年阵中出生入死所体验之信念，披荆斩棘，克服万难，维护国体，重建皇国，勇往直前，以副圣意。

亲爱之诸君，当此诀别之际，忧国之心，无时或已，披沥衷情，切望诸君自爱、奋斗。

昭和20(1945)年11月22日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 冈村宁次 ”

注：后来我归国后，下士官二、三人要求把这一训示写给他们当作座右铭，我就写了送给他们。

复员本部部长冈田总参谋副长偕同尾川参谋，于1946年1月30日由南京出发赴任。伊藤、松木两参谋及其他人员，如前所述，已从11月开始在日本办理复员工作。

复员本部最初设于博多，并于佐世保、鹿儿岛设办事处办理复员业务。其后，又在门司、下关、别府、唐津、仙崎、大竹、名古屋等地，增设了办事处。复员本部后来改编为派遣军残留事务整理部，隶属西部复员联络局。1946年10月最后又划归留守业务局管辖。

最后遣返的是1946年10月的总司令部及同年8月21日的华北方面军司令部。

7月31日，派遣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中将，代替我晋谒陛下上奏停战后中国派遣军之一般情况及报告复员局的具体状况。

二、山西省之现地退伍

根据其本人希望在各现地退伍者为数极少，但在山西省情况特殊，有大量人员在现地退伍。

阎锡山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国学生第六期留学毕业生。当时我担任中国学生队区队长，因此，他是我的学生。他回到故乡山西后先担任校级军官，民国革命之际，青云直上，一跃而为山西省督军。1919年在北京召开华北督军会议时，我当时正驻北京任大尉职，曾去访问过他。

他励精图治，努力改进山西省的政治、经济、民生、文化等工作，颇有政绩。中国自民国革命以后战乱不绝，但他专心固守山西，决不卷入战乱，因此，以山西门罗主义而著名。

中国事变爆发，日军进入山西省时，他也决不离开山西，盘踞于该省西部沿黄河线交通不便之山地，不与日军作战，且暗地联系日军以图保存实力。他在我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时期与日军秘密联系的事实，我将于本书第三篇叙述，此处予以省略。于此仅就阎身处僻远山中却能熟悉内外形势的情况叙述如下：

停战不久阎即返回太原。我想他梦寐以求的可能是想再次恢复山西的门罗主义。因此，不难想象，为对付四面活动的共军，他迫切希望留用日军，以充实其战斗力量，同时为使省内二十几处日本产业继续维持生产，就要留用日本技术人员。

澄田第一军司令官为使全体人员回国，曾多次训示各部队予以注意，并与中国方面交涉督促回国，但终未奏效。同时，中国方面强烈劝诱日本官兵留在中国。最初先以甜言蜜语引诱士兵，然后以小队长等干部为对象。另方面，停战后我官兵的心理状态及军纪观念趋于动摇，官兵中希望离队留在中国者不断出现，甚至连独立步兵第十四旅团长元泉馨少将、军司令部参谋岩田等有力人物，也决意留下。元泉与岩田由于受阎锡山的笼络，结果，如后所述，当根据宫崎参谋申请将他们转调华北方面军司令部部附时，早已逃到阎锡山的身边去了。

对上述人等，如继续使之留在部队，将给其他官兵以不良影响。因此，接受本人要求，采取了现地退伍的措施。

另方面，中国对日本军民的遣返，有使之更加推迟的倾向。由于上述情况也逐渐传到南京，因此，于1946年3月派总司令部宫崎参谋到太原，进行实地调查并善后处理。

该参谋报告之要点：

(一) 阎锡山最初为协助留用，命令我第一军编成特务团。我第一军迫不得已，遂着手改编。当本参谋于3月11日面见阎锡山，出示中国总司令部之各项训令，对阎之措施提出责难时，阎颇为狼狈，遂即明确表示负责迅速使之归国。

(二) 中国方面散布各种谣言，使日本军民愿意留下者和热望归国者之间，发生对立，呈现一片混乱。

结果，由于宫崎参谋之责难（宫崎初与阎见面时，阎以冈村总司令官是我之恩师等言语，试图拉拢宫崎参谋，但该参谋的毅然态度，使阎之拉拢失败），澄田军司令官以下之苦心努力，以及在北京美军师长根据宫崎之说明，进行侧面协助等原因，我大部军民得以撤退。但仍有相当数量的官兵残留未走，与中共战斗，或者战死，或者被俘而后遣返。其概况如下：

(1) 第一军停战时官兵约59,000人，希望留下者约达10,000人。其中6,667人，现地退伍。

(2) 其后，由于总军（宫崎参谋等）及第一军司令部首长的劝告，遣返运输开始时，现地退伍者中也有不少人归国。结果，1946年以后残留者仍有约2,600名。其中，包括山西产业、华北交通部分从业人员及侨民若干。河本大佐（山西产业社长）以下300名在内。

河本大佐在宫崎参谋向他劝告时，他表示了一定留下来的决心。最后，终被中共俘虏，死于北京狱中。

(3) 残留于大同附近的，有今村中佐以下约600名。1946年7—9月间，与共军作战，战死数十名。

残留主力，为确保太原附近地区，在共军包围下，孤军继续进行抵抗。在此期间，1947年和1948年上半年，离开山西经由北京附近归国者约1,600名。

(4) 至1948年夏太原陷落前不久，残留者约1,100名，同年6—8月间，在太原附近最后战斗中，战死约400名，被俘约700名(包括日侨)。

(5) 结果，残留山西省旧军人当时确认为死亡者328人。又，据传上述700名俘虏中，有417名于1954年第八次遣返时归国。

三、俘虏

1. 概论

105万中国派遣军既已投降并被解除武装，就法律而言乃是俘虏。但事实上未被拘禁，受到“徒手官兵”的待遇。然而，八年战斗中被国军或共军所俘虏者亦有不少。其大部分是战场负伤后为敌方所收容，或飞机发生事故被迫降落于敌区者，以及战争末期缅甸战线受到歼灭性打击部队中被转送至重庆的生存者。自己打着白旗向敌人投降者，似乎极少。

随着遣返输送的进展，由中国政府方面及共军方面(极少数)移交的俘虏，1946年5月末的数字为：陆军1,212名，海军40名，商民106名，共计1,358名。

有关这些俘虏的正式记录，仅有1946年5月重庆方面的俘虏经过南京时的情况，对于在俘虏收容所内的情况，则完全不清楚。因此，我听取了做过多年俘虏的今井清吉(空军曹长，山田队干部)和停战前夕被俘的西川五郎的谈话，并让他

们写了回忆录。加上综合上述俘虏经过南京时，参谋们的调查报告，得知俘虏收容所内的概括情况。

对于被共军(延安)方面收容的俘虏情况，几乎无法得知。因此，我将在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时代所知道的情报，结合有关日本共产党的情况等加以综合，试作一般介绍。

另外，我在华北方面司令官及第十一军司令官任内所掌握的有关俘虏情况，也分别于第三、第四篇内加以叙述。

2. 国军方面的俘虏

最早时期，似将日本俘虏软禁于前线部队里，其中，似有被杀害者。1939年春，国军中央司令部对前线部队似曾下达将俘虏集中于中央的命令。然而如后所述，当时隶属于蒋介石的共军，敷衍公事勉强向中央送去了二、三名，而将收容的日本俘虏全部集中于延安。

国民政府最初似于成都、重庆、镇远等地设立了俘虏收容所，1944年春将俘虏全部集中于重庆。

成都俘虏收容所之情况：成都俘虏收容所分为两期。前期自1940年开始，所址在某一别墅，规模不大。所长杨宋炎空军中尉，会讲少许日语。被收容者是阪本松治中尉及陆海军下士官15、6人。于由粮食不足，大体上允许生活自理。当时发生过以下二件特殊事件：

1940年夏季，日军飞机猛烈轰炸成都机场，据传日本战斗机曾在机场着陆，烧毁敌机。发出空袭警报时，命令俘虏到市内防空壕躲避。当时有一朝鲜飞行第六联队少年航空兵出身的名叫白浜幸吉的俘虏。他于1937年末被俘，由于早就和敌方合作，所以没有进入俘虏收容所，而在中国航空部队内自由

生活。他对送来成都的日本俘虏，甚至用严刑审讯，因此受到全体俘虏的愤恨。他与在延安的野坂参三、去重庆的鹿地亘、池田幸子以及青山(假名)等，是同类人物。

此时，在这个俘虏收容所以外，在成都军事监狱收容有山下七郎海军大尉，在成都 19 号监狱有山田信次少佐以下 6 名军官及士兵。山田少佐是士官学校第四十一期及陆大毕业的飞机驾驶员，在岐阜飞行集团参谋任内，往华南飞行中因飞机事故被迫降落，在人事不省中被捕。

中国军方面试图利用日本空军俘虏从事某种工作，因此，将他们集中于航空基地成都。但是，除白浜幸吉外，其他人未被利用。

1942 年 4 月，上述成都附近的日本俘虏全部被集中收容于成都城内王家坝的旧官署内，此即后期的成都俘虏收容所。

当时的人员有上述山田陆军少佐、山下海军大尉以下约 30 名(内陆军 16 名)。大体上也是生活自理，他们建立了庶务(外交、炊事等)、卫生、娱乐等班组，副食品支給现金，由懂中国话的人每天到市上采购。他们每晨举行皇宫遥拜式。每逢节日就拿出在纸上用血染成的太阳旗，大家整队同唱日本国歌举行遥拜式。外国的传道士有时也来慰问。

然而，1943 年突然发生了以下事件：

森中尉和浅野军曹散步走出门口约一米处时，哨兵误认逃跑而开枪射击，使二人均负重伤，虽经入院治疗，但因出血过多终于死亡。此事件发生后，采购或打水等一律禁止外出。

其次是，4 月上旬发生了小笠原、杉野两海军军士，森村伍长、野崎军曹同屋四人全部越狱事件。他们沿扬子江而下，

当日傍晚即被逮捕。山下海军大尉也被作为教唆犯同时逮捕。其后，此5人被收容于另外的监狱。由于在他们的衣服内，发现有写着中国军队之配备图、兵力及其他的纸片缝在里面，显然是间谍行为，被问成重罪。1945年8月15日停战之日，《大公报》刊登了此5人被同时枪决的消息。

据说这些情报主要是山田少佐搜集的。

由于发生了这些事件，收容所长改由空军少校周某担任，管理更加严格，禁止生活自理，完全成了囚犯。仅仅由于和中国兵搞熟了，才可以看到报纸，判断形势。山田少佐曾提醒大家说：“如果我进一步采取软弱态度的话，我们的待遇或许有某些改善。但是，精神的问题比物质问题更为重要。我们没有任何卑鄙可耻的行为，他日停战归国之时，也是光明正大的。”

重庆俘虏收容所的情况：重庆俘虏收容所，设于重庆市南五公里名为刘家湾的村落中，所长为邹任之上校（停战时任少将）。

1944年4月，从成都转送至此的俘虏，与原来在当地的俘虏，分别收容于邻近不同的建筑物内。原来在重庆的俘虏和以山田少佐为中心的成都组俘虏，不仅分别收容，而且在思想上也尖锐对立。

原来在重庆收容所的俘虏，组织了“民主同盟”或“同志会”，以名叫大串胜利俘虏为中心，海军下级军官三上毅为助手，掌握了很大的权势。他们设有总务部、文化部、教育部、社会部等，并搜集有关日军的情报，对新入所的人，了解日军的军备、军需工厂等情况，向中国军政部门报告。就连美军飞机

轰炸日本本土的某些目标也是根据这些资料而定的。

前述之鹿地亘，和上海的舞女池田幸子一起，早就投身国民政府，当时也住在重庆，以完全自由的身份，经常出入于这个同志会。

这个同志会所在的收容所，人员逐步增加，达到八百几十名。但并不是都参加了同志会进行卖国行为，其中也有不少坚贞之士。

食物过于恶劣，因营养不良而死亡者陆续发生，重庆政府连自己的文武官员都穷得吃不饱饭，俘虏给养的恶劣情况可想而知。

成都组山田少佐以下三十八名，收容于别的房舍，称第一营，被当作顽固分子予以管理。第一营的给养比前者更坏，每日二餐糙米稀粥，副食也只是咸汁木瓜（原文如此——译注），这使来此的美国传教士大为同情，拿来一些制造玩具的材料，让大家做了玩具出卖，换些肉类和香烟。

山田俘虏组和在成都时一样，进行自己的日常活动。在压迫下加强团结，士气旺盛，因而死者极少。每晨举行皇宫遥拜式，节日唱国歌，挂太阳旗，避开监视，暗中持续进行。

在收容所内，根据中国的报纸和一些征兆，大体也能觉察到战争情况。1944年夏，当日军进入桂林、柳州一带时，中国政府大为动摇，甚至有迁都西康省康定之说。国府内部彻底抗战派和宋子文等停战派争吵不休。

第一营在1944年末，迁移到邻近地区新建的集中营。这一时期，又收容了小野华北交通会社总务部长，林、别所两舰长，某某海军大佐、中野海军军医大佐等较高级的军官和民间

人士，加上从缅甸转送来的一些人，总数达到 130 人。

某某大佐等四名入所后不久即被转送美国，不久其中三人又回到重庆被同志会方面收容，仅该大佐一人留在美国。

新收容的人，情绪不稳，烦恼也大。因此，第一营中刚收容的伍长向井，用剃刀割断了颈动脉，藤光补充兵剖了腹，以图自杀。

同志会歌颂三民主义反对战争，而第一营则每日向皇宫遥拜。这种对立，一直继续到停战。如上所述同志会方面最后虽然达到了八百多人，但并不都服从大串等的领导。后期收容的人中，大部分只是共起居、不反抗，保持中立态度。第一营不用说最初三十多人的最坚强分子，就连后期收容的也大都采取统一行动。邹任之所长有一次来第一营说：“同志会的人，对什么都说‘是，是’，这当然不能令人十分满意。但象你们这样傲慢的俘虏，恐怕世界上哪个国家也没有。”

1945年8月12日夜，宣告全面停止战争，俘虏们同声欢庆。8月15日收容所内贴出了《大公报》的号外，上面的大字是“日本无条件投降”。

这时，邹所长又对第一营山田少佐等说：“你们才是真正的日本人。”

从此，他们以一日三秋的心情过了八个月，等待着归国的日子。1946年3月21日，下达了将于4月14日出发送回的命令。行动比较自由的同志会方面，就去埋葬俘虏同胞的近处山腰扫墓，并立了墓碑。

4月14日，共计约八百名的日俘，遥拜了长眠此地战友之墓，分乘三十辆卡车从重庆出发。以后，在几天的徒步强行

军中，又死去数人，对死去的人都就地挖坑埋葬。这样好不容易才到达了扬子江的小港口潜陵。4月19日在此地乘船下航，到达汉口移交给日军。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为照料通过的归还部队，在南京江岸下关，设立了兵站设施队。1946年5月14日、17日及20日，曾三次将俘虏队伍收容于设施队，并使之停留了二、三天，发给被服，令参谋作必要的调查等。根据调查结果，从思想上大体区分如下：

(1) 作为日本人坚守节操者。

前述山田信次少佐指导下的数十人是坚强的军官、士官。其中，有主计大尉某人，在缅甸激烈战斗中负伤，人事不省被俘，转送到重庆收容所第一营后即企图自杀，被山田少佐说服，他与山田约定先辅助少佐，俟回到日军部队时再自杀。到南京来后，即向宫崎参谋恳切要求允许自杀。经宫崎参谋再三说服，才打消了念头。

(2) 与敌军持合作态度者。

这属于前述“同志会”那些思想不正的人们。据说到汉口后，多数退出了同志会(民主同盟)。

(3) 受中共和冈野进(野坂参三)之影响，成为共产主义者或共产主义拥护者，从事反战运动的人。

前述同志会方面收容所内的知识分子，有丰富学历的预备役中、少尉居多。曾在我总司令部工作过的长谷川为领导人。

(4) 不属于以上三者，马马虎虎混日子的也不少。

对这些不同类型的人们，我参谋分别给予适当鼓励后，送

往上海。

这些俘虏6月下旬于博多市复员时，中国派遣军的伊藤参谋的讲话使他们大为感激，精神抖擞地踏上还乡之途。伊藤参谋说：

“有关对于诸君的接待，政府方面也有议论。然而，当野坂参三、鹿地亘之流大摇大摆回国之际，对于曾和他们对抗过的诸位，应予以愉快、温暖的迎接。”

3. 中共方面(延安)的俘虏

共军方面，除局部地区将若干名俘虏送还日军及把极少数的送往重庆外，大部分集中在延安，进行教育，终于没有送还日军。这些俘虏似乎均为讨伐战中身负重伤被俘虏的，人数不明。根据我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时期得到的综合情报，延安似有几十名日本俘虏，收容在称为营养学校的训练处，接受冈野进(野坂参三)等的赤化教育。

又据1963年秋在东京得知的情况，现在日本共产党中，有以中小路静夫为中心的延安会及茂田繁等人的香山会等在延安受过训练的小组，据说他们受到中共的特别信赖和期待。他们有的跟随野坂参三回国，有的混在归国日侨中回国。

四、归国运输

归国运输是我和总司令部人员最为关心的事。运输力特别是船只问题，如本章之一所述，最初非常担心。但是美国分配给中国地区相当多的坦克登陆舰，从而，自1945年11月17日由塘沽启航开始，逐步由塘沽、青岛、连云港、上海、广州等地，乘船归国。但连云港由于陇海路东段于1946年1月下旬

被共军割断，其后，我河南方面军民经徐州、南京向上海集中。

何总司令也于1946年1月下达训令，指示应于6月底以前紧急集中于乘船地点。人数最多的长江腹地方面，由于中国方面的努力，除第二十军官兵自湖南中部徒步行军至岳州以外，其余通过船只及郑州——徐州线的铁路，于6月20日左右，全部集中到上海。

山东胶济路，被共军割断多处。我济南地区军民，遭受国、共两方基层部队及当地居民的掠夺等，备尝艰辛，并有若干牺牲，经过乘车与徒步结合，才到达青岛集中。

解除武装之时，为自卫允许每步兵中队可以保留步枪十支，特殊中队步枪六支。每枪可附子弹五十发。这些枪支在乘船地集中后或上岸前交还。

归国军民可携带的行李，有如下规定：

行李重量在三十公斤以下，但不包括被褥。

每人可携带金额，军官五百元，下级军官二百元，侨民一千元。

军人姑且不论，侨民特别是在中国已居住几十年的，积累了莫大财产，这次丧失殆尽，孤身无靠而回国的情景，确实悲惨。

我在以后隐居上海时期，曾于1948年4月29日（参照第十一章同日日记），路过上海的吴淞路。吴淞路两侧原来都是日人店铺，几十年来繁荣兴盛。而今看到全部成为中国商店，不禁泪下。

综合九州各地先遣复员本部办事处报告，据说象这样几乎是空手被遣返的情况，同其他地区相比还是较好的。到遣

返为止，根据 1945 年 11 月 26 日训令，对日军官兵支給的每月杂费是：

将官八千元

佐官四千元

尉官二千元

下级军官四百元

士兵二百元

根据上述情况，至 1946 年 6 月末，除处理遗留事务者，以及被征用、留用者外，大部军民已踏上归国之途。我总司令部（剩余主力约 390 名）也接到秘密指示，分别于 6 月 29 日、7 月 8 日，由南京出发，乘 7 月 15 日由上海启航的最后船只归国。但在 7 月 1 日午后，突然由于美国方面的原因，上海出发的最后船只改为 7 月 4 日启航，因此，又接到严格命令必须在本日内乘下关的长兴轮，明早启航。虽然毫无道理，但战败者的悲哀，不容抗辩。只好彻夜忙乱进行准备，翌日 10 时由下关启航回国。

到此告一段落，我也得以安心。

虽说告一段落，但除上海纺织关系方面尚有数百名留用者外，还有相当数量的遗留侨民。如 8 月 15 日，为处理遗留事务留在汉口的约 40 名军民，在第六方面军经理部小田部大佐率领下路过了南京。总之，大陆上还遗留着相当多的日本人。

有关此后的撤退，仅举如下一、二实例：

遗留在北京、太原、汉口、青岛、南京、上海、广州、台北等地的联络班，除南京联络班之一部外，其余均于 1946 年末，结

束业务撤退归国。

1946年12月28日由上海启航的坦克登陆舰，搭载我军民760余人驶向佐世保。

据1947年9月15日来访之曹士澂少将谈：

(1) 从华北撤退者约一千人(其中五百人来自大同)，近期乘日轮橘丸归国。

(2) 青岛约有50名侨民正在等船，预计近期内可搭乘油轮归国。

(3) 南满最后撤退侨民约一万人，近期可能全部归国。

五、留用与征用

根据前述对华处理纲要(参照第二章之八)，采取使志愿留用者留在中国的方针。中国方面也希望利用日本军民的技术能力，在航空、通信、特别情报、卫生、汽车、养马等方面给以协助，或下令征用。

此外，还有不属于留用的劳役，即由日军修建道路、桥梁及其他工事等。这种情况虽然不多，但为此于1945年10月15日制定了由日军修复被破坏的交通、通信、各种建设工程的“中国战区日本徒手官兵服务办法”。

对上述留用、征用、劳役等，在最初一段时间里进行很顺利，据说中国姑娘看到日本兵疏浚南京河流的作业情况深为感动，曾有在街头募捐进行慰劳之事。但也有的中国基层机关方面，对中日合作缺乏理解，而把日人当奴隶看待。因此，申请取消留用的人层出不穷。同时，随着归国运输的进展，在被留用和征用者中，由于内心的驱使有的也强烈要求回国。但

中国方面则坚持希望留用，因而发生了矛盾。为使这些人撤退，总司令部以下主管人员煞费了苦心。

何应钦等曾多次对我等提出希望说：“日本已完全废除了军队，一些优秀的军事技术家也不需要了，这太可惜。我想招聘他们，连同所需要的器材，秘密运送到中国内地如重庆等地进行工作，请你们妥善从中斡旋。”为此，我与中央部电报联系后，又派总司令部冈野参谋去东京办理。但冈野回到日本不久，即报称：已被美军阻止，不许进入名古屋南北线以东。不得已只好让冈野去九州复员本部，单独复员。

当时，密码电报一律禁止，只允许用明码电报。但是，派遣冈野参谋的目的等，又不能露骨地说明真意，因此，使用了一些暗示符号。估计这些暗示符号被美军识破，所以，阻止冈野不准与中央部联络。

美国好似对中日合作的气氛感到不快，这从中国方面的言行中也不难推测出来。后来中国方面改变了希望留用、征用的态度，于1946年1月20日，突然下达除希望留下的技术人员以外，全体日本军民一律回国的训令。

同年4月8日又接训令，大意为：除台湾日侨（约2800人）可使之留到明年1月1日以前外，其他不论是否志愿留下，应一律遣送回国。据我估计，这是美国的唆使，并不是中国的真意。就在前一训令之后不久，1月27日白崇禧将军接见今井参谋副长，还就留用问题进行了热情的秘密谈话。到接近遣返运输末期，情况第三次发生变化，又接到强制留用相当数量日本军民到年末为止的训令。

总之，中国方面接收的机关、工厂等，在相当一段时间里，

如果没有日本人则无法继续工作和经营。因此，一方面颁布了全部遣返日本人的命令，但在需要面前，命令却可能被忽视。至于现场，对此等训令，则佯做不知，继续留用日人。

第十三军参谋长土居明夫中将与停战时被中国方面从泰国救出来的辻政信大佐，志愿留在南京中国军部内。另外，有几名特情工作的军官，也半强制性半永久性地留在中国陆军部内。

1946年6月24日止，被留用、征用者概数如下：

军	{	北京、天津、保定	35	}	829 名
		山西省	691		
		南京	17		
		武汉	15		
		广州	13		
		海南岛	58		
民	{	正式留用(包括家属)	27,883	}	36,521 名
		(其中台湾日侨	27,107)		
		非正式留用(包括家属)	6,955		
		其他	1,683		

在这些人中，志愿的姑且不论，强制征用却是违反波茨坦宣言的非法行为。总军虽屡次抗议，但毫无成效。这是战败者的悲哀。

在全部撤退以后，我估计还有相当数量的征用者、留用者、“潜在者”留于各地。

六、会计、卫生及法务

有关这些问题，仅从派遣军情况报告中摘录其要点如下：

1. 会计问题

预算、决算：中国派遣军到停战为止所使用的预算总额，由于现地物资及其他复杂的经济情况的影响，达到了空前的巨大数字(3,864 亿日元)。因此，决算工作十分艰巨，经充实加强复员本部经理课，并在各军主管者的协助下，始逐渐完成。

停战后的财会处理：留在现地所需要的经费，以中国方面付给的实物、现款及贷款等支付。我方保有的公私款项，由中国方面接收的经过，也大体顺利。

官兵之野战薪金：薪金待遇逐渐降低，长期留下的，各种待遇更为不利。

粮食给养：派遣军在停战同时，为了军队的独立生活，要求保留给养组织及维持军需品的现状。在采取一系列措施后，各军基本保持了到 1946 年初所需要的粮食，但是，1945 年 10 月，中国方面在接收军需物资时，对被服、粮食等下达了“应与中国正规军同等待遇，原则上以实物补给”的训令。然而，实际上并不按规定补给，因此各部队均以现有粮食节约食用。到 1946 年三、四月间粮秣已经用完，再加中国方面又逢粮食饥荒，经常不予补给，因此，武汉、粤汉线地区我方部队最为困难。经采取各种手段始勉强度过，未致发生重大问题。但遗憾的是在内地的部队却发生了营养不良问题。

被服发放：处于中国内地的部队，因自己保存的被服不够

充足，过冬发生困难。但由于中国方面发还接收物资以及由总司令部追加补充，方得安全度过。

为了使归国时尽量穿好些，在乘船地接受了中国方面发还的接收物资(主要是被服)，使五分之二官兵，换上了新装，聊以饯行。

2. 卫生问题

患病数字及主要疾病：

停战当时派遣军患病总人数约八万名。主要疾病，疟疾占首位，其次是脚气病、赤痢、营养失调症与皮肤病。停战同时考虑到给养及将来的运输问题，努力使患者集中于后方主要地区，并特别在上海准备了二万张病床。

卫生工作以预防传染病及复员前彻底治愈性病为重点，我曾向所属指示了使官兵身心健康，以参加重建祖国的方针。

然而，停战后情况大变，衣食住均不如意，身心疲劳过甚，因之发病率有所增加。

传染病：传染病特别对霍乱的防疫检疫，最费苦心。到1945年12月为止，除华北、台湾外，各地共发生2,200名霍乱患者。进入1946年后，华中、华南又发生约三百名霍乱患者。结果，在华南和法属印度支那的复员运输船内，爆发了霍乱的流行。这真使人遗憾。

其他，斑疹伤寒患者也不少，还有回归热、赤痢、天花等，但均未造成大流行。

1946年5月左右，扬子江流域一般地也发生霍乱及斑疹伤寒。对此，美军表示了极大关心，调查了我军的实际情况，发放了DDT及其他消毒液、预防接种疫苗等。

运送患者：

自后方运送患者特别在中国内地的部队最为困难。山西省的约三千名患者，从1945年12月至1946年3月，才经过铁路送往平津地区。

长江一带第六方面军的约三万名患者，由于医疗船不许可在长江航行，只有用普通船只运至南京，再通过铁路送到上海。在这一阶段，因超载搭乘、伙食不良等原因，中途死亡七十名。同时，因病情不宜运输在南京住院的有388名。

遣返日本的患者总数约为六万五千名。其中，由医疗船（包括坦克登陆舰改造者）遣返约32%，一般船只约68%。

停战时派遣军的卫生机关：停战时派遣军的卫生机关如下：

兵站医院	55	防疫供水部	3
野战防疫供水部	2	患者运送部	2
防疫部	1	卫生材料厂	1
病院列车	3	日本红十字救护班	103

以上各机关，跟随所在地兵团逐步遣返复员，其中护士及女文职人员，均提前予以遣返。

各卫生机关的接收，大体是在1945年10月至1946年2月之间。由于被接收后仍然允许收容我军民患者，因此未发生大问题。惟因中国的监督军官中，有逞私欲者，加以所收容的中国兵，一般缺乏教养，风俗习惯也不同，对我方诚心诚意的治疗、护理，常因枝节小事而发怒，行使暴力等以致造成困难，但在我方职员尽力隐忍下，完成了使命。

侨民的诊疗及防疫工作：

由侨民中的医师负责诊疗及防疫工作，军部发给他们需要的卫生材料，并将重病号收容在就近的兵站医院，给以必要的协助。

3. 法务问题

恩赦工作：1945年10月17日颁布大赦令、减刑令、复权令，自公布日起实行。在当地虽也促进这一工作，但由于当时判刑者已大半归国，分别拘押于内地各监狱中，因此，由各军法会议将法务部军官派往九州复员本部，并于复员本部中任命军法官，组成军法会议，负责恩赦工作。1946年6月5日完成了这一任务。

军法会议的运用：停战后，有关日军有无裁判权之问题，在国际法上确有疑问，但当时在我军中有这样一种见解，即：由于中国方面的好意，在中国战区确保了日军之统治机能，根据这一特殊情况，并鉴于保持现实军纪的要求，有关日军所发生的犯罪事件，我方可以处理。据此继续保持了所属各军法会议的机能，以期充分保持我军的军纪，直至复员输送完了为止。

至于处理与中国有关的事件，曾规定原则上适用中国的法律裁判。但是，即便在这种场合，也尽量争取由我方收容处理。因此，由中国司法机关的处刑，除战犯外，限制在最小限度内。

停战后，派遣军的统治、团结，仍然坚强巩固，因之，能够实现整齐的复员撤退，与战前相比也保持了毫不逊色的军纪。但在当地征召的士兵中，有不少追求安逸生活企图不走，或害怕被追查为战犯而离队等等违法行为。

判刑的执行；

停战同时，除案情特别严重者外，在法令许可范围内一般假释出狱。为了确切完成判刑的执行任务，在努力保持现有设施同时，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了对未决犯暂时免予扣押，对已决犯停止服刑，由就近部队收容看管的方针，各部队大体上顺利地完成了这一工作，并将各犯移交给国内的执行机关。

七、停战对人物考核发生极大变化

这主要是以华中方面的见闻为基础。虽然对华北、华南的情况缺乏了解，但派遣军的大部分在华中，因之，也可看出大致的倾向。

停战后军队解体，军人生活行将结束。当此能否安全回国前途未卜、忧心忡忡之际，正是人类本性的大暴露之时。停战之后，在指挥官、幕僚等干部中，也有丧失军人精神，变成只顾私利的卑鄙小人。特别在乘船地区，发生了不少丢脸的事情。譬如，在遣送船只跟前，想要早一步上船乃是人之常情。但据说有不少人把过去先考虑上级或部下等道义完全置之不顾，而买通中国负责官员，自己先上了船。还有的私自携带宝石一类在日本可卖高价的细小物件。甚至有的军司令部，全体幕僚都返回日本，只剩下了军司令官及军参谋长。有些部队长，在被接收时的态度，输送时的统率表现，以及乘船前的焦躁情绪等，都与平素对他们的评价相抵触。

据广播报道，日本国内中央部为处理停战善后工作，在各府县任命了联络部长，从中国归还的少将级干部也有膺任此

职者。其中有的行为卑鄙反被起用，而品格优秀的却落选。对此情形我极为愤慨。因此，于1946年春夏之交，曾向中央发出了如下电报：

“伴随停战，对人物的考核变化很大。今后录用由中国归还者时，凡属大佐以上及幕僚人物，希先来电报协商。”

与上述情况相反，也还有原来对其评价不高，停战后却表现卓越而被人钦佩的人物。如停战时驻安庆独立步兵第六旅团长门胁幹卫，原来对他的评价并不甚好，同时从陆大毕业的陆士同期生，都已晋升到中将，惟独他还仅是大佐，而且看来旅团长职位对他已算到顶。但在停战后，被接收时，他的态度光明正大，采取的措施恰如其分，很受中国方面的称赞。同时，在统率归还部队通过南京的多数兵团中，他的表现也是最好的，大家都很佩服。其次，也有平时优秀、停战后表现也很出色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当总司令部即将撤退，快到只剩我一人的时候，全体参谋都争着要留下，以致难以选择，使我深为感动。结果，在南京的总联络班留下了今井少将、宫崎、小笠原两中佐。各地联络班（参照第八章）留下的主任，基本上都是当地驻军参谋。对他们这种高度的责任感，我深表敬意。惟独在上海，该地附近的多数参谋中竟无一人愿意留下，以致组织联络班时发生了困难。只得以总司令部的延原、高桥、相山、日高等参谋为主，组成了上海联络班。在此期间，撤退途中的第六方面军参谋安崎操中佐，主动加入了上海联络班，使人异常感动。

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中将，过去未曾和我共过事，到任日期也短，我对他本来不太了解，只是听说他的人格高尚。当总

司令部就要撤退时(参照第六章5月30日日记),他每晚和我激烈辩论。小林的说法是,总参谋长的职务,相当于总司令官的主妇。当不知道其总司令官的命运如何之前,决不能自己先回国,无论如何也要作为南京联络班长留下来。

对此,我反驳说,总参谋长不仅是属于总司令官的,他应当代替总司令官率领总司令部归国,并上奏军队情况。一连几天,每天为这问题纠缠不休,我心里感激小林的好心,但嘴上却说,他不能胜任联络班长的职务。小林总参谋长才不得已只好答应了归国。他在上海等船时,还强烈要求担任上海联络班长,我仍然予以拒绝。(参照第八章7月7日日记)

军的撤退末期,接到指示:“中将级的将官除鹰森孝、笠原幸雄、小林浅三郎三人外,其余全部留下。”估计可能由于这三人到任期短,没有战犯嫌疑的资料的缘故。但是,笠原、小林两中将愿与同僚共命运,坚决不肯回国。对此,我虽已丧失正式命令权,仍于7月7日前后发出如下指示:“总司令官意图,笠原幸雄中将、小林浅三郎中将应立即回国”,两中将乃于7月19日踏上归途。

第六章 1946年上半年日记抄

1月1日

于南京宿舍迎来一个停电断水的元旦,下午举行遥拜式,晚上召集幕僚部长们在宿舍会餐,一切和往年一样。

1月3日

据报告,江苏省高邮守备大队(大队长以下200余名),受共军猛攻终于被解除武装。

1月9日

战争结束已4个月。因治安情况不良而缓期解除武装的部队,现奉命一律予以接收。

因中国方面有要事,派日高参谋前往北京。

1月11日

据小笠原参谋报称由于国共停战协定的成立,中国方面再次指示我军全部解除武装,据此已指示全军遵照办理。

1月12日

数日前,接何总司令训令,按美方计划,应速行集中遣返军民。另据外报消息,美国已决定移交我国万吨级轮船百只、三千吨级坦克登陆舰百艘,配备日本船员,负责遣送日军民回国。

战争结束当时,曾向美方要求提供船只,但未被应允,此番似已确定了从速遣返的方针。

1月15日

来宁的美军事调查团，曾要与我会面，因连日感冒卧床而谢绝。

1月20日

虽说国共停战协定已经成立，但国军仍未到达，据报告：被共军包围着的未接收的我部队，对共军仍要求解除武装的要求，陷于窘境。

1月23日

据报，驻扎山东省泰安附近第十一独立警备队（司令官注田少将及部下约四千人）曾接何总司令命令，应携带武器向济南集结，绝对不准将武器交给共军。但该队最近被优势共军包围强硬要求接收武器，虽曾试图突围也未成功，共军还截断粮、水来源，使警备队陷于极端困难的境地。为此，派小林总参谋长赴何总司令部，交涉解决办法。这是第二次。

注：注田兵团于1月23日以战斗姿态由华丰煤矿出发，毅然突破包围，其军容整齐压倒敌方使之后退，结果，未损一兵一卒，率领侨民于1月30日抵达济南完成集结。

1月24日

立法院副院长叶楚傖一行四名军事委员会委员等，突然来访，仔细查看了住所内部。据云，外间传说我住所内藏有中国珍贵艺术品，故来检查。临行告我并未发现什么。

1月30日

冈田参谋副长被任命为复员本部长，尾川参谋大佐任部员，于本日出发归国。

2月4日

夜，白崇禧将军要求面谈，因病由小林总参谋长代为前往。

2月8日

战争结束已经六个月，始接到国内来信，乃金泽市陆军少将福田荣太郎于去年8月8日发出的明信片。

2月9日

我们宿舍的房主中国人某，偕同其美国人秘书和军政部卫生处刘处长来宿舍视察。

2月11日

举行纪元节遥拜式，我因病缺席。去年11月因飞机迫降被共军扣留的嵎山参谋，后经释放又在徐州受国民党军审查，今日始归来，大为欣慰。收听安部文部省大臣的广播“纪元悠久”，为之感动。

2月12日

继续治疗；舌尖溃疡仍未痊愈。傍晚，何应钦总司令部参谋钮先铭、曹士澂两少将、王武上校来访。据云代表何应钦上将来问候我的病情，赠水果一筐，并转达了何应钦对战犯问题的意见（关于战犯问题另行记述）。对此，唯有感谢而已。

2月17日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主任王芃生，王又名王大禎来访。过去只见过他一两次，他和我的好友殷同、汪时璟等同为日本陆军经理学校毕业之英才。我出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由东京出发时，东条陆相曾口头委托我秘密开辟和重庆的联络线。到任后让殷同（后为汪时璟）与重庆接通无线联络线，当时重庆方面的对手即为王大禎（详见第三编）。

今天和王畅谈了一个半小时，从日中关系、招聘技术人员，到防止赤化，以及战犯问题等。据他透露不少在重庆阵营中的我的朋友们，都一致认为：“冈村虽一直在中国活动，但他和南京、徐州事件以及其他的大惨杀事件完全没有关系，真是他的幸运。”

注：约在一年之后，王大桢突然死去。王死后风传他密通共产党事已暴露。

2月 19 日

正在南京的魏德迈将军曾要求和我会见。我本拟和这位中国通一谈，但因病未痊愈，只好谢绝，甚憾。

注：1957年魏德迈将军通过美国驻日武官，就有关对重庆作战问题向我提出几项质问（当时魏德迈是蒋介石的最高顾问、参谋长），我得到防卫厅战史室的帮助，于当年8月末答复了他所提各项问题。

1958年秋“魏德迈报告书”出版，并畅销一时，并寄赠给我附有亲笔签名的一册，已转赠给战史室。我因不懂英文，找到译本，通读一遍，果然不出所料，当战争结束时，对将军一再提出的建议，美政府未予采纳，故而冒埋头于国共合作的错误。现在看来，事情很清楚，这正是造成中国大陆赤化的原因之一。今后如有机会，当再熟读该书，结合我当时在华见闻，将此重大事件回忆一番。

补记：1965年魏德迈将军来日，我与他再度恳谈。

2月 24 日

据报 22 日山下奉文大将于马尼拉从容走上绞刑台。

2月 28 日

进驻东北的苏军暴行，激怒了中国人，于上月25、26两日，数万学生在重庆、南京等地举行反苏示威游行。据说美国舆论也对东北予以关注。

3月5日

安哥拉广播东京消息，传说天皇陛下将要退位，故以总司令官名义向币原总理兼复员大臣发出如下电报：

“据安哥拉广播，天皇陛下将要退位，这项消息是在中国的二百万军民不能相信的，请速告详情。”

旋接回电如下：

“关于天皇退位事有关负责方面概不知情，相信将来也不会实现。”

注：事后据当时任复员次官的上月良夫中将对我说，币原大臣看到我的电报后大喜，当即派上月良夫次官晋宫据情上奏。

3月7日

据报冈田总参谋副长前天在博多就任。

3月10日

最近发表的日本新宪法像是以主权在民、放弃战争、维持大大削减了权力的天皇制等为中心内容。但据同盟军司令部发表的谈话，宪法似乎是按盟军指示商定的，并非出自日本人之手。呜呼！

我的宿舍旁的房屋，已将房屋归还原主交通部航空司司长高廷梓，最近该氏也已迁回居住，故赠予一些礼品，今天对方回赠我佛像一尊、茅台两瓶。

3月11日

迄今为止，已归国军民合计 63 万人。

3月17日

归国军民达 70 余万人。

3月22日

十时到鼓楼办公处办公。自元旦患外感，相继而舌尖溃瘍，卧病不出约八周，今始好转，恢复工作，实在高兴。

听取宫崎参谋汇报山西、华北情况。

接长子忠正的报告，已携其妻子于 20 日离北京，将于 4 月份乘船回国。其所在单位大东亚省势必撤销，未知其前途又将如何。

3月26日

十川第六军司令官来汇报情况。

归国军民已超过百万。

4月1日——12日

1 日早突患胆囊炎，胃肠亦有并发疾患。卧床 12 日始痊愈，每日唯以读小说度日。

4月13日

截至昨日，归国军民共 135 万，下余约 70 万。中国方面声称要在 6 月 20 日以前将长江上游的军民集中于上海，6 月份内要将中国地区日本军民全部遣送回国。但仅凭现有的长江航运船只和汉口——郑州——徐州——南京——上海的铁路运输能力，能否于 6 月 20 日以前将军民集中完毕，很成疑问。

4月15日

听取小笠原参谋上海公出汇报。

晚间，召集全体参谋，举行停战以来的第一次会餐，借以

遣闷。参加者有小林总参谋长，今井总参谋副长，西浦、延原两大佐，宫崎、大笠原、野尻、藤林、高桥等中佐，日高、舟木两少佐。尽出所藏洋酒，佐以水煮鸡，开怀畅饮，群情大快。席间大家议论：停战以来，人人多少均有些患神经衰弱，也听到各部队内多少有些小纠纷，而总司令部上下一心，百余名士兵本可提前归国，但均表示愿与总司令官共患难一起回国，余听到这些，深受感动，不觉泪下。

4月18日

由延原参谋向中国方面手交秘密研究文件达四、五十部，中国方面极为感谢。

最近遣返运输频繁，原驻河南地区的第十二军部队，每日乘火车经下关、南京东去，另驻汉口地区的第六方面军部队乘船，每日只有一艘到下关换乘火车去上海。总司令部为此特设置下关兵站工作队，积极配合过路部队，工作十分紧张，从而幕僚与各部队长往返下关的情况亦极繁忙，至少能很好地了解部队的情况。

4月19日

前田宪兵曹长从北京到南京一直担任余之警卫，并表示仍愿留在我身边。但鉴于宪兵大部都被指控为战犯的情况，决定令其早日归国。前天赠给服装数件，也是因为他已晋升为准尉，特地予以照顾，当晚，举行会餐为之饯别。

4月21日

据中央社消息，长春的国军遭共军猛烈攻击，据说有人见到共军拥有某国的坦克、大炮，另据报道长春似已失守。关内各地由于美国斡旋，除个别地区有小纠纷外，大体相安。而东

北则战事日益激烈。所谓和谈只是表面现象，继续抗争乃是实质。

4月22日

最近每隔一日即有外事汇报，间有情报汇报等。

晚间偕同今井副长及冈田翻译，往访何应钦上将，面谢日前探病之盛意，并就有关扣留战犯问题进行恳谈时，我特别提出：“听说最近已开始对日军高级将领的战犯嫌疑开始审查，我认为有关战争责任的处罚问题，应由总司令官我一人承担，希望对其他军司令官、师团长免于追究，指定我一人即可，并请将此意转致蒋委员长。”何对此未作任何表示。

4月23日

前由何应钦密嘱写一篇对中国军队坦率的评论，昨日晚又来催促，故自今日起开始执笔，起草《从敌对立场看中国军队》。

据报：日前国内总选举结果，自由党约140席，进步党约100席，社会党约90席。

4月25日

听说因战犯嫌疑在被转移到上海拘留的原台湾军司令官安藤利吉大将于20日服毒自杀。另对汉口附近美空军飞行员事件有关人员镗木少将以下五人，于22日在监中处死。

安藤是我同窗好友，镗木乃我熟识的旧部下，开始听到他的死讯不胜哀悼。然而，余今同情他人，他日余亦不免。对于死之感觉已麻木矣。

4月27日

最近因兵站勤务队发生火灾，考虑到中国方面的舆论，今

日处分了该队队长增田少将。

据东京电，麦克阿瑟总部认为，现在外地已解除武装的日军官兵，既非俘虏，亦非市民。在中国境内，中国方面对日军均称“徒手官兵”，但近来亦有简称为“日俘”、“战俘”者。

4月29日

原定10时于鼓楼办公处院内举行天长节遥拜式，因阴雨泥泞，改在各室内分别举行。

5月3日

按照中国报纸的原文记事是：“蒋主席夫妇凯旋首都。”

5月5日

还都纪念那天适值星期日，市面热闹非常。

我的军人生活的最后十年，仅在国内工作二年，其余八年均在战地工作，于兵马倥偬之余，写成随感录共十一册。因盛传历史文献将被没收，故于今晚全部烧毁。其内容大部是有关于用兵作战的记载，其中关于精神修养心得部分已摘要载于“回忆录”中。

注：结果任何文献均未被没收，后来每当战史室查询作战情况时，深悔不该烧毁，然已无济于事。

5月9日

还都以来，南京人口激增，高级官员的住宅尤为紧张。因此，主动决定将我们所用宿舍三处归还中国方面，全体人员拟集中于鼓楼办事处。并将此意通知中国方面。

1943年12月我于华北前线遭母丧，其后，在母亲遗像前供奉香炉，每朝在母像前焚香三柱，停战后改为一柱，祈祷冥福，但今日线香终于告罄。

5月10日

可能由于美军授意中国当局指示，今后出入军政部及陆军总部不得着军装。但我等除军服以外别无其他衣着，乃取下军衔领章，以军服当做国民服。军帽改为普通帽。副官为我买呢帽一顶，时价法币二万元，火柴一盒五十元。

5月13日

何应钦将军秘囑我撰写的《从敌对立场看中国军队》一文，今始脱稿，并经作战主任宫崎参谋以上各幕僚传阅补充校正。我自少佐时代经常来中国，相当通晓中国内情，又屡与中国军队交战，对其缺点也有充分了解，既受囑托，又愿为改善中国军队略申己见，故直言不讳，加以批判。

5月15日

华北方面军参谋长高桥坦中将因事来宁，中国方面指示，令其在我宿舍待命，可能有战犯嫌疑。

5月18日

晚间，由冈田翻译相伴，往访何应钦将军于其公馆，面呈拙著《从敌对立场看中国军队》共两部。何草草翻阅后，似感兴趣，又询及各种问题。在曹少将陪坐下又交谈二、三时务问题。

注：拙著内容多涉及机密，故仅誊写三份，两份交出，一份留底，不久亦烧毁。据何氏后来透露，看过该文件的只有何与蒋主席及另外一人。

5月19日

中国军事机构实行大改革，军事委员会、陆军总司令部，限月内撤销，新设国防部、参谋本部。国防部隶属于行政院，由陆、海、空、后勤各总部组成，任命白崇禧为国防部长，陈诚

为参谋总长。

5月20日

据报吉田内阁成立。

5月21日

不出所料，通知我等归还宿舍。时常与我接触的中国方面的参谋们，均为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亲日派，近来过从甚密，不时向我透露中国方面的内部情况。

5月22日

接到高桥坦中将将以战犯嫌疑于一、二日内被拘留的内部通知。对此余已向何应钦氏一再恳请予以从宽处理，终未获准。而高桥却处之泰然。

5月24日

考虑到自己今后处境，一个设想是作为总司令部的看守班，可能被允许留下来，小林总参谋长以下，近来也都希望全部留下来；而自己则认为也可能被当作日本战犯引渡回国。所以此刻谈不到全体留下的问题，而应对总参谋长以下的未来早作安排。

5月25日

送别高桥中将。

5月26日

离开住惯的宿舍，搬进鼓楼办事处。分居三栋宿舍里的高级人员，挤到窄隘的办事处，实感不便。

陈参谋来，说是要对日高参谋进行审查，将其带走，不悉何故，此举对我辈刺激甚大。

5月27日

今井副长往访曹少将，探询日高被审底细，象是无大问题，但亦未得要领。

米满副官向前住宿舍房东刘瑞恒移交房屋设备家俱，刘十分满意，未提出赔偿要求。

5月28日

率小林总参谋长、各部长及参谋副官等，赴下关兵站视察。

在码头、车站，眼望日本人踉跄逃命的姿态，作为三十余年来多次驻在中国，一直关注自己侨民的自己，面对他们全部失去多年在中国的积蓄而返国的情景，感到惨不忍睹。

5月29日

10时左右，美国军医哈莱大校来访，要求我做出各种姿态，共摄影96张，余不解其意，甚为惊讶。

5月30日

日前(26日)，不明原因而被拘留的日高参谋，由我保释，今始归来，据云并未受审问。

为处理战犯问题及善后事务，请求在各地设联络班，今已获准。自即日起于南京、上海、汉口、广州、北平、青岛、太原、台北等八处各设联络班，各班人员限十名以内，期限至年底，对联络班人员之归国，允予保证。

小林总参谋长以下参谋人员全体恳切要求与我共同留下，使我很为难。结果，南京总联络班内定为以今井副长为首，另有延原、宫崎、小笠原各参谋及二宫军医少佐等人。南京军事法庭从今日开始审判战犯。

5月31日

接到指示，自本日起，陆军总司令部宣告解散，有关我等一切责任，移交由参谋本部负责。

6月1日

美军医哈莱大校又来访。他说下关兵站卫生状况欠佳，拟以美军卫生材料相赠，我同意接受。并以咖啡赠我个人。

6月4日

今日端午，王俊中将以香烟、洋酒见赠。

6月11日

堀内公使来访，就上海情况晤谈一小时。堀内决定辞职，与日本侨民数百人长住于上海。

6月13日

寺内元帅因脑溢血，昨日于柔佛州逝世。

6月14日

我总司令部的延原参谋、吉永中佐以下七人，于一个月前由中国方面临时调用，在密室中编写情报参考书，写成特情资料共数十册，于今日归来。据云中国方面极为感谢，将使彼等尽速归国。

6月18日

由汉口径郑州、徐州遣返的最后一次列车的部队，于本日通过下关驶往上海。至此，长江上游军民已全部通过南京回国，我心释然。

6月19日

去上海公出的西浦参谋归来，带来4月20日在上海狱中自杀的安藤大将致我遗书一封。

6月22日

南京联络班人选问题，由于大多数人员均愿留下，5月30日内定后仍争论不已，颇感为难，本日最后决定如下：

班长 总参谋副长今井少将。

班员 宫崎、小笠原两参谋中佐、伊藤军需少佐、二宫军医少佐、冈田嘱托，三石、铃木两大尉，丸山准尉，汽车司机一人、勤务兵一人。

各地联络班人员大体已定，唯上海联络班，因当地部队及过路各军参谋人员志愿留下的不多，结果由总部高桥、嵯山参谋等先去执行联络班业务，俟有愿留人员时再行补充调整。

6月24日

美国合众社特派员伦盖由王武参谋陪同来访，了解遣返运输情况，约谈一小时许。

6月28日

下关兵站勤务队完成任务，将于明天去上海，为此队长增田少将及村上、上野两大佐前来汇报。

南京联络班开始迁入鼓楼附近的金银街原日本大使馆借用的二层楼房内。

6月29日

国防部指示：“总联络部（总司令部残部约四百人），应于7月8日由南京出发，15日由上海起航回国”，据此下达了有关总司令部、各军司令部遣返的命令，这是最后一次的命令。

6月30日

今日与各部课长举行最后一次会餐，出所藏御赐清酒，共同举杯话别。

7月1日

九时于办事处院内，举行中国事变以来阵亡军民追悼会。阵亡者约 20 万，近半数为我部下，不胜伤感。尽管仪式简单，总算了却一桩心愿。

午后突接紧急命令：“由于上海启航的最后船只根据美方强硬主张，提前改于 7 月 4 日启航，限令遣返人员一律于明早由下关乘长兴轮赴沪。”为此，彻夜进行出发准备。

7 月 2 日

上午七时，遣返官兵文职人员共 390 余人，在细雨霏霏中集合，由小林总参谋长代表遣返官兵，向我致以热情洋溢的告别词。我也致了答词，对大家共同努力，在短时期内完成了二百万军民遣返任务，表示了诚挚谢意，并希望归国后继续奋斗。九时许，小林中将以下幕僚乘最后一辆卡车离去。我送别他们以后乘汽车返回金银街总联络班宿舍。

第七章 战犯

一、与美国有关的战犯

美国已经在上海成立战犯法庭，审理有关在中国大陆、台湾杀害美空军被俘人员案件，但案件很少。华北方面军只有一件，结果未予追究。

汉口第六方面军参谋长楠木少将以下五名，被判死刑，于1946年4月22日在上海监狱执行。

台湾军司令官安藤利吉大将，也于同年4月20日在同一监狱自杀。安藤留给我遗书一封，于6月19日收到，内容如下：

冈村宁次大兄：

余自知死期已至，故而自尽。多年承蒙关怀，不胜感激，敬谢厚谊，并希珍重自爱。祝好。

安藤利吉

安藤是我在士官学校同窗好友，我任第六方面军司令官驻汉口、湖南之际，因当时制空权完全操于美军手中，为赴驻广东隶属部队二十三军视察，不得不转道台湾飞往，因而得与安藤多次晤面，孰意竟成永别。忆其往事以及从容赴死之心

情，不禁想到自己不久也将身临其境。

此遗书日后在仙台已手交安藤夫人。

台湾军参谋长谏山春树少将被判无期徒刑。

上海军司令官泽田茂中将被判五年徒刑。

第十一军自广西开始撤退时，俘获美军大校、中尉各一人。因彼等在拘留中于黑夜逃亡，中尉被守兵击毙，大校在逃。不知何故，此案直至1949年初才被提出，当时东京占领军司令部，曾传讯原十一军参谋及宪兵队长。原第十一军司令官笠原幸雄中将自忖不免于死，静候传讯。孰料参谋长与司令官均未被传讯，本案不了了之。

因当时东京军事法庭已撤销，可能由于占领军对此难以处理，经上报不予追究了事。如本件在一年前被提出，原十一军司令部军官中总会有几人要判徒刑。由此可见，战犯裁判有失公允。

二、与中国有关的战犯

停战后，由重庆来南京访问过我的要人，私下都谈过战犯问题，据说重庆政府内部对确定战犯范围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1946年2月17日来访的王大禛，曾吐露以下内容，可能与事实接近。

根据蒋介石主席方针，确定战犯范围以最小限度为宜。在最高干部当中有的说17人，有的说150人，政府虽拟停留于最小限度，但最近各地民众纷纷来信检举，其数字无法估计。与其说亲日毋宁说爱日的汤恩伯将军和我单独会谈时，曾力言战犯只以某某(未举其名)一人为代表即可。

总之，由于中国方面要趁停战的机会，确定了加强中日互助合作的方针，故在最高领导层虽拟将战犯范围尽量缩小，但又不能不考虑和其他同盟国处理战犯情况保持平衡，加以经过八年战乱，受日军蹂躏过的地方百姓，对日军官兵的横行霸道，纷纷检举，被拘留的人也将与日俱增。

截至 1946 年四、五月间，被拘留人数已约达三千名。但其中包括因与嫌疑犯同姓名而错扣的，只要是宪兵就一律拘留的，或其他非法拘留的人们。这对复员遣返工作也有妨碍，总联络部曾一再请求予以释放，其后陆续有被释放的，到 6 月底被拘留的战犯（包括台湾、海南岛）人数如下：

已判决 死刑 28 人 徒刑 73 人 扣押 2,042 人 合计 2,143 人

（据中国方面最后发表，受理战犯案件为 2,200 余件。）

中国方面虽已制定战犯处理办法，任命处理委员，其委员长为对日颇怀好感的曹士澂少将，并考虑日中关系之前途，确定宽恕友好、以德报怨的方针。然而，迫于国内外的政治压力及民众的强烈反日情绪，加以在工作上下属贯彻不力，各地军事法庭审理时的态度方法极不一致，有的把一般犯罪与战犯混同起来，而且不准用日本律师，官方指定的律师与被拘留者联系也不密切，以致草率从事，裁判欠公。总之，与停战当时蒋主席的号令不符。战犯中有的在日本国内如谷寿夫、矶谷廉介两中将，于 1936 年解到南京。现举二、三例说明审判战犯情况如下：

（A）南京军事法庭于 1946 年 5 月 30 日开始审判战犯，被告人为酒井隆中将和高桥坦中将，前者曾任天津

驻屯军参谋长，后者曾任北京驻在武官，两人均为签订梅津、何应钦协定当时日方的助手。酒井因访问何应钦时态度傲慢遭到憎恨，据闻何应钦指定的战犯只此一人。裁判结果，判处酒井死刑，高桥无期徒刑。

(B) 广州军事法庭，一次判处 40 人死刑 因太过分，经联络班向国防部恳切要求，乃将被告全部移交上海军事法庭再审，结果 40 人全部无罪返国。

(C) 理由和判决互相矛盾，使人怀疑是否因其他方面有罪，矶谷廉介中将军的案件即其一例。判决要点如下：

① 在第十师团长任中，部下虽间有罪行发生，但不属于本人责任，故无罪。

② 作为驻在武官、幕僚执行对华任务时，因当时官职较低，无参与侵华计划的证据，故无罪。

③ 任香港总督时，宪兵队员虽有罪行，由于经常告诫宪兵，本人不能负责，故无罪。

④ 但在任香港总督时，为解决粮荒问题，将 20 万居民强行疏散到外地，违反国际法，故处以无期徒刑。

矶谷在国民党要人中有很多好友，对其成为战犯嫌疑一事，中国方面也有不少的同情者，我也曾向军事法庭提出他在中国的政绩书面材料。但这一判决在列举无罪事实之余，却以细小理由而判罪，使人难以理解。

(D) 斋藤弼州的情况不仅审判极为荒唐，而且有关斋藤之无私行为以及日华友善之美谈，仅就本案即可写成一部长篇小说，简述其要点如后：

斋藤是柳泉煤矿矿长，柳泉煤矿位于江苏省徐州东北，至战争结束为止，属于华中振兴株式会社，年产煤40万吨，供津浦、陇海、京沪铁路及发电、民需等用煤，因而受到重视。战争期间，在中国大陆的各企业厂矿，均雇用当地退伍的日本士兵担任警卫，唯柳泉煤矿全由中国人组成步、骑兵防卫队，经训练后以对付匪贼。这种情况，我在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时期，曾亲自看到，我对斋藤充满自信、有胆量、在中国人当中享有威望，深为敬佩。

战争结束后，历时很久，中国军队才进驻该地。在此期间，匪贼来袭，斋藤奋不顾身，率平素信赖的中国从业人员使用自制炸药，进行防卫战斗。当煤矿接收完毕时，中国矿主对斋藤表示感谢并作为顾问暂时留用。1946年5月突然被当作战犯予以拘押，其原因主要是进驻当地的中国军队军官周麟祥向煤矿索取财物，斋藤告以除矿主外其他任何人不能染指，断然予以拒绝，因而招致不满，被虚构罪名诬告所致。

审查结果以窃夺主权的罪名，起诉书认为应判死刑，最后判决为无期徒刑。我在南京得知后，对于这一极不合理的判决不能坐视不顾，遂向中央当局提出请求再审，后经国防部法务局再审，将无期徒刑改为有期徒刑十年。

柳泉煤矿所有者华东公司总经理陆子冬由于其全部财产得以发还，对斋藤极为感谢，并非常同情斋

藤的遭遇，曾屡向当局请求免罪释放，但未获准。其后斋藤在徐州、苏州、上海各监狱服刑期间，陆子冬每月送给斋藤大量财物，斋藤把所赠药品、营养品等分给同监其他犯人。斋藤为了维护矿主利益得罪官宪，以致被捕入狱，我对斋藤的为人及陆子冬的仗义，深为敬佩。我想这是值得传诵的“日华美谈”。（审判实例仅谈及此。）

拘留所的伙食及卫生情况一般不良，据说只汉口拘留所较好。1947年10月以后各地拘留所撤销，将战犯集中于上海江湾原日本兵站的一处设施里，伙食极为恶劣，但准许往拘留所送东西。这部分战犯集中上海时，因满洲已归中共掌握，在沈阳拘留所的战犯未能集中到上海。

中国原定于1946年末全部审理完毕，结果一再拖延，直到1949年1月方告结束。

自1946年初，开始对兵团长一级进行拘留。对此，我曾向何应钦进言，责任由我一人承担，要求解除对他们的拘留，但未被采纳。结果军司令官一级（除我以外）全部归国，而师团长一级二十余人，反而呻吟于战犯监狱中。其罪状多因细微事件被居民所检举，因而对判刑怀有不满情绪者不乏其人，例如某师团长M中将的手记中，有以下一节：

在中国的高级将领有人企图逃脱战犯罪名而躲藏起来，使人难于谅解，这对官兵影响极大，至今犹有烦言。这是留下来的战犯嫌疑者都知道的。但是，唯冈村将军却不是那种人。

1946年10月25日，据联络参谋通知本班，中国政府行政院会议决定如下：

- (1) 凡属无战犯确证者，于本年底以前一律释放。
- (2) 战犯应在日本国内服刑，其实施办法将与麦帅总部协商之。
- (3) 改善战犯拘留所的设施及给养。
- (4) 冈村大将不得归国，但不拘留，仍以总联络班长名义，配属参谋若干人，于当地生活。

上述第1项理所当然，第3项并无丝毫改进，第4项以后另行记述，现将第2项有关情况概述如下：

关于战犯回国服刑一事，我辈热切希望，中国方面自1947年春即与麦帅总部交涉，但未得同意。其后中国大陆内战使国民党军节节向南退去，可能因此该司令部终于同意。1948年12月3日，当时我因病被秘密保释在狱外生活，接到决定归国服刑的通知，我立即通报狱中同僚。

当年12月8日《申报》报道：据中央社东京7日电称：“本日自占领军总部法务科获悉，在中国受审服刑之日本战犯，可能将回日本服刑。”转年1月龙佐良少将、曹士激少将相继来访，二人也均正式表明，归国服刑一事近日即可决定。

努力争取战犯减刑及回国服刑，为我应尽的义务并一直愿为此略尽微力。我自1948年11月27日因病情恶化准予保释出狱后，因活动较便，当即通过两条渠道进行疏通：一条是经联络军官吴文华→曹士激少将→国防部长何应钦；另一条是经龙佐良少将→汤恩伯上将→蒋总统。我所疏通的只是军部方面。但是，中国政府战犯处理委员会虽以曹士激少将为首，其委员会成员除军事系统外，尚有内政、外交、司法等方面委员，这些人一般主张从严处理战犯。

我和在押战犯同人的联络，狱中由菱田元四郎中将负责，通过松冈进行联系。我将内外形势告知狱中，菱田中将鉴于中国内战紧迫，表示一致希望归国服刑。我也为此积极活动，终于达到目的。于1949年1月30日，上海监狱在押战犯全部乘船归国。

1949年1月末，据上海军事法庭发表，受理战犯案2,200余件，判处死刑145件，有期、无期徒刑400余件，其余无罪送还。又据厚生省调查战犯处死及在狱中死亡者共192人。

三、中国关系战犯全部释放

汤恩伯将军曾屡次对我说：蒋主席内定伺机将与中国有关的战犯全部释放回国。

战犯被转到日本国内之后，中国政府曾一再要求仍由中国处理，但麦帅总部坚持主张战犯既经转移到巢鸭监狱，即应受占领军直接管理，不同意中国方面的要求。而中国方面仍维持签订和约时全部释放的内定方针。

1952年4月28日，日华和约正式签字，我亲赴巢鸭，与中国关系战犯11名代表会见，向他们说明中国政府内定的对战犯赦免的意图。29日《朝日新闻》报道，中国战犯将随日华和约生效而全部获得释放。

同年8月5日日中和约正式生效，于是现存88名中国关系战犯全部出狱。我与彼等家属前往迎接。6日出狱战犯代表8人，由我陪同前往中国大使馆拜访正来日本访问的国民政府特使张群，表示谢意。

当时获释的全部中国战犯，曾联名给我发来一封词恳意

诚的感谢信，全文如后。

冈村宁次阁下台鉴：

此次我等中国方面判决的战犯，不问服刑时间长短，一律提前获释，实为阁下鼎力所赐，我等全体感戴莫名。

回顾几年以来，您为营救战犯，倾注全力，尤其您以病躯顽强战斗，不屈不挠，与中国当局多方联系，尽力折冲，鞠躬尽瘁，终使我等全部获释。念及如非总司令官阁下，难有今日，对此，我全体获释人员深致铭感之意。

以上谨以书面聊表寸衷，书不尽意，诸希谅解。本应造府面谢，奈以各人归心似箭，不恭之处，希予谅解。尚祈珍重自爱，并祝愿健康长寿。专此布达，敬候钧安。

中国关系战犯全体

1952年5月30日于巢鸭

四、关于冈村的处理经过

中国事变以来，我虽未直接参与战争的谋划，但一直在中国战线先后担任师团长、军司令官、方面军司令官，最后达到最高地位的总司令官。因此，在停战初期，我自忖不仅被判为战犯，且死刑也在所难免。但几经曲折，终被宣判无罪，得以生还。如此命运实非始料所及，对此，社会上似有误传之处，现将其经过详述如下。

最初提名我为战犯的是在1945年11月某日，系由当时仅为一地方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在延安发表的战犯名单约二万多人，我被指定为第一号战犯，第二号战犯为曾任华

北方面军的多田骏大将，第三号战犯为曾任驻山东第四十三军司令官细川中康中将。

上述消息，只有当地外文报纸登载，其他中文报纸则未予转载，也未传到日本，大部分人并不知晓。

中共发表的战犯名单中，还包括很多下级军官和士兵如伍长、上等兵等，这是由于他们在华北参加过对中共的讨伐，认为问题严重而列为战犯的。此外，还列有在满洲国的、在北京的高级文官以及大会社的干部等。

苏联从满洲押走的日本军民当中，有九百余名是在战犯名单的，由中共向苏联要求予以引渡，进行审讯，这就是扣押在抚顺的日本战犯。

中共方面坚决主张把我定为第一号战犯，直到1949年初与李宗仁谈判时，还要求将我引渡共方，作为谈判的一项条件。在我回国以后，至今仍不断看到报纸上对我的责难和攻击。

在当地对我个人的战犯问题，是从1945年12月初提出的。然而关于战犯问题中国方面特别重视战争中日军的暴行，其中重大事件有南京战斗等四处。我虽始终在中国战线工作，幸运的是这四处的战斗均与我无关。战争结束后，据由重庆来南京的旧友透露，重庆方面一些我的友人，都为我庆幸。

1945年12月1日，中国报纸第一次报道有关我的消息。何应钦在重庆接见记者时宣称：“总司令官冈村将与原总司令部人员同时回国，由盟军进行审判”。翌日共同社报道，“冈村将作为战犯遣返”。

1946年2月12日，何应钦总司令部参谋钮先铭、曹士澂两少将，王武上校三人来访，传达何应钦的口信如下：

“最近中国报纸刊载何应钦谈称：冈村大将将作为战犯予以逮捕的消息，与事实不符，应予更正。并指出：战犯系由政府决定，与总司令部无干，但对努力配合接收工作者，总司令部将建议政府不以战犯论。政府是否采纳尚难逆料”云云。

其后有关我个人的战犯问题，在中国政府和军部内进行过多次讨论。1946年6月下旬，联络参谋透露会议内容的片断如下：

- (1) 1946年4月22日，在某次会议上，何应钦将军曾列举许多理由，为冈村免罪，蒋主席虽表同意，但指出要考虑政治方面的策略，研究处理办法。
- (2) 6月25日，在战犯审理会上国防部二厅王处长建议，可任冈村为总联络班长，留驻南京，与会者多数同意。
- (3) 最近参谋总长陈诚曾向蒋主席建议，冈村在战争结束后功绩显著，应予宽大处理，如此对将来中日关系亦属有利。蒋主席默不作声。

我虽然听到这些消息，但面对中将以上均被拘留，其中部分人员已因战犯嫌疑而被逮捕，因此决心服罪的初衷不为所动。

1946年7月2日，作为联络班长留驻南京以后，中国方面联络参谋仍经常来访。

7月21日据联络参谋传来的消息，前述参谋总长陈诚有

关对我的处理意见，最近已书面正式上报蒋主席。大意谓，作战犯处理的问题暂且不论，但担心同盟国要找麻烦，估计归国问题也有困难。

总之，中国政府特别是军方对我深表同情，为回避国际和群众的责难，可能采取等待时机的态度。

1946年9月《中央日报》刊载，战犯处理委员会负责人回答国内外记者询及何时拘留冈村问题，解答如下：

“冈村本系日本战犯，但自日本投降以来，在维持南京治安、协助我政府接收以及受降工作上，成绩显著。目下仍任联络班长，工作尚未结束。何时对其拘留审理，委员会现正研究中。”

有关我的拘留问题，政府发言人往往在国内外记者面前难以解答。对此，每次均使我感到内疚。

10月14日，据中国联络参谋谈，联络班预定在年内撤销归国，但如让我归国，估计被美苏等盟国方面指定为战犯的可能性极大，因此，内部决定让我一人继续留住中国，究竟如何处理，现正在研究中。

10月25日，据联络参谋称，最近政府行政院会议决议，其中一项为对冈村既不令其归国，亦不予以监禁，仍以联络班长名义留住南京，并配属参谋若干人。

1946年11月23日，国防部与我商谈以下问题。

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美国方面）要求我和松井太久郎中将出庭作证，中国方面拟以我的工作未了、健康亦有问题为理由，予以谢绝。如将来再三要求，不得已必须去东京时，中国方面对我的一切应负全责，拟采取作证完毕后仍回中国的方

针，答复美方。问我是否同意。

我回答：一切听命于贵方。

1946年11月29日，王俊中将通过今井少将，向我传达国防部长白崇禧上将口信如下：

现已决定，冈村最近不和联络班同时归国，因其已被列入东京战犯名单，一旦归国，恐将引起国际问题。如在现地审判，则考虑到民众的反感和国际影响，又难于从宽处断。因此对外仍以联络班尚有重要工作为理由，使我继续留在现地以待时机的缓和。

当年12月5日报载，彭学沛宣传部长在接见中外记者约二百人时，就我的问题问答如下：

“问：冈村宁次现在何处？俘虏遣返已毕，他现况如何？是否给政府工作？”

答：冈村现仍以联络员身分，协助处理遣返日俘、日侨未了事宜。因目前在中国国内仍有部分日本军民和征用的技术人员尚未遣返完毕，此外，宣判无罪的战犯亦必须遣返回国。”

针对上述消息，12月9日上海《大公报》发表合众社延安7日电如下：

“第一号日本战犯冈村宁次，对中国人民犯下烧杀掠夺等严重罪行，而蒋主席却待如上宾，为此正受到延安的责难。又据《解放日报》载：‘宣传部长彭学沛，所以声言冈村作为联络员协助遣返日本军民，正是冈村在南京享受此待遇的证据’”。12月中旬上海共产党报纸还刊载我接受联络员任命的漫画。1946年12月22日，东京电台广播，“过去以联络员身分留在南京的原陆军大将冈村宁次，经蒋主席同意，近期即将来东京

国际法庭作证”。此系传闻之误。

同一天《中央日报》报道如下：

“东京国际法庭向中国政府要求冈村出庭作证一事，国防部尚未同意，据悉蒋主席仅批准松井前往东京出庭作证。实际上，松井也未出庭。”

当时中共方面的报纸经常登载对我责难的报道，1947年2月21日南京《新民报》以“欢送冈村宁次”为题登载曾在太原恣意杀戮、罪行累累的冈村，任务终了竟被欢送归国的讽刺性报道。因此，国防部二厅为了更正这一消息，让我提供资料。我即提出当时的日记，以证明此事并无根据。

1947年4月10日，《大公报》刊登该报记者“日本考察记”一文，文中列举日本人感谢中国宽大方针之事例，记述了当时日本的情况，内有以下一节：

“有的日本人认为，以德报怨的宽大方针，施于战犯是否妥当。如冈村宁次身为侵华军的总司令官，乃理所当然的战犯，如此战争祸首，竟得免罪遣返，遗留下军阀的祸根，实属有害于民主主义的发展。还有京都《朝日新闻》记者山本向我询及冈村受优待的情况，当时我曾答称在监禁中。但我回国后，探问究竟，方知冈村尚未起诉，周佛海也得到减刑，并未处死。”

1947年4月30日报载：宣传部长董显光在接见中外记者约三百人时问答如下：

问：（外国记者）冈村的联络员工作想已结束。他究竟属于战俘，抑或作为战犯进行审判？他身边尚有参谋几人？

答：冈村作为联络班长，其投降遣返工作仍未结束，估计

尚须数月。至于冈村本人的战犯问题，有待日后决定。

5月10日《大公报》载：

据南京专电，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谈，相信冈村于联络班任务结束后，应移交军事法庭审理。

6月17日

王俊中将来访，传达国防部长白崇禧口信如下：

根据国际情况，以暂不归国为安全。为了敷衍舆论，也可能移交军事法庭审理，但审判只是走走形式而已。这和小笠原参谋月初由国防部听到的消息是一致的。

6月19日

《大公报》载：

冈村宁次的命运，将于数月内决定。

(合众社南京18日电)据宣传部长董显光谈称，冈村目下仍为首席联络员，协助中国政府从事遣返工作。其命运将在数月内决定。

有关我战犯身份问题，中外记者屡屡提出质问，中国当局总是苦于解答，我也于心不安。但是，提问者均为外国记者，刊载此类消息的是外国和中共的报纸，政府及国民党系统报纸极少报道。

最近据悉：东京军事法庭再度照会冈村、松井已病愈，要求他二人出庭作证，中国政府再次予以拒绝。同时谣传，冈村现在江北指导对共军作战，为此，中外记者团要求向联络班进行采访调查，国防部予以拒绝。

1947年7月5日，国防部二厅曹少将向小笠原参谋透露：“对冈村的审理，争取于九月以后进行。由于蒋主席、白崇

禧国防部长、陈诚总参谋长、何应钦将军等对冈村在停战后的工作甚为感谢，审判只是走走形式，毋庸挂虑，但归国时机，以在和约签定后为宜。”

据中国方面告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已将我和松井列入战犯名单。

于1946年末各地联络班撤销后，仅南京一地由我和另外二、三人仍保留联络班名义。不难理解，这是由于中国方面为了拖延对我的战犯问题进行审判而采取的措施。但鉴于国内外形势，联络班也不可能长期保留下去。直至1947年10月7日，联络班宣告结束。于是只剩我孤身一人。不久，肺结核病发。

近来病情忽好忽坏，中国方面劝我住院治疗。但我认为，二百万军民已遣送完毕，如今一身轻松，手头有药又有医书，故想不如在自己的住处静待运命降临为宜。因此从未就医，这样度过了1947年。

1948年2月初，国防部二厅拟令我转地上海治疗，而最高首脑鉴于远东国际法庭的审理工作将于4月结束，决定让我4月以后再行转地疗养。由此可见，中国方面的方针，似乎是要等国际法庭4月分审理完毕再对我进行审理。

1948年2月16日，接总参谋长命令，指示即使只我一人，也要把联络班长名义保留到4月下旬，我想这也是根据上述方针决定的。

当年3月29日夜，我离南京，自30日寄居于上海某氏邸，由中山高志博士为我治疗，等候审判。我在上海的寓所极为秘密，新闻界人物均以为我在上海战犯监狱，或监外就

医。实际早由总参谋长训令淞沪警备司令对我进行监护，便衣人员经常出入寓所担任戒备。

中共报纸已半年不见有关我的消息，但自1948年5月末又不断出现对我的报道。近来中国报纸版面充满“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等舆论，《新闻报》的有关评论主张严惩战犯土肥原、板垣、冈村。并报道说，学生反对美国扶植日本运动的六个口号之一即为：反对任命侵华日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为顾问。

1948年4月已过，东京的军事审判仍未结束，中国政府内部由于中国军事法庭也接近尾声，不能不着手准备对我的审判。据国防部的联络人员称，将于五、六月分进行。但7月5日战犯军事法庭派人来访，面交了国防部长何应钦7月1日给庭长石美瑜的训令副本。内容如下：

1. 冈村宁次病已痊愈，对该俘的战俘嫌疑部分，应立即开始审理。
2. 根据规定进行，随时报告情况。
3. (略)

7月7日，战犯军事法庭检察官发出传票，令我于12日上午10时到法庭受审。

7月8日，国防部二厅联络军官吴文华来访，传达何应钦国防部长的安排，即在东京国际法庭结束之前，对我进行审理，开始审理的训令已经下达，并口述以下各项：

(1) 训令中所谓病已痊愈，乃是为了病中可拖延审理，法庭将根据病情斟酌行事，为此速向法庭提出诊断书为好。

(2) 蒋总统也同意开始审判，并已指示要从轻处理。

(3)作为被告理应拘禁于战犯监狱，但因病中疗养或以移住于京沪医院为宜，此事尚在研究。

(4)关于保释问题，届时法庭当有指示。

停战以来，我一直认为，作为战犯而受审的日子势必来临，现在终于来到了。然而二、三年来对于中国政府及军方的领导层所给予我的关照和好意，更使我万分感激。

7月10日，中山大夫向法院提出了我的诊断书。

7月12日，我按传票指定日期，由松冈和翻译刘季坪陪同，于9时20分到军事法庭候审。10时半，由施检察官对我作战经历以及与之有关的部下之不法行为等有无责任问题提出质问。我想部下犯罪纵属事实，也是下层发生的零星不法行为，与军司令官、方面军司令官、总司令官无关，不属于共同责任犯罪问题，虽然如此，我仍应承担道义上的责任。我据此做了回答。大体上似乎没有我个人的犯罪事项，法庭调查达一小时之久。

其后，石庭长、施检察官和刘翻译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辩。事后据刘翻译谈，石庭长等认为，既已成为被告，其健康状况良好，应即移往战犯监狱监禁。而刘翻译坚决主张现寓所乃国防部所指定，除非该部指示，断不能擅自离去，双方争持不下。最后由国防部和石庭长协商，准予申请保释。

7月18日，吴文华来访，为我起草申请保释书，由松冈代为抄写，于19日向法庭提出。

7月23日，军事法庭派来京沪医院的朱院长，由中山博士陪同前来对我诊断。结果朱院长拒绝为我担保。又过数日，才找到钱龙生律师（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为我担保。8

月2日，法庭同意保释。同日法庭将对我的起诉书送来。其内容是，在总司令官任内应对第二十三军、第二十七师团、第一百十六师团、第一百六十四师团、第八十九旅团等所属兵团的官兵犯罪行为负连带责任。只此而已。

我在中国四度担任军司令官职务，但与有名的几个暴行事件均无关系，也未曾参与战争决策，构成犯罪事实的，也只能有连带责任。

8月3日，各报均刊出起诉书全文，并报道遣返工作虽已完成，但我患肺病正疗养中，现病已稍愈，即将开庭审理。

8月9日，国防部吴文华来访，告知，石庭长向国防部长提出“冈村应扣押于战犯监狱，于该处就医”的申请，业经国防部批准。

翌日，石庭长突与吴文华来访，表明来意如下：

今天未受任何人指示，完全以个人资格来访。

带病入监，当很痛苦，然迫于形势，经与政府当局协商，只好如此，希能谅解。监内住处我已看过，可独居另室，医师来治疗及送进营养品均可自由。万一病情恶化，仍可申请保释。在此期间尚望安心保养。入监时间定于14日退庭后，由法庭直接前往，希有所准备。

对此，我表示感谢，同时并要求对一般战犯进行公正审判。

根据训令我于8月14日(星期六)出庭受审。

8月11日，各报报道如下：

为公审冈村，将于23日特设临时宽阔法庭，届时将有驻上海各国外交官及各界要人等一千余人旁听，并有

英文翻译，预审于14日进行，预审后立即监押于战犯监狱。（注：一般认为我仍在某医院疗养中。）

8月14日，由松冈伴同到法庭候审，9时石庭长开始预审，约30分结束。待我离开法庭刚到走廊时，等候着的中外记者、摄影记者约百余人围拢上来，纷纷提问，直到休息室，仍有二、三十名记者紧跟不放。到十点半钟，才离开法庭登上大卡车，此时尚有记者数人，一同乘车继续提问。

停战以来，我一直成为新闻界的话题，但直到今日，才能见到我本人，难怪记者如此纠缠。他们提出了大量的问题，大都是有关中日外交的前途、中国领导人和我的关系，以及有关我的谣传的确否等，但询及起诉内容者却很少。11时才到达高境庙战犯监狱。

我原来希望和已入狱的很多部下一起坐监，但为了向中国政府特别是军部内旧友求情，以求减轻在监部下的罪刑，早日回到故国，只好忍心留在狱外。这种思想矛盾很为苦恼。今日入狱反觉安心，夜里睡眠很好，也未发烧。

原来只有钱龙生律师一人担任我的辩护人，后来国防部又委托第一流律师江一平、杨鹏两位为我辩护。8月18、20两日，三位律师曾先后来访，作了有关的调查和了解。据谈，外间对我的舆论，同情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但后者多为中日提携论者。

8月22日典狱长孙介君来我居室，由斋藤弼州翻译，探问病情并密谈如下：

“先生前在塘沽协定时和在停战投降时，均未采取对

中国不利的措施，中国有识之士均甚嘉许。

蒋总统本无意使先生受审，然考虑国内外的影响，不得不如此。但绝不会处以极刑。至于无期也好、十年也好，结果都一样，请安心受审。在受审时，对中国民众所受灾难，要以表示痛心为宜。判决后可根据病情请求保释监外疗养，无论是审理和入狱只是形式而已。”

8月23日，公审之日终于到来，8时我和证人落合、菱田、船引、梨冈各兵团长，同乘囚车离开监狱，8时30分到达塘沽路市参议会，进入候审室休息。

9时30分公审开始，旁听者千余人，外国人也不少，座无虚席。上午由检察官宣读起诉书，对被告及证人进行庭审，中午休息三小时，午餐是丰盛的中国菜。证人们对此大为满意，审讯中与我无直接关系时允许坐在旁边椅子上，候审室专为我备有大扶手椅，如此周到照顾，感激莫名。

下午3时，继续公审。首先由江一平律师对证人进行质问，继由王检察长宣读有罪论证。对此江、钱、杨三辩护人进行辩论。法庭呈现紧张场面，下午6时30分，庭长宣布庭审结束，改日再审。我等于7时20分回监。

今日的公审，是考虑到对民众和国际的影响，是一次大型公开展览。然而在此情况下，辩护人敢于大胆为我辩护，令人感激，尤其江一平律师不顾其父反对，毅然出庭，并列举我在华北任方面军司令官时期为供给农民棉布、打击奸商等事例，为我辩护，使我永铭肺腑。（1961年6月我去台北曾经访江一平及石美瑜表示谢意，据说杨鹏、钱龙生二人当时在中国大

陆。)

次日 24 日孙典狱长前来慰问，他透露说：“对先生的公审判决的时机政府内部有两种意见，外交部方面主张等待国际上对其他方面的战犯判决后，斟酌情况再作判决为宜；而国防部方面则主张从速判决。因此，只得请示蒋总统才能决定。下次公审可能是继续辩论，是否立即判决尚未定。”

今日徐军法局长来监视察，并说：何应钦国防部长嘱我问候先生病情。

今日各报对我昨日受审情况均有报道，其中有的对政府进行激烈抨击和讽刺说：拖延三年今始作戏剧性审判，实不光彩。莫若及早宣告无罪！

8 月 26 日《申报》载有如下消息：

由于证据不足，审判可能延期。经费也不足，正在申请中（8 月 23 日审判所需经费达法币 30 亿元）。

军事法庭对外电传说冈村将送交东京国际法庭一事，发表谈话称：“冈村并未参加日本侵华的中央系统组织，其犯罪仅与在中国战场上发生的事实有关，因此当然不须送往东京处理。”

据 9 月 1 日《东南日报》载：对我的第二次公审将于本月中旬举行。又日前公审时记录影片将分送世界各国。

9 月 11 日孙典狱长透露，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将于 10 月以后结束，因此对我的公审势必推迟。

10 月 11 日孙典狱长又来我住室说：“最近去南京面谒国防部副部长秦德纯及二厅副厅长曹士澂少将，对先生病情均颇关心。他们认为，现在情况与前不同，社会上众目注视。此

时，以在健康许可范围内在狱中静候宣判为宜。并说一般认为，对先生的宣判以等待东京军事法庭结束后再作处理为有利。

在狱中虽有中山医学博士常来治疗，并不断得到营养品，但病情仍趋恶化，10月中旬，并发心脏病及腹泻等症。11月13日中山博士开出诊断证明，建议监外就医，并由监狱诊疗所朱所长向国防部提出入院治疗的申请。27日石庭长来监，同意临时出狱，公审延期30天。于是在国防部吴文华陪同下当日出狱，但所去之处，并非医院，仍为以前的隐蔽住所某氏私邸。

11月28日，据悉：数日前由何应钦部长、秦德纯副部长、曹士澂二厅副厅长、司法行政部长、国防部徐军法局长以及石庭长等举行会议讨论对我的判决问题。会上何、曹主张无罪，但司法行政部长则主张参照舆论并与东京军事法庭量刑一致，以判处无期徒刑为适宜。因此，议而未决，只好请示蒋总统。

11月30日，汤恩伯军参谋龙佐良少将来访，谈话中有如下一段：

约一周前，汤恩伯将军面谒蒋总统，力陈冈村、松井太久郎在停战时有功，应令松井立即归国，对冈村应判无罪，蒋大致同意。事为何应钦得知，何认为松井可令其归国，冈村必须考虑舆论及国际关系，未便立即宣判无罪，应徐图善策以待时机。

12月5日，松井乘船归国。

我临时出狱，极端保密，直到转年1月末回国前，新闻界及一般市民似均以为我尚在战犯监狱中。

我的病情，虽有中山博士的热心治疗，出狱以来一直卧

床，到1949年1月中旬，才能行动。据说，1月20日法庭书记前来探问病情，因预定近日即将公审。

当时局势紧急，1月22日蒋总统辞职，副总统李宗仁为代总统。23日龙佐良少将来访，告以南京情况，据称在对中共政策等问题，国民党内矛盾重重，无法收拾，蒋总统不得已终于辞职。但是，汤恩伯将军仍担任上海地区警备。并附带告诉我，对我的审判，仍按预定进行。

1月24日，接到公审传票，预定1月26日上午10时开庭。

25日军事法庭副官郭新夫来访，因法庭在四层楼上，特来察看我的病情。国防部吴文华来电话称，曹少将也恐我不能上楼，问我明日出庭是否需用担架。我答称可以走路，请向曹少将致谢。

何应钦、汤恩伯两将军，曹、龙两少将，吴文华上尉以及法庭的各位，不念旧怨，对我关怀备至，情实难忘。

1月26日，对我进行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公审。

9时30分与龙佐良少将及松冈同乘军事法庭派来的汽车（特地选派战犯监狱里的日人金子为司机）前往法庭。

10时开始公审，此次事前并未公布，今晨报纸始发表消息。法庭甚狭小，规模与去年8月23日公审大不相同。上次的特别大法庭旁听者千人，并有外交使团参加；此次公审，旁听席只有新闻记者20余人，特邀辩护律师迟到，只有钱龙生律师一人。

开始要求被告对检察官论罪理由进行申辩，我只答以同意各辩护律师的申辩，继由钱律师作简短补充申辩，然后石庭

长再次问我有何最后陈述，我当即表示对法庭审判无任何意见。但对由于日本官兵的罪行给多数中国国民造成物质、精神上的灾难表示歉意，同时对因病推迟审判造成工作困难，表示感谢。至此裁判长宣布公审定于下午4时宣判。在退往休息室时遇到前来受审的樱庭少将，让他传达重要口信给联络者菱田中将，得此机会深为庆幸。

下午4时开庭，在宣判樱庭少将无罪、伊藤忠夫无期徒刑后，对我宣判要点如下：

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决（民国三十七年度战审第二十八号）

公诉人 本庭检察官

被告 冈村宁次 男 66岁 日本东京人
前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官 陆军大将

指定辩护人 江一平律师

杨 鹏律师

钱龙生律师

对上述被告因战犯案由本庭检察员起诉，本庭判决如下：

主文

冈村宁次无罪

理由

构成战争犯罪的条件是：在作战期间，犯有恣意屠杀、强奸、抢劫，或阴谋策划违反国际公法，以及支持侵略战争等罪行。此为国际公法及我国战争罪犯审判条例第二、第三条所明确规定者。

本案被告于民国 33 年 11 月 26 日接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所有长沙、徐州各会战中日军之暴行，以及酒井隆在广东，松井石根、谷寿夫等在南京的大屠杀事件等，均系被告到任以前发生之事，与被告无关。

被告在任期间，我军作战大有进展，日军陷于孤立，战意丧失。日本政府正式投降后，被告立即停战，率百万日军奉命投降。在此期间并无上述条款之罪行，只因身为敌军总司令官，而被列为战犯嫌疑犯。

被告在任期间，驻湖南、江西、浙江等地之日军曾发生零星罪行，已由该驻军直接上级落合甚九郎、菱田元四郎等承担罪责，本庭已分别判罪，现在服刑中。以上零星罪行无以证明与被告有联系，因而不应负共犯罪责。

综合以上各项，依法应判为无罪。

根据以上结论，按战争罪犯审判条例第一条第一项、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项，判决如主文。

中华民国 38 年 1 月 26 日

审判长等人署名盖章

宣判结束后，记者们为这意外判决涌进庭长室叫嚷起来，我原拟向庭长致谢，但被拒绝会见。此时聪明的法庭副官向我耳语：宜乘此混乱时机从后门走脱为妙。我乃与松冈从后门走出，徒步返回寓所。

关于对我的判决，军方以外各方面有的主张判无期徒刑，石审判长曾拟判徒刑七年，我自己也希望如此判处。这样，表面上也好，实际上因有种种条件即使服刑也几等于零。今天

判决无罪，我想主要是以何应钦国防部长为首的军方要人，尤其是汤恩伯将军强硬主张宣判无罪的作用。

念及我一人无罪，而旧日部下二百余人尚在狱中，实觉寝食不安。所幸已经内定所有战犯将送回日本服刑，且经蒋总统批准等待时机即全部释放，唯有盼其早日实现而已。对我的战犯问题，中国政府特设联络班，安置我担任遣送工作，借以推迟入狱时间。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将我列入战犯名单，传我到庭作证，中国政府借口有病予以拒绝。以后因等待东京军事审判的进展，并考虑国际关系及舆论动向最后才使我入狱，随后又因病情恶化准予秘密保释，恢复狱外生活，以迄今日，终于判决无罪。除对中国政府、蒋总统、国防部各位将军的一贯好意永志不忘外，并愿病愈之后，献身于日华友好，以酬宿愿。

1月28日上海各报纸，均大登特登判我无罪的报道，除中共方面的《大公报》认为判决太轻有所责难外，其他各报则均未加评论。据云一般市民反感不大，甚至还有说好的。

注一：汤恩伯札记摘要：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译注）对冈村宁次大将进行审判时，正值华北局势恶化，共产党对此审判也极为注意。在国防部战犯处理委员会审议本案时，行政院及司法部的代表委员均主张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我从反共的见地出发，主张宣判无罪，并要求主任委员、国防部副部长秦德纯，特别是何应钦部长出席参加审议，结果我的意见获得胜利，并经蒋总统批准。

札记并从政策、法律观点加以分析，阐述了日本人、中国

人及中共对冈村的见解,认为法律上构成战犯的两项条款,即支持指导侵略战争或作战中有不人道行为,均不适用于冈村,可告无罪。即使法律上构成犯罪,鉴于当前国内外形势,从政策上考虑也宜宣判其无罪。

此外札记还论述了,为了贯彻对日宽大的方针,应将既决战犯移交日本服刑的必要。

注二:汤恩伯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极端亲日。战争结束后汤负责上海地区的接收工作,为日本人尽心竭力,十万侨民深为体谅和感谢。

我和汤作为军司令官曾有四次对战的机缘,战后相见,宛如故交,十分亲密。

和平实现后,汤曾三次来日,从羽田机场到达旅馆后立即前往明治神宫参拜。他就是这样亲日派,在日本曾受到多数日本官民的盛大欢迎。1954年6月汤来日本医治胃溃疡,住在庆应医院,手术结果良好,但在恢复期间,突然死去,原因不明,甚为遗憾。在东京为他举行了盛大的葬仪。

1961年6月25日,我曾到台北市西郊的小山上拜谒过汤恩伯将军的墓。为了中日合作,失去此人实深惋惜。

第八章 总联络班时期日记摘抄

前 言

1946年春，在撤退的尾声中，由于战犯问题和其他工作，申请在各地留下联络班，最初未获批准，后在5月30日，终于允许在北平、太原、青岛、上海、南京、汉口、广州、台北等八处留下联络班。条件是各班不得超过十人，期限到本年末保证回日本。各地军参谋均愿留下，因而顺利组成联络班，唯上海地区军参谋无一人愿留，因此，以总军参谋为骨干，组成该地联络班。

各地联络班的干部如下：

南京：今井总参谋副长、宫崎、小笠原两参谋、伊藤

军需少佐、二宫军医少佐。

上海：延原、高桥、相山、安崎、日高各参谋。

汉口：西冈、青木两参谋。

北京：笹井、永山两参谋。

太原：山冈第一军参谋长。

青岛：寒川参谋。

广州：井上参谋。

台北：秋山中佐。

随各地军民的撤离，从6月中旬到7月初，各地联络班开

始工作。

7月2日

早晨送走总司令部最后撤离的官兵及文职人员约390人，9时许与坐最后一辆卡车的小林总参谋长等幕僚告别，随后我乘汽车回金银街的总联络班宿舍。

在鼓楼西，原大使馆西方约四百米处的田野中，有四幢两层木结构的住宅，其南侧两幢为原日本大使馆所租用，作为机关宿舍，现由联络班继续租用。

在匆忙转移中，由于昨日以来大家彻夜劳动，搬运联络班所需物件将近一半，今日又忙碌一天始将所需什物全部搬完，但还需要几天的整理。

重新雇用了中国厨师、女仆三人。

7月3日

在食堂共有15人会餐。

南京总联络班的人员如下：

班长：今井武夫少将

宫崎舜市中佐、小笠原清中佐、伊藤武雄军需少佐、二宫重通军医少佐、冈田嘱托（翻译官）、三石大尉、铃木大尉、丸山准尉、大野（司机）、伊藤（司机）、杉浦（今井少将的勤务员）。

冈村大将、米满副官、新盛（冈村勤务员）。

中国方面联络军官 黄金发少尉。

7月5日

整理宿舍内部，修理门、墙院等，大家忙得很。中国政府征用的特情关系军属三人，来此为本班修理电气器材及收音

机等。

因何应钦将军去美，原拟会晤致谢，约三周前提出请求，但何在数日前到各地公出，回宁后公务甚忙，已于昨日出发，因此失去问候的机会。

7月6日

办交涉、提申请、向拘留所送东西，由于这些事务，外出人员很多，班员相当忙碌。我没有可办的事，每天生活是读书、庭院散步、下围棋。因留下许多书籍，各部门各学科的都有，我特别阅读了有关宗教、文学方面的书籍。

二宫军医少佐和米满副官同来我的房间，说明前者在二月间检查舌部外伤的结果，为结核性的，验痰结果也是阳性，已确诊患有结核病。由于平素身体健壮和年事已老，病症不会发展，希望多加保养，并讲些摄生方法。

我听了之后并未感到惊恐。由壮年时代即不断苦练身体，到了这样年纪是不致被结核菌所缠倒的。但是应该避免传染给年轻勤务兵新盛，所以对青少年要特别注意。从今日起，午、晚饭单独进餐。

据广播报道，在东京军事法庭上，田中隆吉少将出庭作证揭露满洲事变的历史。

7月7日

上海的延原大佐来访，报告了当地的状况。

总司令部下余人员、病号等最后一批几乎全部乘船归国，但高级将领、宪兵等约1,300名被监禁。因此，希望加强那里的联络班，延原自己也坚决要求留下工作，对此要求，我同意了。

接国防部6日训令，任命我为南京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班长，领导各地联络班工作，担当征用俘虏的任务。

但据中国方面联络参谋说明，南京总联络班长已确定为今井少将，在此期间必须为我安排某些任务，因此，国防部下达了上述命令。

7月10日

请来鼓楼的理发师，为全体班员理发，决定今后每月理两次发。

改建大门，新建汽车库，修理院墙、房舍等工程已全部完工，费用计100万元，据说系以所存30大袋稻米作为代价支付。

7月11日

从两、三天前规定的作息时间表如下：

起床：7:30 早点：8:30 办公：9:00—12:00

午饭：12:30 办公：15:00—17:00 洗澡

晚饭：19:00 息灯：23:00

7月13日

9时到国防部，会见第二厅曹士澂少将、陈昭凯上校，由他引导与陈诚参谋总长会谈。我向中国方面表示感谢，日本二百余万军民能于很短时内回国，皆中国方面尽力援助的结果。此外托付了几件善后工作。陈参谋总长表达了对将来中日合作、日本复兴等问题的善意。会谈约50分钟，他为人温和，使我发生好感。陈总长就时势问题说了下面一些话：

(一) 停战时，对日本军在中国战区的正确立场表示敬意。

- (二) 除去希望留下的人以外,一定全部使之归国。
- (三) 对于希望留下的人,考虑国际关系,拟以征用名义使用。
- (四) 战犯问题,考虑群众意见,是不得已而为之,希望谅解。
- (五) 各地联络班,可与各地受降主管部门进行联系,毋庸顾虑。

7月15日

上海联络班的嵇山中佐来此报告当地情况。

我为消磨时光,开始自学中国话。

7月16日

去秋与延原大佐共事的刘上校将去日本,行前到此辞行。
该上校是我好友刘玉书的外甥。

7月21日

黄瀛少将、陈昭凯上校来访闲谈。

7月25日

从上海转来两封书信。一是福田良三海军中将领的离华告别信,再一个是野竿由日本寄来的明信片。

7月27日

邀请一向担任联络工作的陈昭凯参谋和王亮联络员会餐恳谈。

7月30日

班中饲养的山羊在昨夜被偷走,在此之前也遭受过小的盗窃之害,但这样大的东西被盗还是头一次。

7月31日

今井少将为视察联络工作前往上海。

青岛(细川军司令官、寒川参谋长)、太原(山冈参谋长)的两处联络班开始来信进行联系。

8月2日

由于铁路不通,小笠原参谋出差徐州延期。今日接到徐州战犯拘留所膳所大佐关于被拘禁惨状的报告,心情十分沉重。

8月3日

招待南京拘留所长陈少将、杨组长、金翻译吃晚饭,感谢他们合情合理的管理,并恳请今后给予关照。

8月4日

今井少将归来,据说上海尚留有相当多的日本军民,情况复杂。

夜晚黄瀛少将来访闲谈。

据闻战犯嫌疑犯拘留于巢鸭的谷寿夫、矶谷廉介两中将,由盟国方面引渡中国,一日由空路来到上海。

8月5日

据传在日本由于粮食困难,人民穷困达于极点,而我等如今却仍享用营养相当丰富的食物,确属过分浪费。但念及病情需要营养,对我则是幸事。

8月7日

汉口联络班的伊藤大尉、小山嘱托,前来联系。

8月8日

小笠原参谋、铃木大尉、黄金发少尉一行,为联系战犯嫌疑犯及征用者问题出差徐州。

8月12日

据昨夜归来的小笠原参谋报告，在徐州战犯拘留所及军法处，给被拘留者戴上手铐、脚镣等，十分惨酷，当即向国防部提出抗议。

据说该地至今仍有一些残留日本坏人胡作非为。

8月14日

以特情关系被征用的松岛、中村、多贺谷、山下等七人，明日将转调徐州，前来辞行，委托他们与徐州战犯联系并送东西。

8月15日

前留汉口办理善后工作的第六方面军经理部小田部大佐，带领军民约40人，乘船经过南京归国顺路来访，并报告了汉口情况等。该地战犯拘留所对待战犯嫌疑犯情况很好。

8月17日

大概为纪念胜利一周年，从前天到现在市内鞭炮声不断。

8月20日

对酒井隆中将开始第二次审判，总联络班派人前去旁听。

8月23日

宫崎参谋、伊藤军需少佐、铃木大尉一行，为联系工作去上海。

8月24日

国防部第二厅林少将来访闲谈。

东京广播，众议院通过了宪法。

来此后无事可作，读了许多书籍，感受最深的是居里夫人传。她的伟大天才，超人的努力，知识的渊博，以及安贫的高

洁精神等，令人感佩不已。

8月26日

审判无罪释放的某日人，于昨日前来投宿。

8月27日

宫崎参谋一行从上海归来，据他报告上海集中营里的下级军官及士兵思想逐渐恶化。又据偶尔由日本来上海的人讲，内地极度缺乏粮食，人民生活非常悲惨。

酒井中将被判死刑，呜呼！

8月29日

今天是“接见日”，我请铃木大尉去战犯拘留所，将写有慰问辞的名片及以前保存的御赐酒一瓶还有其他物品，送与酒井中将。又对本联络班参谋人等新的征用问题开始进行内部商谈。此次征用，将与已经留用的土居明夫中将及战争结束时由泰国跑到重庆、被当地征用的辻政信大佐一起工作。

8月30日

由黄少将介绍国民党党部的六、七名青年来此，据说特来观察日本人的生活状况，以增长见闻。

9月2日

今井少将访问战犯拘留所归来，带回酒井中将给我的书信。酒井的决心实在令人佩服，我也放心了。

从东京广播听到麦克阿瑟元帅的降服一周年纪念声明。虽有中肯之处，但对日本人认识也有不足之处。

9月6日

接到电话，在上海疗养癌症的坂西一良中将今天死去。在临死之前，曾经申请允其提前回国，但未获批准。

电报获悉，拘押于广东的数百名宪兵已被释放。

在工作中穿军服有些不方便，班内全体工作人员决定制做西服及大衣，从市里找来西服裁缝，想不到原来是位娶了中国妻子、未经正当手续留下来的日本人。在广大的中国国土上，近百年以来，象这样的日本人到处皆有。

9月8日

曹士激少将来此谈话。

在联络班住宿的联络军官黄金发少尉，请假回台湾探亲，由吴文华上尉来此暂代。

今天接到很久未来过的家信，是6月12日寄出的。

9月9日

今天的报纸，全部内容皆歌颂国父孙中山起义五十周年，很少有记载胜利一周年的报道，对此很感意外。

9月10日

今天是中秋节，吃着月饼赏月。

9月11日

中国大陆及南方地区军民，已有80%以上回国，但苏联地区及满洲方面的撤离情况如何，现在消息不明。此种违反波茨坦宣言的情况，何以未引起国内舆论重视？正在为此纳闷，今天由广播听到，东京发生了示威运动，催促苏联遣返四千日本军民家属。这是很自然的。

9月13日

接到军事法庭通知，酒井中将于今日下午3时在雨花台执行死刑。无限感慨。

9月14日

从战犯拘留所领回酒井遗物，在班内空房设置简单的祭坛，供奉其灵位，全体班员一同守夜。

9月15日

今井少将等数人，前往雨花台，为酒井中将遗体正式埋葬。

9月20日

整日闲暇，除读书外无事可作。已阅读了数十部文学书籍和小说，现在上午阅读禅及其他宗教书籍，下午阅读历史著作。早晨照旧自学华语。

9月23日

被征用的池田翻译官的助手山崎（女），因已解除了征用而来此，拨给她一间房居住，使她担任勤杂工作。

9月24日

写信回复日前收到的家信，试交中国方面请代为寄往日本。

注：此信在12月18日寄到家中。

10月5日

8月1日移送上海的谷寿夫、矶谷两中将，于3日转送此地，收容于南京拘留所。

10月7日

黄金发少将回本班。

矶谷中将为我同期好友，异常挂念，闻他尚无冬装，乃赠与绒衣裤一套。

10月9日

吴文华离去。

10月11日

在东京的中国代表团工作的王武上校，回国联系工作，顺便来此，谈到日本内地的状况。

10月15日

被征用的原第十三军参谋长土居明夫中将来谈。

10月17日

东京的中村雅郎、野尻德雄两氏寄来明信片。这是归国人的第一封信。

10月19日

战犯嫌疑犯清水广军曹病危，于14日经军法处批准接到联络班，虽经过二宫军医官等人的热心医治看护，终不见效，今早死亡。经各机关检视办好手续，11时入殓，并为之守夜。

10月20日

晨5时30分与大部班员一起将清水的棺木运到金银街北、约三百米处公墓埋葬。

青岛的战犯嫌疑39人，将押送来此，先遣助手永浜中尉昨夜来此投宿。

10月22日

细川中将等39名战犯嫌疑，于午后从青岛到达下关，根据国防部命令应即转送上海集中营。只有细川中将来班谈话，谈后乘火车去上海。

10月24日

日前归国的野尻、船木两参谋来信，转告我家中消息。对此亲切关心表示感谢。

10月26日

我认为日华合作对东亚的将来非常重要，但有些日本人只知指责中国人的缺点，当然也有反对这种指责的。对此问题似应从大局出发加以考虑。

10月30日

收到西浦参谋9月20日寄出的明信片及中国派遣军善后处理部(伊藤参谋)的第一次来信。

10月31日

班内我是最有闲的人，因此能细心收听东京电台广播，并作好记录，隔一天向班员传达一次。

11月1日

10月29日徐州出差的小笠原参谋、铃木大尉一行今晨归来。

11月3日

在东京，国会举行新宪法公布仪式。

11月7日

5日夜，班员两、三人饮酒大醉，其中一人走出门外，与门前过路的中国人吵架斗殴，造成打伤对方的事件。国防部也得悉此事，构成问题。班内干部连夜极力奔走求得对方谅解，今夜请被害人来此商谈始得到和解。

11月8日

最近在上海及其他各地，有许多公司、工厂、商店、钱庄相继倒闭。据说因大量物美价廉美国货充斥市场所致，主要为轻工业品、食品等，经济影响很大。

11月10日

昼间读书和以自己的方法坐禅，夜间继续围棋生活。结跏

跌坐(打坐的一种姿势——译注)已能继续一小时以上，睡眠很好，可熟睡八小时，幸与年轻时无甚差异。

11月14日

上海战犯管理所所长邹任之少将来访，面谈要事约一小时。

11月15日

今日南京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共产党终未参加，国共妥协愈益困难。第三势力分裂，青年党和社会党参加了大会，但民主同盟及其他第三势力未参加。

11月17日

为联系工作回中国的驻东京中国代表团某团员的谈话：

朱世明团长原为美国通，去日虽属初次，由于各种原因，对日本人较之对美国人更有好感。该团许多与美国有关的工作人员，也转而偏爱日本，其中有的人甚至说这样好的民族举世无双。因此，代表团中很多人以中日合作为目的，正在寻求志趣相同的日本人与之接触，而日本警察不知是否对美国有所顾虑，竟对接近代表团的日本人进行监视。实在令人不快。

11月21日

我的专属副官米满新吾少佐，从1940年3月，我任军事参议官时，即由人事局选定作为我的副官，尔后我四次转职，均随我转职各处，长期照顾我已有六年九个月之久。去年在确定联络班人选时，因不再需要专属副官，大家主张让他离去。但他深以为耻，坚决要求留下，经小林总参谋长的批准，作为编外人员留下。所幸他的高尚人格和热诚，受到班中同人们的称赞。

最近总联络班撤离的时机迫近，他已看出势将离我回国，

几天来专心为我今后的生活进行充分准备。今天写出一份物品一览表,并仔细向我加以说明,我无从说出感谢之辞。

11月23日

夜间王俊中将在私邸招待我。今井、宫崎、小笠原、二宫、冈田等同往。并由第四十九师周参谋长及林牙科医生二人作陪。王俊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与西浦参谋同期,因此,很早就特别对我等表示好感。美酒佳肴,欢饮数刻,饭后与王氏对弈。

11月28日

接到冈部大将在上海死于狱中的报告。不胜哀悼。

11月29日

驻东京的中国代表团成员王武上校即将返任,行前来谈。

12月2日

宫崎中佐、黄少尉赴上海出差。

钮先铭少将来访。

12月3日

汉口联络班三人撤离途中来此,根据该地班长西冈参谋的报告,感到汉口对待战犯嫌疑的待遇及审判态度较其他地方为好。夜间接受参谋次长刘斐中将设宴招待,今井、小笠原同往。主方有少将、上校六人作陪,刘次长是我国陆大毕业,陪客中除一人以外,均曾在日本留学,因此,席间用日语欢谈。

注:刘斐后来最先投向中共。

12月5日

傍晚,穿着破中式服、苦工模样的23名日本人突然来此。其中一人为被私人征用的日本军医少尉,20人为逃兵,二人

为侨民。他们是分散匿居于九江附近农村，后被赶出送至国防部后，当即发给衣食，使之乘晚十时的火车去上海。在南京郊外隐藏的一名日本人也同去上海。

12月6日

在上海被拘留的第十三军司令官松井太久郎中将和第四十三军司令官细川忠康中将，由宫崎中佐(二日出差去上海)陪同来此，指定从今日起与我住在一起。虽未被拘留，但也不允许回国，与我的情况大体相似。

12月9日

现已决定各地联络班到年底一律撤销，全体人员回国，唯我一人仍须留下。对我这样战犯嫌疑的处理，中国方面很为难。保存南京联络班名义，看来只是为了在形式上给我一些工作所采取的措施。

约在一个月前，今井少将即提出除我以外全班人员均回国，另选班外人员照顾我的生活的计划。我也愿使班员早日归国，当即表示同意。

但是，今日今井少将突然告知，已经商得中国方面同意，由小笠原参谋、二宫军医与我一同继续留下。特征求我的同意。对此意见，我坚决表示反对，仍主张全体回国。今井少将十分为难，向我道歉、劝说，我仍表示保留意见。

12月10日

据小笠原参谋透露，原来内定除我以外全体回国，至于该参谋和二宫军医留下一事，是私下与中国方面交涉得到允许，今井少将也同意、通过正式交涉得到谅解的，今若反对，确实为难，故务请同意。我因感激小笠原与二宫的诚意，即对今井

少将表示赞同昨日方案。

实际上在 10 月 28 日陈参谋总长就下达了“总联络班应继续工作到明年 6 月，不需要的人员即可回国”的训令，今日我始获悉。其后班内有何议论，又如何与中国方面联系，则全然不知。但使多数人能尽早回国，总算如愿以偿。

总之，联络班因工作需要而保留下来，现在工作大体完毕，各地联络班已撤销，其成员均已回国。因此，今后南京联络班的存在，可能只是为我一人所采取的措施，使我对中国方面以及小笠原、二宫两位表示深切的感谢。

12 月 11 日

伊藤军需少佐与米满副官同来我处，对我今后生活多方予以指导。过去多年来，出外购物均由米满承办，自己从未摸过纸币，但今后就要亲自购买必需用品，他们为我留下零用钱，并告知现在物价的情况等。

香烟(四级)每盒 20 支 600 元，西服一套 50 万元以上，怀表 50 万元以上，鸡蛋每个 220 元，袜子每双 15,000 元至 25,000 元，毛巾每条 1,200 元，手帕每条 900 元以上，衬衫每件 30,000 元以上，领带一条 25,000 元以上，汗衫衬裤一套 25,000 元以上，苹果每个 1,000 元，广柑每个 500 元。

12 月 14 日

傍晚请王、钮、曹等少将与沈上校来此，以鸡素烧招待他们。我方除我以外尚有今井、宫崎、小笠原、二宫以及新来的松井、细川两中将作陪，彼此畅谈甚洽。来客中只曹夫人不谙日语，我以华语同她谈话。

12 月 15 日

联络班结果只留下小笠原参谋、二宫军医、伊藤司机和我，确定今井以下 12 名（包括山崎）回国，夜晚举行小宴送别。

12 月 16 日

晨，米满副官前来辞行，相见之下泣不成声。此时情景，一言难尽。将写有承蒙多年照顾不胜感激的谢词，亲手交付与他。

11 时按约定时间，去国防部长白崇禧公馆访问。由今井少将、冈田嘱托同行，王俊中将也在座。11 年前我在参谋本部任第二部长时期，曾于南宁见过白将军，此为第二次会晤。我对中国政府特别是军方，对待日本官民和我的好意，向他表示感谢。他讲的话很有感情。他虽未去过日本，但从国际形势出发，极力陈述日中密切协作的重要，对其见地深表敬佩。晤谈约一小时辞去。

当晚突然接到白将军的邀请，7 时 30 分偕同松井、细川两中将、今井少将、冈田嘱托等至王俊官邸赴宴。宴席豪华丰盛。将军与午前会见时无异，依然热情洋溢，畅谈中日合作问题。9 时 30 分回班。

总联络班大部分人员即将回国。我在晚间为之送行。由白将军的宴会归来后，又为今井、冈田送行。

此后在联络班住宿的只有我和松井、细川两中将，小笠原中佐，二宫军医少佐，伊藤、村田两司机，以及联络军官吴文华、黄金发等人。小笠原、黄两人为送行同车去上海。

第九章 第二联络班时期日记摘抄

(自 1946 年 12 月 16 日至 1947 年 10 月 6 日)

12 月 16 日

由今起开始第二联络班(临时)的活动,本班有日本人七名,中方联络军官二人,雇佣的炊事员夫妇。如后所述,不断有联络军官的熟人前来投宿,每日三餐泰然食用,全无公私之分,此种情形直至我单独生活时为止。

在徐州征用的特情人员,其中一部分撤回,今日去上海回国。

12 月 19 日

午前二宫军医与联络军官吴文华去战犯拘留所,为被押人员诊病并进行联络工作。在该所拘留的同胞得知该军医及小笠原留下,十分高兴。过去小笠原等与二宫军医每星期去该所两次,慰问被拘留的同胞,并分给物品。今后班员大减,每星期只能去一次,但此种慰问联系是十分需要的。

午后小笠原、黄金发回班。

12 月 20 日

我班至明年 6 月末所需经费三千余万元,以我的名义向中国政府申请借用,已被批准由小笠原领来。我为支付命令官,小笠原也为分担责任的官员,以此形式支配经费,据说回国后将负接受会计检查的责任。上述金额在领取过程中已被

扣减三分之一，我对此有些吃惊。其为官吏之腐败？抑或恶习之所致？乃与小笠原、二宫两人，重新商谈今后班内的生活。

起居时间大体如前。我个人的生活为午前室外运动体操、坐禅两小时、读书，午后读书、下围棋，大致与前无异。

12月23日

外交部机要室章起良来访，并下围棋。

12月25日

此地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历时月余，制定出宪法，今日闭幕，共产党和一部分民主同盟未参加。

12月26日

小笠原、二宫赴战犯拘留所送物和诊病。

12月28日

霜冻结冰，朔风寒冷，晨起坚持室外运动。

听说汉口、南京、上海、广东的各联络班，与在上海等船的官兵及侨民760余人，今日从上海启航，开往佐世保。

至此，留在中国的只有第二联络班、太原联络班、征用人员及战犯嫌疑者。但在上海、北京及其他各地，尚未正式征用的侨民似有相当人数，尤其山西省内约有二千数百人留在该地。

12月30日

东京广播，日本银行发行额为934亿余日元。

12月31日

晨，从楼上看见卡车开出大门。小笠原、二宫在车上装着饼、白糖、盐、酒等，送往战犯拘留所，由16日以来，本联络班

开始缩小，人手不足，因此改为每周送一次东西，但事实上诊病送东西不但次数未减，所送东西反而有所增加。他二人的深厚情谊令人感佩。

年末感想：我继续生存的最大目的就是解决使二百万军民平安无事回到日本这个停战善后工作最关重要的问题。此事由于中国及美国方面大力协助，进行意外迅速，早在7月份，几乎全部撤离完毕，善后工作人员也在数日前回国，至此稍感宽慰。身染结核病却意外健康，心想能这样继续下去就好。

1947年元旦（昭和二十二年，民国三十六年）

在南京金银街联络班宿舍迎接元旦。宿舍里有松井、细川两中将、小笠原参谋、二宫军医、伊藤、村田司机和我共七人。另外尚有联络官黄金发少尉、吴文华上尉（吴文华每周来住二、三次）及厨师夫妇。

八时半在房门前整队，向东遥拜后进入食堂，以保存的御赐清酒奉祝圣寿无疆，品尝在日本国内难得的肉类、蔬菜等美味，班员们打乒乓、下围棋度过愉快的一天。

1月7日

生活同前，只是与松井、细川等闲谈时间多了。由于喜读禅书，每日打座，此种情况持续到肺病发作。

注：患过肺病的白隐禅师的《夜船闲话》日后对我与疾病作斗争起了极大作用，载于“斗病日记”。

1月8日

美国特使马歇尔离宁回国就任国务卿。

1月9日

为关押在此地战犯拘留所的好友矶谷廉介，将其过去对国民党及中国国民的友好事实，写成书面材料作为证言，请小笠原参谋提交中国当局。

1月10日

松井中将最近将去东京军事法庭作证，草拟一份为畑元帅辩护的短文，交与松井作参考。

1月11日

日本国内报纸报道本联络班留在此地消息，战犯嫌疑者、失踪者的家属纷纷来信探问。

1月12日

烧饼、油条半年前每个十元，现在涨价十倍，每个百元。物价飞涨令人吃惊。

1月14日

战犯拘留所长要求伊藤司机暂去该所劳动，因干重活，衣服严重磨损，将我冬衣裤赠他。

1月16日

上海的战犯、战犯嫌疑者，以前关押在上海监狱内，现在转到北郊江湾集中营，因此，小笠原中佐与黄联络官同往上海。

二宫军医去拘留所诊病和送东西。其中凡是商品化、实用化的东西，经常中途消失，送不到在押同胞的手里。此种情况过去也有。实无办法。

1月18日

今天是旧历12月29日，照例要给信差、报差过年的节礼，他们以此为应享的权利，日本人虽有对此表示不满者，但

我想一年只有三次（包括端午、中秋）给他们一些小的馈赠而使人高兴的习惯，日本人效仿效仿也无不可。

1月20日

小笠原由上海返回，据报告，原在提篮桥普通监狱之183名与战犯有关的人，现在转至江湾集中营过集体生活，数十日来始能入浴，大家很高兴。据说上海尚有相当数目侨民，南京则已无一人。

1月21日

旧历除夕，四处鞭炮齐鸣。我等晚饭也以鸡素烧会餐。

1月23日

据广播报道，日本国内政局动荡，公务员工会、企业工会罢工示威行动及左翼活动甚为激烈。国家再建实属不易。

1月24日

严寒不断袭来。年轻人室内只有火盆取暖，温度为摄氏五、六度，我的居室以小型电炉取暖，温度为十一、二度，需穿厚衣。

1月25日

正被征用的池田夫妇、“华中矿业”的野阪来班。

1月26日

晚王龙来班，因亲属有重病人请二宫军医往诊，二宫欣然前往。

1月27日

据国内电台广播，虽不具体但可看出新学制等文化设施的情况，大致颇有吸收美国文化、抛弃东洋传统文化之感。难以赞同。

1月28日

据闻今天在皇宫前广场，有40万劳动者集会，提出打倒现内阁口号，举行突破危机的国民大会。

1月29日

物价暴涨，益加严重，为节约燃料，减为每周三、日两次入浴。

1月30日

日本国内公務员工会等260万人总罢工问题，势将形成政局纠纷。

1月31日

今日美国终于声明停止为防止中国内乱的调停工作，撤出三人小组中的美国人员回国。国共合作前途益加险恶。国民政府方面虽已表示让步，共产党方面却提出难题作为先决条件，以致和平谈判不能进行。

注：以后美国在远东防共问题上所以束手无策，我认为此乃第一错着。

2月1日

近来向拘留所送物，仍为每周四、六两天。日本国内预定今日举行空前规模的总罢工，昨日午后占领军司令官发出禁止命令，罢工被压下去。

2月5日

冲绳县人余木拘押于苏州监狱，期满释放来班。

2月6日

由今日起以三天时间，开庭审判参加进攻南京战斗的第六师团长谷寿夫中将的战犯罪行。小笠原参谋每天出庭作证

或旁听。

2月9日

夜间，中国男女青年五、六人来我班与黄联络官等跳舞为乐。

2月11日

晚餐购买少许绍兴酒，共庆纪元节。物价益加猛涨，绍兴酒一瓶 85,000 元，洗衣肥皂两月前一箱七万元，现涨到 22 万元，低级香烟也要几千元一盒，经济上、社会上均有不安之感。

根据国防部及战犯拘留所指示，将拘留中的桥本上等兵接来本班疗养，由二宫军医担任治疗。他的肺病十分沉重。恨不早日治疗。

2月12日

去年 12 月 3 日曾与爱好钓鱼的刘斐参谋次长约好，赠他三根钓竿，今日修好已将钓竿送去。

桥本上等兵的病情经过良好。

陈昭凯上校，转职东京代表团，前来辞行。

2月14日

因一般犯罪关押于苏州监狱的坂诘、押江两人，此次大赦释放来此暂事休养。

2月17日

物价暴涨更甚，中国政府发布紧急经济措施令，实行严禁买卖黄金及其他果断措施。

2月18日

日前出狱的三人，除坂诘仍暂留本班担任杂务工作外，余木、押江二人今日由小笠原参谋带领送往上海集中营。归途中

为苏州监狱在押者送物品。

美制糖精一小筒去年末售价六万元，现在市场无货，黑市售价 42 万元。

去年 12 月东京附近的亲戚来信，今天收到。

2 月 23 日

小笠原归任。

2 月 28 日

被当地特情班征用的池田夫妇及男孩来此住宿，池田转调徐州。

3 月 2 日

南京郊外马鞍山华中矿业留用的饰磨医生来访。

晚间设小宴招待即将转职去东京中国代表团的王处长及陈、杨两科长，为之饯行。

3 月 3 日

小笠原偕同黄金发去上海，为营救原因不明被逮捕的原公使土田丰，并为一部分归国同胞办理乘船手续。

谷寿夫中将第五次受审，二宫与吴文华上尉同去旁听。

3 月 6 日

小笠原一行返回，土田公使由于活动的结果，得到政治释放，保护在邹任之少将私邸，将于 8 日乘船，与其他同胞回国。

传闻 2 月 28 日，台湾爆发一次重大事件，真相虽然不明，似为民众起来造反，抵抗军队。

3 月 7 日

数十年来，上海的日本侨民中，有不少品质不良的无赖及在国内无以谋生之人，彼等不愿回国，潜伏市中各处。此次决

定将彼等 40 余人强制回国，但据情报仍有逃避者。其中似有一姓木村者，今日在南京街头，因行动可疑被捕，由宪兵送来。使之立即返回上海。不断有同胞需要照顾，实为难办。

3月8日

本班工作向由参谋本部第二厅第八处管辖，因该处王处长、陈昭凯科长转职东京，今后改由该厅第一处管辖，住宿本班的联络军官吴文华、黄金发二人也转属第一处领导。第一处长曹士澂少将如前所述颇为亲日，且早已相识，办事将更方便。

近日陈科长赴日，班员以大量书信托其带回国内。

3月10日

谷寿夫中将受到最后审判，宣判死刑。

所谓南京大屠杀事件，中国方面极为重视。当时居住南京的外国传教士，将目睹暴行详情著书于欧洲出版，其中文译本我于停战后获得一册。书中极力主张不能容忍此等暴行。中国方面也深知中岛今朝吾第十六师团的罪行远比谷寿夫第六师团更为严重，并曾命令本联络班调查中岛师团长、师团参谋长及各团队长等人的下落和地点，但中岛已经死亡，对其他团队长等的下落，则答以本联络班无法进行调查。

对罪行严重的第十六师团不予惩罚，而由几乎无罪的谷中将代人受过，处以极刑，不胜慨叹。

注：我被任命为第十一军司令官负有攻占武汉的任务，于1938年7月在上海登陆后，曾闻先遣参谋等人谈及南京暴行真象，且悉与暴行有关的大部部队将用以进攻武汉，于是我煞费苦心充分做好精神准备，所幸攻占汉口时，未发生一件残暴

行为。(详情见本书第四篇)

3月15日

黄濑少将为一文人，通晓日本文学。

我在读书时曾有所感：“中国文化，以禅学为例，远在唐、宋时代，哲学伟人迭出，何以后继无人，其原因安在？”我以此与黄探讨。他答称：“这与桔树结果期尽不再结果的道理相同。”

3月17日

押在战犯拘留所的寺冈军曹因病重申请接出，收容于本班，与桥本同室疗养。

山村大尉解除征用，来此投宿。

最初仅为名义存在的第二联络班，但出入人员仍很多。

3月18日

东京电台广播，麦克阿瑟元帅昨与外国记者团会见时，谈及促进对日媾和，及其以后的撤兵等问题。

3月20日

今晚，曹少将在其公馆设家宴招待我和海军武官杨氏夫妇。

3月22日

家信叙述国内生活情况：早饭粥，午饭面包或山芋，晚饭一碗盖浇饭。与此相比，此间被扣押者的伙食颇为浪费，对此应当有所考虑。

3月26日

曹少将部下战犯组组长彭上校来访。

3月27日

渡边、石田两人，又由苏州监狱来此投宿。最近受麦克阿瑟元帅邀请访日的中国记者团，视察日本回国后，在报纸上刊载了半月见闻记。其要点如下：

(一) 东京有中国文化研究团体 30 余处，其中无一处亲华。盖因存在一种无形障碍。询问币原大臣有关亲华问题，答称：“日华亲善是必要的，但不能操之过急以防招致盟国嫉妒”。日本人对美国顾虑重重，确实可怜。

(二) 美国官兵中有不少人喜爱日本。如某上校在战争中负伤，其子战死，但他向记者却谈论日本好的方面。他表示，如果本国政府许可，他希望永远留在日本。

(三) 在政党之中，最受记者团欢迎的为民主社会党。

(四) 关心中国现状的日本人很多。

(五) 战争结束时蒋介石主席采取以德报怨的方针对待日本人，日本各阶层对此表示感谢。

3月28日

阅报得悉，华南第二十三军司令官田中久一中将，27日在广州被枪决。其属下某混成旅团的一部队有残暴行为的嫌疑者均已回国，因此由他一人伏罪，实在有些冤屈。

4月1日

被华中矿业公司征用的饰磨医师，解除征用，昨日来此留住一夜，今日启程返国。

4月6日

战犯拘留所岑翻译来班与小笠原商谈公务。

4月7日

小笠原参谋偕同黄氏，为与战犯嫌疑者联系前往徐州。宪兵两人来班调查问题。

4月9日

小笠原等归班。

4月12日

命小笠原在某饭店招待参谋本部战犯组组长7人并恳谈。

4月17日

报载：国民党将一党政府改为包括青年党、民主社会党、社会贤达的联合政府，在各党派同意之下，内定以张群为行政院长。

4月18日

根据上海战犯管理处长邹少将的要求，小笠原同黄联络官去上海。

综合国内情报，原来道德观念薄弱的日本人，近来更加道德败坏。农民囤积粮食被检举者甚多。黑市泛滥。山火频发，损失木材达一年总产量的十二分之一，其最大原因据说由火柴、吸烟所引起。交通规则等全不遵守。缺乏社会全体观念及公共道德，盲目叫嚷民主主义，岂非坠入为所欲为的自由主义之中？

4月20日

我班炊事老人，20余年工作于南京日本总领事馆，在鼓楼市场一带很有名，经常为我等做日本菜。

4月21日

商震接替朱世明被任命为盟国对口委员会中国代表兼驻日中国代表团长。

4月24日

如前报纸所发表的张群内阁组成。

4月25日

对美国提议的使日本现存工业维持在1930年至1934年水平一事，中国《大公报》、《和平日报》等舆论加以反对，认为如此高的水平，将威胁中国经济，并含有重新进行侵略的危险，主张降到1914年水平。讽刺麦克阿瑟的占领政策是在扶植日本。

4月26日

午前在雨花台处决谷寿夫中将。人生无常，何其迅速！

4月27日

在上海的老友山田纯三郎，托人送来珍味“鱼子酱”及其他物品。感谢老友盛意。

4月29日

7时30分，全体班员在车库前东向整队，举行天长节遥拜仪式。昨夜青年们制做了“胡枝子饼”，晚饭举杯庆祝节日。

吴文华通知，松井中将去东京军事法庭作证一事可能取消。

5月3日

日本今日起施行新宪法。

5月4日

黄濂少将来访。

5月6日

投降时，何应钦总司令部的参谋钮先铭、曹士澂两少将及王武、陈昭凯两上校遵照蒋主席、何应钦将军的指示方针，对日本人颇为理解并备加照顾。前于三月间王、陈两位已转调东京中国代表团，此次钮少将又转职将去台湾，因此，今早偕同联络军官黄金发乘车前往钮氏寓所，作答谢访问。钮氏以往室狭小，接待客人甚为不恭，表示将亲自走访辞行，坚决谢绝会面，不得已乃返回。9时30分钮少将果然来访，我郑重致谢并赠派克钢笔一支，谈话约30分钟。

接到2月10日寄出的家信，前次来信为2月1日寄出，3月10日收到。

5月8日

据东京广播：东京军事法庭关于华中作战当时的行动，从前天开始连续由辩护律师及证人发言说明情况。广播中听到有我任第十一军司令官时期的幕僚宫崎周一、天野正一、吉桥戒三等人的名字，引起我对当时的回忆。在法庭上提到进攻汉口作战当时未曾发生残暴行为，作证者达十人。

5月11日

因物价暴涨，今后食物必须更加节约。

5月15日

我的生日，未声张。

5月24日

在河南郑州受私人留用的日本侨民七人，因无证明在旅途中被捕，现拘留于南京警察署，昨日小笠原前往交涉，今日领回，并由小笠原与黄联络官两人送往上海。

5月25日

中国驻日代表团的王亮少校为联系公务回京，来访并带来今井武夫、延原威郎、宫崎舜市、土田丰等的书信。

5月27日

午前，我与松井、细川、小笠原、二宫集中在一处，听取小笠原讲述在上海获得的有关国内外情况，并对本班的将来进行协商。中国审理战犯工作虽然意外缓慢，但根据一般情况，本联络班的封闭也已为期不远，以后又将如何？决定由小笠原进一步研究后，再与中国方面协商。

5月28日

晚间，招待由日本回南京的王亮少校会餐，听到一些日本内地情况。

5月29日

夜，章氏来访，笔谈写道：“照我看先生可免于受审。”其理由是：

- 一、移交时，对中国政府有极大帮助。
- 二、南京老百姓，对先生印象甚好。

关于上述第二项，曾有以下事实：以前南京市中心的鼓楼附近有大市场，每日民众多聚集于此，市场附近的日本总领事馆、大使馆，数十年来与民众具有深厚的情感。据停战后经常去市场采购的鲁厨师说，附近居民对日本人很亲切，仍称我为总司令，购买食品常常少算价钱。

5月31日

在东京由社会党、民主党、协同党三方联合，成立片山内阁。自由党未参加。

6月1日

王亮少将即将去东京返任，特来辞行。据云，今后每几个月归国一次，委托捎带书信十分便利。

6月5日

国防部要求松井、细川两中将和我写出国际形势判断书面材料，各人分别写出草稿，综合整理后提交该部。

6月6日

为借支本班7月至12月经费，共一亿一千余万元，特以我支付命令官的名义向国防部提出申请书，由出纳官小笠原送去。

6月7日

每日打坐已养成习惯，持续一小时以上，毫无痛楚的感觉，但精神尚远远不能集中。

6月8日

往访久未晤面的王俊中将，就中日合作及其他问题交谈约一小时。

6月10日

施载棋氏来访。

6月12日

小笠原、黄金发两人去徐州。

松冈博明来访。他曾给予上海集中营的人等以极大照顾，并讲些上海情况，当晚返回上海。（此人后作我助手）

6月15日

徐州特情班内川、前田来访。

6月21日

物价暴涨加剧，本班伙食的副食质次量少，但据二宫军医

计算，日本国内大城市，每人每天摄取的热量不超过一千卡，而本班老年组则为三千卡，青年人为四千卡。实觉惭愧。

6月23日

今日为一年三大节之一的端午节。早饭吃中国佣人送给的粽子，晚饭与佣人一同品尝鸡肉。

6月28日

从1941年至1944年的日记，不知何时将被拿走，其内容皆为战争生活见闻，写时无所顾忌，因此，决定烧毁，但又觉可惜，乃将可以公开部分择录下来。今已摘录完毕，日记全部烧掉。

东京电台广播，麦克阿瑟元帅对来日本的美记者团，发表谈话要点如下：

1. 对日和约必须在12个月至18个月内完成。
2. 根据研究结果，军事占领超过五年以上时，历史上常遭失败。
3. 苏联占领千岛，虎视日本，估计对促进对日和约不致反对。
4. 冲绳人的民族不同于日本人，继续占领冲绳，估计日本也不致过于反对。
5. 为使日本经济复兴，给以相当国际地位为宜。
6. 日本于今后一个世纪内，不可能重新恢复军备侵略他国。

夜间小笠原回班。

6月29日

吴文华将国防部有关部分情报，告知小笠原，其情况如

下，

- 一、东京军事法庭一再照会要求已经病愈的冈村、松井出庭作证。
- 二、南京中外记者团要求来本班访问调查。盖因外间谣传冈村正在江北前线指挥对共作战。
- 三、以上两问题，国防部理当采取相应措施予以拒绝。

7月1日

据东京电台广播，在粮食青黄不接时期，缺粮 350 万吨，至今无法补充，根据政府的食粮紧急对策，对大部分居民，将在七、八月份少供二十天粮食，与以前少供的十一天的粮食，均由个人自行处理。这样，大城市每人每天平均热量只有 1,100 卡。

读书感想：人类生活大致可分为活动生活与冥想生活，个人如何分配生活，可分为以下五种：

1. 专心致志于活动生活者。
2. 同时进行活动生活与冥想生活者，如政治家、哲学家佛兰西斯·培根。
3. 以活动生活为主略有冥想生活者。
4. 以冥想生活为主略有活动生活者。
5. 专心致志冥想生活者。

我的生活于停战前大致属于第三类，以后情况变化则在第四、第五类之间。

7月2日

小笠原与黄联络官两人，与房东商谈今后房租问题。考虑今后物价上涨的情况，房东要求每月租金二千万元（原来每

月一百万元),结果谈妥今后五个月为五千万元。

本班经费,到年末只能向中国政府借支一亿元,房租占去一半,迄今为止已向各处送款达八千万元。班的财务陷入极大困难。

午后,留在上海的堀内干城公使与木村领事来访并留宿,谈及上海未走侨民的情况。

7月5日

国防部第二厅曹少将向小笠原透露以下情况。

1. 虽有联络班存否问题,但引起此问题的原因在于共产党。共产党放出谣言,说冈村赴徐州、郑州、北平、东北各地前线,指挥对共军作战,致使中外记者纷纷申请访问联络班。本部拟使联络班保留至9月前后。
2. 联络班到本年末的经费预算额,理论上不能许可,但将9月以后的余额,做为将来运营之用,如此办法可予谅解。
3. 冈村可能留到最后,其所需经费毋庸担心。(看来剩我一人时,中国方面也一定负担)
4. 松井归国的时机与英国有关,估计也将在东京甲级战犯审判完毕才有可能。
5. 细川在作9月回国的准备。
6. 战犯于九、十月审理完毕后,全国的战犯将集结于上海集中营,并努力使之采取自治体制。集结人数约有八百人,估计其中约有二百人无罪回国。

7月6日

中午前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少将来访,

并为调查案情进行以下问答。

问：受上海高等法院委托，让你为汉奸金宝作证，为此进行调查，你和他是什么关系？

答：对此人毫无所知，没有任何关系。

问：据说金与一六三九部队有关系。该部队是情报机关，还是物资收集机关？

答：有关人员全部回国，不经查询很难回答。

问：将在8日预定审判矶谷廉介，希望届时出庭作证。

答：国防部第二厅若有指示可以出庭。

以上问答完毕后，开始闲谈。石庭长说：军事法庭计划在年末结束。处理方针是：对证据不充分者宣告无罪，只对证据确凿者定罪等，并对本班以前的协力表示谢意。我也表示请求给以公平的审判。

堀内公使继续留此住宿。

7月7日

关于我明日出庭作证问题，黄金发去国防部与曹少将协商结果，决定取消。让我注意，与拒绝会见新闻记者同样，今后一律称病不与外人晤面。

7月8日

今日公审矶谷廉介，小笠原与吴文华前去旁听。我虽未能出庭作证，但矶谷多年来对中国及中国人具有深厚感情一事，曾提出宣誓口述材料，愿能产生作用。

7月11日

堀内公使一行为与行政院长张群会面，二日由上海来此。9日始被行政院召见，因张院长太忙未得见面，委托秘书代为

转达。该一行已于今晨返回上海。

傍晚黄联络官带来一中年日本妇女冈田春子，因其形迹可疑经警察、国防部转到本班收容。她原在徐州与中国人同居，后被遗弃。其毫不在意的态度使我吃惊。

7月15日

班员人数每日平均应为八、九人，但在此用饭者经常约20人。其中有收留的病号，临时投宿的侨民，此外尚有黄、吴的客人多人，彼等均泰然自若住于此处。

7月16日

联络班接国防部指示，本班将于9月以前关闭，经全体协商，已作如下决定。

1. 除我与松井外，其余人员在8月间去上海等船。
2. 松井同时去上海养病。
3. 我留在南京等待审判。将来可能移居上海。
4. 吴、黄二人依旧与我同住。

7月17日

小笠原从曹少将处获悉以下情况：

1. 昨日内部传出有关联络班问题，关于我与松井的处理，尚未作最后决定。
2. 确定全部战犯集中上海，决定设立战犯监狱（改建现在的集中营）。
3. 冈村、松井已被列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战犯名册内。

将上述战犯集中一处，我等早已申请，今得实现，殊堪庆幸。

注：集中时，在沈阳的战犯因在共军范围，未能集中。

晚间吴文华向小笠原透露，对以国防部为主的宽大处理我和松井的方针，表示反对而主张严办者逐渐增多，多属对现政府的反对党派。

7月20日

原在北京的特情关系征用人员，酒井、有江、上别府、葛原、田村等五人，与此地征用人员合并，已到南京，前来致意。

晚，王俊中将在私邸招待松井、细川、小笠原、二宫和我。客人还有汤恩伯上将、刘斐参谋次长、陆军总司令部林参谋长、东北军董副参谋长、亚东协会梁氏等，均曾留学日本，席间以日语欢谈，满堂和睦。

7月21日

今日，本班接到11月结束的命令。据透露将原定9月结束期限延长至11月，是国防部长白崇禧的意见，主要是为延长我的联络班长名义，使我万分感谢。（实际于10月7日结束）

7月22日

据报上海集中营有两人逃亡。

7月23日

日前收容的冈田春子，由小笠原送往上海，同时处理集中营逃亡问题。

今日的《中央日报》、《和平日报》（均为政府系统报纸）以“毛泽东的卖国行为”为题，煞有介事地登载：1943年8月17日，冈村宁次与毛泽东于山西神池达成共同对国府军作战协定，以及该协定的内容。此报道显系捏造，但以“军闻社”通讯发表，恐引起误会。闻国防部第一处及战犯处理委员会已采

取措施予以更正。

据闻由于共产党系报纸经常捏造或夸张我与中国政府军部的关系，新闻局第二处年轻人出于愤慨，乃作出此种过火的反宣传。

7月31日

从北京、汉口来信，在北京战犯拘留所的同胞卫生状况不佳。

据报告上海逃亡者已捕获。

8月1日

申请借用的7至11月份本班经费一亿三千余万元，小笠原已由国防部领来。在此情况下，历次均有中间克扣，但此次却未少分文。回忆曹少将为人清廉，早在办理接收时，在我等中间已有好评。

8月2日

在此地拘留的原法属印度支那派遣军司令官土桥勇逸中将，查明系因认错人而被捕，此地军事法庭不予起诉。但法国曾经要求引渡土桥，最近荷兰也来要求引渡。因此，我请求国防部设词予以拒绝。综合以往情报，法国对土桥并不严求，但荷兰的审判杂乱无章，倘不得已必须引渡时，拟向法国方面引渡。

被西安附近中国军队征用的两名日本兵现已解除征用来班，立即使之去上海。

8月3日

前日领来经费，交付房租及向各地拘留所汇款，已经用完。今后我等生活费用，只能靠以前余款及大米过活。

8月7日

汉口医生西平守恒来班拟住四、五日。我班来往过客应接不暇,宛如免费旅馆。

8月10日

我班收容的战犯病号四名,其中渡边、石田、桥本已经康复,由联络军官吴文华护送去上海集中营。

8月13日

西平医生为阮将军所喜爱,在其支持下于汉口开业行医。阮氏转职南京,因患病招他前来。经阮氏劝告,拟在南京开业,现正筹备中。

8月15日

在国内从今日起开始民间贸易。

印度和巴基斯坦今日独立,但仍在英联邦范围内。

8月25日

小笠原、黄两人为探望战犯去汉口,承中国空军关照,顺便乘坐飞机前往。

8月30日

小笠原由汉口归来。

9月4日

小笠原、黄两人去苏州、上海探视战犯。

9月5日

受不起诉处理的土桥勇逸中将,今晚出拘留所,来投我班,前患肾结石症,据说前夜排出石块。

9月6日

小笠原回班,和松井、土桥、细川、二宫等聚集一处,听小

笠原报告上海及其他各地状况,并就土桥的将来交换了意见。

9月9日

小笠原向我说明,从下月以后有关我独自一人生活经费使用等问题。

9月12日

物价上涨益甚,纸币已不堪用,必须贮存物资,承小笠原照顾,为我购买半年用的早餐食品及调料等,对此实在感谢。

一向在战犯拘留所任翻译官的日本京大毕业的岑氏,为人清廉诚实,对日本人多方照顾,现因辞职,今晚请来班内共进便饭,聊表谢意。

9月14日

全班人员照像留念。

9月15日

曹少将来访交谈。

午饭面条,为土桥最喜爱的饭食,他非常高兴。深悔在他从拘留所初来本班时未以此招待。

9月16日

晨,松井中将由田村伴随去上海疗养。

据报大台风侵袭太平洋岸,利根川溃决,关东平原遭受严重灾害。

9月17日

军事法庭李检察官来此,告以对细川中将的审理只是形式,实际将不予起诉。略觉放心。

在徐州留用的日本人加藤,因买物来南京,在街头被捕,送来我班。

9月19日

好久没有过的事，略有低烧，请二宫军医诊视，卧床静养。

9月20日

低烧不退，继续卧床静养。与班员谈话、体操、坐禅完全停止，终日读书实在无聊。

经与国防部联系，已确定对细川不予起诉，土桥可去上海京沪医院住院，松井也暂时可去该医院住院。

9月26日

低烧不退，估计有何隐患行将发作。

9月29日

国内的亲戚、至友处寄来书信六封。

9月30日

午前3时左右，右腹部剧痛难忍。恐深夜扰人，强忍至5时唤起勤务人员坂诘，请来二宫军医，经注射后剧痛基本消失，但是隐痛和肚涨仍未减退。据说似为胆囊炎。

原定1日晨，本班解散，一同出发，只留我一人，但因土桥通行证尚未办妥，命令延期至7日解散，对我疾病堪称幸事。

低烧已退，胆囊炎仍作痛，再次注射。

中国驻东京代表团的陈昭凯上校来访。

10月6日

连日天阴，今早始放晴，我体温、脉搏正常，病情基本痊愈，已能下床活动。且喜能以欢送明日回国的同人，晚饭与大家最后一次会餐。

午后9时，汤恩伯上将、王俊中将、马少将、钮少将（台北）、曹少将、李少将、陈上校，结伴前来探病。彼等均为留日

的高级军官，今晚于王俊中将私邸设宴为小笠原、二宫饯行。席间汤恩伯将军知我患病，即倡议同来探望，不胜感谢。

小笠原移交我大米六十袋，黄金、美钞各若干，作为维持至1949年春季的费用。同时请来吴、黄二位对我今后生活交换了意见，并以黄金一两、货币百万元作为本月经费，交黄金发少尉掌管。

二宫军医为我留下了各种药品并附使用说明。

10月7日

7时15分，土桥、细川两中将、小笠原参谋、二宫军医、伊藤、坂诘六人，离班归国。我欣然为之送行。

第十章 单独拘留——南京时期日记摘抄

(自1947年10月7日至1948年3月29日)

1947年

10月7日

晨，送别六名同伴，至此联络班宣告结束，只剩我孤独一身，所幸壮年时期常驻中国，在日常生活中，中国话尚能敷衍，也无特殊寂寞之感。每日坐禅、读书，与吴、黄二青年和睦相处，静待最后之命运。

黄金发去上海送行，晚饭只有吴文华与我，稍感寂寞。

内川氏来访，谈特情征用者的情况。

10月8日

曾因患重病寄居本班的战犯嫌疑者寺冈宪兵军曹，现已基本痊愈，唯恐其不堪拘留生活，仍留暂住。他是我身边唯一的同胞。

10月9日

自前天以来，表面上只我孤身一人生活，而实际上除寺冈及联络军官吴、黄二人外，还有他们的两位食客，以及厨师鲁妈夫妇，共有八名给养人员。

10月10日

给鲁妈钱让她去买水果，七年来第一次自己用钱。

10月13日

发烧38度，在上海等船的小笠原偶然来访，对我进行护理。

10月15日

连续发烧，夜里高达39度，感到肺病复发。遵照医嘱的疗养方法，保持安静。

10月16日

二宫军医由上海来此，与小笠原两人为我治疗及护理。

10月20日

陈昭凯第三次来探望，据云，后天去东京返任。

10月28日

感谢二宫军医连日治疗，终于退烧。

11月15日

上午小笠原往访曹少将，托其关照我的病情及疗养，据云，明年二月底将使我移居上海进行疗养。

据报，归国船日内进入上海港。下午2时，小笠原参谋和二宫军医，至病榻前告别，我对两君从第二联络班时期以来之厚谊，表示终生难忘。我只能勉强送他到室外楼梯口告别，看到小笠原的眼里流出泪水。

11月16日

小笠原、二宫走后，我只身卧病，稍有寂寞之感，但念及二百万军民得以安然归国，也颇堪自慰。

寺冈与我同病相怜，有时也来聊天。

11月17日

曹少将通过吴文华向我问候。

11月18日

自16日起，开始自我疗养生活。中国方面虽多次关照，敦促我入院，或请中医治疗，但因独居生活很随便，故均谢绝。

11月27日

在上海等船的伊藤司机，因最后一次联络，来此留住一宵。由徐州送来已被处死的四名战犯的遗物，托伊藤转送日本内地。

12月10日

自11月29日至昨日，十一天来病势转重，并曾咯血，也未请医生，仅努力保持安静。寺冈及吴文华曾来照顾。所幸心情尚不太坏，睡眠及食欲亦好。从疗养得知，咯血并不太可怕，但咯血伴以发烧，则病情不佳。我正属于后者，应该警惕，但如今束手无策，唯有听天由命而已。

据自上海归来之黄金发谈，第二联络班人员已于8日由上海启航开往佐世保，同船载有遣返同胞三百余人。

12月11日至20日

在汉口拘留所的奈良、梶浦、佐藤三人，要求我为他们写证言，带病写成，航邮寄出。

两周来连续发烧，14日体温平复。

国防部战犯组要求交出我过去日记四部。为松井、细川、小笠原出具证言。

据云最近法国要求中国政府引渡土桥勇逸已被拒绝，又要求代行审理，中国方面予以承诺。荷兰亦要求代为审理土桥的罪行。

12月21日至31日

病稍愈。吴文华患病入院。为立法院宪委员会开车的司机伊藤，28日归来。

1948年元旦

在南京住所，迎来65岁的新年。

1月2日至6日

4日，被征用从事特情的内川氏来访。

伊藤司机因宪委员会出差，在其友人加纳工作的第五十八师师长公馆帮忙，今夜来住宿。

为在上海监狱的小仓达次写证言一份寄出。

1月8日至15日

9日，吴文华病愈出院。

11日，上海的松冈博明君来访，据云归国命令已下，但为照顾上海监狱中的同胞，情愿留下。经与吴、黄两人商议，由国防部开具战犯监狱留用证书，12日返沪。

黄金发晋升上尉，转调上海战犯监狱第二科工作，15日去上海赴任。其后任由吴永明接替，同日搬来我处。

1月16日至2月9日

据报，土桥勇逸中将于1月9日引渡法国，解往法属印度支那。

15日为在汉口的伴、在上海的专田二人，分别写证言寄去。

1月28日，田中、野田、向井三人，于雨花台被处死刑。

2月10日至12日

10日为旧历正月初一，市面热闹非常。晨，黄金发来访，谈上海监狱情况。

据报，片山内阁总辞职。

2月13日

午后，美国新闻记者要求会见，厨师告以需经国防部批准和本人正在卧病，予以拒绝。

据闻，国防部高级人员开始考虑令我移居上海，由当地留用日本医师治疗。

2月16日

接参谋总长命令，至4月下旬以前仍保留联络班名义，其目的是为延期审判寻求借口。

2月26日

近来病体稍见康复，有时卧床休养，有时稍作运动。

3月1日

前上海战犯典狱长邹任之少将，颇得日本人好评，去年12月，因在押战犯野中久男逃亡事件，被免职调南京审查，本日本已恢复自由。

3月3日

汉口方面之战犯嫌疑者，近日将移至上海拘留。

3月11日

伊藤司机因无正式留用手续，被警察拘留。

3月17日

黄金发来访，谈称：已辞去上海战犯监狱职务，并已向国防部呈请辞去公职，返回台湾故乡，特来此告别。他与我相处达一年半之久，多蒙照顾，离别之际，深表谢意。

3月19日

军事法庭通知寺冈，本日下午2时到庭听候预审，由接替

黄金发的吴永明伴随出庭。寺冈病已痊愈，庭审后即移送战犯拘留所收容。

3月20日

上海监狱在押的十川次郎中将来信称，万国红十字会上海代表寄赠二亿二千八百万元，此外，最近国内亦将有衣物及日用品等寄来。

本日伊藤司机被移送战犯拘留所，据闻因与五十八师留用的鹿野司机的涉嫌案件，有所牵连。

3月23日

邹任之少将由上海来访，杂谈之余，留住一宿离去。

3月24日

卢志中持武汉日籍技术员互助会理事长西平守恒之介绍信来访，住宿我处。

当晚，国防部吴文华来访，与吴永明共商有关我去上海疗养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如前所述，蒋主席早已同意，让我4月份转往上海，国防部复于3月12日上报，由于病情需要让我速去留有日本专门医师的上海疗养，最近已获批准，23日召开战犯处理委员会，由曹处长报告，并经全体同意，作出了转地上海的决定。不久即可成行。

现住房屋，本月租期已满。何时离去，要请国防部第二厅第一处决定。

3月26日

晨，吴文华电话通知，定于29日启程去上海，并与吴永明商议结束此间的一切工作。

3月27日

吴文华去上海为我准备寓所。

3月28日

曹士澂少将来访。曹原为何应钦总司令部参谋，现任国防部二厅副厅长兼第一处长及战犯处理委员会主任，对日本战犯及留用人员甚表同情，对我尤为关心。我本应前往致谢，他竟在我病中特地来访，我谨代表日本人和我自己，向他致以衷心谢意。

鲁妈夫妇，依依惜别。两人在南京日本总领事馆、大使馆，前后佣工25年。此次无意另找职业，拟回江北老家务农，等待日本总领事馆的再开，请求我为其写一份日文的身分证明。我当即照办，并致以厚礼。

3月29日

第一次国民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

带病为搬家匆忙整理行装。

居住金银街四号，已有一年又九个月，今日离去，无限感慨。

适烦吴永明代向王俊告别，王俊却特意前来送行。告别房东，下午8时由鲁妈夫妇相送乘汽车出发，8时30分抵下关车站，立即进入卧铺车厢，吴文华、吴永明二人同行。11时，火车离开南京。

青年时代曾经久住的南京，

指挥过百万大军的南京，

签订过降书的南京，

患过肺病的南京，

一生难忘的南京。再见！

第十一章 单独拘留

——入狱时期日记摘抄

(自1948年3月30日至1949年1月28日)

3月30日

上午7时30分，到达上海北站，遂即驱车至溧阳路东亚协会。山田纯三郎、松井太久郎来访。10时与协会总干事王丕承少将晤谈。王原在国防部任职，为我旧相识。据谈，他受国防部委托，已在远离日本人集中地方，为我找到一处不引人注意的寓所。

11时在王丕承的引导下，到达黄渡路王文成宅，由于疲劳和发烧立即卧床休息。下午4时，留在上海的医学博士中山高志来诊。晚间，松冈博明来访。松冈乃诚实热情的青年，从此以后作为我的助手，为战犯做了不少好事。

注：王文成又名王子惠，从小学到大学，均在日本就读，出色的日本通。曾任汪精卫政权的经济部长，与日本财界关系颇深。当时他已与重庆秘密联系，故战后未被列为汉奸，是个两面人物。不仅如此，他还以日本通资格被派往东京中国代表团工作，因为同辈所惧，返回上海。我与王初次见面，知他有很多日本朋友。王表面温和，人品高贵，容易接近，但长于权术，心地不良，连日本人也有说他是骗子的，后为汤恩伯

将军所用，在我前后又来日本，从事各种活动，因行为诡诈，终被起诉。他常利用原侯爵德川义亲、原海军大将野村直邦和我的名义，到处招摇撞骗。因此，我和德川、野村三人均与之断绝了交往。

3月31日

松冈赠我生鱼片，他每日都来照顾我，隔日去一次战犯监狱。

本日，何应钦自美国归来到达上海。

4月2日

林田蕃少将、王丕承少将二人代表汤恩伯上将来访。

吴文华、吴永明即将返回南京，特来辞行。我对其长期关照，深表谢意。

4月6日

日本“花月”餐厅经理吉田，委托松冈赠我大鲷鱼一尾。

4月19日

南京国民代表大会，选举蒋中正为第一任大总统。

4月22日

山田纯三郎伴同政工局专员何佩实（沛石）、喜多宏行（席瑞明）来访。我在华北任军司令官时，何曾由重庆密来北京奔走和谈工作，亦属旧交。就中日关系等谈话约30分钟。

4月25日西川秋次来访，他现于上海掌管纺织系统数百名留用人员。20余年前我任上海驻在武官时期，他任某纺纱厂董事，与我关系非常密切。战争结束后，我提出的对华处理方针，他也同意。

4月28日

根据熟悉上海市民生活的松井的建议：送给房东王氏700万元作为房租；给住在这里照料护理我的山田夫人100万元（坚决未收），另给中山博士500万元。

4月29日

南京国民代表大会，选举李宗仁为副总统。

夜，由中山博士引导赴光沪医院照X光像，发现左肺有病灶。途经吴淞路，该路原为上海唯一的日本商店街，两侧日本店铺相连，而今均改为中国商店，日本人被赶进路旁小巷内，睹此情景，不禁为之泪下。

5月6日

收到大阪中部复员联络局总务部长征井重夫3月29日发出的来信。

5月9日

南京国防部上校刘炽昭一家自上月来此寄居。每逢周末刘回家来，时常与之闲话，方知他是我青年时好友刘玉书之侄，据说刘玉书现在四川老家。

5月12日

据国防部二厅一处吴文华函告，参谋总长已电令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对我进行保护。

5月15日

在南京被留用的辻政信大佐来访。据他谈，停战前在驻泰国的军司令部工作，因将被列为英国战犯，故由泰国微服潜入重庆。又因战犯在日本也会被追及，故家族所在地大阪不安全，但获悉在石川老家的母亲病危，故决定回国探望。以后在安全时机到来前，将继续潜伏，我劝他保重。

王丕承、甘海澜两氏来访。

5月16日

日本侨民约200人，乘海王轮归国，过大佐亦同船归去。该大佐在出发前又来看我，并赠水果，殷勤致意后辞去。

5月18日

国防部吴文华来访，面交参谋总长为我开具的在沪养病证明书。

5月20日

蒋中正总统、李宗仁副总统，在南京举行就职典礼。

5月22日

汤恩伯司令部参谋林田蕃、龙佐良两少将来访。

5月30日

以翁文灏为首的行政院组成，何应钦任国防部长。

6月2日

松冈陪我上街理发。两个半月来未理发，七年来未在街头步行。今日大有轻松之感。

6月6日

今日初会来看房东的朱世明将军。朱是美国通，为首任中国驻日代表团长，2月8日《中央日报》发表过他关于中日关系的论文，对其立论公正、取反潮流的勇气深为敬佩。借其行将赴美，无暇长谈，甚以为憾。

最近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与学生“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运动，甚为高涨。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前天发表声明，予以反驳。

当此风潮中，北京大学胡适教授发表了堂皇的论文，认为

日本已无侵略实力，故扶植日本不足为虑。

6月9日

曾在北京联络班工作，以后被留用的吉村军医上尉来访。讲述了华北、东北方面情况。据称他被继续留用，前往南京。

6月16日

二年来读了很多文学作品，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有，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莫泊桑的《一生》和《羊脂球》，以及辛克莱的《爱国者》等。

6月20日

淞沪警备司令接到对我进行保护的密令，因此，听说有便衣督察经常到我住处来。

6月26日

物价暴涨，链霉素一CC 二千万元，相当5月初的六倍。

6月28日

淞井、松冈来访，在靠背椅坐谈三小时，未觉疲劳。

6月29日

何佩实陪同席瑞明（喜多宏行）、马本政（岛本政次郎）二人采访，继续上次所谈，说明政工局关于中日合作的对共计划。并请求我予以协作。我表示同意，并允诺为其推荐适任人员。

据报，昨28日福井县发生大地震。

7月1日

前在南京联络班临时收容的寺冈孝，于30日被宣告无罪。

7月2日

我平生的爱好是，饮酒、读书、下围棋及钓鱼等。酒已因年老多病一滴不饮，棋、钓也均停止。现在只能读书。但因生硬费解者不好读，故选读一些趣味性读物。然而，新书很难寻到手。

据说西乡隆盛也常下棋，尤喜观棋，白隐禅师和前年物故的河上肇博士等专心于一种事业的人，至晚年都棋兴甚浓，耐人寻味。

7月3日

松井太久郎寄居处的平山夫人，因病急需链霉素，但药价过昂，无力购买，我赠药费约一亿元。

7月4日

读《回忆河上肇》，对河上博士的思想，虽难赞同，但有同病相怜之处。尤其当停战前后物资缺乏时期，他因营养失调而死的遭遇，与之相比特别为之同情。但读此书，看到河上博士本人及其周围的学者，竟对结核病的疗养常识如此缺乏，不能不使我吃惊！

7月12日

首次到战犯法庭出庭。

7月13日

整理好行李物品，准备随时向任何地点转移。

7月14日

《日新报》为此间唯一日本报纸，由东亚协会编写，日侨联络所印刷（油印），此外偶尔也可借到国内报纸。靠这些消息，对国内情况大略察知。

7月15日

柴山兼四郎、神田正种两陆军中将，由东京押送上海战犯监狱。7月17日，二人身无长物，只穿一身衣服，困窘异常，因此特以衬衣等旧物托松冈相赠。

7月28日

最近酷暑，每日气温30°C以上，夜间难以入睡。

山西省终于也被共军占领，只有太原似仍在固守。此间英文报纸报道，据逃出的外国人称，太原之确保，全靠日军残留部队之力。

8月2日

本日军事法庭送来对我的起诉书。

8月10日

吴永明来访。据云曾归台湾故里，因无适当工作，又来上海，今后拟从事工业。

8月11日

为开发海南岛而被留用的前公使堀内干城来访，谈准备开发的情况。

今日房主王文成讲述其任汪兆铭政府高级官员时，曾与重庆政府秘密联系的情况，尽管他解释了未被问以汉奸罪的原由，但这是日本人难以作到的事情。

为入狱后方便计，本日剃了光头。

8月12日

听说我行将入狱，山田纯三郎老人带病来访。

8月13日

松冈、吴永明两人，将装有我身边衣物的皮包二个，送往战犯监狱。

林田蕃、龙佐良两少将，代表汤恩伯将军前来探望，据云汤现在浙江省衢州。

8月14日

军事法庭出庭，随即送入战犯监狱。

与盟友矶谷廉介及其他数十名在监旧识，相继来谈，连晚饭后的自由活动时间，也与友人谈话，心情甚快。

本日活动较多，幸未发烧，夜间得以安睡。

过去因部下多人入狱，自己出于军人精神也愿早日入狱，但又想留在监外，便于与中国政府及军方友人联系，使部下得以减刑，早日释放回国。此种矛盾思想迄未解决。今日入狱，于心始安。

8月15日

狱中生活的第二日，虽感疲劳，但未发烧，两月以来左手指、左腿神经痛，情况不佳。

探望福田良三、神田正种两君病情。

8月17日

松冈送来毛毯、馒头。在判决前，不许会见。

8月23日

本日公审。

晚间，无名氏送来牛奶一罐。

8月24日

11时30分，国防部军法局徐局长来监巡视，特意探视我的病情。

招商局商船海辽轮，已开始每月定期往返上海—神户一次。26日将搭载我候船军民归国云。

8月25日

监狱隔壁是候船的日人收容所，凡经军事法庭宣判无罪者，均移居该所。听其交谈声音，知十川中将等五十余人，似也将于下午出发上船。

松冈送来鸡蛋、蔬菜、香蕉等，照例分给矶谷及患病的柴山、神田。

提出申请由医学博士中山高志来监狱诊病。

9月8日

入狱已三周，病情转剧，据此提出保释申请。监狱第三科刘科长也有此意。申请书由原济南总领事有野学以中文起草，由文政抄写后提出。

9月11日

入狱以来，蒙斋藤弼州经常照顾，并为我作翻译，今日托斋藤弼州由狱内合作社买纸烟若干，分赠经常照顾我的人等。

9月17日

本日中秋节，又收到狱外送来各种食品并有月饼。

入狱以来，首次自演文娱节目。

9月18日

中山博士来狱诊病。

9月20日

国防部政工局何佩实前来探病，监狱第三科刘科长在座，也谈及以前的特务工作。

9月23日

日本青年会之哈顿博士(京都帝大毕业)来监探视，承赠咸牛肉罐头。

9月24日

王家送来食品。

同监有一姓岩元的木工，曾多次赠我燃料，日前我以香烟回赠。他用木料为我制作小型屏风送来。邻室下河边宪二并在屏风上作画。我在狱中，除斋藤外，尚有一、二人照顾我。大家对我关心，实属幸运。

9月28日

担任护理我的寺冈，接到命令即刻出狱，移至隔壁候船收容所，我送他到门口。由林弘藏代替他担任护理。

10月1日

狱内禁止阅读报纸，仅在图书室揭示一些剪下的报纸，但不知从何处也传进一些消息，主要如下：

1. 日前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会议上，英美与苏联的矛盾，表现更为尖锐。柏林问题仍未解决。
2. 张群自8月20日访问日本约三周归来后，在广播讲话中提倡东亚经济同盟。
3. 据说约在一周前，济南终被共军占领。

10月6日

两三天前何佩实所赠维他命鱼肝油，转赠与体力最衰弱的柴山兼四郎中将。监狱病室新来两名肺结核患者，因寺冈已归国，由我担任对此类病号疗养的指导，今日前往探视，该两病号甚喜，问了一些有关疗养之事。

10月7日

西川牙科医师来监，经诊视结果，拔掉上下四个已活动的牙齿，准备镶假牙。

10月8日

收到大量监外送来物品，仍照常分与矶谷等人。

10月10日

双十国庆

晨，孙典狱长来室交谈（参看第七章之四）。当晚，演出台湾及日本戏剧。孙典狱长并对全体讲话，大意如下：

“中国现状与前途多难，应与新日本、新韩国携手，渡过难关。中日合作乃当务之急”。

10月20日

松冈、王宅的平山等每隔四、五日即送来物品，不胜感谢。

10月21日

基督教会来人慰问。

10月22日

收到中山博士的诊断书，内容主要是：病情恶化；心脏期前收缩，需要狱外治疗。

10月29日

最近送来的食品中，不见馒头和鱼肉，据云商人出现“拒售同盟”。此乃经济上不正常现象。

11月1日

病情虽不佳，神经痛稍好，可在床上盘膝端坐。即日起开始散步。

11月2日

下午3时，正当散步之际，见来探监之松冈，相对一笑，因我为未决犯，不准会面。

松冈不仅对我个人多方照顾，对全体在监人员，每隔一天

必来探监，热心为大家办事，我曾通过斋藤与之联系，没想到今日戏剧性的相遇。

据称昨晨沈阳被共军占领。

11月4日

下午3时，横滨军事法庭某美军少校，与日、美律师各二人，在上海军事法庭的施检察官陪同下来监，向我和柴山兼四郎中将查证。要求我提供的情况，主要是：关于方面军司令官对准备运输的权限等原则事项，并未触及具体事实。远道来此，究因何故，不解其意。

11月11日

物价暴涨，经济恐慌，狱内空气也呈不稳。

11月12日

试行白隐禅师《夜船闲话》所示的“内观法”，心情转好，发现此法可医治心脏期前收缩。

11月13日

据报道，东京军事法庭已对东条、土肥原、板垣等七人宣判死刑。

11月17日

孙典狱长召集各室长讲话，说明国军在徐州与共军会战，进展对国军有利。

注：实际情况恰好相反。

11月19日

据狱中之中原博士谈，诊疗所朱所长已于13日向国防部提出我需要入院治疗的申请。

11月20日

在收容所候船的同胞，定于明日乘船归国。

关于上海财界巨子柳泉煤矿矿主陆子冬，对拘押在监的斋藤弼州君甚为同情（详见第七章之二）。自我入狱以来，见到陆氏逐月以黄金和物品赠与斋藤，并悉与斋藤同室的四十人均受其惠，我对陆氏与斋藤二人的行为更加佩服。

11月25日

据悉昨日甲级战犯土肥原、板垣于东京终审宣判死刑，而今我与矶谷亦囚禁于大陆监狱之中。青年时代我等四人均为志在大陆之同窗好友。与矶谷促膝共话我等的命运，无限感慨。

11月26日

汤恩伯将军来信探问病情。

11月27日

晨，第三科长来告，接到国防部二厅电话称：已派人接我出狱就医，希速准备。于是由斋藤、林、小谷为我准备行李，矶谷及诸友好均来话别。

下午1时，军事法庭石庭长来监，在第一科办公室内稍加讯问即宣布，准我暂时出狱，并延期30天公审。

由于决定当日出狱，忙将所有物品尽量分给狱中诸友。

1. 食品、香烟全部分给矶谷和全体将级军官以及医护人员等。特留给矶谷日币二十元。
2. 衬衣及皮带分别赠给林和小谷。
3. 赠给柴山兼四郎中将军用铁衣箱一个，内装皮靴一双、冬衣一套、夏衣两套及零用物等。

下午2时，国防部第二厅吴文华及松冈来迎，在走廊与列

队相送的全体将官等 30 余人告别，向孙典狱长及各科长致意后出狱。

以前进出监均乘囚车，看不到市街的景象，今日改乘普通汽车，得以眺望青年时代熟悉的江湾一带风光，感慨实深。车到目的地，方知并非医院，仍为前曾叨扰过的王宅，主人一家热情相迎，仍住二楼一室，离此入狱以来已有 106 日，阔别约三月有半。

8 月 14 日入狱时的思想矛盾今又出现，我想此次出狱，要为被监禁者的减罪和回国服刑更加努力奔走。

11 月 28 日

据中山博士诊断病情如下：

“因入狱致使病情转剧，近一、二月内易于咯血，咳嗽严重时须及时报告。如能保持现状，度过明年 6 月病情可望稳定，宜多珍重。”

11 月 29 日

山田纯三郎行将归国，特来告别。

关于中国大陆内战局势，综合所闻，大体如下：

徐州南方地区，将发生大会战。国军于东北地区，损失兵力达 40 万。济南战败损失亦大。所损兵力有的已被共军收编，如共军将上述兵力整编后南下，将占很大优势，国军明春将面临危局。

据由东北锦州逃来的士兵透露，东北国军（大部为蒋介石直系精锐部队）士气极为沮丧，纷纷投往共军，范汉杰军最后只剩百人，范亦终于被俘。

南京政局不稳，一派悲观情绪，当政者庶几丧失信心，美

国亦不积极援助。

12月4日

松井太久郎、山田纯三郎二人，定于明日乘船归国。

近日报纸刊出我因病延期公审的消息，但对我被保释出狱事似尚不知。

晚间中山博士来诊，破例稍作杂谈。据云，丰臣秀吉的谋士竹中半兵卫，也患有肺病。老年患肺病，反而智力不减，体质不衰，更有长寿者。

注：在我整理本稿的1965年，距写日记当时已逾15年，我已年逾八旬，身体健康状况颇好，人们说我是“因病长寿”的典型。

12月6日

同胞二百余人(其中有军人三、四名)，于本日乘日本船桔轮归国。未归国者上海尚有700余人。

12月7日

停战后在上海主管对日本受降、处理问题宽厚，受到十万日本侨民爱戴的汤恩伯将军，一度调转浙江方面，最近被任命为长江下游警备总司令又来上海。下午2时他的参谋龙佐良少将来告，当晚汤恩伯希望与我会面，并要听取有关防守长江的意见。晚间龙少将驱车来接，同赴汤公馆，与汤将军作了长时间谈话。汤将军告以半月前与蒋总统及何应钦国防部长商谈有关我的问题的内部情况(参照第七章之四)。我对汤将军为战犯减刑及送回日本服刑所作努力表示感谢。我根据壮年时期以来研究长江下游军事要地的知识，陈述了有关防守长江的意见。谈话约一小时辞去。

注：中共方面一再宣传，我被任为蒋总统顾问，并指导国军作战云云。日本国内也有谣传，实际我向中国方面直接提出意见，也只此一次。

12月10日

松冈因被委托担任残留日本人的中小学教师，工作繁忙，今后只每周二、五来此联系。去江湾战犯监狱的次数虽减少，遇有联系事务时仍代我前往。

12月11日

据吴文华秘密告我，顾祝同参谋总长对上海警备司令陈大庆发出机密训令，指示对我的安全及保释问题，须秘密进行保护和保密。

12月12日

保释出狱以来，与狱中诸友书信往来不断。公开联系由菱田中将负责，有关情况的通报，均寄交菱田。

12月19日

今日《新闻报》、《大公报》登载我病重消息。

12月22日

南京政府的组阁由于时局紧张而难产，至今组成孙科内阁，并发表“光荣和平、作战到底”之声明。

12月23日

本日，土肥原、板垣、东条等七人，于东京巢鸭拘留所内被处绞刑。

惊闻壮年时期以来的盟友之死，引起种种回忆。

12月29日

龙佐良来访。龙一向为我与汤恩伯将军从事联系工作。

规定每月支付食宿费为 600 日元。

12 月 31 日

自去年突发的肺病,迄今尚未好转。坐监、保释、疗养,但战犯罪尚未判刑,真是烦恼的岁末。

1949 年 1 月 1 日

于上海秘密住所黄渡路王文成宅,迎来 66 岁的新春。

下午 4 时,汤恩伯将军偕龙佐良少将来探病,并与我交换关于防守长江的意见。

1 月 4 日

对孙行政院长的“光荣和平”声明,以及蒋总统“和平的关键在于共产党”的元旦声明,共产党虽未作正式回答,但连日来通过广播对国民党反动分子及美帝国主义进行谴责。

1 月 7 日

上午龙佐良来访。

下午国防部曹士澂少将、吴文华上尉来访。曹已调任京沪警备总司令部参谋长,即汤恩伯将军的参谋长,就将来中日关系及战犯问题,谈约一小时。

国共和平之说甚为高涨,唯中共尚未表态。

1 月 8 日

上午龙佐良少将来访,下午曹士澂少将来访,据曹讲,战犯归国服刑问题,大有希望云。

1 月 10 日

房主家女孩宝米,为小学四年级生,人很聪明。教科书中有关于我的记载,老师在给学生讲解时,有一学生问道,“冈村现在何处”,老师答称:“现在江湾战犯监狱中。”宝米听了忍不

住要笑出来。在上海的社会环境中，我的住所能以保密，实非易事。

1月11日

午后3时，王丕承陪同《东南日报》主笔宋越伦及朱一成来访，杂谈数十分钟。相约为我住所保密。

下午4时，汤恩伯将军独自一人来访。

1月14日

本日广播了毛泽东对蒋总统元旦文告的声明，提出严峻的和平条件如下：

1. 惩办战争罪犯；
2. 废除伪宪法；
3. 废除伪法统；
4. 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
5. 没收官僚资本；
6. 改革土地制度；
7. 废除卖国条约；
8. 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1月15日

国共内战，天津于昨日似已陷落。

1月18日

仅凭中国报纸是无法了解中国政局的黑暗面的。通读日本内地来的12月上、中旬报纸，综合南京、上海、香港等合众社、美联社、法新社的报道，多为蒋总统下野，中共军北京入城

式，联合政府交涉中，国民党陷于分裂等有关南京政府危机四伏的新闻。

1月22日

时局紧张，蒋总统本日终于辞职，根据宪法，李宗仁为代理总统。李对我不似蒋总统抱有好感，我的命运如何难以逆料。

1月23日

赴南京出差之龙佐良少将归来，立即来访，告我蒋总统因国民党内对中共问题意见分歧，不得已而辞职，但汤恩伯将军职务不变，并说对我的处理也不致变。

1月24日

下午2时，军事法庭送来传票，通知定于26日上午10时公审。

龙佐良来访。两月余未曾理发，恐失体面，被人见笑，今特理发。

1月26日

法庭公审，对我宣判无罪。

1月27日

11时中山博士来诊，因昨天公审出庭，感觉疲劳，呼吸稍感异常，医嘱需静养两、三日。

李宗仁代总统对中共展开和平工作，任命邵力子、张治中为和平谈判代表，向中共发出号召，但无响应。昨日陕北电台广播斥伪代总统李宗仁为第二号战犯，并提出难题，要求：如有和平诚意，应立即将蒋介石、宋子文、谷正纲、陈诚、何应钦、顾祝同、刘峙、汤恩伯、张群、王世杰、朱家骅、刘健祥、吴国桢、潘公展、蒋经国、张君勱、左舜生、戴传贤、郑介民、叶秀峰等主要

战犯逮捕归案。

(译注：1949年1月28日中共发言人谈话中所指出的主要战犯为，蒋介石、宋子文、陈诚、何应钦、顾祝同、陈立夫、陈果夫、朱家骅、王世杰、吴国桢、戴传贤、汤恩伯、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等人。)

1月28日

今晨当地报纸，对于判决我无罪一事，除《大公报》指责判刑过轻外，其他各报均保持沉默态度。据来访者谈，一般群众并不十分关心，也无反感，也还有人为我庆幸。

晚间，松冈来告知：战犯监狱内空气突然紧张起来，有在一、两天内可能出发转移的迹象。

第十二章 归国

1949年1月26日，上海军事法庭虽已对我宣判无罪，但在未领到国防部判决书之前，仍未能成为无罪之身。所幸已被保释出狱，尚能为狱中诸友的归国服刑问题，从事活动。最近得秘密通知，国内服刑业已确定。看来，回国仅为时间问题。

孰料，仅隔一日，28日傍晚，军事法庭郭副官突然来访，通知我于明晨6时30分以前去战犯监狱集合，与狱中的战犯同乘美轮归国。

事后得知，中国当局为使我等能搭乘该美轮回国，在该轮从横滨启航后，特提前宣判。

突然接到这一可喜的命令，心情反而紧张，于是告知房东一家，并承帮助整理行装。将手中美钞及中国货币悉数交付松冈，所有未了事宜全部托他代办。

唯一困难是第二天适值旧历正月初一，无处雇车，幸蒙汤恩伯将军盛情帮助，借给卡车一辆。

一切准备完毕，乃与房东一家话别，夜11时半方就寝，但因过劳，难以成眠。

1月29日拂晓起床，5时在房东一家送别中乘车出发。同车有龙佐良少将及松冈。6时抵战犯监狱，与监中诸友久久面谈，8时半与同监战犯259人，分乘汽车离江湾监狱至黄浦

码头，经过 DDT 消毒，按名单依次上船。

日后，据当时留在上海的日本人讲，彼时在上海市到处都贴出了“不许把日本战犯运走！”的标语。此举，似中共分子所为。

美轮为约翰·W·维克斯号，船长以下船员均为日本人，有汤普森上校手下的数百美军负责警卫。

我被编入病号班，与越智、白川、东、木皿四人，同住于船尾的特别病房，病房门口，有美兵岗哨。

同船有日本红十字会派出的卫生班，担任医疗工作，并进行了种痘和斑疹伤寒的预防注射。

我因连日忙碌，略有微烧，上船后立即卧床，翌晨，汤普森上校向我说明，他的任务是负责运送战犯，对九名无罪者的乘船，属于特殊照顾。到达后如何处理，尚未确定。

30日上午10时，船由上海起航，念及青年时代多次往返的上海航线，以及吴淞附近的风景，本拟作最后的观赏，终因卧病而未遂。

当日经医生诊查，认为身体无异常变化。

傍晚，船上轮机长来告：“据适才东京广播，中共对国府提出的和平条件之一，为不承认对冈村的无罪判决，要求引渡冈村。但是我们的船已驶出领海了”，言下一笑。

东京广播并报道：在华全体日本战犯正在返回日本途中。

事后得知，李宗仁代总统为争取和平，已下令对我重新逮捕，而上海警备司令汤恩伯将军，将命令扣压不发，而令我乘船归国。此外，日后在东京，中国代表团团长商震亲口告我，李宗仁也曾命令商震将我逮捕归案，经与美军当局协商结果，

予以拒绝。

我再次幸免于难，过去不止一次幸免于难，可谓幸运儿了。

1月31日、2月1、2日在海上航行三天，风平浪静，船上伙食很好，病员还能喝到牛奶。医生每日按时诊断、开药。据医生讲：“战后日本国内长期食品缺乏，不少患结核病的老人，因缺乏营养，多有死亡，最近始见好转，滋养品也都上市，你此次回国正是好时机。”我留在中国时滋养品从未间断，在此方面我也是幸运者。

在船上入厕时也要受监视，自2月1日开始，无罪者可以自由活动。

船过黄海时，不禁回忆起，自青年时期多次在中国大陆工作，乘船或飞机往返黄海数十次，以日华合作为宿愿，从事于中日战争第一线。黄海位于日中两国之间，形同连接两国之桥梁。我在中国友人之间，曾以“黄桥”为别号，意即在此。然而，今后两国关系又将如何，我的命运又将如何。

多年在外地工作之人常说，每当回到日本内地，看到六连岛、长崎港外碧绿景色，颇觉快意。2月1日晨，临近离别七年有半的西南各岛绿色天地，尽情眺望。痛感今非昔比，今日日本已无所谓“内地”、“外地”之分。思念及此，不无伤感。

在船中，樱庭告知：我等宣判无罪的九人，已于1月29日上午8时下达释放命令。由于匆忙动身归国，竟未领取国防部的判决书。

2月3日中午，船过伊豆半岛南端，晚9时在横滨港外下锚。同屋的越智是理发师，为我洗头，甚为爽适。2月4日

晨，船靠横滨码头，输送队长等要将无罪者九人一道送往巢鸭，经我等据理力争，最后终于同意我等九人先行上岸。

在码头上来迎接的有复员局长原中将上月良夫、停战当时在南京的原军司令官十川次郎中将、原总军司令部参谋西浦进、野尻德雄、小笠原清以及我儿媳美智子等。我与来迎者以微笑致意。我等九人在厚生省工作人员引导下乘汽车赴归还援护厅横滨援护所，在该所履行复员手续后各自归家。我因公致病，被安置到东京国立第一医院住院。

东京我的祖居毁于战火，我妻已疏散至青森县娘家居住，儿等也从国外返回，现在他处寄居，此时我已无家可归，能住进医院，可谓适得其所。

12时，盟军总部参谋部第二部肯尼中校，特由东京赶来，对我进行询问，翻译是一日裔美国人青年军官，此段对话为本章主要内容，详记如下：

肯尼：先看看窗外，悬挂在院中旗杆上的日本国旗，明白
这是什么意思吗？

我答：不明白。

注：我早已不断听说，盟军对原日本军人压迫的情形，尤其对军司令官级人员更是严格监视，因此，我作为总司令官，早有精神准备接受刻苦的遭遇。另外，现正严禁悬挂国旗，不知悬旗用意何在。

肯尼：因为你曾经是为国宣劳的将军，我的上司特命令厚生省悬旗以示慰劳。

注：上司是指麦克阿瑟元帅或第二部长威罗比少将。

我因事出意外，无言作答。

肯尼：向麦克阿瑟元帅表表心意吧！

我答：停战以来，承蒙派出大批船只，不到一年，将我二百万军民遣返回国，深为感谢。

肯尼：那只是小事一端，是否还有更重要的表白，在这里的谈话我们可以互相保密，绝不向外界透露。

我答：既然如此，我有一事相告，但不知麦克阿瑟元帅，在处理远东问题上权限如何，我认为，美国如不早下决心，采取有效对策，不出半年，中国大陆必将尽归共产党掌握之中。

肯尼：这是最好的表示，我必如实报告麦帅。对将军自由生活，盟军虽无特别限制，但要求目前以不接触政治家和新闻记者为好，请乘厚生省的汽车赴医院安心疗养。

我答：敬谢好意。

真正的询问，是在肯尼中校离去之后，由一名美军中尉进行的。其内容只是详细询问了我的履历。下午2时审问完毕，午饭后才与来迎及来访的人等谈话后，于下午2时前往东京第一医院，4时到达。

其后，几乎每天都有盟军总部的青年军官来探望，每次均以衣料、食品、滋养品相赠。

另一方面，2月4日，驻仙台美军某上校，专程去青森县黑石市，由该市警察署长带领，去到我妻家，当时全家人等大吃一惊，及至拿出巧克力及化妆品等礼物相赠，我妻始放心。据该上校称，他奉占领军总部命令，前来迎接冈村将军夫人，并请立即准备，乘美军专车前往东京。因事出突然，我妻乃托

辞谢绝。

盟军最高当局，出人意料对我施以特殊优厚待遇，使我至今仍不解其意。我想可能是由于过去占领军为了瓦解日本精神，尽力压迫旧军人，优待共产党。而现在似乎觉察其政策之错误，而改变主张，利用我归来之机，以优待我为示范，表白不再压迫旧军人……。这只是我的推测而已。

结束语

上述各章，是我自1945年8月停战，至1949年2月归国期间的粗浅体会。作为历史事实，是不够完全的。特别对日华关系、日共关系、占领军政策等，我原深有所感，但作为战史资料，也只能就此停笔。

回顾在此期间，尚有一事有待研究。即原拟就我当时在现地从旁所见，对照魏德迈将军报告以及其他参考文件，针对战后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作一番探讨。如果当时当地美国的政策得当的话，我想至少不难争得以长江为界，形成赤、白两个中国的局面。果能如此，则朝鲜战争也可能不致发生，而美国也不致陷于越南的泥沼之中。

后记：

1965年10月28日，魏德迈将军来日，在他停留五天之间，与我会谈两次。我想如美国政府当年采纳魏德迈的建议，中国大陆将不会形成今日的局面，而接近以上我的判断。他和我的意见一致。

第二篇 由汉口到南京

前 言

本篇所述内容，为从1944年9月第六方面军司令官转调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至1945年8月停战期间的经历。这一阶段的日记（如第一篇所述，1941年至1944年的日记已焚毁，仅将必要事项抄录下来，1945年后的日记得以幸存），已约定将来赠与战史室，故本篇只追记、陈述日记中未经记载的事项、须补充说明事项、当时感触，以及其他值得参考的事项。

至于有关指挥作战的重要情况，宫崎周一中将（当时的方面军参谋长，后任大本营作战部长）的札记已有详细记述，对此，本章从略。但关于进攻四川作战问题，因属当时最大课题，故须将本人当时真实思想加以叙述。

一、异常人事调动

1941年8月25日，我被免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而充任第六方面军司令官。这种似极平常的人事变动，本无足怪。但其后仅隔三个月，又被转调他任，对于关系重大的方面军司令官职务变动如此频繁，使我感到诧异和不满。

第一，由当时全军最大的华北方面军转调新编较小的方面军（即使负有作战任务），似为左迁，但从接任华北方面军司

令官的冈部大将又转调第六方面军司令官来看，也可算荣升。

第二，第六方面军既然如此重要，何以莅任仅三个月，又调我就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而再令冈部继任第六方面军司令官，致使华北方面军司令部随之陷入仅隔三个月又办交接的窘境。何以最初不将冈部派到第六方面军司令部？新编军作战艰难固在预料之中，但冈部岂非出色的大将？我在第六方面军部署繁重作战任务仅仅三个月，即被调离而将残局委之冈部而赴南京，心中极不愉快。既对冈部感到内疚，又对大本营抱有强烈反感。人皆贺我荣升，我却心怀不满。

第三，第六方面军的参谋长由宫崎周一少将充任，副参谋长由天野正一少将充任。前者为我任第十一军司令官时代的作战课长，后者为作战主任。配备与我如此投缘的干将（不知有意安排抑或巧合）其用意当然期望此次作战将能排除万难，势必成功，然而，未及半年，该二人竟亦调往他方。

总之，此事至今我仍困惑不解。

在此种情况下，中央当权者即应派遣专人或以密函，向我坦率加以说明（暗示也可），方为统率之道。人事安排虽严禁解释，可避开人事说明的形式，而在慰问言辞中交代一二，以免引起疑惑为好。

二、离奇的占卜

1944年8月24日，我于河北省的石家庄巡视下属部队，忽接北京司令部电话，报称收到转任密令电报。于是立即返回司令部。25日被任命为第六方面军司令官，随后，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发来去汉口赴任的指示。

此事虽觉突然,但年初占卜却已应验,令人不可思议。

著名的高嶋嘉右卫门的得意门生中,有一占卜大师小玉吞象。当时每年元旦,银座交询社邀请他为财界名流预卜一年吉凶。虽然有时灵验,有时不灵,但颇有名气。在我就任华东方面军司令官以前,小玉卜师即住于北京,以占卜致力于日华亲善,时时来访。

1944年岁首,小玉卜师来访,特为我当年命运认真进行占卜,所卜大意如下:

本年截然不同于前两三年,命运将有极大变化。战局迄今虽无甚大变动,但年中直至秋季将有进行大战之迹象。作战方位似在西南。职务亦将有变(调职),且属荣升云云。

在作战方面,当时我只忙于讨伐共军,维持治安,从无方面军规模的作战,但同年5月,奉命指挥河南作战,将战斗司令部向前推进设于郑州。我以为小玉卜师所卜至此已言中,而其后又向湖南方面进发,不久果又荣升总司令官,小玉卜师的预卜全部应验,确实令人惊叹。

虽属闲谈,颇感妙趣,故难忘怀。

三、赴任路线

9月2日由北京出发,经南京,9月4日抵汉口。为何取道南京,虽已记忆不清,但当时华中西部制空权已基本掌握于敌手,因此,去汉口时一般均沿长江一线前往。

四、汉口就任后的感想

此次为继第十一军司令官任内,攻克武汉之后再度进驻

汉口。前后两次环境大变，令人吃惊。

以前敌机极为罕见，在汉口、九江之间，往来内地之大型运输船，常达三、四十只；如今，连十吨左右的小汽船均被敌美空军炸光。

以前，此地住有数万日本侨民，店铺很多，相当繁华；如今，侨民大部归国，留者寥寥无几。偕行社尚有一些男女服务人员，照料军人食宿。

甚至我的居处亦有变化，以前，位于汉口市内，彼时常从二楼窗口眺望街头情景；如今，改在汉口东郊为树林环绕的旧军事设施之内，连个中国人影都见不到。

飞行队青年军官因频频出征，常有去而不回者，人数逐渐减少。在偕行社食堂每天照料他们的少女，睹此情景，露出凄凉神态，毫无青年朝气。

总之，环境的显著变化，为我留下深刻印象。

五、标语式的训示

到汉口接任后，发现所属部队风纪败坏，中国事变爆发后的残暴行为屡屡出现，用普通训示方式制止，恐已无济于事，乃决定改变形式，印发如下标语式的训示，以便时刻诵读。

统集团(第六方面军代号——译注)司令官五训

一、贯彻击美爱民，戒烧、戒奸、戒杀。

二、遵守卫生纪律，怠忽卫生而致病，即为不忠。

三、行为不检至为可耻，丢失武器、损伤军马亦军人之耻。

四、道义乃无形战斗力，对友邻部队应尽情谊。

五、爱护节省装备弹药。弹无虚发方为强兵。

“戒烧、戒奸、戒杀”为我在北京即已颁布的标语训示。

六、丧失制空权的空路交通

在空战方面敌人一旦居于优势，我空路交通顿时受阻，只能于早晚进行短暂飞行。此种情况，本年4月在河南作战时我已有所体验。但目前制空权竟已全被敌人掌握，对敌机的猖獗活动几乎束手无策，我方空路交通处境极为艰难。

第六方面军司令部设于汉口，为便于指挥桂、柳作战，决定将战斗指挥部设于湖南省南岳山中的迎宾馆内。从汉口到南岳的路线，应先乘飞机到衡阳，再由衡阳换乘汽车，如无制空顾虑，只需半日即可到达。可惜已失去制空权，此段行程竟需三天时间。飞行只在早晚短暂时间，陆路唯有利用黄昏，窘况由此可见。飞机亦非以前所乘运输机，而是六人（包括五名随从）分乘三架侦察机，并由六架战斗机护送，宛如出征，却也爽快。

我转调南京后，去汉口与广州方面，仍须于早晚短暂时间飞行。

与第二十三军的联络最为不便，直接南下飞往广州十分危险，因而一般须绕道台湾迂回前往。9月25日我由汉口出发，首次巡视第二十三军司令部，即是经由台湾前往的。

原来新编第六方面军远征占领桂林、柳州的目的之一，即因我空军无能为力，只得利用地面兵力以歼灭分散于江西、湖南、广西各省的美军机场。

完成此项歼灭任务后，我即转调总司令部，因绕道台湾前

往广州耗时过久，我曾试行先到南昌，然后于早晚较安全时间由南昌直飞广州，此次试验竟告成功。正当为此满意之际，继任第六方面军司令官的冈部大将亦沿此航线去广州，于清晨广州着陆时，遭敌机攻击而负伤。

七、“四十日雨”

在中国，一般华北雨量少，华中尤其腹地则多雨。据书载，四川、陕西有被称作“四十日雨”的连雨天。此次于湖南、广西作战中即饱受“四十日雨”的折磨，兵站部队异常艰苦。

10月7日我由汉口飞往湖南省南岳方面军战斗指挥所，因乘侦察机，只能携带一小公事皮包，其他盛放随身用具的小行李，在我离开汉口以前即已由陆路运走，直到11月16日才运抵南岳，耗费时日达52天。护送行李的上等兵黑川抵南岳时亦已疲惫不堪。

八、占领城市

11月10日，第十一军占领桂林，该军一部亦占领柳州。

占领桂林、柳州为第六方面军新编后的第一作战目标。大致计划由第十一军攻占桂林，由第二十三军攻占柳州。由于敌军将由柳州向西退却，故第十一军于占领桂林后，应即避开柳州通路而向西南挺进，以逼近其退路为有利。我虽下达如此命令，但第十一军却急于攻占柳州，致使逼近其退路的行动不够积极，违背了我的意图。此次作战经过，宫崎周一中将札记中已有评述，故此从略，但回顾过去战绩，仅就日军之迷恋攻占城市恶习再作一言。

举凡作战目标，不外能动的敌军与不动的土地（城市、山河的要地等），但在中国战场，城市目标最多，且对鼓舞士气最为适宜。攻取武汉时，曾有数千疟疾病号，而在占领武汉后方始发现，在此以前，病号从未接受诊断，一心只想去汉口，强忍病痛继续战斗。

以大部队进攻，绝不能全体进入城市，只能有一小部分部队占领城市，其他大部分要在城外地区行动，此理尽人皆知，但人人皆愿入城。我以第十一军司令官身分攻占汉口时，仅以两大队步兵占领汉口市区。然而，此乃依靠全军威力压倒敌之大军，方得占领汉口。

但是，城市总有其魅力，而且各条大道最终总要通向城市，尽管军队常有穿越远离城市的旷野进逼敌军的任务，却往往为城市所吸引。本年5月在河南作战中，原作战计划要点为首先使坦克兵团按兵不动，待敌军集中主力迎击我方猛攻时，再使坦克兵团突然插入敌阵，使敌陷于崩溃，并切断敌军退路以歼灭之。但坦克兵团勇猛突破敌阵，完全击溃敌军后，其先头部队竟为此间唯一城市（名城洛阳）所吸引，结果兵团大部进入洛阳，丧失了切断敌军退路的良机。

在中国战场上，各兵团有许多随军特派记者，他们用无线电发报机将战绩直接向国内报纸进行报道，大事宣扬“争先主动”之类的战果，此种情况亦可能为城市所吸引的原因之一。将自古以来日本武士“争先立功”的精神发挥于现代战场之上，可谓功过并存。

九、美空军的攻击目标

根据在汉口、湖南省南岳战斗指挥所以及在南京各时期的观察，我发觉美军空袭时专以我军军事设施为目标，而避免破坏中国建筑物。

我军行动于敌国之内，防谍工作不论如何严密，最高司令部的位置等重庆必能侦悉。尤其汉口、南京等地飞机于上空皆能一览无遗。湖南省几乎每日均有敌机空袭，但只攻击我运输部队，而设在省迎宾馆的方面军战斗指挥所则从未遭受攻击。由此看来，尽量避免损坏同盟国的设施，或为美国空军之一项方针。

1945年春，大本营断定美军将于中国东海岸登陆，因而命令准备迎战。我虽亦遵照命令努力准备，但内心却认为美军对践踏中国土地有所顾虑。关于此事，容后叙述。

十、未雨绸缪

在南岳战斗指挥所的感想

(1944年10月3日)

1937年7月中旬，我任第二师团长驻扎哈尔滨时，奉命率所属部队混成一旅团，经由热河、内蒙古向蒙疆方面进发。时值盛暑季节，但我估计此次作战势必延续至冬季，鉴于南满——北京——张家口补给线过长，即命出征官兵全部穿上冬装。篠原旅团长等大为吃惊，再三请求穿夏装，我坚决未准，并指出蒙疆地处高原，冬季早临，只靠路途遥远的唯一补给线，决难及时将冬装运到。结果年底回防时，寒气逼人，其他

兵团因穿夏装而狼狈不堪，唯我兵团官兵则深为庆幸。

此次由汉口来南岳时已是10月，湖南夏季虽长，但考虑到补给线条件恶劣，应即指示部队可穿冬装，但为时已晚，只得按原决定穿夏装出征。然而，由于“四十日雨”及敌机猖獗，补给线处境更加艰难，交通频频断绝，甚至先遣队亦耗时两月始勉强到达南岳。此时南岳峡谷，身穿夏装已觉寒风刺骨。

以上事例说明，计划未来行动必须周密考虑，宁可眼下忍受牺牲，亦应未雨绸缪。

十一、诏书

1944年11月24日蒙赐诏书

“朕委卿以中国派遣军统率之任。惟现下战局实关重大，望卿深察宇内大势，妥为筹划，益振军威，以副朕望。”

奉答如下

“蒙赐优渥敕语，拜受统率中国派遣军之大任，诚惶诚恐，不胜感激，愿粉身碎骨竭尽死力以奉圣旨。”

有生以来首次拜受对我的敕语，感激之至。重下决心，必将把握解决战局之转机，奉慰圣怀。

十二、进攻四川问题

自我就任总司令官直至停战的八个月期间，最重要事项有二，即进攻四川作战及开展对重庆工作。日记所载过于简单，随感录的作战部分又已烧毁，但战史室编纂主任官（长尾、森松）对于进攻四川作战问题的回顾，热心予以赞助，他们综合大本营有关文件及宫崎周一中将札记等，1964年数次向我

询问，我就记忆所及已做陈述，但因事关重大，愿就此再略述一二。

1944年12月初，莅任南京听取各部课长所作情况简报后，我首先想到，以前虽亦考虑过全军的情况，但就任总司令官后，考虑问题更须着眼于战争全局。南方军屡经苦战，前途堪虑。国内情况虽不甚详，但财政困难当属无疑。当前，南方军总兵力约75万，而我派遣军则拥有105万大军。战争重点虽在南方军方面，但就兵力而言，主力却在我这方面。以如此重兵仅能维持现状，心甚不安。如何报效祖国，如何支援陷入苦战的南方军，此乃就任总司令官后首先考虑的问题。

出击四川的构想即出于此种考虑。对于中国军队，早在任第十一军司令官时期，我即抱有坚定的必胜信念，此时看来，对重庆一击，必将有利于整个战局。在断定美军将在中国东海岸登陆的人看来，进攻四川有危险，且对解决战局并无裨益。但依我看来，此乃意外之幸事，如对美军登陆，有所牵制，就可减轻祖国负担，此种危险，正所欢迎。此种想法，当时虽未过分强调，却始终未能忘怀。1945年7月25日的日记最后有如下一节：

“……战争愈加激烈，默念战争前途，对我派遣军当无所虑。以我擅长苦战之派遣军，若将大部美军引至大陆，以减轻皇国本土之负担，实为快事。所虑者唯有帝国全局之未来。”

进攻四川作战的设想于12月15日提交参谋部，全体参谋同意制订草案，松井总参谋长、宫崎等三位主任参谋一行于1945年1月2日启程晋京，呈报大本营。参谋总长、陆军大臣对之基本同意，但僚属中间反对者甚众，只同意部分采纳。

1月11日松井总参谋长归来，详细报告请示结果。1月8日宫崎参谋的电报告知大本营的气氛，9日我在日记中写有“与大本营意见颇有分歧”。

分歧点在于：大本营判断美军在中国东海岸进行登陆作战可能性大，我则判断可能性小，并且认为倘来登陆，反为意外之幸事。如前所述，美机空袭虽极频繁，但其轰炸目标仅为我军细小设施，避免破坏其盟国的建筑及践踏其土地。因此，我认为假若美军登陆，将从东京湾（即北部湾——译注）一带我军未设防地点登陆，经过整備后再向我军来犯。

注：据战后得知：

1. 美军毫无在中国大陆登陆的意图。（据战史室调查资料）

2. 我军占领桂林、柳州迫近贵州省境时，重庆阵营内曾出现迁都西康省的议论。

总之，从派遣军本身来看，腹背受敌显系冒险，而我甘冒此险，断然进行大牵制作战，目的即在于减轻本土重负，但很少有人理解我的心意。

追记

曾于1944年10月31日到重庆出任驻华美军司令兼蒋介石参谋长的魏德迈上将，在1957年7月出版其名著《魏德迈报告书》之前，来函询问当时若干事项。在防卫厅战史室帮助下，我一一做了答复。为此，魏德迈将军将该书一册签名寄赠与我。

该书披露了美国在欧洲及亚洲的战略、政策，饶有兴味，在美国极为畅销。

1965年10月28日魏德迈上将来日，逗留期间与我再次晤谈，我二人意气相投。晤谈中与本节有关事项摘录如下：

一、在印度受美式装备训练的蒋介石嫡系军队有五个师，限于运输能力，至多只有两个师可调往重庆，故日方若进攻重庆，或能成功。对中国方面来说，可能为一重大打击。然而远比重庆更重要的要地是昆明。该地为物资集中、补给唯一枢纽，倘陷入敌手，即使顽强的中国军队也将举手投降。

二、对日军曾有总反攻计划，即夺回广东、香港。其要点如下：

(甲) 以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二十个师于1945年9月开始大反攻。(8月已展开南宁、桂林一线的作战，士气大振)

(乙) 日军如在广东采用“玉碎战”时，则不予强攻，将其包围，夺取汕头、厦门、福州等，为打开港口进行准备。

三、美军并无在中国东海岸进行登陆作战的计划。

十三、美军通讯技术精湛

美军在雷达和破译密码技术方面远比我军优良，对此，当时并未察觉，以后由两件事例中始有所体会。

我自任第十一军司令官时起，每当攻克重要据点或重要战役结束时，立即赶赴现地，向作战指挥官表示慰问。占领桂林、柳州后不久，正拟前往慰问时，不料转调南京，诸般要务缠身，以致未能成行。直到45年3月末才离开南京飞往桂林、柳州访问。因制空权业已丧失，乃采取分段飞行方法，当飞抵衡阳时，接桂林电称：“近两三天桂林上空每日早晚必有敌战斗机数架盘旋。总司令官来桂似被敌发觉，故应停止出巡”。

总参谋长也劝阻桂林之行，结果只得返回南京。

此外，如前所述，继我任第六方面军司令官的冈部大将，在经由我授意开辟的南昌——广州航线飞抵广州机场降落时，遭敌机袭击而负伤。

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元帅飞行中遭遇敌机袭击阵亡，似亦为密码被破译所致。在军事技术方面，敌人显然大占优势。

十四、对重庆和平工作

承陆相通知，小矶内阁将对重庆工作全权委之于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故派今井副长、川本副长（上海陆军部长）、延原参谋等为主任，首先开辟了对重庆无线电联络线。至此除我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时开辟的北京（殷同，后为汪时璟）—重庆（王大禎）联络线之外，又开辟三条无线电联络线，联络相当频繁，但是，双方意见完全对立，无所收获。所以如此，盖因1943年11月23日~26日，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上已确定战后对日处理方针，我方对此却毫无所知，以致始终采取相当强硬态度。实际上对方并不希望日本元气丧失殆尽后停战，而愿重新谋求中日合作。我方对此并不理解，致使双方主张不可调和。

例如，我方下最大决心提出的条件为，中国派遣军亦可撤至山海关（需时一年），而对方认为撤至山海关仍不满足，要求撤至釜山。如此条件在当时不屑一顾。但以后考虑，作为投降条件来讲，当然要撤至釜山。

再举一具体事例加以说明：

1945年2月2日，船津辰一郎先生（曾在外务省工作，后在中国各地服务，与中国人交游甚广，告退后充任上海纺织组合顾问，此时为上海市政府顾问。他与我关系密切）来访。据他说，居住上海的袁良为冈村带来蒋介石的口信，但因不便亲往南京，务请近日来沪。我于2月14日赴沪，偕同川本副长、延原参谋，并在船津先生陪同下与袁良晤谈。蒋介石的口信大意如下：

袁良的某联络人员最近由重庆归来，行前曾会见蒋介石，陈仪（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炮工学校、陆军大学，以日本通著称，与冈村关系亲密）也在场，让他转告冈村：

（一） 中国与美国不可分离，但我认为中日合作对大东亚至关重要。

（二） 因此拟于适当时机为日本讲话。拯救日本非我莫属。然日本人误解我的本意，实为憾事。

（三） 望互相尽力克制。

当时我认为此一口信相当可靠，但因我对开罗会议的决定毫无所知。加之长期身居战地，对正在衰落的国内情况亦不清楚，因而以蒋介石出言狂妄，竟未予理睬。蒋介石当时所讲确是真心话，但直到停战以后我才知道。

同年3月4日，何应钦派遣使者余万青来访南京，我命延原参谋与其会见，并转交我给何应钦的书信。此信内容我已忘记，但不外重申不能调和的主张。

1945年7月，今井总参谋副长深入河南敌阵进行谈判。该项工作详见今井武夫著《中国事变回忆录》的河南会谈部分，此处从略。

小矶内阁虽将重庆工作全权委之于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但阁员绪方竹虎等人却于东京直接进行所谓缪斌工作，其实缪斌与重庆有密切联系之说，纯属谎言，故我等未予利用，但是，驻上海某新闻记者却信以为真，并介绍于绪方等人。

战后审判汉奸时，对曾与重庆确有联系的周佛海判以无期徒刑，对王文成不予起诉，而对缪斌则与陈公博等人同样处以死刑。缪斌所谓的与重庆有联系，果是谎言。

十五、大连会议

1945年6月4日，梅津参谋总长、山田关东军总司令官与我三人于大连举行会议，其内容已记不清，但大致如伊藤正德著《帝国陆军的灭亡》终篇第四章10的记事所述。

原编者注：上述大连会议为梅津总长亲自传达天皇5月30日关于对苏全面开战的命令、指示的会议，亦即三巨头最后一次的时局恳谈。

十六、王牌军

中国派遣军的主力调至华中，其前线兵团中最精锐部队当属第一线第十一军的第三师团及第十三师团。重要战斗常以该两师团为骨干担任主攻，可谓名副其实的王牌军，其装备亦颇精良，其传统更为可嘉。我原为第十一军首任司令官，当时该军除第三、第十三两师团外，第六、第九、第十四、第二十一各师团亦皆精锐王牌军。但是，此次再度赴任汉口，即使第三、第十三师团亦再无钢筋铁骨之威，其他兵团的装备、战斗力等均较前明显降低。全军建制已感力不从心。

第二篇补遗

当时第六方面军参谋长 宫崎周一

前 言

冈村将军回忆录对 1944 年夏秋任第六方面军司令官时期的记录比较简单，当时，我跟随将军任参谋长，在短短的四个月中，使我受到很多教益。这里主要记述将军指挥作战、统帅思想、带兵之道等有关事项，以及我个人的回忆与感想。

本篇共分两章，第一章叙述出师前自己的处境与感想，以有助于回忆当时的一般形势。第二章为本篇札记的主要部分，是身为参谋长的回忆和感想。通过这一章的内容，将随处可以窥见冈村将军的统帅思想、领导方针、对中国军事力量的判断，及其超人的胆略等种种将帅天才。

本篇内容主要是当时日记的摘录。我的《阵中秘录》（1944 年 5 月～12 月）幸得保存下来，从中整理、归纳为二十一节。

第一章 出征前的处境与感想

一、陆大教育的重大转变

我作为瓜达尔卡纳尔岛（所罗门群岛首府所在地——译注）战斗的军参谋长由该岛撤退后，转任参谋本部第四部长，负责战略和战训（43年5月），但因病入军医学校医院疗养60天，未待痊愈便转任陆大干事。（43年8月）

在约一年期间，我相继随侍冈部直三郎大将、饭村穰中将、秦彦三郎（兼任参谋次长）中将、田中静一（兼任军事参议官）大将。

就任干事不久，便经历了教育方针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从传统的对北方作战转为海洋防御战。当时已把学员定额50名左右的三年课程改为二年制，随着战局紧迫，本年度又改为学员定额200名的一年短期教育。

二、战局前途堪忧

1944年年初以来，战局演变令人极为不安，当时的日记充满忧国之情。摘录其中一篇如下：

5月8日 读有关敌军登陆澳洲以北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战斗总结有感。多年来我军与中国军队交锋，每战必胜；我军在太平洋战争初期的南洋作战中，对战斗素质比蒋军尤差的

美英殖民地军采用奇袭,更战果辉煌。但1942年8月的瓜岛(即瓜达尔卡纳尔岛,下同——译注)之战,初次受到现代战争洗礼,其后到处历经苦战。据说,最近华北也遭到80余架美机的轰炸,颇受损失。对于缺乏对空作战训练的日军来说,但愿能从中汲取教训。

在缅甸方面,英帕尔、科希马(均位于印度东北部——译注)周围的战斗陷入胶着状态,敌正有计划地转入反攻,前途不容乐观。

总之,且不管局部战术如何,在选定全面的作战目标、研究作战所需时期、攻势结束对我军保存的兵力、尤其是后勤补给能力等方面,今后则都应充分考虑。否则,将有使敌人取得以逸待劳的优势之虞。

三、令人叹息的空军境况

5月7日和学生一起到空军司令部见习。发现迅速扩充空军带来的大量困难与缺陷,真令人担忧。

例如讲授通讯课时,八九十名学员蚂蚁般地密集在一部无线电通讯机前,而且采取三部、四部制教学。对四、五百名甲种干部候补生讲授航空战术的教官,据说不过只是一名少尉候补生出身的大尉。

一般说来,量的问题,在数字上所表现的好象还可以,但质的问题却被表面数字所掩盖。而且对待重重困难,只强调必须用精神力量来解决。这样,从质量和经验来看,对转到空军的军官,特别是高级人员,也不能抱多大希望。

由于长期进行大规模战争,已使财政明显地出现枯竭的

征兆。

四、缺乏基本教养的青年军官

5月10日 视察陆大初试考场（空军与东部军）。考生举止颇为散漫，不胜寒心。休息室内乱堆着军刀、帽子和携带用具，有的考生在考试时吸烟。这种情形，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对此，我提请监考官注意。

这些现象暴露了陆大后补学员缺乏修养。在战时体制下，中断了往年的军官团教育，以致出现身为军官竟缺乏基本教养的现象。睹此情景，深有所感。

鉴于以上情况，下午对全体学生训话，就带领军队的意义、军纪和礼仪、服务方面的教养等问题，提起注意。在战时体制下，干事也不得不担当起军官团长的职责。

五、预见与全局的统一

5月12日 虽说兵贵神速，但身居最高要职者处理问题时，预先洞察情况的演变，不失时机地确定方针、大计，使全局动作得以步调统一，要比闪电式地处理一个个问题更为重要。因为即便要求对一个个问题作出急剧的大的转变时，如果其他有关方面缺乏准备，那就会白白造成牺牲，也难以取得预期效果。

今天秦次长（兼任校长）视察东南方战场归来，在作战室作了战况报告。（中略）据随行的参谋本部某课长讲，东南方第一线在短短一周内，不得不按照参谋总长的指示四次变更统帅命令。现在中央的威信已大受损害。甚至在方面军以下

的各兵团长中间,也出现一种表面唯命是从,却不积极主动去完成任务,而只想以身殉职的风气。

在中央内部,总长和高级次长以下官员之间离心离德,有时甚至处于对立。据说与海军之间由来已久的阴影,也有出现于陆军内部的征兆,从而在同心同德、统一战斗力方面酿成严重问题。

听到这位参谋的尖锐评论,象我这样局外人也有所察觉。这种事态对国、对军都颇堪忧虑。常此以往,前途破灭已成定局。不知如何才能挽救!

六、最高领导人的地位与重责

6月6日……战争长期化将成不得已的趋势,……如因处于困境而丧失兼听的理智,以为只靠目前的闪电式处理和独断专行就能指挥大战,那就错了。伟大的领袖人物必须具备集思广益的品德。应该重新考虑个人能力的局限性。愿为国家前途祈祷。

7月5日 看到最近战局急转直下,深感忧虑。……前年夏季瓜岛作战开始以来,在掌握事态真象以确定尔后指挥作战的基本观念上曾有重大缺点,对此必须再予探讨。最近最高统帅部所犯的错误概括如下:

第一,未确定基本方针,对于最前线发生的一个个现象,只是采取一时冲动而且事后补救的措施。

第二,最高统帅好似亲自全神贯注于战场的局部战斗,为其一进一退而坐卧不宁。

第三,人事任用不当,专用附和己见小圈子里的人,左右

慑于威压而不敢陈述己见。传闻甚至将有才能的人远远置于海外前线,使其意见无法上达。

七、日、德前途暗淡

7月中下旬,敌人向小笠原群岛方面进袭,同时塞班岛(位于太平洋中西部,马里亚纳群岛首府所在地——译注)及缅甸方面的战局亦极令人担忧。阅读塞班岛司令官及师团长的最后报告,无比悲痛。

18日,发布命令梅津大将为参谋总长、杉山元帅为教育总监、山田大将为关东军总司令官。同日公布塞班岛陆海军官兵全部壮烈战死。

难熬的多难之秋。20日晨广播报道,18日东条内阁总辞职,继而组成以小矶陆军大将和米内海军大将为首的合作内阁。预料中的事态终于到来。

21日晨,敌军于关岛登陆,我守军十二大队、日侨五百人无疑全体罹难。这种惨剧必将在各岛屿上相继发生,对此必须作好精神准备。

27日读到新几内亚“猛”司令官安达中将充满悲壮决死意志的训示电文。电报为18日发出,27日才收到。从这一点也可想见其处境的困难。

在德国方面,20日希特勒在东部前线被陆、空军内部安置的炸弹炸伤,左右有十余名分别遭受轻、重伤。听说参谋总长、空军司令被撤换。

盟邦的前途真可谓危如累卵。

我帝国情况与德、意不同。在日本臣民之中,无人想要效

法独裁者的英雄言行。这里是言必及忠诚，事事强调统帅的绝对权威，只要稍有步德、意后尘的动机，即应坚决予以排斥。

第二章 方面军参谋长时代的回忆与感想

一、再赴难忘的汉口

8月18日夜，正要出发指挥学员进行登陆攻防演习，接东京电召立即返京。在参谋本部得知我已转任第六方面军参谋长。前年秋季正当我研究“北方作战”时，被派往南太平洋的所罗门群岛，这次正进行登陆作战演习时，又被派往大陆接任。且不说个人的境遇如何，由此可见国家、军队所面临的命运在急剧变化中。

8月25日 宣布了新编第六方面军的战斗序列：方面军司令官为冈村宁次，其华北方面军司令官职务由冈部大将继任。同日亦宣布我为第六方面军参谋长。六年前我任作战主任在汉口蒙冈村将军知遇，这次又在将军麾下任参谋长，感慨之余，也认识到责任的重大。

二、当前作战的特点

1. 到达任所

8月31日 穿过晴朗的天空飞向大陆。海上风平浪静却看不到航行船只，有些凄凉。从长江北方进入大陆。昔日的战场如今山野浓绿，耕地齐整，有说不出的亲切感觉。由南京

西进合肥、六安、大别山，下午6时飞抵汉口机场。翌日上午在雄伟的汉口军司令部拜会了总司令官畑俊六元帅（5月将战斗指挥所推进到汉口）、参谋长松井太久郎中将、“吕武”（第三十四军代号，司令官佐野忠义中将是前几年在瓜岛的老相识）、“隼”（空军代号，司令官为下山琢磨中将，参谋长是我同期密友中西少将）和海军根据地部队。

下午听取天野正一少将（由总军司令部作战课调来的方面军参谋副长，当年武汉作战值得信赖的中佐参谋）介绍过去作战情况及今后战况设想，感到前途不容乐观。

2. 新任务的困难

当时方面军所属有以下三个军：

第三十四军负责警备汉口周围和担当补给基地。

第十一军，武汉作战后被认为最精锐的一个军（首任军司令官即冈村将军），今年夏初以来，南进击溃优势之敌，盛夏时期经艰苦奋战，攻克湖南省要冲衡阳，目前其最前线已进入全县（广西省东北角），正准备向桂林、柳州进发。

第二十三军亦正准备远自南方的广东附近向柳州方面进发。

8月31日 对方面军所面临的战斗，有如下感想：为了掌握此次的作战情势及特点，还需深思熟虑，觉得今后执行作战任务有很多困难。尤其是将来面临长期艰苦战斗，第一线部队尚未得到充分休整和补给，现已连续进击达二百里，减员仍迟迟未得补充。对各部队所保存的战斗能力，不能不令人担心。

一般情况下需要量力而为。统帅节制不当，就可能白白把军队置于死地。只热衷于攻城一地的作战方针，不可能完

成长期远征的大业。

9月2日 在总司令部召开会议，研究第二期作战（攻占桂、柳）的后勤补给问题。由于敌机掌握了制空权，一切行动大受限制。身临其境，痛感事态艰难。不过事前已有充分认识，只要采取相应对策，不致有多大失误。期望得到可以信赖的天野副长大力协助。研究一直到夜11时。

9月3日 昨天宣布任命武田功大佐为方面军作战课长，并本熊男大佐为第十一军作战课长。至此，参谋部门的人事已大致齐备，纳入轨道。

三、冈村司令官的训示

1. 攻占武汉时的参谋任参谋长

9月4日 冈村将军9时40分在机场着陆，就任新职。见到将军精力充沛的神态，深感喜悦。

中午，“统”（第六方面军代号——译注）司令部全体军官谒见，我代表大家致词：“愿在大将阁下威德与武运下，竭尽微力，为国效命。”迎接司令官的仪式上，全体意志轩昂，一切充满信心。

回想起来，六年前攻占武汉时的方面军参谋长是吉本中将（20期，后晋升大将），参谋副长为沼田少将（后晋升中将），均系俊秀良材，其后才能数到我宫崎。这次冈村将军竟不得不让我这样相当于孙辈的年轻参谋长来作他的助手了。中国事变的长期性，由此可以想见。

9月5日 由总军幕僚向冈村将军介绍近来的战况。

将军昨晚和今晚在偕行社享受垂钓之乐。从容不迫的精

神，实可仰赖。

2. 铭感至深的司令官训示

9月10日零时，方面军司令部编制就绪。这是军官、高级文官共132人的大家庭。应该把他们统一组织在司令官的周围，同心协力，开展工作。

当天司令官做了训示，并阐述了统帅思想。

训示中印象最深的有以下各项：

(一) 坦率表明此次奉命就任方面军司令官的感想。

将军讲：“我已连续出征八次，三年前即为全军最早被任命的方面军司令官，现在再次受命领导方面军，看来意义颇为深远。”“参谋长宫崎少将是武汉作战时的作战课长，参谋副长天野少将是当时的作战参谋。以这两位来与我配合，也有深远意义。坦率说来，我想这是中央难得的人事安排。”并说：“对于隶属指挥下的兵团长、部队长，应竭尽诚意和情谊。”将军还举出在武昌的已故井上少将（后方课长）多方关照部下的事例，备加赞扬。

总之，身为将领对其部下推心置腹，满腔热情。众人无不铭感。

古语云：“威而不暴”。实际上，这样的将军甚为罕见，一般是有威则暴，无暴也无威。但冈村将军则可谓“威而不暴”的稀世之才。

(二) 关于“统帅思想”的训示

接着将军对参谋长以下的参谋和各部长（军需、军械、军医、兽医、法务、政务）阐述了司令官的“统帅思想”（将军用语）九点。要旨如下：

(1) 军司令官与幕僚的关系：司令官要抓大纲和前线指挥，并信赖参谋长。

(2) 统帅作风要端正，振作军纪要彻底。

(3) 对华作战指导方针：大胆果敢，确信必胜。

(4) 关于敌军的素质和实力：嫡、旁系军和美式装备师、胡宗南军共三十个师。

(5) 对上级司令部（注：指畑元帅的派遣军总司令部和大本营）的态度：不妄求增援，不乱提意见，主张默默执行。（注：这里所谓的提意见是指申述反对的意见）

(6) 彻底节省、爱护军械、物资。

(7) 掌握民心：贯彻“反美爱民”方针，最初的行动至为重要。以姑娘们的态度——恐惧还是亲近，做为衡量民心的标志。

(8) 赏罚严明：不得因处于作战期间而忽视赏罚，不得因战功而赦免应罚之罪。

(9) 对管辖指挥下的协同部队，特别是飞行队，应融洽亲切。

对我来说，以上各项主旨，正是武汉作战时将军所经常具体教导的，因而听来感慨万分。

冈村将军以其手写的讲稿，谆谆教诲，我和天野副长面对司令官并列最前排，肃立敬听。

四、申请在方面军后方增派一个军司令部

如前所述，由于第十一军长驱直入，其后方的警备和兵站的推进逐渐困难。这项业务从来是由总司令部直接处理，但

考虑到第十一军不久将向桂、柳附近以西进击，随后又将准备预计的第三期作战（打通粤汉线作战），所以最好在衡阳附近插入一个军司令部。这个问题便再次被提出研究。

9月11日 大本营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一行视察衡阳方面后归来。作为幕僚联络情况说：“增派一个军司令部管辖衡阳以北后方地区的申请（已由总军司令部提出申请），难以实现，希予谅解。”我立即请求再做认真考虑。并且根据情况的发展进行分析说：“对完成此次作战，目前无所顾虑。只是对本年底以后的情况演变就不敢肯定了。”

（注：在后方地区增派一个军司令部的申请于10月初实现，隶属关东军的一个军司令部调归方面军管辖。）

五、汉口的方面军司令部

方面军司令部是在前日军兵营旧址（武汉作战时我军进入汉口前被炸毁）建起的宏伟的二层建筑，院内有司令官和参谋长的官舍。冈村将军到任时，畑总司令官即迁至郊外民房，让出了司令官官邸。

9月11日 本日我亦从借住的偕行社迁入总司令官邸正门旁的小屋（大约为副官或管理人员所用）。靠近后门，每天早晨出入乘马去郊外很方便。

作为野战用，司令官邸这样的规模有些过分讲究。这种作风怎能不使中国事变迁延下来，并招致大东亚战局的逆转！？司令官的对面，另有一栋参谋长用房，但我未予一顾。按规定派给专用警卫宪兵士官，我也予以拒绝。我曾告戒自己，既在前线，就要遵行军人守则第五条的意旨，时刻不忘第一线

官兵的疾苦。

六、与“旭”(第十一军)司令部之间的联络

1. 由汉口前往衡阳郊外的“旭”司令部

9月15日 我为与“旭”司令部联络，拂晓便由汉口启程，以便利用黎明时间飞往白螺磯(岳阳西北长江西岸，武汉作战时修建的机场)。安崎(后勤)、中村(作战)、东(情报)等参谋随行。白昼过后，趁薄暮再次出发，1小时20分钟后飞抵衡阳机场。三、四个月来，这里曾是美军强大空军活跃基地，湘江对岸的衡阳市区亦是激战的战场。白天在“隼”前线联络所与“隼”参谋副长兼统集团司令部参谋堀场大佐联络，傍晚渡过宽约三百米的湘江，横穿化为废墟的衡阳市区北部激战遗迹，前往胜木塘的“旭”联络所。在该处乘马于田间小道行约6公里，午夜2时30分到达军司令部所在地——下牌冲民宅。

2. 与横山军司令官问答

16日上午问候横山军司令官，听取参谋长中山少将介绍一般情况。

这时我向军司令官传达了如下事项：

(一) 冈村方面军司令官的统帅、领导方针。

为了完成方面军的任务，要协调第十一军与第二十三军的关系，特别对新参加这次作战的第二十三军应给以亲切关怀。

方面军要承担第十一军后方地区的警备、兵站任务，使第十一军无后顾之忧，专心于前方对敌作战。

(二) 关于敌军地面兵力，问题不大。重要的是随着美

空军力量的增强，及于我后方交通的威胁，故应确保后方补给，以适应持久作战的需要。

（三） 预定方面军直辖区的范围，方面军战斗指挥所的预定位置和推进时机等。

接着，横山司令官陈述所见，我亦相应对答，大意如下：

（一） 横山：“总司令部从来就有制止我军向前推进的倾向，从国内或全局形势来讲，其幕后是否有些内在原因？”

宫崎：“有关这样的原因，一无所知，望勿担心。相信方面军司令官是立足于真诚的统帅立场，一心为了完成任务。”

（二） 横山：“以前耳闻许多谣传，我自己亦曾吃过苦头。因此，除直属上级司令部的命令外，亦不得不多一层考虑。例如：7月参谋次长来访时，曾透露参谋总长的意向，希望攻占遂州、赣州（注：分别在衡阳东南二百、二百五十公里）的美空军基地。）

宫崎：“如前所述，鉴于强调统帅的纯正，乃冈村将军的方针，相信今后一切无庸担心。”

（三） 横山：“我认为把军指挥所推进到靠近第一线来指挥战斗最为适宜。第一线兵团的士气亦至关重要。”

宫崎：“完全可以理解。至于方面军不仅不会妨碍贵军的意图，而且将努力促其实现，请放心。”

（四） 横山：“关于桂、柳的作战目标，一向从未给以明确意志的表示。一会说本军只以桂林为目标，一会又说连同柳州也一举攻下，或者说‘波’集团（第二十三军）不攻击柳州，实际究竟如何部署？”

宫崎：“这一点理应清楚。方面军以桂、柳为目标。届时，

统帅方面将向两军指示各自的目标，方面军将负责对两军的协调进行策应。”

（五）横山：“本军一举进攻到全县附近，这是否符合上级的意图？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宫崎：“我认为这属于军司令官针对情况进行指挥的问题，不存在可否问题。这虽属统集团司令部（指冈村司令部——译注）行使职权以前的问题，但估计当时的总司令部鉴于今后作战形势，或许认为保持充分军力、备有机动力量，对日后的进攻更为适宜，故有此考虑，而完全没有约束第十一军积极性的意图。总之，今后也不会发生使军司令官产生怀疑的情形，希予谅解。”

这次访问“旭”司令部给我的感想，虽然难以明确表达出来，但令人担心的是军司令官和参谋长、参谋之间，缺乏思想的一致和意志的统一，往往听信一些谣传和异议，而不明了统帅的本意。

特别是和中山参谋长悬谈时，对以前总司令部的安排有不满的话，对此我极力作了纠正。

总之，这的确是一次令人不快的初次会面，“统帅之道在于人格”，由此体会益深。这种不快是从来未曾有过的事。

七、武昌军仓库被炸

9月23日 昨22日夜，敌机空袭汉口、武昌地区。武昌中央弹药库中弹引起剧烈爆炸，持续数小时，损失重大。弹药损失占武汉储备量八千吨的20%，损失汽油15%。总之，这就暴露了在敌人夺走制空权的今天，我军依然象数年前那样

高枕无忧，沉溺于非野战的旧习，暴露了防空警备的缺陷。武昌军仓库的疏散工作和防空设施，一直是在汉口总军司令部的领导下，由“吕武”（第三十四军）具体负责。新到任的我站在监督指导“吕武”的立场上。考虑到为了汲取这次教训，尽速改变现状，乃严令“吕武”参谋长镗木大佐等参谋必须确保积存军需品的安全。事后，总军参谋长和“吕武”参谋长因这次失职受到行政处分。

八、方面军参谋长对各部参谋的要求

司令部建立伊始，在与所属各部之间的紧密联系和集中统一方面极易产生漏洞。故应注意及时纠正这种缺陷。

9月23日 鉴于日前访问“旭”司令部和昨夜武昌军仓库被炸事件，对参谋等在执行司令部业务方面提出如下要求：

(1) 幕僚应遵循司令官的方针——统帅思想“五训”作到同心同德。对尚未确定之事，不得向外滥发议论。

(2) 根据司令官要“抓大纲”的精神，我作为参谋长，决心努力加强统辖和彻底执行。期待天野参谋副长，重视“司令部勤务令”明文规定的“辅佐参谋长”的任务，要求不仅搞好后勤业务，亦应关注全面作战。希望各参谋在执行业务上亦要体察此项要求。

(3) 参谋应熟悉本作战情况，独立思考，不断研究，实行边教导边作战的主旨。

对于管辖下的部队长、幕僚，在军纪、诚挚态度等方面，要以身作则，决不可给人以妄自尊大、盛气凌人的印象。

(4) 方面军所处地位在于协调第十一军和第二十三军的

关系,并期望两军都发挥其积极主动精神。

第十一军漫长后方地区的警备和补给线由方面军负责。方面军司令部一方面统帅所属各军,另一方面要以军司令部的资格周密地直接指导具体工作。

感想:最近的实际情况是:青年参谋未经特殊训练,便不得不使之承担重要业务,因而产生不领会统帅领导的意图,而轻率处理业务的弊端。而且作为高等司令部的幕僚,有的行文手笔拙劣,措词生硬。

九、冈村将军访问第二十三军司令部

9月25日 清晨方面军司令官由汉口机场启程,前往南方的“波”集团访问,天野副长和高桥参谋随行。冈村将军临行前说:“据来自东京的消息,参谋本部第二部及陆军省有关部门对这次作战的成败惶惶不安。为避免重蹈所谓英帕尔的复辙,对确保后方补给,望更加慎重。”

听说总军参谋长为联系作战要务奉命进京。正在准备进行“捷号”作战(计划对菲律宾方面展开空、海决战,作为防敌再次来犯之对策)之际,难保我方面的作战不受影响。需要注意。

十、第十一军后方归方面军直辖

9月25日发布命令:自10月1日零时起,湖南省北部地区归方面军直辖。随后就此做了说明,并发出注意事项。

9月26日 近日天气晴朗,最高气温36.4℃,感到炎热。下午参谋及部长等进行汇报,我说明下述事项:

(一) 关于命令的要点和实施

(1) 这次命令中的甲、丙两项是以司令官的一贯方针为根据的。(甲)提出作战警备大纲，(丙)主要具体指示后勤工作。

(2) 各部队长要按照本命令(甲、丙)和另发的军政指导纲要，参照警备地区和各部队的实际情况，制订自己的计划，部署军队，进行工作。为了彻底实现上述要点，求得顺利实施，还需依靠各位幕僚的努力。

(3) 各兵团部队必须充分理解现地自给和获取军需物资的意义。即各部队不仅要自己依靠当地生活，更需完成建立补给基地的任务，以解决长期进攻作战所需的全员口粮。这是本作战成败的关键。

获取军需物资是完成我国战争的紧要问题，这也是作战的一环，不得轻视。具体实施主要靠军政部筹划，但军部亦应在警卫、运输方面给予积极协助。

(4) 确立“击美爱民”的军纪，是执行上述作战任务的必要条件。因为收集稻谷和物资，若无当地人民协助，不可能取得理想成果。从这一意义讲，望利用一切机会努力贯彻方面军司令官的“五训”。

(二) 说明进行工作的心得

(1) 对于统帅的本义，必须具有严谨、彻底的认识。往往看到对如下问题态度不够认真的事例：例如不通过命令调动军队，即使一兵一卒也必须避免。又如不能忘记命令不只要明确指示任务，并且要监督检查其执行情况直到任务完成。

(2) 幕僚和各部长等拟定各种计划时，要斟酌接受命令的执行人的经验能力，必要时亦需详细指示执行方法。例如需

要具体指示遭受轰炸时的对策，物资要妥善包装、运输途中防止失盗等。

(3) 拟定计划者要能预见情况的变化，不失时机地作好准备。受到下属部队的催促，或由于本身疏忽而受到指责，不仅是个人的耻辱，亦有损司令官的威信。丧失威信的司令部与木偶无异。

(4) 努力作到通讯联络迅速、准确。为此，应认真遵守“服务规则”，注意勿因疏忽（即便是出于无意）影响紧急通讯、收报。文件和电文经参谋长阅后，要注意上面的批注。

十一、忙中偷闲之乐趣

10月1日于汉口读神田正雄著《湖南省要览》作为军事地志资料，颇有趣味。其中人名、地名，尤感亲切，摘录如下：

(1) 湖南之人物

周朝 屈原 以著有《离骚》而出名，瘦躯美髯，风采朗秀，好奇服高冠，一日三洗其纓。追记。纪元前约300年战国时人。性格刚直，传说因悲愤祖国楚受秦侵略，投汨罗江而死。

宋朝 周茂叔、米芾

明朝 李东阳、刘大家

清朝 曾国藩、胡林翼、唐才常

民国 黄兴、蔡锷、谭延闿、何键

(补记：中共毛泽东据说是湖南湘潭人)。

(2) 湖南人之性格

自尊心强，排外思想旺盛，富于尚武风气，信仰释、

道，笃于崇拜祖先，淡于金钱，反抗心理强，迷信思想深，有嫉妒、排挤风气，多慷慨悲歌之情。

(3) 少数民族情况：有红苗、黑苗、苗寨、瑶族等少数落后民族。

10月14日 于南岳战斗司令部油灯下，读《我国国土与民族》的日文译本。

曾国藩的训教。奖励养鱼养猪、种菜种竹。

“子女习于奢侈的士宦之家，保持昌荣者及一、二代。勤勉朴素的商家三、四代。耕地读书、简朴慎行之家五、六代。孝悌、友情之家八至十代，繁荣不衰。

简朴的田园生活，家族近邻笃于温情，乃人生之幸福。对于欢乐之道应留心选择，如避祸然。爱好淡泊之幸福向属东洋之美风。”

中国民族性格有以下一些特点：即朴素、稳健、爱自然、忍耐、节俭、勤奋、喜家庭生活、爱和平、多生子女、知足、诙谐、保守、耽于肉欲……。

(补记：解放后的中国，对上述优点正在发扬，对于旧习弊端也正在纠正，并致力于发展成为伟大的民族，可否应作如是观呢?)

十二、由汉口前往南岳战斗指挥所

1. 批准桂、柳作战计划和开赴前线

10月7日 请司令官审批作战计划。结果，全部批准，特别对于以柳州附近的两个军(第十一军和第二十三军)进行围歼的设想，沿黔桂(贵阳—桂林)铁路深入，并撤离该铁路

线,以及明确命令第二十三军攻占柳州某计划表示满意。

出征前拜见了畑总司令官,感谢对本方面军建制以来给予的关照,陈述了对作战前途的展望,请释悬念。此时元帅兴致颇佳,除祝愿成功外,并说:“今天大本营决定放弃北缅利多公路(今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境内一译注),预料敌人将由昆明方面来犯,故中央部希望‘统’(第六方面军)勿陷英帕尔战之复辙,对此,望多考虑。”

下午出发前仓促看望了“吕武”“隼”司令官。4时30分,畑总司令官率众在司令部正门前送别。机场上有“吕武”“隼”司令官、唐川总参谋副长送行。

一行分乘三架侦察机,于四、五百米高空飞行,日落时于湘潭机场着陆,在机场大队长指挥所过夜,当地负责警备的混成旅团长森村经太郎少将汇报了情况。

2. 防空壕内冈村、横山二将军会见

10月8日 低云细雨,能见度五百米,影响了预定在7时的飞行,准备好护航的六架战斗机只好作罢。8时乘侦察机飞往衡阳。沿湘江以一百米高度飞行,8时40分在衡阳机场着陆。

在机场一角美国空军遗留下的窑洞式防空壕内,与“旭”司令官举行例会。首先传达训示,冈村将军表示以前未得机会亲访“旭”司令部,对此深感遗憾。

横山中将汇报情况后,作战主任井本参谋说明“旭作战计划”。出乎意外,冈村将军在听取说明快结束时突然插言道:“对前段(攻占桂林)无异议,但不同意攻占柳州的部署。”然后阐述了方面军的作战计划大纲,明确指示“望予修改”。

冈村大将的统帅风度和对目前批准要点掌握之准确，实在令人钦佩。发生这种事态是我等司令部幕僚的疏忽所致，对两位将军实感抱歉。总之，方面军作战计划大纲，特别是以“第二十三军担任攻占柳州”这一点，尽管已一再向第十一军司令部作了传达，但仍不彻底，并且发现方面军作战计划文件的传递有所延误。这是幕僚的失职。不久，井本参谋提出了按冈村将军要求的修改计划。

3. 前线师团实况一瞥

10月9日 8日晚乘渡船过湘江，告别“旭”司令官一行，到衡阳南方二公里的第六十八师团（堤中将）司令部停留一夜。途中道路泥泞，一片漆黑。

次日晨，堤部队职员谒见，接着，师团长汇报情况如下：

军官缺额40%强，准士官以下缺额约30%。预定月底到达军官95名（其中干部候补生出身的55名，其余为现地征集）及低级军官、士兵二千余名。由此可见各部队战斗力的低下情况。而且师团目前担负着衡山、衡阳、茶陵南方广大地区的警备。前者，在衡阳作战中俘获的方先觉军参谋长及师长各一名在看守中逃跑。听到这些报告，使我这辱蒙重用的年轻的方面军参谋不胜惶恐。

下午司令官抽暇垂钓，等到薄暮出发，载重汽车颠簸于泥泞坎坷的道路中，到达南岳战斗指挥所已午夜11时，在黑暗笼罩的山麓，顿觉寒气逼人。

十三、南岳战斗指挥所

1. 司令指挥所的环境

在衡阳北方 30 公里的衡山(亦称南岳) 据称系中国五岳之一,共有七十二峰。附近古刹星罗棋布。

10月10日 作为战斗指挥所的建筑物,系在衡山靠东一个山峰的麓谷间的教会学校校舍。在倚山而上的二百余级的石阶上,筑有宏伟的迎宾馆,附设很深的混凝土防空壕。估计系为驻守衡阳的美军军官之用所新建。如今此处预定作为军司令官和参谋长宿舍。

六十一岁的冈村将军,意气旺盛,胜过年青人,但因被安置在要上下石阶和无人的后院里,稍有不悦之色。参谋们已住进石阶旁窄小校舍的办公室里。负责安排营房的年轻参谋可能认为让大将住在这座宏伟的宾馆最为合适,其实对于野战将军来说,这样安排是欠妥的。一天早晨,将军从窗口俯视,指着对面的民房,说想要搬到那里,第二天果然搬去了。

2. 司令官的日常活动

10月13日 司令官早餐后片刻,下山钓鱼。听说曾有特大的鲤鱼挣断钩弦逃走了,其后便采用特殊装置,几乎每天都有所获。

司令指挥所的楼上,设有司令官室,但将军很少在那里。白天乐于垂钓,遇有要事,参谋们要在午餐时或傍晚去宿舍谒见。以前,将军在北京虽然过着豪华生活,而此时此地则过着没有灯火、和衣而眠的野战生活,但将军的心情还是愉快的。

看来司令官好象很安闲自在,但阅读文件和电报极为认真,有时使我很难应答。他读的、听的、看的未必很多,而理解、洞察、掌握实情的能力则决非一般人所能及。记忆力也特别强,处处都表明他具备大将的天资,令人叹服。特别是在激

战情况下,有时诙谐,有时稚气,有时当面率直陈言,亦无不快。对部下从长远考虑,发扬所长,如果不能胜任,也绝不摒弃,依然给以出路,这些很值得学习。

3. 参谋长的辅佐之道

冈村大将到任训示中曾说:“司令官要抓大纲,要信任参谋长。”因此,我的责任感一刻也未放松。我经常追随将军,从只言片语中推断意图,并随时提出我的看法,尽力探索他的意向。

10月11日 晚餐时,我提出自己的意见时,了解到司令官亦有同感,就增强了信心。我的意见如下:

(1) 关于此次战斗,象东京那样忧虑(注:指重蹈英帕尔作战覆辙)的谣言曾屡有所闻,但我决心以事实让他们放心。

(2) 观察未来情况,有必要在这次作战后尽速进攻韩中、凉山,以使成都进入我战斗机威力圈内。另一方面,同时占领常德,控制重庆粮道。为此命三十四军承担这项任务。即把隶属第三十四军的三个混成旅团改成师团编制,所需装备依靠缴获武器及其他方法自筹。

4. 天野参谋副长的协助

天野副长辅佐我处理一般作战事项,同时负责管理后勤补给工作,并积极收集前方情报等,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我的不足。一向寡默、稳健、实干的天野少将见识卓越,信念坚定,的确是一位可信赖的同僚。现从日记摘录事例如下:

(1) 现场指导后勤工作

10月19日 小雨,傍晚天野副长一行到达指挥所,他们乘马沿岳州—长沙—易俗河—南岳的泥泞公路行进,历时两周。

沿途到处进行现场指导，尽力推进兵站并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相应措施。

副长视察结果，认为主要问题是：对基层传达命令，存在中断或延误现象；后方要地的各部队、机关缺乏统一指挥。因此今后有必要及时向各要地派遣参谋，掌握实际情况，加强现场指导。

(2) 搜集桂林、柳州方面情报

11月17日 与“波”集团的通讯不畅，为调整柳州附近的“旭、波作战”，决定向柳州方面派遣得力的情报所。天野副长、片山、东参谋一行由衡阳机场启程，先飞向桂林，盼望中途无敌机袭击。

19日 据来电，天野副长一行18日中午到达桂林“旭”司令部。来电报告，先前要求“旭”派参谋与“波”联络，建立柳州“统·旭”情报所一事，以及迅速由“波”先遣联络参谋一事，已分别及时处理妥当。

22日 天野副长一行进展极为顺利，21日下午抵达柳州。与各方面特别与“波”取得联络。与“旭”及“波”联络的结果，对今后行动意见各有疑问，就此，天野副长所采取的措施我完全同意。“旭”担心将来兵力不足，问这意见究系出自何人，并说对此意见绝不同意，即使是冈村司令官的意见也是如此。司令官说：“如敌方获得增援，北缅方面我军处境即可缓和。敌人反攻来犯，正是一举歼灭的绝好机会。”

29日 天野副长一行日没归来。往返十四天，非常辛苦。（注：天野副长返回前，发布了冈村将军转任派遣军总司令官的命令。）

十四、赴南方“波”司令部联络

1. 联络的目的

冈村司令官(天野副长随行)虽在9月下旬对“波”集团进行初次巡视访问,但眼下方面军作战计划业已制定,“波”集团也正开赴前线,因而认为有必要就攻占柳州有关的加强“旭”“波”协作,以及结束战斗和以后的行动问题进行一次周密的联络。下面是根据日记回忆此行概况:

10月19日 商定有关我赴“波”集团联络的重要事项。联络重要文件大致由武器课长准备,对有关要点,我和天野副长的见解完全一致。田村参谋携带重要文件随行。

这次联络有必要尽速实施,尽速返任,故这天傍晚先乘载重汽车去易俗河(湘江渡口)。预定路线是南岳—汉口—南京—台北—广东。从广东到目的地路程由当地驻军安排。启程前,向司令官报告了与对方联络的事项要点。主要内容是作战兵力、发动进攻的时机、战斗告一段落后的兵团配置和任务;第三期作战(打通衡阳与广东之间的粤汉路)的时机、兵力、方法;加强广东沿海的正面防御;改编香港总督府问题(总督由军司令官兼任)等。

此时,司令官对于“构成大陆要塞”的设想发表了意见。我想改日由广东返任后再认真研究,以实现这一绝好设想。

2. 连雨泥泞和易俗河一带的窘境

南岳—易俗河公路,被敌军在退却时有计划地进行了破坏,加以连日降雨,道路泥泞难行,开往前线的兵站汽车运输队勉强行进。85公里路程耗费16小时,并时常下车帮助推

车。真担心前线的补给中断。

10月20日 下午到达易俗河，河畔的卫兵、渡船工兵等浑身泥土，面色苍白，看他们大口吃着路边摊贩不干净油炸素丸子的情景，感到又可怜又于心不安。

在易俗河渡口，发现坦克第十七联队的两个中队正在待命渡河。我一直认为把坦克联队全部集结在长沙附近待命最为适当，而这两个中队据说却根据“旭”的命令正在向祁阳（衡阳西南一百公里）进发途中。因而立即使之停止前进。否则，也可能因道路被破坏陷于进退两难之中。

21日由湘潭机场给天野副长打电报，让他采取三项措施：（1）修补易俗河—衡阳公路；（2）制止坦克联队向长沙以南前进；（3）临时在易俗河设常驻参谋，负责管制交通。掌握现场情况并及时予以适当处理。本来是幕僚的重要职责，但因忙于所担负的一般事务，往往容易顾此失彼。

眺望湘潭机场、易俗河一带风物，看到当地居民逐渐归来，向日本兵出售食品，儿童也接近日本兵等情况，看来可以期待获得日常生活物资。

下午冒着细雨离开湘潭，乘侦察机飞往汉口，黄昏时刻到达。在司令部宿舍与井上、东参谋及总军的宫崎参谋取得联系。

3. 在汉口听到敌军袭击菲律宾的报告

10月22日 昨晚连续降雨，据说汉口已有十多天未见太阳。

据报，美军对菲律宾，特别是对莱特岛（位于菲律宾中部的米沙鄢群岛中——译注）发动大规模登陆作战，并对各方面

大举进行空袭。又听说在台湾海面的空战中，敌方损失惨重的消息，闻之而喜，偶或对我方前途亦觉放心。但愿上天保佑我军，能在菲律宾方面获得辉煌战果。（注：日后得知，这次大本营发表的通报是严重的情报失误和判断错误。）

4. 经上海、嘉义赴广东

10月23日 9时30分乘侦察机飞越大别山北部上空，11时30分抵达上海。加油后经台北上空，于下午4时在嘉义机场着陆。途中看到正在构筑的西海岸机场及各处阵地。据说12、13日嘉义遭受空袭，飞机库和十六架飞机被焚毁。

夜晚投宿于车站前的青柳旅馆，室内陈设遗留着战前的繁荣景象，而膳食却很简单，贫困状况可见一斑。24日晨嘉义浓雾，据报汕头低云，香港天气恶劣，广东阴。9时20分在雾中起飞，经澎湖岛、汕头、香港上空，于11时40分抵达广东天河机场。山津参谋、吉野少将、松井少将前来迎接。

在“波”集团留守司令部交换了各种情报，并指示山津参谋：“鉴于目前情况，广东方面应按照以战为主的观点处理一切，司令部本身要做出示范。”

稍事休息后，商讨飞往现已开赴前线的“波”集团战斗指挥所的步骤。结果商定傍晚再次起飞，在梧州（广东西方200公里）附近的临时跑道中途暂停，于翌日天明前飞向丹竹（梧州西方100公里）机场。采取这样步骤是为了躲避敌方雷达，免遭敌机袭击。

据说平整美空军撤退时破坏的丹竹机场的工作，两三天前大致完成，但昨天首次着陆的飞机却发生折断轮架事故，因而这次选派了优秀的准尉驾驶员。

我决定让随行参谋留在广东，自带重要文件前往。

5. 采用蛙跳式飞行前往丹竹

10月24日 下午6时30分，怀着预料要冒险的心情，从天河机场起飞，熟悉地形、经验老练的小林准尉驾驶员驾驶歼击机沿西江向西飞行。在化为废墟的梧州对岸着陆时，正是薄暮时分。与三、四名卫兵一起在看守小屋住了一夜。

25日天还没亮，飞机在狭长草原尽头，由手拿提灯的士兵引导起飞。靠近河岸，紧贴连亘的山丘和峡谷缝隙飞行。不久，在微暗的空间盘旋片刻，向下望去，红褐色的地面映入眼帘。刚觉微微颤动就着陆了。我在“快！快！”的催促声中跳到地面。这里就是丹竹机场。

三、四匹乘马由附近松林里急驰而来，这是等候迎接的“波”集团小林友一参谋和第一百零四师团的佐藤参谋。小林参谋是我的得意门生，他也喊着：“快！”我等立即乘马驰向松林。座机随即飞去。这里的环境竟如此紧张。

在小林参谋的引导下，沿田间小路向东北行十几公里，到达“波”集团战斗指挥所的民房。中途曾向第一百零四师团长铃木贞将军表示敬意。

6. 在“波”集团战斗指挥所联络作战

田中久一军司令官（我任陆大教官时的前任教官）看来很是满意。这次访问前线，任何礼物未能带来，心里很难过。

上午向我说明第二十三军现况。作战准备工作正按预定计划顺利进行。

下午向司令官及幕僚传达我方联络事项，并听取对方意见。其主要项目如下：

(一) “统作战计划”以及供作参考的“旭作战计划”；
(二) 攻势发动时机一致同意为 11 月 3 日；
(三) 预计作战末期的一般形势；
(四) 正在研讨中的停止攻占南宁问题（田中司令官也同意停止）；

(五) 尽早实施第三期作战计划（打通粤汉路）以及“波”集团的配合行动（田中司令官表示：这次作战结束后迅速返回广东，无论使用多少兵力，也要在司令官的直接指挥下协助第二十军作战）；

(六) 第三期作战结束后，“波”集团兵力配置的预定，尤其是加强海南岛、雷州半岛及其东海岸的防御；（司令官认为我方意见与其完全一致，表示满意。）

(七) 调整香港、海南岛陆海军的统帅指挥关系；

(八) 除上述外，附带说明了我方的希望：随着将来的形势变化，作战任务更趋繁重，需相应研究加强防御，广东地区应彻底加强军需物资的防空措施，在打通粤汉路的作战中，应力求将铁路设施完全无损地予以占领。

晚饭时，有田中司令官、安达少将参谋长等全体共八人入席。司令官慷慨地拿出前线少有的酒来招待客人，大家开怀畅饮到 11 时。参谋们都喜形于色，我的联络任务也圆满地全面完成了。26 日天未亮，便怀着惜别的心情踏上归途。

在丹竹机场等候片刻，歼击机飞来迎接，立即启程。一个多小时到达天河机场。这次半冒险的联络任务，遂告平安结束。

7. 在广东和台北

虽然急于赶路，但上海附近天气欠佳，只得暂缓出发，在珠江沿岸长堤大马路的广东饭店休息。雨一夜未停，27日又因大雨延期启程。

借此空暇，详细阅读了前几天的大本营公报。综合10月12日至16日的台湾海面空战、15日的菲律宾空战、19日至21日莱特湾的海、空战，炸沉、击沉包括航空母舰在内的31艘敌舰，击毁敌舰45艘，内有航空母舰15艘，共计76艘。估计至少占敌海上兵力的一半，可以肯定，捷一号作战必将一帆风顺。对于今后敌人的强攻，胜败趋势将取决于我方空军力量的补充能力。（注：如前所述，这不过是一场空欢喜而已。）

10月28日 归任途中在台北机场加油时，与视察南洋战况后归国途中的秦参谋次长相遇。据次长讲：“当前正在激战之中，飞机就是一、两架也很难得。我军在莱特岛惨遭敌坦克蹂躏，机场已被夺去。赶往菲律宾的飞机，很多都在中途掉队，由国内开出二十架，只有六、七架在菲律宾着陆，能在第一线活动的仅仅两、三架。”我觉得广东的梦想已在台湾的现实中烟消云散了。

十五、统帅与战略战术——“旭”司令官的心地

统帅可以通过命令手段使全体步调统一。不应因战略战术上存在分歧而以各自的企图左右行动。想不到“统”“旭”之间围绕攻占柳州问题竟引起一场风波。

1.1月3日

“旭”司令官于1月3日给“统”发来电报，要旨是：“本军鉴于柳州附近敌军配备薄弱，其主力已转至‘波’集团正面之

情况，为一举攻占柳州，已命‘鹿’（第十三师团）、‘山’（第三师团）向该地突进。”

而且这一电报除拍给上级司令部外，还拍给了总军及大本营。

上述行动不仅违背了明确规定“‘波’集团担任攻占柳州”的方面军作战计划，而且也违反了冈村将军重视统帅严正的主旨，因而立即以急电传达以下要旨：

“统司令官之意旨在于深入切断敌军退路，以围歼柳州附近之敌，此方针业已明确，切望执行，不要急于攻取城镇。‘旭’‘波’两军作战部署早有安排，关于柳州外围作战，目前情况并无特殊变化，无需变更既定方针。根据我的见解，攻占桂林剩余兵力，需要改变部署，使之指向柳州西北方以切断敌军退路。”

电报明确表达了将军的坚定意志，冈村将军说：“他们这是越权……有必要派幕僚去了解司令部的内部情况。”

不久，接到对方回电，内容虽然欠妥，依旧陈述种种理由。

2. 我重视宜山胜于柳州

收到“旭”回电后应如何处理？依我（宫崎）之见，可采沉默态度，不得已时再致电告以歼敌第一、夺城第二的基本方针。最后，根据冈村将军的意图，决定以简练词句表明将军的意志。

电文是：“余重视宜山胜于柳州。冈村大将。”

宜山是距柳州西方 80 公里黔桂铁路要冲，后来截住撤退的军用列车，缴获大量战利品即在此附近。

3. 冈村将军带兵之道鳞爪

10月11日 前往联络和了解“旭”司令部内部情况的武田作战课长归来。据他报称：“旭”司令官与幕僚之间并无特别猜忌，症结只在对战术见解不同。

听武田大佐报告后，冈村将军出于他一贯的“带兵之道”，拍发了机密电报如下：

“敬悉武田大佐传来口信。期望今后上下一致，站在严正统帅立场，共同完成任务。”于是，此问题便告结束。

十六、畑总司令官来访并传达诏书

11月11日 畑总司令官今晨离开汉口飞抵衡阳机场。傍晚再次启程，午夜过后抵达南岳。这一天，敌机反复袭击衡阳机场，敌我发生空战，我方遭受一些损失。据推测，敌人可能通过无线电或雷达获悉情报，企图狙击总司令官座机。

12日 在迎宾馆以总司令官及冈村将军为主举行会餐。总司令官精神焕发，餐后冈村司令官做了简单口头报告，由我介绍作战情况。在只有二位将军在座谈话时，冈村将军陈述了与“旭”之间发生问题的经过，畑总司令官说：“他是××。”

为了上下迎宾馆，备有两顶轿子，这种轿子汉字写作“舆”。据熟悉中国故事的片山后勤课长说：中国古代天子会诸侯于泰山，举行封禅仪式时，即乘此舆。天子倾听轿夫谈话以了解下情，根据这一故事，现把群众言论称为舆论。

正当总司令官来访之际，恰好接到了11日赐下的诏书电文，由总司令官主持了传达仪式。

诏书

“在华中、南方面作战之各军官兵，果敢机动艰苦作战已近半载，不顾瘴疫，历尽艰辛，到处摧毁在华美军空军基地，充分达到作战目的并为全局作战做出贡献。

朕深为嘉赏”

十七、桂、柳作战的综合成果

1. 方面军的作战指挥

方面军的统帅，特别是指导分进合围的会战时，抓住时刻变化的战机进行指挥最关重要，这能决定战果的大小。

从这一观点来讲，在远离战场的南岳来指挥“旭”“波”两军攻占柳州的战斗，颇有贻误战机之虞。特别在紧急时刻，考虑到“统”“波”之间的通讯曾有数日中断的事实，更有此感。对攻占柳州问题，“统”、“旭”产生意见分歧，也可说是因南岳之“统”和桂林之“旭”的感受不同所致。

无论怎么说未受敌军多大抵抗，就攻占了桂林，继而攻占柳州，并乘敌军动摇之机，以“旭”的精锐师团（第三、第十三师团）进行果断进攻，取得了圆满的成功，缴获了大量军需品，特别是美式武器。

至于攻占柳州，曾担心由南方进攻的“波”部队与“旭”的先头部队之间，在黑夜里可能发生互相攻击之事，但实际上因“波”进攻迟延，并未造成误战事故。但却失掉了围歼敌人的机会，令人遗憾。

2. “旭”的追击及其战果

11月15日 前天以来一直下雨。接到情报得知由桂林、柳州方面撤退的敌军主力，正在宜山附近及其南方地区徘徊。

立即命令两集团迅猛追击。

11月21日 “旭”的追击部队在怀远(宜山西方)截获敌人军用列车(机车11台、货车106辆、客车4辆),缴获大批军用品。据日后清点,计有反坦克炮两门、反坦克炮弹40吨、150毫米榴弹40吨、山炮弹90吨、15毫米机关炮弹17吨、20毫米机关炮弹10吨、飞机1架、飞机发动机6台、炸弹160吨、油17吨、机械20吨、粮食500吨、煤400吨。这是追击的战果,由此尚可看出美军援助桂、柳方面所用的力量。

11月28日 接“旭”报告,追击停止并已返防。对此与之联络,令其尽远撤离黔桂铁路线,将来主防卫线大致应在柳州、宜山一线,并需将一部兵力配置于黔桂省界,担负阻击任务。

3. 攻占南宁,沟通法属印度支那

11月24日 今晨“波”所属混成第二十三旅团攻克南宁。该地是通往南方法属印度支那的要冲,从而为南进中的“统”的一个师团投入法属印度支那打开了通道。

至此达到了纵贯大陆的目的,冈村将军大概能以满意的心情去就任总司令官了。

4. 中国军队战斗力下降

交战后感到敌军士气和战斗力素质下降(注:与武汉作战时期比)。而且令人欣慰的是:过去常常听到的重蹈“英帕尔覆辙”的说法,不过是杞人忧天而已。

11月21日 长沙谍报机关的宗宫大尉发来“关于湖南省西部的谍报员情报”。尽管内容稍有夸大,由此也可推测敌军战斗力下降的实际情况:

(1) 此次作战,中国军队约有 60% 遭到打击,目前六个军的实有战斗力只相当于一个完整军。

(2) 今后的作战方针是防备日军向常德、芷江、贵阳方面进攻,正在各要冲构筑工事。

(3) 今后以正规军编成游击队,从事破坏日军战略要点及后方军事设施,暗杀日军军官和中国要人,收集情报。

总之,随着战斗力的下降,中国军队已将重点转向防卫内地和开展游击战,这与我方所见略同。

5. 派出天野副长率领的情报收集所

从作战观点来看,进攻桂、柳州,应将“统”战斗指挥所推进到战线附近。不过,在失去制空权的形势下,飞行极为不便,道路泥泞,载重汽车行车艰难,有造成司令部机能中断之虞,故推进司令部之议未能实现。于是,临近攻占柳州时,决定向前线派遣得力的情报收集所。

11月29日 鉴于前线的状况,为进行重要联络和指挥作战,决定向柳州派出情报所,以可靠的天野副长为首,片山、东参谋同行。

天野副长一行 18 日抵达桂林“旭”司令部,接着,21 日到达柳州,与“旭”“波”进行作战联络,就以后的各种问题交换意见,随时将其主要内容向我报告。

11月29日 天野副长一行日没返回南岳。往返 14 日,从其颜貌可以看出在旅途中备历艰辛。对于副长在派出期间指挥作战采取的措施,完全同意。天野副长对与“旭”“波”联络的主要印象有两点:在“旭”司令官的态度和言谈中,流露不满情绪;广西地区物资意外丰富,今后作战补给,可以无忧。

十八、方面军移让后方地区

1. 漫长的后方联络线

第十一军5月下旬开始由岳州附近出击，到8月上旬攻占衡阳止，连续机动作战的距离约为400公里。尤其是先后三次进攻衡阳，坚持了40多天的艰苦战斗。所辖各师团虽大都遭受重大损失，但经努力恢复战斗力现正向衡阳西方约600公里的桂、柳进军中。（注：继攻占桂、柳，又向贵州省南部追击，行军距离约400公里。以上第十一军的机动全程实际为1,400公里。）

为了推进如此漫长的后勤联络线以及维持这些地区的治安，当然需要相当强的兵力和兵站部队。

此外，攻占桂、柳后还要进行预定的第三期作战——打通衡阳、广东间的粤汉线，因此，我感到有必要另设统辖这一作战的军司令部。早在9月10日行使统帅权之初，即已向大本营参谋提出此项要求。

2. 增派第二十军司令部及行使统帅权

9月27日 前者大本营作战课长来汉口时，曾要求增派一个军司令部，现大本营已内定增派第二十军司令部（司令官坂西一良中将，现驻北满东部国境）并就其战斗序列方案发来照会。对此答复如下：将现在衡阳附近的方面军直辖的四个师团，划归第二十军司令部，兵站各部队仍归方面军直辖。

第二十军司令部10月中旬到达战场，司令部设在衡阳北端。

11月1日 大雨。第二十军司令部（樱）开始行使统帅

权，兵团长在南岳开会。参加者有坂西司令官、第二十七师团长落合中将、第六十八师团长堤中将、第六十四师团参谋长斋藤大佐、第一百十六师团参谋长立茵大佐、独立步兵旅长森村少将、岩本少将、运输司令官角和大佐、军政部长宫永大佐、平尾大佐、今村大佐、儿岛中佐。

翌日，汇报各兵团情况并进行恳谈，然后由坂西司令官下达命令及训示，会议目的大致达成。

在此以前，坂西中将到任时，冈村将军明确指示了方面军的统帅方针。这次冈村将军适值因病休息，上述会议由我主持。

3. 不够稳重的统率风度

第二十军司令官处理军务事必躬亲，因而在以后第三期作战完整占领粤汉路工程设施方面，取得了出色成果。不过，听说他对幕僚的领导方式略有缺陷。

11月26日“樱”的参谋长私下发牢骚说：“司令官可能是饮酒过量的缘故，有些神经过敏。事无巨细，都要亲自处理，参谋们很不愉快。”半个月来，感到“樱”的统率风度不够稳重，缺乏体察实际情况的精神，其原因或在于此。

听说坂西将军豪饮，酒醉后行为古怪，语言粗暴。近来他已觉身体不适，或因暴饮所致。停战不久，即因颜面癌死于南京。

十九、冈村大将就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

1. 赐与冈村大将个人的诏书

11月24日 电报发来赐与冈村大将的诏书，由我（官

崎)谨予传达。进入大将房间,报告:“谨向您传达圣旨”,大将立即起立,端正姿势。可以看出大将内心感激的深情。

冈村大将这次被任命派遣军总司令官,是专为等待艰难的桂柳作战的时机宣布的。早在今夏转任第六方面军司令官时,便可料到这是已经内定的计划了。将军由华北经华中再到华南,转战南北,贯彻始终,完成作战任务,这次终于晋升到总司令官的要职。

2. 作战意图大胆、主动

冈村将军的大胆、主动精神在攻占武汉作战及其以后的数次会战中,均可找到事例,这次晋升总司令官之际,亦可窥见其一端:

11月22日 本日电报传来将军调任总司令官的通知,当天天野副长从前线归来报告时谈到:“‘旭’预料敌人今后可能增援的情况,担心兵力不足。”冈村大将立即满怀信心地说:“敌军若增援,可缓和北缅友军之困境。敌人向我这方面反攻,却是一举歼灭敌人的好机会,不足为虑。要向继任的冈部大将和上月中将(接任第十一军司令官)详细转达我对敌军战斗力的判断。”这些话逼真地显现了将军的胆略。

3. 离任前的繁忙活动

22日晚,将军约请幕僚、部长等举行告别宴会。在微暗的大厅内充满和睦、活跃的气氛,大家尽情欢乐。宴会高潮,将军不断诙谐地随着探戈舞的节奏拍掌,使人感到将军既伟大而又可亲。将军钓到的大鲤鱼烧成中国风味,使晚餐更加丰盛。遗憾的是,不善烹调的士兵烧出来的鱼是半生不熟的。

11月24日 中午过后,我代表全体幕僚向冈村将军致

贺词：

“我等全体幕僚在将军之威德与武运下，竭尽微力，从事伟大作战，不胜感戴。然建制伊始，时间仓促，尚有许多缺陷，深为惶恐。今后定将遵循将军之教导，以服务于新司令官，尚望总司令官关注赐教。”

11月25日 晨于司令官离任之时，举行阵亡将士追悼会。奉读日前赐与方面军的诏书，接着对阵亡英灵敬致悼词。

下午进行离任告别。将军说：“相处不久，颇感留恋，望今后保重身体，一心奉公。”

随后我向将军陈述了处理今后问题的意见，将军表示大致无异议。我所讲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 就任参谋长以来，总的感想是青年军官虽欠成熟，却斗志旺盛；在中老年军官中有的则缺乏亲临阵前指挥的精力和见识。

至于我个人，因有阁下的明确方针和宽容相待，得以微薄之力，尽心奉公，对此感激之至。

（二） 今后着意于以下各项，作为方面军的努力目标。

（1） 第三期作战（打通衡阳—广东间的粤汉路）重点，在于通过奇袭完整无损地占领铁路工程设施。

（2） 近期攻占芷江（湖南、贵州省界的美空军基地）和常德（重庆补给线枢纽）。

（3） 提高现地自卫和自给自足的能力，加强训练，特别是彻底加强防空，还要充实通讯、卫生措施。

（三） 此外，冒昧提出数点拙见，望总司令官考虑：

（1） 从大陆要塞观念出发，制定全面规划。

(2) 研究中国大陆沿海的防卫。

(3) 采取措施为国内(日本本土)培养兵力。

4. 总司令官在无制空权情况下启程

11月25日 待日落后,冈村大将离开南岳。我到机场送行。夜11时抵达衡阳空军支部。

原定26日清晨离开衡阳,因天气欠佳,护航的战斗机队未到,决定暂时飞往湘潭,傍晚冒着低云起飞。突然,两群敌战斗机由永丰(衡阳西北)方向飞来,使送行的人们非常担心。丧失制空权后,我军的活动竟然如此不便。下午8时,我接到司令官平安抵达湘潭的报告后,始返南岳。

二十、新司令官到任与我的调离

1. 冈部大将到任

12月2日 准备迎接新司令官的各项活动。傍晚启程去衡阳机场迎接。因听到爆炸声,三四次关闭汽车前灯,午夜过后才到达。

翌日清晨汉口来电报告,冈部将军延至4日晨抵衡阳。于是利用空闲时间,访问湘江对岸的“樱”(第二十军)司令部,与坂西中将研究第三期作战计划。

下午视察衡阳市区恢复情况。据说战前40万人口中,现已大约恢复到4万。目睹市内排列着木架临时土屋,逃难的妇幼等正在归来,仍有激战痕迹。此时亲身感到中国人民的顽强特性,同时也为冈村将军所强调的爱民主张取得成果而喜悦。

12月4日 冈部大将和上月中将于7时30分安抵衡阳

机场。坂西中将、川目少将也前往迎接，并在空军支部作了简单的情况报告。

接着三位司令官聚会，冈部大将主要传达了冈村总司令官对新任的“旭”司令官上月中将及“樱”司令官坂西中将的通知事项。其要点为：

(一) 此次作战，“旭”司令官混淆统帅与战术思想，有欠妥当。

(二) 与南方集团通讯中断，实属遗憾。

(三) 目前的通病主要是：

夸大敌情，抱怨兵力不足；

贪恋城市，争先攻入的倾向仍未消除；

存在军纪松弛、丢失密码本等缺陷。

另外还转达了冈村将军的下述要求：

“鉴于此次作战的战绩，希望对第三师团、第十三师团使用驮马大胆进攻的机动距离加以研究。”（注：据推测，这就是冈村将军“出击四川问题”的征兆。）

4日傍晚，待日落离机场，午夜后到达南岳司令部。黑夜笼罩，道路坎坷，司令官连日劳累已露倦容。因我等一行到达迟延，加之寒风凛冽，列队出迎的司令部职员已在司令官一行到达前解散了。

2. 向冈部大将汇报情况

10月5日 天寒，11时全体恭候，我作了一般情况的汇报。（注：例行仪式原来预定9时开始，但考虑司令官昨日夜半到达，连日旅途疲劳，当即请示：“是否推迟预定计划，改为下午举行？”话刚出口，大将立即道：“按预定进行。”看来这是

我的失策，我应该这样说：“仪式预定下午开始，所以……”。从冈部将军的性格来讲，如说：“因恐阁下疲倦，推迟到下午，意下如何？”这样也会失败。曾经有过类似这样的教训，当将军在炮火纷飞的高地上视察战况时，幕僚如说：“这里危险，请到那边。”是不高明的，应该说：“那里比这里看得清楚。”据说明治的将军们曾发扬“越说危险，越不为所动”的精神。）

我作完情况汇报，正和参谋们一起谈笑休息时，收到了参谋次长拍给方面军司令官的“人事亲启”电报。

电文要旨是：“宫崎中将将充任其他要职，望速返京。”人事主任田村参谋把电文给参谋们传阅，但未让我这个当事人看。天野副长等开始揣测，议论纷纷。

这且不提，因还要向司令官汇报，我便忙到司令官跟前。

大将看一眼电文，低声说道：“嗯！这是怎么回事？”然后沉默不语。这时，我想起昨天在衡阳机场，迎接大将时的初次谈话，大将说：“有你在，令人放心，增强了我前来赴任的信心。”

3. 回忆冈部将军

我想在此叙述冈部大将生平和逸话，追忆将军的生前情况：

将军为炮兵科出身，通晓军事学，多年来历任陆大军事学教官、干事、参谋本部第四部长（国军训练、大演习）、兵器行政本部部长、军事参议官兼陆大校长、方面军司令官等职，在战场上屡建战功，尽人皆知。

将军是我最尊敬的前辈之一。我任陆大军事学教官时，曾蒙将军亲切教导，将军任军事参议官兼陆大校长时，我在其

领导下任干事。此次我又作为方面军参谋长与将军相会，为时仅一、两天。

将军不苟言笑，严肃认真，看起来是位具有难于接近性格的人。这点与冈村将军的洒脱、豪爽成为鲜明对照。

记得在冈部干事率领下进行满洲战史现地考察旅行时，一天晚上闲谈，我说：“阁下愿意总象今晚这样吗？”他答道：“自己也总想这样，但是做不到。”

将军对待任何事情都严肃认真。据说曾有这样的情况，在军事参议官会议上审议陆军礼法修正案时，将军预先研究了修正案的条款，随后逐条向陆军省干事提出质询。会议结束后，主持会议的东条陆相责备道：“这个会议只不过是走形式而已，用不着提出什么质询。”受到这种责备，实在意想不到。

鉴于当时战争恶化，将军认为建立“陆海军一元化统帅”至为重要，并以个人名义提出具体方案。其结论是：“设立陆海军统一参谋本部，其成员应由少数有才干的参谋充任，他们担任本部参谋期间，不归陆海军管辖。”将军在校长室内亲自起草意见书，又亲自誊清，盖上私章，然后以军事参议官的身分直接呈交陆军大臣、参谋总长。当时我是陆大干事，将军曾给我看过这份意见书的副本。在我任参谋本部第一部长时，又曾在机密文件夹中发现这份意见书，上面盖着总长、次长审阅印章。

陆海军一元化统帅方案，好象一直在反复研究、作实施准备，但迄未得到解决。

最后竟至有劳陛下轶念，但因米内海军大臣反对而被搁

置起来，直到停战。

将军于1943年出任北满齐齐哈尔的方面军司令官，1944年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官调任汉口方面军司令官。迨至1945年，全面战局逐渐进入逆境，初夏以后，正当方面军的主要兵团转用于其他方面时，宣告了停战。

停战后不久，冈部将军因视网膜下腔出血，在上海去世。

二十一、任方面军参谋长期间的感想

1944年8月至12月短短四个月期间，以方面军参谋长身分参加了活跃的机动作战，有机会在统帅和带兵方面获得一些经验。

在此期间，每日写日记，从未间断。日记封面书有“他人禁阅，阵中秘录”，卷首用红笔题写“国难秘录”。其中有关主要作战事项，大致已作叙述，最后再从日记中摘录一些感想来结束这篇补遗。

1. 统帅和参谋长的职责

幕僚的任务是根据统帅的意旨进行辅佐，这是我贯彻始终的信念。这一信念，是近十年来研究国内外战史，以及武汉作战时受到冈村将军关于带兵问题的实地教导而逐渐成形和坚定下来的。

此次作战，象我这样的晚辈，实难承担参谋长的重任，但我铭记将军最初表明的，“司令官要抓大纲、信任参谋长”的训示，鞭策自己发奋努力。于是作为统帅的臂膀，我经常不断接触将军，体会其意图，以便竭力绵薄，处理工作。不过，我能以这样心情从事工作，主要托庇于冈村将军不干预琐事的性格

与宽宏大量的心胸。

回顾在长期战争年代，将军与幕僚之间也不乏烦恼事例。这不禁使人忆起旧军队的“统帅纲领”“统帅参考书”和“战时高级司令部勤务令”的精神。因为我想：较诸为眼前得失而生，更愿为永恒真理而殉身。

2. 方面军的统帅、带兵之道

统帅与带兵的要诀基本相同。但是，在师团与军的情况下和在方面军或方面军以上的情况下又有所不同。

在以前的攻占武汉作战及随后进行的南昌、襄东、赣湘等会战中，作为军司令官的冈村将军，在领导所属师团长方面，不仅未曾有过烦恼，而且颇有充满喜悦之感。

然而，方面军在这次作战中，如前所述，曾与所属某军司令官就统帅思想发生分歧。可以说“统帅之道在于人格”，由于性格、经验、自信力不同而各有特色。因此，为了带领部队使其统一于共同的方针下，要经常或事前沟通思想，上级司令部必须及时确定意旨，使之贯彻到下级司令部。就此点而言，由于我工作不力，实应深刻反省。（注：参看“与旭司令部联系”及“方面军司令部由汉口移往南岳”）

方面军司令部的主要任务，是对各军司令部进行统一调度，使其相互协作。并且，必须完成政治策略、占领区行政、广大地区情报、谋略等广泛、复杂的业务。因此，在平时训练中，很难进行实际演习，纵然进行司令部演习，也不会超出短期战术训练的范围。为了达到上述训练目的，只有着重从国内外战史来学习带兵的方法，特别要研究人与人的关系，除此之外，别无它法。

当发现战局不利，急于在战斗中的军司令部之上设置方面军司令部时，切需周密考虑。这种事例在日华事变、大东亚战争中，屡屡出现，多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大多是由于最高统帅部缺乏预见，未能抓住设立方面军司令部的适当时机，以致仓惶建制的司令部不太清楚以前的实际情况，并且缺乏充分发挥其机能所需要的时间。

负责指挥桂、柳作战的第六方面军全部是根据大本营的一贯计划设置的，而且任命精通中国事务的冈村将军为司令官，配备了熟悉以前作战情况的天野副长，可谓安排得当。

3. 司令部统一的、有机的活动

象军司令部和方面军司令部这样的机构，是临时由各方面集中起来的组织，在建制初期，最重要的任务是使之能在统一方针指导下充分进行有机活动。参谋部的各课，军械、军需、医务及其他部门之间，一旦有失协调，即使对细节有所疏忽，也能影响司令部的威信。管辖司令部的全部业务是参谋长的主要职责，因此，我对幕僚和各部长常常进行必要指导。（参阅本篇之八——译注）

进驻南岳后，检查执行各项任务情况时，发现对许多细节问题有失完善。随着战局的扩大，高级司令部（师团、军、方面军、总军等）的数量飞跃增加，幕僚的经验、素质也势必下降。在我的日记中记有许多这类事例，以及感想和注意事项。

11月3日 10时，官兵一齐列队，面向东北遥拜。下午巡视司令部内情况。司令部内的设施、服务工作多有不足之处。尤其是中级干部缺乏积极性。发现整个情况比武汉作战时差得很多。

11月10日 针对前天遗漏传达命令一事，就军纪、礼仪、工作守则等向全体军官提出注意事项。

全面观察幕僚执行业务的情况，深感彼等能力不足，缺乏积极泼辣的工作作风。这是失于教导之过。

11月18日 幕僚执行业务时要注意下述两点：

(一) 处理业务要迅速准确，当天的工作要当天处理完毕。应把受到下属部队的照会、询问和督促看作耻辱。

(二) 来函、来电经参谋长审阅后，应注意参谋长的红笔批注。

总之，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在于，未彻底进行典范令、勤务令的基础教育便直接从事繁杂的实际业务，而且缺乏上级的亲切教导。

因此，要求选定专人负责对部下进行以下教育：

(一) 典范令、勤务令的自学与教育(有关参谋负责)；

(二) 对低级军官进行业务知识教育(本部门军官负责)；

(三) 士兵勤务须知(本部门军官、低级军官负责)。另外对于卫兵、通讯所、传达室、值班员等，应摘录守则、须知张贴在执勤场所。

作为方面军参谋长来说，上述要求确有过分干预之嫌，但仍不得不向参谋和各部成员发出指示。这也许是由于我在中尉、少尉、中队长时代所受的教养使然吧。

4. 参谋长与参谋的关系

我对颇有见识的参谋也毫不客气而直言不讳，但我与参谋的个人关系决非冷若冰霜。背地里也许挨过骂，但理解了

宫崎的为人，大家就能很好地工作。因此，在领导方面未曾有过烦恼。日记里也有这样一段记载：

11月28日 夜晚，全体参谋聚集在我的宿舍吃鸡素烧，大家尽情欢乐，纷纷表演助兴，直至午夜。对于我的直率、不客气的领导，参谋们不仅毫无怨言，反倒欣然接受。他们欢快地做各种表演，大家同声喝彩，一派和睦气氛。看到如此意气昂扬，真是幸福至极。相信这主要是“以诚相见，不弄权术”的结果。

5. 作战关键时刻通讯中断

这次作战特别令人遗憾的是，与“波”（第二十三军）司令部的通讯在关键时刻长期中断。因此严重妨碍了攻占柳州的协同作战。

10月13日 与南方的通讯联络很差，从上月底以来，只在4日和7日各接通一次，其后竟有一星期杳无音信。为此，一再责成主任参谋及通讯队长严加戒备，仍未能查出原因。不仅司令官，就连偶然来访的畑总司令官也重视此事。可能是在急行军中对方通讯队的运用不当所致，但经反复调查，结果仍不详。

6. 在“统”司令部任职期间的不幸事件

有两起重大不幸事件，一起是杀害上司事件，另一起是丢失密码本事件，都发生在司令部建立初期。

10月7日 在湘潭机场森村少将（警备步兵团长）向我汇报情况时，听到不久前杀害上司事件的调查处分概要如下：

驻守湘潭附近的野战补充队一名低级军官，于夜间向正在床上睡觉的中队长（应召的老中尉）投掷手榴弹，将其杀害。

据被告在军法会议上自供，前些天演习时，中队长曾威胁说：“象你这样没志气的，下次战斗就该杀掉。”于是胆小的被告陷于被杀害狂想之中，并产生了“反正也是被杀，不如先杀死中队长”的念头。

森村少将继续说：“大队长以下的干部素质下降，缺乏带兵训练，组织新建部队时，由其他方面转来的干部当中，有的很难对付。”

应该责备的并不只是某个中队长或某个低级军官，这问题单凭空喊严正军纪是不能解决的。

10月4日 屡次发生丢失密码本事件，甚为遗憾。最近就相继发生两起。一起是某师团派出的支队丢失了师团密码本（9月12日夜）。据说这是休息时把图囊挂在屋里，出发时才发现丢失的。另一起发生在某集团的无线电小队，由于马夫疏忽，装有密码本的行囊可能被同行的辎重兵中队带走。

总司令部接到报告后，发来严厉指示：“应采取措施彻底搜索密码本去向”，并通报全军，唤起注意。

另一方面，丢失密码本的师团派一名参谋负责搜寻工作，结果在衡阳西方18公里一条大道旁的山林里，发现丢失的行囊，但是里面装的东西已被掉换为豆酱粉，附近有焚烧文件的痕迹。参谋带着烧剩的残片，径往总司令部报告。密码本虽未落入敌手，但因关系全军机密，立即采取了变更密码的紧急措施，为工作带来不少麻烦。

在中国战场，我军通过破译敌方密码收集情报，曾获得很多重要资料。但在此次作战中，可以察觉美空军的适时袭击是由于雷达探索以及破译我方密码所致。我前几年在所罗门

群岛战斗中，切身体验了联合舰队山本司令官战死的情况，因而对此类事件感受至深。

7. 再见吧，南岳！

离别战场时，百感交集。

参加桂、柳作战的数十万官兵长驱数千公里，或毙命于敌弹，或为病魔所缠。补给断绝，霖雨连绵，跋涉于没膝的泥泞之中，为时半载。这种艰难困苦的情景，决非身居南岳所能体会。这是我离别时感到的最大憾事。

根据大本营计划，此次作战可谓大致取得所要求的成果。今后在新司令官指挥下实施的第三期作战，方面军的全面工作也是困难重重。例如，即使凭借我军双脚逐步闯入敌军腹地占领美空军基地，但如不挫伤蒋介石的抗战意志，日华战争仍不可能终止。对战争前途的渺茫，不得不做充分的思想准备。这是第二件憾事。

作战期间一直处于紧张之中。如得小憩，想去看看南岳附近的灵峰。司令部如迁回汉口，为回忆六年前往事，也想再访武汉大学的景物……。这是我当时的一点愿望。

然而来电命令：“急速返京”不知是何用意，这是我所关心的。冈村将军曾有戏言：“你我都已成了泥瓦匠，那里作战出了麻烦，就被叫去涂抹一番。”就将军而言，每次抹得确实相当出色，但我总是抹得粗糙。武汉作战时我任作战主任；北满国境任联队长，负责重建在诺蒙罕战斗中遭受重大打击的部队；所罗门群岛一战担任军参谋长，经历艰苦奋战，最后落得从瓜岛撤退。这些工作都不得不在暗淡烛光之下或摸黑去干。这次任方面军参谋长也是如此。对于这种真正的野战生活，并

未感到特别艰苦，也觉得适合本人天性。即使在南岳五十天未曾更衣弄得浑身虱子，这样的生活也使我怀念。接到召电时，我想象是奔赴战局日趋恶化的缅甸战场。简直做梦也没想过，就任了参谋本部第一部长。

最后，我想向被我擅自借用(侵占?)的南岳宿舍向房东道谢并致歉意。房东可能是某教会学校的教师，藏书很多。我住入时书架已然一空。可能是设营时散失，应该赔礼道歉。

附录：第六方面军司令部职员 132 名(1944年10月1日统计)，现将司令官以下参谋和各部长的姓名附记如下：

“统”集团司令部

司令官	冈村宁次	大将	陆大16期
参谋长	宫崎周一	少(中)将	28期
参谋副长	天野正一	少将	32期
参谋部第一课(作战)			
参谋(课长)	武田 功	大佐(野山炮)	34期
参谋	田村 正	中佐(步)	39期
参谋	中村雅郎	少佐(步)	44期
参谋	东仙太郎	少佐(机)	46期
兼参谋	堀场一雄	大佐(航)	34期
参谋部第二课(情报)			
参谋(课长)	尾川勘治	大佐(航)	35期
参谋	井上忠男	中佐(步)	40期
参谋	西冈忠治	中佐(步)	43期
参谋部第三课(后勤)			
参谋(课长)	片山二良	大佐(野山炮)	37期

参谋	安崎 操	中佐(步)	40期
参谋	高桥 晃	少佐(步)	44期
参谋	森冈幸男	少佐(步)	44期
参谋	田村管吉	少佐(步)	45期
管理部长	川岛 正	大佐(步)	29期
军械部长	原田新一	少将	24期
军需部长	佐藤甲子寿	会计少将	29期
军医部长	斋藤 勤	军医少将	30期
兽医部长	庄司武助	兽医大佐	29期
法务部长	近藤春雄	法务大佐(现地召集)	
军政部	宫永义文	大佐	29期

第三篇 北京三年

前 言

本篇记述1941年7月离东京就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起，至1944年8月转任第六方面军司令官止三年多的经历。这一时期的四部日记已在停战后烧掉，临烧前将认为可能会被允许保存下来、无大妨碍的部分摘录如日记抄四部，现仍幸存。本篇内容主要是对摘抄的日记加以说明或详细叙述，偶尔加进一些插话。

北京三年的主要工作是维持治安，清剿作战——即对中共军的讨伐战。这些问题曾与战史室安部主任编纂官作过数次研讨，已经告一段落，在此不再赘言。

一、行前琐事

1. 陆相的秘密嘱托

7月7日参加任命仪式后，请东条陆相指示时，只有我二人在座，多年挚友东条除向我介绍已经开始的阎锡山工作外，还给了一项不公开的秘密指示说：你在重庆也有朋友，可能的话，要对重庆进行和平工作，这事遇机会我也将禀告总理。

这就是后述殷同——王大桢联络线的开端。

2. 领兵出征

我戴上崭新少尉军衔时，正值日俄战争末期，随即出征桦太接受炮火洗礼。从那时算起，这是第八次出征，心情已不甚紧张了。这应该说是领兵出征吧。7月7日夜，请来邻人片山先生对弈获得大胜。日后片山写了一篇“对弈记”寄赠与我。附录于下：

“对弈记

片山严

“×月×日晚，突有对门冈村将军府差使来称，今夜想试作鸟鹭(喻围棋黑白子——译注)之战。

“近一周来，将军府内军靴声响，进出频繁，使人觉得有些异样，或许接受了某种大的使命，正在猜测之中，今见遣使来邀对弈，似乎完全非我所料，于是欣然应诺，遣使者回复，随即出战。

“将军象往常一样穿着朴素的和服，见我只‘喂’了一声，立即走向棋盘。

“前次我以二子惨败，今天定要捞回三子。于是暗自鼓足勇气，极力拼杀。不料一再失利，每局都遭到惨败，终于三战皆北。

“夏夜渐深，将军提出再战一局，我予以拜辞。于是，将军稍微欠坐，一面安稳地收拾棋子，一面微笑着说：

‘这次拜受华北最高指挥官之重任，将要再次踏上征途，后天就启程。

舍下请多关照。’

“我说：‘衷心恭贺受此殊荣，对您再度出征感激之辞一时不知从何说起。行前繁忙时节，我如此久坐，实在抱歉。’

“将军笑道：‘不，确实准备就绪了，所以今夜要和你较量一番，这样也可以躲过新闻记者。’此时确有邻居远行的那种寂静气氛。英雄心情如此从容不迫，令人赞叹。”

“他谦恭和蔼地把我送到大门，我步出门外，还觉得将军站在背后目送我离去。将军在出征前的棋战中大获全胜，这真是吉祥之兆，我忘掉了输棋的沮丧，心中满怀喜悦。”

“第三天，我到东京车站给将军送行。东条陆相和其他陆海将领以下达官显贵竟有数百人之多参加送行。将军身着陆军大将戎装，胸佩彩色略绶，率众幕僚，俨然屹立在了望车的外廊上，英姿凛然，和对弈时的将军判若两人。送行的人们见此情景无不感到必胜无疑。这凛凛威风正是皇军永不败退决心的象征。”

3. 赴任途径

要想尽快到任，自然应该由空路前往。当时高级官员往返大陆大都借助空路。我亦爱好飞行，并且在任关东军参谋副长时期还有接受过日航公司赠予的第一号两万公里飞行纪念品的经验。然而，这次却特意选择了多费时间的海路前往。这是因为我适应乘船，在航海中遇到风浪，旅客不去食堂时，我也尝有独自去食堂与船员一起用餐的经验，对在海上航行感到十分愉快。为了避免延迟到任日期，我提前动身，在船上一边享受着也许是最后一次航海之乐，一边在旅途中悠然自得地思考着未来的重任。

二、灭共爱民

以前我在研究作战方针和战略战术方面，一直是以中国大陆为对象，而在军队的精神教育方面，则在对外派兵以前未曾加以考虑。因此，对屡屡发生骚扰当地居民的不轨行为深为愤慨。我任第十一军司令官时期，曾以“讨蒋爱民”的标语训示部队。这次就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以后，几经思考，于1941年11月3日的明治节，向司令部全体高级军官作了训示，首先朗诵明治天皇所作诗句“国仇固当报，仁慈不可忘”，然后带领大家高呼“灭共爱民”。在那以后，我认为贯彻爱民方针至关重要，又提出了“戒烧、戒淫、戒杀”的标语训示。这条标语并非出自我自己的发明，而是借用了清军入侵明朝时的禁令。

顺便提一句，日、中的共产党把我的三戒标语篡改成“冈村宁次的可烧、可抢、可杀的三光政策”大事宣传。令人惊奇的是，甚至日本进步学者的著作中也引用了这种宣传。因纯属无稽之谈，毋庸置疑。作为第三者的原中国派遣军所属师团长船引正之，在其1960年9月10日发行的《政界往来》一书中，在题为“对日军充满污辱的误解”一节中述及此事，现摘录如下：

“岩波书店出版的《昭和史》中载有：‘冈村宁次大将率领的华北方面军于1941、1942年进行大规模扫荡战，施行了中国方面称为三光政策的残酷战术——烧光、杀光、抢光。’另外在该书店出版的《中国革命思想》一书中，亦载有：‘日军在战争末期采取杀光、烧光、抢光的所谓三光政策，阻碍了解放区的成长。解放区的人口一时因此骤减一半。’

“三光政策一词，我们尚属初闻。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竟然生搬一方面的史料，并煞有介事地予以发表，实为可笑。

“再说，这个三光政策与事实完全相反。（中略）冈村大将新阵前训的第一项便是‘戒烧、戒淫、戒杀’三戒，这点我记忆犹新。每天至少在点名时听到一次列队高呼‘戒烧、戒淫、戒杀’之声。

“这样轻率的史书长此泛滥下去，将给青少年带来何等影响！”

后来公布了我在1943年3月9日的训示“告华北派遣军官兵书”，并传到国内，其内容除不烧、不淫、不杀外，又加进了不干涉县政、摒弃优越感等，这都是我一向对待中国人的意见，在国内也得到好评。

此外，旧历年前交给中国方面50万元，作为一年的奖学金，并时常邀寓居京津的旧要人进行恳谈，探查民意。

三、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的心情

我就任华北方面军后六个月，爆发了太平洋战争。半年前离开东京时，那里对美开战的情绪正在抬头，其后气氛越发险恶。我虽不了解日本的备战情况，但坦率说来对美战争的前途不容乐观。我在11月30日的日记上写道：“日美交涉毫无进展，帝国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重大时刻，我平时虽为乐观主义者，但思及战争前景，未免有所忧虑。”听说后宫总参谋长曾反对对美开战，在我内心也曾引起共鸣。但是，作为部队的司令官，由于关系到部下的士气，对此只有闭口不谈。战争爆发后不久，住在北京的小玉吞象卜师来访，问我对这场战争的前途

如何估计。我回答的内容早已忘掉，但在我回国不久的1949年3月11日，小玉法师再次来访，说过下面一段话：

“大东亚战争爆发后，我立即占卜一卦，结果断出凶兆，于是我拜访阁下，未露声色，只是淡然询及战争将如何发展。当时将军答道：‘打下新加坡，就必须停止这场战争。这是唯一的时机。不过，要有卓越的政治家、外交官才行。现在究竟是否有这样的人物。我想到小村寿太郎……’这些话我记得清清楚楚。”

另外在我1941年12月28日的日记里写有：“平日闲暇，即陷入沉思，往往想到南方作战告一段落后，对外方针如何调整问题，更加切盼对华的全面和平。”

在我任关东军参谋副长时期，为联系军务进京时，曾有两次奉旨进宫上奏下情。当时连参谋总长等上奏，都需等待时机，而一个少将竟两次奉命即时上奏，使我深深体会到天皇陛下不喜战争，爱好和平的意向。然而，这次对美开战却是天皇批准的，实在令人不解。回国后，为此曾问过当时诸领导人，但至今不得要领。

四、煤矿

我本来就爱好旅行，在战场上也乐于视察前沿或听取现场汇报。到北京后仅一年左右，便对所辖的华北蒙疆地区大致巡视一遍。视察中最感惊异的是看到丰富优质的煤炭资源。现举二、三例如下：

1942年1月7日我视察前线，路过河北省邯郸、河南省彰德西面的磁县煤矿，以及六河沟煤矿附近的农村，看到这里都

是漂亮的砖瓦房，甚为奇怪。原来这里地下数米便全是煤层，农民在自己的田边开凿象水井一样的深洞，用人工就可挖出煤炭，因而也设有砖窑。当时正值农闲季节，见到农民正在往煤矿挑运煤炭。据磁县煤矿经营人（当时为日本人）讲，采用新式设备开采煤的日产量，还不如附近农民挑运来的多。这些确信自己土地下面永远有煤的农民令人羡慕。

据说在此地西面，隔着中条山脉的山西省东南部潞安高原一带有大煤田，蕴藏量在二千亿吨以上。但因交通不便以及近海的山东省等地也有许多煤矿，故未正式开掘。……

山西省大同煤矿的缺点是离海远，但其埋藏量极为丰富，而且和日本煤矿相比，第一，绝对不进水，不需要排水设备，坑口是个简单的斜坡；第二，绝对不会发生瓦斯爆炸等事故；第三，煤层坚实，不需要坑木。其他优点亦很多，这也是令人羡慕之处。

山海关附近的开滦煤矿一直是由英国人经营，但其最大买主却是我国的八幡制铁所。因此，一开战虽将敌国设施财产全部接收过来，但军方却指示该煤矿经理英国人福瑟姆作为最高顾问继续工作，对此他虽有些踌躇，但于1942年1月11日来访，向我保证服从军方指示，留任最高顾问，并对给予敌国身分的人以优厚待遇表达感谢。

五、一级军功

1942年3月30日的新闻公布我荣膺一级军功，并特别提到作为中将受此荣誉乃是首次。于是贺电、贺信频频而来，甚至有人赠送了贺礼。但是，指挥作战越多，付出伤亡越大，以

六万伤亡的代价换来的荣誉，令人深感痛心。

3月28日富永人事局长特意来北京，送交一级军功金鸚勋章和授勋证书，并说按照规定，一级军功只能授与大将，此次鉴于攻占武汉前后的功绩，特予颁发。对此，我只有惭愧。

迄至撰写本文(1965年春)时止，我是受有一级军功的唯一在世者，或许有人称道我的武功，但这正说明远比他人造成的战死者为多，每念及此，实觉内疚。

六、令人悦服的工矿警卫

我视察了几乎全部煤矿及其他企业。这些厂矿的经营成就如何，非我所能识别。至于警卫工作，因处于敌国境内，又在共匪猖獗的形势下，不能掉以轻心。经营首脑几乎都是从国内第一流公司派来的，对警卫工作非常重视，并大致采取如下方法：

在厂地周围圈上大围墙、铁丝网等，并设置枪眼；

在外围冲要地方设置据点，昼夜警卫；

警卫队员一般数百人，其中大部分仍用华人，以当地退伍的日本兵作骨干。

上述方法需要大量经费。

相反，1942年3月16日视察徐州东北地区的柳泉煤矿，却使我不胜叹服。这座煤矿周围既无围墙，又无据点，完全显露在外。矿警队全部为华人，无一日人。这几百人的步、骑兵部队并进行了分列式向我致敬。另一方面矿方采取了一种新的措施，即支出相当大的经费为煤矿周围各村庄装设卫生及其他设施，发展福利事业，使农民在精神上与煤矿融为一体。

一旦发现情况，这些边缘村庄即向煤矿告急。当时我盛赞那里是名副其实的日华合作模范地区。这种措施出于矿长——一位满铁出身的斋藤弼州先生的自信心。斋藤先生的独特经营方式确实令人钦佩。

此外，张家口东方的龙烟铁矿和北京北郊清河镇的北京制作所（满蒙毛织公司经营）也善于掌握附近农村的民心，值得赞赏。

总之，视察华北全部厂矿后，发现负责经营管理的人们采用两种不同方式。一种是在敌国境内办企业以安全为第一，因而全力加强警卫；另一种是掌握附近民心，谋求日华共存与间接进行警卫。前者占多数，经理人大多是初次从国内来华的公司高级员司出身；后者占少数，其经理人以在满洲和中国有多年经验者居多。

我固然赞赏后者的作法，但对于两者如此悬殊而感惊讶。

七、旅团长、步兵团长聚会

1942年7月2日，在北京首次举行了旅团长、步兵团长聚会。由于已经成了将官后，即使在前线也应对大局有所了解。同时当时的华北地区与一般战场不同，任务单一专搞治安整顿，因而也有改变一下气氛的必要。到北京就任后，我巡视了所辖地区，感觉中将级的军司令官、兵团长经常北京聚会，亦有机会和通晓局势的朋友交往。但是，少将级的军官却从来没有那样的机会。所以我提议每年让这些军官聚会一次，表面上布置共同研究课题，实际上向他们提供两、三天换换心境的机会。勿宁说这是从维护统治的见地出发的。这样实施

的效果甚好，与会者皆大欢喜，并认真完成研究课题，听说还举办了同期校友会。

八、拒绝进入政界

1941年7月至45年春约4年期间，我一直热衷于战场上的工作，但有人曾劝诱、策动我进入国内政界，均被我拒绝。此事可能不值一提，但作为资料，却可以从中看到日本当时何等缺乏人材的情况。

1. 在北京，“华北交通”总裁十何信二、朝鲜银行理事中野正永、北京饭店经理檀桥渡三人经常一起来访，或提出种种意见，或苦心相劝。我也颇感他们的好意，称他们为私人顾问，以联络友情。

我从第三者听到，他们去东京时，曾策划让我进入政界，对此我漠然处之。

2. 我在北京时期，有斋藤正身等二、三十人的众议院议员团来访，曾暗地策划让我回中央进入政界。这是1942年9月22日来访的赤松寅七众议员（同期校友）透露给我的。

3. 1942年8月12日无端收到小畑敏四郎一函，要旨为“为匡救时艰岂无挺身而出之意”。为此修书答称：我对国内政情一无所知。对于下级官兵在战地一千四、五年而上级军官却一、二年便可轮换的现状颇有反感，故不想回国。我返回国内后，听到政治评论家岩渊辰雄说，吉田茂、小畑、岩渊等曾密谋政变，由吉田茂组阁，预定以我为陆相。

4. 其后从国内来访者的口中，时常听到我要回国进入政界的议论，我毫未介意。但我任总司令官时，于1945年5月

4日，曾收到蜂须喜信(预备)少将一封冗长的亲展信，其内容大意是，由于部分国会议员和各界人士切盼由我支持政局，故盼挺身而出。我以身负战地重任为理由，予以拒绝。

总之，我始终贯彻了决不参与政治的夙愿，这是聊以自慰的事。

九、对重庆联络工作

东条陆相秘密嘱托开展的对重庆工作，首先需要继续建立重庆联络线，我考虑起用住在北京的殷同较为合适。

殷同出身于日本陆军军需学校，他与其同窗汪时璟、王大楨等回国后都离开了军界，分别在政界、财界活动，相当有名。殷同很早便与我相识，关系密切。我任关东军参谋副长时，殷同正在北京。有一天他突然到我官邸来访。他是奉当时华北政务委员长黄郛和华北最高军事负责人何应钦之命，暗中刺探关东军的和平态度。当时形势正值我关东军与中国军队作战并已越过长城线若干地方，即将逼近北京——天津一线，而驻屯天津的我军与中国军队之间则处于毫无问题的微妙状况中。由于关东军希望和平，结果签定了塘沽停战协定。为了协商与该协定有关的满洲与华北之间的交通及其他问题，又在北京和大连等地举行数次会晤，每次会晤，我都有机会与殷同面谈，自然地加深了亲密程度。(参阅第五篇的前一部分)

殷同当时在华北政务委员会担任要职，于是就委托他作对重庆和平工作的直接联络工作。

1942年8月30日殷同来访，报告与在重庆的王大楨接上联系，并介绍了他的和平工作方案。接着9月6日，由重庆秘

密来北京的何沛石在殷同陪同下来访，就全面和平交换意见。10月18日两人再次来访，双方观点相同，决定在殷同一王大禎之间建立无线电报联络线。为此，军参谋部编制了密码，将我军通讯兵秘密派驻殷同私邸，由我签署一份防哨线通行证交给了何沛石。

不料，这年12月30日殷同突然病故，为工作带来很大困难，结果又请北京的汪时璟代替殷同，继续和王大禎联系，直至停战为止。与重庆每周交换电报一、两次，内容多为议论，对方态度强硬，几乎没有实际效果。

十、对重庆和平工作与开罗会谈

国内中央部门也在利用种种渠道对重庆试图开展和平工作，关于这个情况，另外有许多记录，在南京扶植的汪精卫政权也是其中的一个事例（依我所见，树立该政权反而会使重庆工作陷入困境，故曾反对），但在停战后才知道，开罗会议的时机是重庆工作的一个限度。

关东军司令官和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曾决定每年会晤一次，1943年2月24日我赴南满兴城，与梅津关东军司令官恳谈。其内容大致是关于战局的讨论，我们一致认为尽快与重庆妥协为宜。

随后，2月26日重光驻华大使来访，我们早就相识，因而就对华政策深入交换了意见。我们一致的看法是，只有凭最高政治家的胆略决心让步，与重庆妥协，别无良策。

开罗会议，即1943年11月22日到26日邱吉尔、罗斯福、蒋介石在开罗会谈制定日本战败后的处理方针，这一情况

我们在战后才知道。回想起来，如果当时最高政治家采纳、实行上述重光大使的意见（包含我和梅津大将的意见），和谈或许还有成功希望。但从1943年底以后，所有对重庆工作都是马后炮了。

十一、对华处理方针的转变

1943年初，中央指示了对华处理基本方针，我华北军也根据该方针分别作了处理，关于这点估计有正确记录在案，不必叙述，但对于军队应返回本职岗位的指示，我完全赞成。回想建设满洲国时期，我任关东军参谋副长，当时我想，根据我从少壮时代起研究中国的心得，认为约法三章的政治才是适当的，军队要专心致志于军事，政治方面也要将日系官吏限制在极少数，尽量使中国人自己工作。但是孤掌难鸣，意见未被采纳，于是无数日系官吏由国内涌来，遍布满洲各地。

43年1月7日在北京同参谋长、政务主任等进行会谈，传达新的对华处理基本方针，随后按部就班地进行机构改革。3月13日我和出差到南京的东条总理兼陆相恳谈约一小时，除汇报华北的情况外，亦陈述了对新处理方针的看法和对重庆工作的意见。

根据这项方针，新民会也应解散，乃于3月15日对新民会日系人员颁发了训令予以解散。训令指出：

“……此次对华处理基本方针，乃帝国期望团结东亚十亿民族、击败美英、粉碎其野心、完成大东亚战争不可动摇之国策。诸君的才能与力量在任何岗位均为完成战争之必要因素，切望坚持工作热情，踊跃转往他职，在新的岗位加倍努

力。”

十二、日本人的通病

到北京约一年后，国内来此慰问前线的人接踵而至。

这些人都是各阶层的上流人物，但他们所谈的，几乎都是对当时政府军部和领导人的批评意见，使人不禁想问，难道不可再发扬一点容忍精神以求团结吗？时逢艰危，人人仍在背后说三道四，专事批评，这也许是日本人的通病。或者是出于好意向出征的最高指挥官吐露心事，但向我们保证不必顾虑后方、鼓励好好干的人实在太少了。

十三、现地听取战斗汇报的习惯

（田中少尉的功绩）

我从任北满第二师团长、武汉第十一军司令官时起，便乐于到现场倾听下级指挥官、士官、士兵讲述战斗情况，并予以鼓励，已成习惯。每逢颁授军功奖状时，我一定要赶赴现场，亲自授与其本人或部队，否则便很不舒心。

田中彻雄少尉只身入敌阵，使庞炳勋上将的七万大军投诚的功绩尤为超群，故于1943年5月23日赶往开封，听取他的事迹介绍，不仅颁发了军功奖状，还赠给他特地从国内寄来的一柄军刀。

田中少尉系东亚同文书院出身，既擅长汉语，又通晓中国情况，当他着手进行对重庆系地方军的策反工作时，因他多少有些独断被人误解，遭受上司谴责，说他：“小小少尉，竟然未经命令随意潜入敌阵。”以下摘录“周刊文春”于1959年11月

2日发表的题为“降服七万人的好汉”一文中的数段：

“然而，这种带有鲁莽幼稚错误的冒险，传到巡视新乡（4月26日）的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的耳中。大将命我前往报到。

“我感到情况不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次恐怕是不光受申斥就算了事，我怀着这样心情来到了大将面前。

“一见面，大将便开口说道：

“‘听说你常潜入敌阵。干特务工作的不少，但实际上到敌阵内能见到敌人大将的，大概只有你一人。以后由我负全责。大胆干着瞧吧。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行，要不断地进行说服。’

“啊！我这才放下了心。”

在此我想说明一下当时的心意。

在人们的生活中，经常会遇到履行义务的矛盾。对于军人特别是指挥官来说，处在决定人的生死命运的战场上，最容易遇到这种矛盾。这一点在哲学家的著作中也写得很清楚。

面对这位田中少尉，我也为这种履行义务的矛盾所苦恼，其中有田中少尉的生命问题，有我的下级指挥官指责田中少尉破坏军纪的问题，以及考虑到今后为了歼灭庞炳勋的七万军队，不得不牺牲众多部下，而如果田中的工作获得成功，则可避免这场牺牲。但是，经过深思熟虑，结果根据我多年对中国的研究，确信中国人在这种场合决不会杀害田中；我也察觉到指挥官们指责田中的态度并不是绝对的。另外自我到任以

来，策反重庆系地方军的方针也有获得四次成功的先例。于是决定施行田中少尉的计划。

注：田中彻雄少尉后擢大尉，停战时返回山梨县，现（1965年春）任该县副知事，声望甚高。

十四、将850人提交军法会议

1943年6月曾发生一起榨取民众、贪图暴利的重大事件。由于严禁报纸登载，此事未被社会知晓。

华北平原的广阔耕地耕种着种种作物，其中最主要的是小麦和棉花。我中央政府大概是出于战争的需要，要求改变作物的比重，因而这年让农民增加小麦等口粮作物，大大减少了棉花的播种面积。为了补偿棉花的不足，从国内运来大量棉衣，供给华北各地的农民。这项工作公平地分给已进入当地市场的日本十几家商社承担。但是，这些大商社及其转包的中国商人等几乎都以黑市价格出售，牟取暴利，很少直接供给农民。发觉这一情况后，我大为气愤。很明显，这些商社已公然违反了屯积粮秣等项军法。为此，我断然下令从43年6月21日开始对日华财界进行大检举，凡涉嫌者，即便第一流公司的分店经理也逮捕不贷。检举结果，共将850名日华涉嫌人提交军法会议处理。

我从少壮时代起就在中国各地驻屯，深知日本大商社的经营作风。单就清廉这点而言，一般三菱和住友能得到公认，在这次大检举中，三菱只有一、二人涉嫌，住友却连一人违法的也未出现。

十五、肃正作战〈剿共指南〉

我就任华北方面军时的形势是，对重庆政府军的作战已大致结束，周围几乎到处都有共军活动，另有几处盘踞着重庆系地方军。因此，说到作战，大体上各军、方面军直辖兵团对当地共军都在日夜进行讨伐战（规模大小不等）。1942年5月我曾去石门的方面军战斗指挥所，亲自指挥冀中作战为时八天。1943年秋，又将方面军战斗指挥所迁到保定，在我亲自统帅下，对盘踞在太行山脉的共军主力进行两个月的清剿作战。

共军的确长于谍报（在其本国以内），而且足智多谋，故经常出现我小部队被全歼的惨状。为此，我命令参谋部编撰一本叫做《剿共指南》的小册子，列举了这方面的实例以防灾难，并根据经验讲述讨伐共军的要领。小册子分交各部队供作参考。

这本书起到了很大作用，甚至对共军作战堪称我等先辈的国民党军，停战后也立即把这本书译成中文加以运用。

我想再次搞到这本书，前几年去台湾时，这本书的译者钮先铭少将曾到处为我搜寻，结果原文本、译文本均未找到。不过后来在战史室找到了一些。

试举一件受共军诡计蒙骗的事例：

我军步兵分队在最边缘地方布防时，驻守一般是在村庄或要冲等地修筑碉堡，外面围绕一条深水沟，沟上设置吊桥以便出入，平时将吊桥收起，士兵生活在水沟围绕的范围内，并派有岗哨警戒。村庄里的农民大多是纯朴善良的人，天长日久自然也就和村民有些来往。有一天，一座碉堡上发现由村

子那边过来一队送葬行列。如此大殓实在少见，当行列走近碉堡旁时，分队长等人完全不加思索放下吊桥，武装不整地走出碉堡，刚刚来到行列近旁，突然送殓人群大乱，许多手枪一齐射击，分队长等应声倒毙，随后冲入碉堡，残兵均被消灭。

十六、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态度

日本的中国通对中国人的态度或看法，基本上分为两类：其一，认为考虑到中国人的性格，以诚相见未免愚蠢，应根据利害关系加以斟酌，审慎对待。其二，认为只要确实以诚相待，中国人也会对我信赖，并且乐于共事。我本人则属于后者。从我壮年时代以来的经历，即可证明这点。因此，我自到北京后，一再向所属干部甚至一般人士倡导，无论是个人、团体、厂矿，对中国人都要以诚相待，要在自己所在地方建设八纮一字（世界一家之意，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亚洲的口号——译注）的据点，以奠定日华提携的基础。这种理想的曙光，在各地虽偶有出现，但仍然不够彻底。

基于上述见地，到42年夏为止，我对华北的公司、工厂、矿山等企业进行了视察。其结果已在本篇六中作了叙述，日本各大公司对承包任务的厂矿企业，派去优秀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在事业上虽然取得了相当成就，但是，这些在国内也堪称优秀的人员，在治安欠佳的国外，却只考虑安全，为此倾注大量经费，热衷于构筑坚固围墙和招集现地退伍的日本兵，而不考虑日华提携的国策。

十七、投降的将领

我到北京就职后，了解到管辖区内没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但有不少以上将、中将为军队司令的国民党地方军。这些地方军大都是各派系的旧军阀，目前虽接受中央政府的军饷，对蒋介石却未必忠诚。只要避免和他们作战，即可减少牺牲，节省兵力。因此，我要求各军司令官、兵团长等对国民党地方军进行诱降工作。结果非常奏效。从1942年春开始，这些将领陆续投诚，到43年秋几乎全部归顺我军。

其中最大的军，就是前面提到的庞炳勋八万（原文如此——译注）大军。

除上述将领统率的正规军外，投诚的也有地方杂牌军的小部队。即使这样队伍，在维持治安方面也起到一些作用。

1942年10月8日我曾到山东省张店，检阅了该地杂牌军的投诚部队，当晚在日本饭馆招待各部队的五、六位部队长并进行了恳谈。此时我想起在北满任第二师团长时，曾费了一年的苦心，最后成功地使管区内的土匪全部归顺。当举行归顺仪式后，也是在饭馆宴请他们的几位头目，并进行了恳谈。

这些将领可以说对蒋介石不够忠诚，对国家民族倒有相当诚意。他们到北京或在当地初次见到我时就说：“我们不是叛国投敌的人，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如果贵军要与中央军作战，我们不能协助。这点望能谅解。”

1944年3月22日，我在北京宴请了全部降将：庞炳勋、

孙殿英、孙良诚、张岚峰、杜锡钧、李守信、吴化文、胡毓坤、荣子恒等，并进行了恳谈，当他们得知不久将发动进攻时，仍表示碍难参加对中央军作战，而愿协助维持后方治安，并向我介绍了河南西部的民情。

注：后来在我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的末期，估计向我军投诚的重庆系地方军的兵力共约40万人，其中华北部分即达30万人左右。

十八、河南作战琐事

1944年4月18日开始的河南作战亦称京汉作战。因为打通京汉铁路，恢复北京——汉口之间的铁路交通是这次作战的重要目的之一。这次作战是我指挥的，主力部队是第十二军，有关作战情况不再叙述，这里仅讲几件印象较深的琐事。

（甲） 针对敌将性格制定的作战计划

关于作战计划，我虽一如往常让幕僚起草，只是要求他们针对敌将汤恩伯司令的性格来制定计划。我任第十一军司令官时，曾与汤恩伯两次交锋，再综合其他情报来看，他是蒋介石麾下最骁勇善战的将领。襄东会战时，我第十一军曾猛攻敌正面的一角，汤恩伯则亲率主力向这一角反击，并乘隙使我主力陷入重围，受到歼灭性打击。这次我军特别掌握着坦克车师团，最初将其隐藏起来，待汤恩伯照例调集主力向其被突破的一点发动反攻时，我军以坦克兵团，从另一面插入敌阵，敌军大乱，我作战成功。

注：汤恩伯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出身，与胡宗南同是蒋介石

石嫡系中最杰出、最受信任的将军(三人均为浙江省人)。蒋介石经常把汤恩伯军调往第一线,胡宗南军却不常在第一线出现,始终驻守在西安附近,监视延安的共产党。(这次河南作战,胡仅派出一、两个师)

(乙) 黄河铁桥桥头堡

在尚未具体筹划河南作战,打通京汉路之前,仅仅考虑到将来或许有用,于是出奇兵渡河,进到黄河右岸时,见地势险要,便构筑了小桥头堡,派兵守卫,并开始修理黄河铁桥。这次作战,桥头堡竟成了出击的据点,起到很大作用。

作战开始后一个星期的4月28日,黄河铁桥被美国空军炸毁,但立即修复,其后敌机虽频频来袭,但该桥几乎是畅通无阻。

(丙) 治安好坏与中国姑娘的态度

我通过华北、华中的战场,得知日本兵已经不是从前的“神兵”,掠夺、强奸、放火的情况很普遍而感到叹惜。这种实例将在第四篇详述,这里仅提出下面一件事。

我经常巡视华北、华中前线,发现从中国姑娘的眼神可以看出当地的治安情况的好坏(也包括日本兵的风纪)由此总结了如下三点:

第一,绝对见不到姑娘们的踪影。系惧怕日本兵的左证。“治安不好”

第二,对我们的汽车、卡车感到稀奇而远远地从窗口眺望。“治安稍好”

第三,在上项情况下,走出家门口眺望,中国姑娘神态自若地走在有日本兵往来的街道上。“治安良好”

在这次河南作战时，我照例作了“戒烧、戒淫、戒杀”三戒训示。4月30日方面军战斗指挥所进驻郑州，看到郑州的情景真是又惊又喜，经过激烈战斗占领郑州后仅仅十天，虽然大商店尚未营业，市场却早已开始营业，市民往来如梭，也出现了年轻姑娘，看到这番光景，我立刻感觉到第十二军的军纪严明。

(丁) 保护古代文物

名城洛阳的文物得到悉心保护。在洛阳附近的战斗告一段落后，便劝告洛阳守敌投降，但遭拒绝。我军不得已从5月19日开始攻城，25日予以占领。除城墙和民房受到破坏外，城内外古代文物均幸得保存完好。

十九、关于俘虏

在过去日清（甲午战争——译注）、日俄战争年代，日本兵没有主动投敌的，即使负伤后被俘，也不会因在敌人审问下供出我军情况。现在情况变了，被俘后很多人供出我军军情，并有叛逃投敌者，实为可叹。在华北，还有思想上倾向共产党的。

据说共军捕获我伤兵、逃兵时，首先让阵营内的日本兵和日本通等对俘虏进行甄审，并把被认为不合格的兵放还。这些被放还的逃兵再次落入我军后，均被送交军法会议以投敌罪加以重罚。审查合格的俘虏则接受教育、训练，从事对日宣传，甚至参加战斗。讨伐共军作战后，我前线士兵有时在敌军遗体中发现日本兵的尸体而感到愤慨，也偶有再次被我军俘虏回来的。

从这些返回我军阵营的士兵中，了解到一些共军的内部

情况。

据说延安专门设有日本人学校，野坂参三（化名冈野进）为主任，负责对这些日本兵进行赤化教育，1938年左右已有老俘虏担任该校的教官。

这些中共军内的日本俘虏，组织了称为觉醒联盟的团体，后改称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又改称日本解放联盟，从事抗日活动。其主要人物为野坂参三以及现在仍为日本共产党骨干的那些人。

另外，根据对诺蒙罕战后交换回来的我方战俘进行的调查结果，其中大部分是身负重伤以后被俘获的，但也有一部分是自愿投敌的，还有不少在敌人审讯时供出了军情。关于交换数量，苏方未告知实数，据说有迹象表明，赤化对象已被送往苏联国内，与华北的情况相似。

二十、战区强奸罪

我任第十一军司令官时，常发生强奸暴行事件，对此曾作过种种考虑，当时陆军刑法规定，强奸案诉讼程序和普通刑法同样，必须受害人亲自告发方予受理，我认为这是根本性错误。1940年2月我返回国内时，曾向阿南陆军次官建议设战区强奸罪，正义的阿南次官当即同意修改。其后历时二年，终于在1942年制定了战地强奸罪法。

所幸在华北方面军时期的强奸罪行已比我在第十一军时显著减少。我想犯罪减少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后备兵极少，大部分都是年轻的现役兵和补充兵。

这些犯罪士兵在军法会议上申诉时，都说离开家乡以前，

复员先辈们教唆过他们在中国战线强奸的事，结果不由得起了那种念头。可见最初派往中国战线的后备兵，比起昔日的出征兵是多么缺乏风纪观念！

第四篇 攻占武汉前后 (第十一军司令官时期)

前 言

本篇记述自1938年6月任第十一军司令官起,至1940年3月转任军事参议官回国止这一段经历的体会。主要是根据日记、随感录,对重要事件按年月顺序加以回忆和说明。

这一期间,战斗接连不断,而我阵中随感录的作战部分业已烧掉,只有些许模糊印象可供记述。当时任作战课长参谋的宫崎周一中将有份极为珍贵的手记,现已赠交战史室,故将有关作战事项委诸宫崎手记,不另补记,并将宫崎对本篇的附注分别插入相应章节中。

宫崎注:将军的回忆录,简言之,就是一部“带兵之道”。统帅的指挥是以带兵为经,以兵法—战略战术为纬,交织而成的。兵法可随时代的进步而发展变化,而带兵的秘诀则是古今东西通行不变的。将军回忆录的字里行间渗透着带兵秘诀,通过具体实例更易于理解。

这也是一本全面讲述战争的著作。将军从军司令官的角度揭示了一些重要问题,也只有将军那样熟悉中国和中国人,才能有这样深切的感觉。特别是贯彻“爱民”的温情,对待违犯军、风纪的严肃态度,更与其他将军们不同,这是值得特书

的。

我追随将军参加过武汉作战等多次战斗，通过将军的言行，无时无事不受到教益，今日读此回忆录倍感亲切。然而，为将军的回忆录加注，不免有画蛇添足之感。因系将军所嘱，就以祖述师训的心情加于“注”中。虽说是“注”，其内容确属自己的真实感想，或为说明，或为军中司令官的训示事项。芜杂之处，唯乞见恕并望读者谅解。

一、第十一军建制、出动

为攻占武汉，大本营决定在华中派遣军（畑俊六大将）之下，除第二军（东久迩宫稔彦王）外又编成了第十一军。其经过如下：1938年我任第二师团长驻扎在北满的掖河时，6月21日夜，突接陆军大臣急电，内称：“调任第十一军司令官，速往参谋本部报到。”当时，我师团正接受植田关东军司令官检阅，第二天预定由我给所辖团队长讲授图上战术，内容为师团在预想战场进行战斗的设想。作为师团长，本应将我的观念和要求加进去，使检阅更加壮观。但昨夜电报使我精神上陷于矛盾，于是只按原计划进行。最后我向各团队长宣告电报内容，并把我的要求供作参考。检阅官也取消了讲评。

6月23日发布任命敕令，我即离开掖河，在哈尔滨向后任师团长安井藤治中将作了交待。因天气不佳，飞机停航，火车受阻，迟至6月30日才到东京。7月1日向参谋总长报到，当天下午在新编军司令部所在地的预科士官学校内，接受参谋总长的军装检查。

7月5日上午进宫拜谒天皇陛下，随后拜谒皇后陛下，并

拜受皇后陛下亲手缝制的围巾，拜领侍从长送下的赐金。在吉本参谋长、铃木专属副官伴同下，参拜皇宫内殿，拜受御赐神酒。至参谋本部，接受总长宫殿下的派遣命令和本军的战斗序列。

此次编成新军出发，决定严加保密。因此，启程时，秩父宫、闲院宫、梨本宫各殿下所差遣的送行武官都未去东京车站，只在参谋本部正门前送别。御遣侍从武官的送行也取消。尽管如此，外界仍有所闻，在东京期间也有不少人来访，也有一些了解华中情况的人们认为由于不宜冒酷暑进军，可能要等天气凉爽再行作战。实际上我也害怕中暑，但结果实际并不那样。

7月6日离开东京，9日在宇品乘船出发，12日抵上海。

宫崎注：因武汉作战需保密，冈村将军抵东京后，在九段的偕行社新馆的最上层下榻，未回四谷私邸。这期间我在偕行社曾与将军密谈。其中谈及出征军军纪败坏的事例，以及我与参谋本部幕僚的联络情况，特别是关于攻占武汉的作战设想。谈话毕，我把一片片字条揉成团，放入身边的火盆里，将军划火柴点着，使我深深感到同心协力的气氛。

一天，在偕行社大门，见到几位老人举着华丽的在乡军人分会旗帜来访。我问将军：“那伙人是干什么的？”将军解释说：“日俄战争末期，我任少尉小队长，他们是我出征桦太时的部下士兵，凯旋归来后，他们合议组织‘冈村会’，每逢有什么事，就举着这面旗子前来看我。至今已近40年，真有意思！”将军年轻时就特别受到部下士兵的爱戴，实在令人钦佩，回顾往事，自愧莫及。

二、战场上的第一印象最为重要

我第十一军司令部的干部于7月12日在上海上岸，公务繁忙的派遣军司令部由参谋长率领大部分参谋前来码头迎接，恳切致词欢迎，汽车等均已备妥，并已安排好我们以后两天的活动。第二天我向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大将报到时，大将态度诚恳，表示了信赖之意。

我立即告知幕僚，派遣军司令部热情态度值得今后效法。盖因在日常交际当中，即使第一个印象欠佳，尚可通过不断交往，逐渐谅解而成密友，但战场上往往只能相逢一次，以后就多靠电话、书信等往来。因此，第一个印象是极为重要的。在长期的战地生活中更使我对此有深刻的体会。

宫崎注：按中国古代兵书的说法，所谓带兵之道即收揽英雄部将之心。我因重要军务先行出发，冈村将军和司令部干部抵达上海时，我也前往迎接。冈村将军对领导作风甚为敏感。当他受到派遣军司令部（第十一军的上级司令部）参谋长率领众多幕僚的隆重欢迎时，对身边的我等说：“今后我军也要好好学习这种作风。”将军在匆忙之中及时对幕僚进行实地教育，我等幕僚在日后多次情况下均遵将军的训示执行。每当冈村将军听到所属各位将军夸奖幕僚，总要转告我等，予以表扬。这些容易忽视的微末细节，决不是单纯的礼仪和庸俗的亲切，而是以诚意换取人心。

三、今昔战场的军、风纪问题与我的决心

我从昔日书籍中得知，日清战争、北清事变（八国联军入

侵——译注)、日俄战争时,我军官兵军纪严明,有“神兵”之称。回忆过去,我在日俄战争末期,以小队长参加桦太战线,任大尉时投入青岛战斗,以及作为关东军参谋副长和第二师团长开往满洲等时期,所到之处,军纪良好,几与往昔无异。而这次在东京耳闻攻占南京时发生了大的残暴行为,我认识到,率领这些犯有暴行罪的部队去攻占武汉,必须极力维持军、风纪。针对当时情况,我决定发布“讨蒋爱民”的训示标语,说明我军目的是消灭蒋介石军队,而对无辜民众应以仁爱相待。

抵上海后的一、两天内,听取先遣的宫崎周一参谋、华中派遣军特务部长原田少将、杭州特务机关长荻原中佐等有关军纪的汇报,综合如下:

攻占南京时,确实发生过对数万市民进行抢掠、强奸等大暴行。

第一线部队借口给养困难而杀戮俘虏。

注:后来又出现驱使俘虏搬运物资的现象。

上海收容大批俘虏,但其待遇不良。

据最近俘虏的敌军官讲:“我们被日军活捉便遭杀害,退却又要被督战者枪杀,所以只有顽强抵抗。”

7月15日中午,我在南京开始以第十一军司令官的身分进行指挥,17日启程巡视第一线部队,18日访问位于潜山的第六师团司令部。该师团长稻叶中将到任不久,是一位公正人士。据他讲,师团官兵作战英勇无比,但忽视抢掠、强奸等非法行为。团结心强,排他性也强,对其他配属部队等缺乏关心。

通过上述报告,我越发认识到必须严格实行爱民方针。

宫崎注：时过境迁，人也变化。日俄战争及其以前的出征军，大致是由受过教育训练的干部作指挥官。上下之间心连心，干部率领着过去的学生，指挥能力也强，因之受到部下信赖，心悦诚服。然而，在这次中国事变中，干部与部下之间存在隔阂，特别是中、小队长和分队长级大多是征集人员，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指挥能力上，不少人都缺乏坚定的信心。特设兵团尤甚。油滑的老兵兴风作浪，服从观念不强和违犯军风纪现象已成家常便饭。瞻望前途，将发展到何种地步，实难逆料。

将军始终贯彻“讨蒋爱民”的口号，其宗旨是大胆果敢地进行歼敌作战，同时对无辜民众施以仁爱。将军对所属诸兵团的情况非常清楚，因而经常能及时作出妥善指导。

关于对待俘虏，有一段体现将军仁爱精神的故事，武汉作战末期，司令官带领数人（一行中有临时配属的竹田宫大尉参谋及我）前往访问深入南方追击的第二十七师团司令部。大家乘着载重汽车向南行进时，突然发现一个正在逃跑的中国兵。喊他过来，他便老老实实走到车旁，这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兵，看样子是因脚伤而掉了队。司令官亲自讯问后，按照将军的吩咐，让这个少年兵坐在卫兵车上，跟随前往。后来听说，这个俘虏又按将军的意思当了司令部卫兵所的杂役，成了卫兵们喜欢的人物，司令官每月还给他五圆零用钱。这虽属琐事，却可见将军的仁爱精神。

四、首先巡视第一线

到任后或大战前后，都要首先巡视第一线兵团，这是我的

信条之一。

我担任第十一军司令官的第三天，便开始巡视第一线部队，7月17、18日的日记载有巡视情况，这里再附加一二。宫崎周一中将是当时随行的参谋，现将他1959年4月发表在《陆上自卫队干部学校纪事》一文中的题为“山南海北话战史之三：在战场上学到的种种带兵之道”中的“我去会见”一节，摘录如下：

“……从飞机上下下来的是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将军一行五人，时间是1938年7月17日上午，地点是在彭泽县城附近。这一带正是就要发动的武汉作战的战场，处于敌我最前线中间的不安全地带。军司令官无论如何也要访问即将开始作战行动的第一线兵团，想亲自会见前线官兵。为了访问江南的波田支队（台湾混成旅团）和第一〇六师团、江北潜山的第六师团，今晨便由南京飞抵彭城郊外。第一〇六师团秋山参谋长前来迎接，先领进地头的帐篷。离帐篷不远，秋山参谋长和军参谋副长沼田悄悄地谈了许久。随后，沼田副长把秋山所谈情况告诉宫崎参谋，并以商量口吻说：‘怎么办才好？’师团参谋长介绍的情况大致如下：

“一支强大的敌军部队从昨天开始进攻彭泽，彭泽南侧高地的我警备队遭到优势敌军不断攻击有相当伤亡。今晨战斗仍在继续。师团决定派昨夜在彭泽登陆的连队袭击敌左侧背后，眼下正在部署进攻。这里到彭泽约两公里，途中恐多危险。第一〇六师团长、波田支队长等主要干部均在彭泽，所以是否请司令官在此稍待，以便召集各队长到此地来。

“从幕僚立场来讲，秋山参谋长的意见有一定道理，沼田副长和宫崎参谋难以作出决定，最后商定探询一下军司令官的意见。于是宫崎参谋走近军司令官请示：‘目前情况是这样……您看如何决定？’军司令官以平静、轻松的语调答道：‘啊！我到二位兵团长那里去吧！’一语定乾坤。师团参谋长立即高喊：‘出发！’一行人分乘汽车和军马驰向彭泽。中途遇到举着军旗的步兵纵队，穿过路边的野炮阵地，炮身旁散乱地放着一些发射过的炮弹壳。兵团长和各队长正聚集在彭泽一家阔绰的宅院里，见到军司令官以和蔼的表情，亲切地向他们问候，心里非常感激。会见时，欢谈和感激汇成一片，使人感到诸将之心紧紧连在一起。‘啊！我到二位兵团长那里去吧！’这才可说是无形的战斗力！宫崎参谋回想当时情景，从将军的身教中领悟到为将之道。”

当时我只是脱口说出去会见他们，但读过宫崎参谋的记事，再综合其后的种种体会，我深深认识到在危险、困难、关键时刻，高级指挥官更需要深入阵地指挥作战。

在潜山，我向各团队长和师团司令部职员作了训示。其内容，只记得当时强调的一项，要旨如下：

我军兵力不足，又必须以此兵力来完成攻占武汉之重大任务。因此，希望第六师团单独攻取江北。另外准备配属重炮联队等，以增强兵力。

这个训示看来适合稻叶师团长所说第六师团官兵勇于战斗的精神，因而博得其好感。后来在九江停留期间，8月6日第六师团的联络军官（工兵联队的野村中尉）曾说：“军司令

官阁下在潜山指示，汉口由第六师团攻取，我们听后士气大为振奋。”确定第六师团进占汉口，本来也有地形的关系，但从联络官的谈话看来，这一训示似乎被夸张成为鼓舞师团官兵士气的动力。

不过，这是攻占南京时犯有暴行罪的师团，如何使其进入汉口时保持良好的军、风纪，我和稻叶师团长、牛岛旅团长都曾费尽心机。

宫崎注：这是带兵之道的首要意义。目睹第一线兵团实情，亲自慰劳，互通意图，即使上下脉搏息息相通，彼此心心相连，结成坚强的锁链。这次亲自巡视前线，冒着很大危险，也十分艰苦，然而将军毫不介意，认为是最大的愉快。可以说这就是将军所具有的性格。

“啊！我到二位兵团长那里去吧！”这句脱口而出之言，却率直地表现了其人的品质，事先准备的种种言词或幕僚所起草的文稿，却很少有能打动人心之处。由此可知，华丽的辞藻是未必令人悦服的。

五、 攻占黄梅、九江

我军于7月19日发布了有关攻占黄梅、九江的命令，翌日，把战斗指挥所推进至彭泽，但为了指挥将于23日开始攻占九江的战斗，22日又将战斗指挥所再向前推进到湖口。结果军司令官的位置，竟处于最前线的步哨线上——湖口的石钟山下，这是很特殊的情况。当天曾有一位旧识海军军官来找我，他根据常识判断军司令官的所在地不在安庆就在彭泽，但找来找去一直找到最前线才得相见，为之一笑。

石钟山是位于鄱阳湖水汇入长江处的小山，山上有座幽雅的寺院，据称此处风光甲长江，从这里观察敌情、地形甚为爽快。

7月23日拂晓3时左右，我被一阵机枪声和炮声吵醒，但朦胧间枪炮声停了下来，估计在敌滩头登陆已获成功，于是再次入睡。5时左右被幕僚唤起，送来了强行登陆成功的第一报（保津号军舰通报）。早餐后登上石钟山观战，因与战线相距已有二、三里之远，仅可看到投掷炸弹及炮弹爆炸的情况。

7月26日占领九江，因当地正流行霍乱，当由军发出特别命令，全力以赴消灭霍乱，终于很快制止其流行。调查结果，此次霍乱起源于市内东南部的井水，虽不能断定是否有人把霍乱菌投入井中，但据当时传说很可能是敌军撤退战术的一环。

由于无线电报大量传来，翻译电文很费时间，以致第六师团进入北岸后，与军司令部的通讯联络不够及时，第六师团8月2日晚占领黄梅的消息，我是3日晨先从东京无线电广播听到的。各兵团有许多从军记者，按照当时的惯例都争将部队的战绩以无线电飞报故乡，尽管兵团、部队的番号都是伪称（大多冠以指挥官的姓），但仍可了解到它们的行动。

宫崎注：在石钟山顶设战斗指挥所，虽取其有利地形，但该地确属全军最前线。由此隔鄱阳湖远眺庐山，其绝妙景色至今仍映现于我的眼底。

司令官在这里画的铅笔画（我们称为写生图）令人赞叹不已。我在画上题了字，原想作为日后战史资料保存起来，但停

战时和所有资料一起烧掉了。

当时九江（长江的重要港口）是军的集结根据地，江南我军主力溯江而上，人员、物资在此上陆，进行作战准备，如果霍乱蔓延，第十一军作战就可能受挫。因此，九江发生霍乱的情报是一严重情况。所以，司令官下达的第一项作战命令，就是“全军定要消灭九江霍乱”，并立即派出以军参谋长为首的有关参谋、各部部员携带所需物资前往现场。按照常规，这种命令应由后勤课幕僚负责发布，但这次在作战课由我起草，并在命令编号上冠以“作(战)命(令)”字样。日后听说此事传到国内，被军医学校和军需学校当作教材，广为宣传。

8月2日晚，我收到第六师团占领黄梅的电报，立即以军司令官名义用急电向稻叶师团长拍去贺电。数天后，通过联络飞机的吊筒（与无机场的司令部相互传递信件用的权宜办法）收到第六师团作战主任参谋（秋永中佐，与我同期）的信函。信中大意说：“历尽艰辛，不惜牺牲，完成占领黄梅使命，军司令部竟无任何反应，是何道理？”以尖锐词句发泄了愤懑情绪。我感到好象挨了当头一棒，真是糟糕。我虽然想尽力使幕僚满意，但初临战场就犯如此大错，深感惭愧。

我立即叫来两名报务军官询问，查明了此次失误的原因。原来是进军九江以后，无线电报务剧增，其中大部分是“特急电”，尽管译电员彻夜不眠，酷暑之下努力工作，但总也处理不完，直到现在仍积压近七十份待译电文。这样，发给第六师团长的电文还需等待数日。据说，大部分是兵器部与上级司令部之间，关于发来的物资分存后方各地的照会和答复收到武器、零件件数的电报。结果对建制不久的军司令部的协调及

监督指导造成困难。于是，我复函秋永参谋，避免采用辩解之词（尽管不无原因），对我方的过失，再三表示歉意。此事虽小，但为汲取教训，将经过情况汇报给参谋长，他完全同意我的处理，并强调密切注意调整司令部的报务与各部的业务。

六、陆海军协同作战

因系溯长江而上进行作战，陆海军的协力当属必要条件，结果情况良好。担负海军最前线的第十一分遣舰队司令官的近藤英次郎少将，我在上海与南京工作时彼此过往甚密，其所属舰长也有不少熟人，关系非常融洽。离彭泽后，军司令部主脑部门向前推进，都顺便搭乘他们的舰艇。

我估计陆海军在分配物资、土地等问题上最容易发生矛盾。因而，在九江期间，我方幕僚即预先与华中派遣舰队司令部幕僚就占领汉口后的分配问题，作出了详尽的秘密约定。

官崎注：冈村、近藤二位司令官是青年时代的密友，故双方幕僚间的联络也很融洽。我曾随同将军访问过旗舰“安宅号”受到海军式的宴席招待，至少有两、三次。

冈村将军在东京偕行社的谈话中，曾提到：“应以武士道精神对待友邻部队及配合作战的空军、海军。”想来这也是鉴于中国事变爆发后陆海军曾因占领青岛问题发生丑恶争执，或争先抢占城镇，以及因空军误炸友军引起抗议和愤懑等事例，而特意给予的教导。

在这方面，我认为武汉作战中，陆、海军相互配合颇为成功。

海军航空队的装备、素质均比陆军航空队精良。第一〇

六师团从9月到10月底脱离险境，是由于得到九江基地第二联合航空队主动、积极的协助。

误炸事件也曾有过。我军为占领九江，越过鄱阳湖进行登陆作战时，配合作战的海军水上战斗机曾连日对庐山北麓丘陵进行勇猛俯冲轰炸，有力地支援了地面进攻的波田支队；但登陆成功的翌日，该支队的一部遭受误炸，死伤七十余人。接此报告后，在判明事件真象前，我未予特别处理。第二天早晨，海军航空队来电，对误炸表示歉意。另一方面，根据我方调查波田支队的台湾民夫运输队发现高地斜坡有几门敌人败退时丢弃的山炮，民夫们上前胡乱摆弄，牵动了拉绳，不料击发了装在炮膛里的炮弹向我方飞来。时近黄昏，正在上空飞行的海军飞机立即向开炮火光进行俯冲轰炸，致使附近的民夫遭受伤亡。知此情况后，我电复海军航空队：“事故原因在我方，感谢航空战士勇敢行动。”

七、有关军纪、风纪见闻之一

8月3日我进入九江。到任以来仅仅两周有余，对我军官的军纪、风纪问题已有如下见闻：

1. 奸淫掳掠的暴行尚未绝迹。
2. 不了解出师海外的意义，对俘虏、居民缺乏仁爱，我的“讨蒋爱民”方针实际并未执行。
3. 对公物缺乏爱护，兵器、物资丢弃损坏现象不在少数，行军帐篷仅保存半年左右即报废，防毒面具当枕头用，以致丧失防毒功能。日本人缺乏公共道德的缺点在战场上反映得更加严重。

4. 厌恶露营，愿住民宅。

5. 我政府一再声明尊重当地外国权益，我军也已下达所属遵照，但迄未彻底执行。占领九江时，有的部队仍任意闯入英人房屋宿营，还有的联队想在美人房子住宿，被宪兵发觉，予以制止。8月6日，英、美两国军舰的舰长经我同意视察了两国在九江的公私权益，结果对大致得到维护表示满意。倘无宪兵监督，则不堪设想。对国外事务缺乏理解，可能是几千年来闭居岛国的日本民族自然形成的天性。

宫崎注：将军的感想和忧虑关系全局至为深刻，对下情更是了如指掌。按说军风纪问题包括在我的职责范围以内，但因忙于当前作战任务，往往忽视这项工作。

在将军指出的事项中，爱护公物问题，在平时训练中一直强调严格教育，至于其他各项，则在出发时进行特别教育，到战场时还必须相机训诫监督。然而，由于干部带头违犯军纪，势必形成上行下效。我常常见到大队长级的干部占据附近最豪华房屋的事例而感到惶恐。附带说明，九江的军司令部设在靠近郊外的师范学校校舍里，军司令官的寝室是位于学校一角教职员住的一排房屋的一个狭小房间。我等参谋办公室则是学校的教室，晚间在用窗玻璃围起来的烛光下一直工作到深夜。

由此回忆起我在少尉时期的秋季演习情况。那时有在村庄附近露营的训练，名曰“村落露营”。这是根据日俄战争的经验，载于“阵中要务令（军令）”中的规定项目。在日本国内进行这种演习时，到处得到居民、村公所和在乡军人等的照顾，他们让部队到家里住宿，做饭等事也由家人包下来，不让

士兵动手，体贴无微不至。在演习地的沿途和小山丘上站满看热闹的人。一位满面胡须的老农自豪地喊着：“在俺萝卜地里放大炮了！”

这是日本东北地区的纯朴民情。在南九州进行大演习时，一般国民热情款待军队的情景更令人难忘。不过这里想要指出，如果我们甘于领受全体国民的善意而习以为常，到战场上也强迫要求当地居民象在日本国内一样，那就难免招致当地居民的恶感了。

欧洲各列强是民权思想发达的国家，军队演习等时决不进入民宅，最多也只是借用马厩或贮藏室。

据闻中国自古以来，就不允许军队进入城市、村落宿营。占领武昌后，曾看到郊外空地上有许多用席子搭的宿营遗迹。战后大家都知道，毛泽东的延安窑洞司令部，对其部队进入民宅自不必说，就连借个水桶等细小东西，也必须得到允许，归还时必须道谢。注意掌握民心，决不容忽视。

冈村将军在武汉战役初期，即密切注意这方面问题，在本战场体验的其他部分也屡屡忧虑及此，并曾几次竭力指导纠正。尽管如此，一般官兵已病入膏肓，令人不胜遗憾。

关于掠夺或对居民缺乏仁爱问题，从作战实际情况来看，在某种程度上不无来由。这是因为连续长途行军、作战，后方运送的补给只限于弹药、汽车燃料及其他必需品，而行军、作战期间的大部口粮便不得不取之于敌方，在开始港口登陆作战时，军司令部以司令官为首的全体官兵一连几天每餐副食只有款冬罐头。先头部队的波田少将等曾用盐汁泡桃树叶佐餐，舌头、喉咙被扎得疼痛难忍，成为笑谈。

所幸作战地区是在所谓：“两湖（湖南、湖北）熟天下无饥荒”的粮仓地带，即使给养未运到也不致挨饿。1944年秋的桂、柳作战，口粮几乎都是在当地割稻脱壳以备作战之用。在现地物资缺乏的瓜达尔卡纳尔岛，我曾体验过饥饿的悲惨窘境。

八、从报纸上了解所属部队的行动

前面提到第六师团占领黄梅一事，我是在公报送达前从国内无线电广播获悉的。后来又从8月4日寄来的国内报纸了解到7月26日陆海军部队占领九江的行动详情。

海军方面的行动另当别论，从国内报纸上看到自己所属部队行动的照片和详细报道，甚觉奇怪，而部队抄写的公报等却迟迟不见到来。以前国内新闻特派员争先发表的详细报道，尽管缺少部队番号和其他禁止报道的事项，但我读后仍能明了部队实际情况，故甚感快慰。但是，这类报导在以后的华北方面军、第六方面军、总军时期则完全看不见了。我想那只是中国事变最初时期，有许多记者在各兵团随军采访的一种特殊情形。（记者人数附后）

九、军纪、风纪见闻之二（战区强奸罪）

1938年8月18日吉本军参谋长视察九江对岸小池口一带，结果如下：

驻扎在小池口附近的波田支队（与第六师团同为南九州兵）的原田大队风纪败坏，强奸、掳掠情况屡有发生。有的人在召集附近村长时夺取他们的服装，这是因为穿起来便于进

行强奸。我军飞机场工程由一位村长承包，因士兵轮奸了该村长的妻子、女儿，致使机场施工一度停顿。有的士兵克扣修机场的民工工资。还有的人在九江害怕军司令部的管束，却跑到小池口去胡作非为。“讨蒋爱民”的标语到处张贴，但毫无实效。

于是，我与吉本参谋长协议，将九江全体宪兵派到对岸小池口严命逮捕所有罪犯，送交军法会议处理。

另外，又将九江特务机关的主力移驻小池口，加强安抚工作。

8月23日五十岚宪兵队长前来报告，他以平淡口吻讲了以下意见：调查小池口上等兵等三名轮奸事件时，得知少女既未极力反抗，也未亲自告发，不能构成强奸罪，所以最好不予起诉。在座的军法务部长也陈述了相同意见。对他们的意见，我严厉斥责说：我也知道强奸罪要亲自控告才成立，但那是以日本国内为前提制定的法律，对此不能不深加考虑。我们出兵不是号称“圣战”吗？！神武精神是在法律以前就有的。另外，应当理解被害良民在刀枪面前谁敢亲自控告？宪兵必须让被害者都来亲自控告，而后严惩所有罪犯。

宪兵队长、法务部长的那些意见，事先曾向吉本军参谋长讲过，也同样遭到反对。从此，宪兵队长以军司令官的严厉要求为理由，似乎严加取缔，但其后各地强奸事件仍频频发生，还听到一些奇怪现象，有不少事例用调解的形式加以处理，而且调解金各地统一为十五日元。因此，我痛感必须根本修改陆军刑法的亲自控告罪，设立战区强奸治罪法。1940年回国时，我曾向阿南陆军次官提出我的意见，得到坚持正义的阿南

的同意，并答应着手修改。

宫崎注：为准备发动攻占武汉作战，进驻港口时便着手勘查陆军飞行基地适合地点，最后决定在长江对岸的二套口附近建设飞机跑道，为了尽早完工，我煞费苦心征集了大批当地人，紧张地投入施工。正当此时，竟因一件对妇女的暴行，民工一哄而散，一人未剩，使工程遭受挫折。我大失所望，对此暴行深为痛恨。为此我过江视察现场，对居民进行安抚慰问。这次事件直接给作战带来重大损害。

在战场，奸污妇女似乎是难以避免的罪行。它和掠夺同样是衡量军纪的标准，除非依靠干部的及时教导和认真监督，否则是不能杜绝的。然而，如文中所述，就连上层干部都缺乏严明纪律的观念，看来这已形成通病。据说明治维新时代征讨日本东北时，向越后地区进军的萨摩、长门的官军曾在长冈各地树立诫牌“犯强奸罪者处死刑”（长冈藩的家臣河合继之助传记）。记得停战时，在横滨登陆的美军黑人士兵奸污妇女的暴行每天竟达千余起，我在复员省见此通报悲痛万分。

“战地强奸治罪法”迟迟未定，这也说明当时的一般观念。但在溺于世俗习尚的老兵中，或许有人认为污辱妇女就是犯罪的良心已经麻痹，亦未可知。因而每当出发作战时，必须象“战阵训”的名文所规定那样，应直接向兵士具体训示必要的注意事项。

十、军纪、风纪见闻之三

8月23日以后至9月底的见闻如下：

1. 在九江我的宿舍后面，有一片丘陵草地，这里是替换进

攻部队的临时宿营地，与我的住处相隔三、四百米，从室内即可大致看到部队状况。从军、风纪方面来看，各部队有很大差异。

由南九州兵构成的波田支队，士兵背囊都留在相距甚远的镇江，携带的帐篷被当作背袋使用，以致破烂不堪，难以遮挡雨露，因此宿营时以侵占民房为主，在上述土山地露营，无民房可占就和衣露宿。

与此相反，来自北陆地区的第九师团某支队，自参加上海战斗以来，转战各地，出征时日远比前者为长，但来到此地便支起修理完好的帐篷露营，营中秩序井然、肃静，早晨士兵肩负背囊，成四路纵队威风凛凛地出发，与前者出发时的混乱队伍成为鲜明对照。

这两支部队指挥官采取的措施有何区别？士兵来源地的民情有何差异？虽然尚难立即断定，但在生死难卜的战场上，极易产生干部忽视军纪、重功轻罪的弊端。因此，看到军纪如此严明的军队，确属难能可贵，令人钦佩。

2. 考虑“慰安妇”（即军妓——译注）问题。昔日的战争时代不存在“慰安妇”问题，谈起此事，深感内疚，因为我是“慰安妇”计划的创始人。1932年上海事变时，曾发生两、三起强奸案，我作为派遣军参谋副长曾仿效当地海军，请求长崎县知事召募“慰安妇团”，其后强奸案未再出现，令人感到欣慰。

现在几乎各兵团都有“慰安妇团”随行，已形成兵站的一个分队。象第六师团那样，虽有“慰安妇团”同行，奸淫罪行仍未绝迹。

据闻北京附近的中国老人回忆，义和团事变时，欧美各国

军队肆无忌惮地奸淫掳掠，唯独日本军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如今日本兵竟然变成这样，深为慨叹。

3. 据宪兵的报告中提到，一位住在蚌埠已嫁给中国人的日本中年妇女说，中国兵掳掠而不奸淫，日本兵却奸淫而不掳掠。二者的是非，唯有求教于天主教会的神父了。

在刑罚条款中，触犯最多的是对长官的暴行和强奸。从罪犯年岁来看，以三十三岁居多。

看到上述报告，我想，按说三十三岁的人，应当是已经受过军队教育的兵员，因此，现役时期的军队教育也应承担责任。但是这些士兵离开军队以后已在社会上生活多年，所以社会也应负有责任。这究竟是军队之罪，还是普通国民之罪？

4. 据来到前线的中村军务局长说，不少人从战区向家乡邮寄拍有残暴行为的照片，因违反邮政法而予没收的已达数百件。好奇心竟发展到如此地步。

5. 来自国内的邮件对前线官兵来说是最大的慰藉。但信件邮袋数量有限，规定部队必须尽速退还空邮袋，却总不见实施，未收回的邮袋已达40万个，制作新袋尚有困难，因而野战邮件投递陷于困境。

这点也暴露了日本人对公共财物漠不关心的弊病。

宫崎注：从冈村军司令官的宿舍向南眺望，可见庐山北麓连绵的山峰，眼前一片丘陵起伏，灌木丛生，其地形恰好适于露营。据说北伐军官兵也曾在此露营，并留有阵亡将士纪念碑。

冈村将军常隔着树篱笆墙观看在此露营的我军部队，观察军纪、风纪的情况。

军纪严明的军队即为精锐部队。这从他们的服从观念强、纪律严明、执行命令坚决可以得到证实。昔日有位将军曾说：“一踏入兵营大门，即可知晓其军、风纪如何。”

宿营或驻军期间要比作战时更能显示军、风纪的好坏。而且干部以身作则，要比百般说教更为重要。在此意义上，高级司令部的参谋和职员的行为更应谨慎自重，实所切望。

“慰安妇”同士兵一样，随着部队渡过长江开往各地。一天，我在汉口市中心的街道上看见坐在两、三辆卡车上的一群穿着军装和军大衣的妇女，出于好奇走了过去询问，原来是“慰安妇团”，顿时感到一种可怜和可耻的复杂心情。

一旦已婚或溺于世俗习尚的中年兵居多数，随着纯洁性和遵纪守法精神的消失，极易造成军、风纪的败坏。此外，青年军官和征集军官缺乏带兵能力，对于比自己年长的老兵不能行使威令，也是不可忽视的问题。中国军队里也有老兵，但以十五、六岁的青年兵居多。日本在战争末期老兵逐渐增多，在防御日本本土的准备阶段，曾不断发现无视军纪事故，令人担忧。大家知道，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德军征集了很多少年兵，苏联也令大批女兵从事军务。由此可以看出，长期战争是应避免的。

十一、回忆五万分之一比例地图

我从少壮时代经常驻在中国，从事情报工作，搜集军事要地的资料，但得到地图却很不容易。武汉作战时所用的华中中部地区五万分之一比例地图，大部分是我秘密搞到的。那还是为孙传芳督军当顾问时期的事。孙传芳及其麾下大部干

部、指挥官都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留学生，由于我曾担任过他们的区队长，以此关系被请到南京当顾问，称我为老师，备受尊重。1926年秋，蒋介石率军北上，孙传芳在九江、南昌地区布防迎击，但遭大败以至全军覆没。当时中国各地最详细的分区地图是五万分之一比例地图，这是昔日到日本留学军事的部分学生在陆地测量部学成归国后测绘的，绘图方式与日本完全相同。不过中国各地都极珍视，按极密文件保管，严禁出售，因而极难获得。尽管我在孙传芳阵营内受到敬重、信赖，向我咨询作战事宜，这份地图却从来未给过我。但有一天，我去最前线的南昌，当地的指挥官把华中中部地区五万分之一比例地图全部借给我，委托我制定作战指导方针、计划。我按其要求提出了计划方案，却把地图径直带回到九江的司令部。不久，孙传芳军节节败退，最后设在江面船上的司令部竟遭敌军集中火力射击，孙传芳束手无策，决定启锚顺流而逃。这时有位头脑冷静的人说，冈村老师赶紧雇条小船躲到日本军舰上去。于是，我雇了条小船，让它靠在为保护九江租界日本人而停泊在江上的第一派出舰队的旗舰“安宅号”旁，哨兵见我穿的是中国服装，心中起疑，拒绝上舰。好歹让他找来近藤参谋，这才由近藤参谋放下软梯将我收留。

仓促间，我丢弃了所有行李，却未忘记带上这套五万分之一比例的地图，所幸未被察觉。

这份地图错误较多，在前线到处都可听到对地图的批评，每当此时，我心里暗自不平：“真不知此图得来不易！”

我回国后把地图交给参谋本部，曾获得巨额秘密赏金。另外，军舰上的近藤参谋，就是前述协同作战的第十一分遣舰队

司令官近藤少将。后来他在宴会上略带醉意时说：“那时你是两手空空落魄而来啊！”说得我无言答对。

宫崎注：由武汉作战和中国大陆各次作战都多亏有这份五万分之一比例的地图。只是由于局部（特别是距主要道路较远地区）不够精确，也曾为作战带来一些差错。在襄东作战的北部地区，曾发现有很大出入，大概是因忽略细微测量所致。

关于这部地图的来历，我曾听将军谈过。

据说将军从少壮时代即与中国有密切关系，因公赴大陆工作，先后达十八次，还曾深入到中国内地许多地方作调查旅行。从洞晓地形、民情来说，不愧为真正的中国通。由于他的人品，得与中国要人相当亲昵。最后成为百万中国派遣军的总司令官，乃是理所当然。可惜为时过晚，实为遗憾。

十二、田家镇要塞

我作为军的司令官，最大目标就是攻占武汉。如前所述，我曾屡次前往中国进行有关军事要地的调查，从而早就深知田家镇要塞对于进攻武汉的重要地位。因此，9月29日当我的飞机传来的报告中，获悉第六师团的今村支队已占领该要塞时，欣喜万分。我想攻占武汉只是时间问题了。

宫崎注：由此可知，将军非常重视“田家镇要塞”。记得我这个作战主任因研究不够，当时对其重要性缺乏认识。

由国内出发时，参谋本部移交的作战资料中，有兵要地志班整理保管的“作战地区的军事要地志”，现在看来，其内容不够充分。驻在中国的年轻情报武官的日常活动重点，大部分

是探索中国军阀的动向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往往忽视用兵时所需的地势调查工作。结果在第一次（1932）、第二次（1937）上海附近作战中暴露出这方面的问题，而经历了一番苦战。再例如，兵要地志班移交的资料中，有一份1930—1931年驻华武官长勇少佐的现地报告，其中有说明只用一个师团攻占汉口的兵力部署的文件。

然而，在九江留驻期间，正巧驻美大使馆武官平田正判大佐转任波田支队联队长，他把从美国带来的一大本有关长江及其沿岸防御带照片的图册提供给我。看过以后，对美国平时调查的周密和重要文献整理、保管的精细，感到惊讶。我们对文献的整理、保管及便于查找的方法不够重视。庞大的文件堆积如山，缺乏整理、修订、索引，形同一堆废纸。回顾过去，值得我们反省。

在南昌作战时，正逢阴雨，吃尽了苦头，才注意事先对军事要地志缺乏研究。后来我反复查阅司令部备置的“满铁调查部”编辑的中国各省统计要览，发现庐山及其周围的降雨量全年以三月份为最大，于是想到莫如从这类文献中摘录所需材料，但摘录应从用兵角度考虑，否则均不切合实用。

十三、第一批随军作家

1938年9月30日，久米正雄、岸田国土、白井乔二、川口松太郎、佐藤惣之助、丹羽文雄、尾崎士郎、富泽有为男、浅野晃、深田久弥等一行来到九江，第一次出现随军作家。当晚立即在我的房间——用木板和苇席围成的屋前庭院里聚餐，闲谈约三小时，甚感愉快。他们最感惊讶的是，从上海溯江而来

时，屡遭两岸炮击，幸未击中船身，有人一直仔细计数，共发射七十多发炮弹。他们不解为什么要放炮，我答道，在你们赴宴的归途中，会不断地遇到一条条狂吠的狗吧。

这些作家个个精神饱满，后来大部分都深入到最前线摄取素材去了。

作家中的唯一女性是林芙美子，按照她的愿望，一开始便到北岸部队——亦即第六师团随军体验生活。为了保护和接待她，特由朝日新闻社命令该社记者予以照顾，后来据该报记者们讲，只因她是妇女，生活上诸多不便，实难照料。

他们当中一直和我不断交往的，是尾崎士郎、富泽有为男二位。

顺便提一下，随军新闻记者人数是：我军司令部十几名，各兵团分别为几名、十几名，全军达二百几十名之多。

宫崎注：冈村将军视野宽广，交友遍及国内外，健谈善听，记忆力非凡。因而与随军作家交谈的话题似乎无所不包。在司令官室内，常可看到他翻阅高级综合杂志。对人心动向，洞察入微，或许就出于这种渊博的习性。象我这样一介武夫，既不善于和作家们交谈，且有嫌弃之感，自觉心胸狭窄，因此，使我更增强了对将军性格的崇敬。

十四、攻占武汉作战的特点

（兵力、地形、酷暑的不利）

攻占武汉作战，有以下三大特点。即，一、敌人拥有极为优势的兵力；二、与恶劣地形作战；三、与酷暑作战。

1. 兵力

敌人兵力比我军多十几倍或几十倍。然而，我少壮时代经常驻在中国，深知中国军队的素质。而当时参谋本部内对中国军队的习惯看法，一般是我一个联队足抵蒋介石嫡系部队的一个师，我一个步兵大队足抵非嫡系地方军的一个师。因此，当收到前方敌军不断增加，长江南岸地区已达三十个师，北岸地区已达十几个师的情报时，并不吃惊。

后来，我第十一军仅以七个多师团警备武汉地区，被周围一百二十多处敌人包围，即使受到所谓冬季攻势时，也并未感到不安，而将全部敌人予以击退。

但与恶劣地形与酷暑的战斗，却使人极为厌烦。

2. 与恶劣地形斗争

长江南岸地区山连山的地形，使人烦恼。这与我军的素质（特设师团）虽然有关，但第一〇六师团突破九江西方庐山西北山麓敌人阵地及第一〇一师团突破庐山南麓和鄱阳湖间狭隘阵地，一共费了一个多月以上的的时间。而波田支队、第九师团、第二十七师团等精锐部队，也是用一天的时间才能攻下一座山头。我每天用色铅笔在我座旁边地图上，把占领的山头一个个标下来，它很象单衣服的碎点花纹一样，不过碎点很细小，我常常希望这些碎点早日连成一片。

以后，某一幕僚请我写点东西，我就给他写了“敌非敌，地形是敌，征战我不爱山水”。

北岸地区大体是三百米以下的丘陵地带及农田，因而精锐的第六师团面对数倍之敌，一般能够顺利进行作战。采取每作战一周、休整十天的尺蠖战法，顺利地向前推进。

但是，我发现我步兵在南岸地区二、三百米以下的山地与

在二、三百米以上山地作战，其进展却有着显著的差别。这是一种感觉。10月20日左右，我看到我军主力被险峻山地阻挡，战斗很难进展时，我根据山地战的原则及上述感觉，认为应当向右迂回转进到丘陵地带较好。还没有等到我下命令，二、三小时后参谋却拿来了和我想法完全一致的转进命令方案，请我决定。我立即予以批准。军司令官和参谋之间意见如此一致，颇使人愉快。

由于地形的困难，对据守庐山之敌暂缓进行扫荡。至攻占南昌后的4月17日夜，乃攀登悬崖对之攻击并加以占领。进攻中用高射炮参加了作战，这是一个异常的战例，可见庐山之险陡。

在南昌作战时，命第六师团进攻武宁。以精锐著称的第六师团，在山地上前进五、六里地，也需要五、六天。与该师团在长江北岸迅猛进击的情况大不相同。这完全是由于地势险峻的缘故。

当时的炮兵旅团长澄田少将对我说：“炮兵旅团在展开战斗时，如是三百米以下的丘陵地带，大体与平地一样进行作战准备就可以解决问题。但是，对于三百米以上的山地，在通信设备及其他准备方面，就需要更多的时间。”

3. 与酷暑战斗

汉口的酷暑，是世界闻名的。我在壮年时代经常尝受过汉口酷暑的滋味，夏季气温大体为华氏九十七、八度，温度极高，而深夜和白天也几乎无大差别，非常不舒服。

我在东京出发前，有位熟知中国情况的财界朋友说：“听说你这次奉命出征攻取汉口，象汉口那样的炎热，现在季节无

法进行战斗。我看从10月左右再开始，来春等你的捷报。”我当时只一笑置之。这也不过是一般常识罢了。然而，我们却是冒着酷暑攻击前进的，官兵之苦可想而知。

汉口的酷暑，也有不太热的年头，也有很热的年头。武汉作战时恰逢后者。当时部队发的汗衫土黄色的很少，白的又太显眼，所以官兵都是赤膊上阵。有胡须的老兵，脸上长满痱子，胡须之间的痱子化脓，满脸象开了花一样。当我看到用担架抬下来的伤员时，忍泪把目光挪开。

过去，汉口的日本租界有日本酒。但因含防腐剂太多味道不佳，因此，侨民都把威士忌兑水喝。我虽曾指示军经理部长夏季把日本酒深深埋在地下保存，但他没有搞好，结果大量酒都坏了。第二年改进了保管方法，一点也没有损坏，都很好地保存下来。

宫崎注：攻占武汉的三大特点和以上所说的情况完全一样。在当时虽然偶尔也谈论这些问题，但现在读了这些细致的总结材料，不禁产生了以下几点感想。

第一，我等幕僚平常认识不太清楚的问题，将军却能从大局着眼，高度概括地掌握其要点。回顾起来，我等实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憾。

第二，着眼点高。往往听说，有的将官对战术上的细小问题，也与幕僚争辩讨论，还有的将军事无巨细都亲自处理，使幕僚无所事事而丧失工作的积极性和热情。因此，有的将军对于重要的方向性的问题缺乏指导。

关于地形高低问题，三百米以上和以下的差异，确实如此。当时我未能那样明确认识，只是看到一个个的山都高，却

看不到它们的差别。

十五、特设师团的战斗力

当时的特设师团，在形式上与现役师团无大差别。以步兵联队为例，现役只有大队长、联队长及联队副官。其他官兵完全为预备后备役。因此，每逢作战，各大队长势必亲临最前线直接指挥，其伤亡率当然很高，而大队长缺员代理大队长接任后，大队的战斗力将减少到一半以下。第一〇六师团在九江西方地区所以陷于苦战，主要原因即由于该军的素质太差。然而，同样的特设师团，如担任警备重庆附近的第一一六师团的情况就略有不同。该师团之一部（石原支队），10月初归入我第十一军，沿长江北岸附近前进，其行动相当活跃。

我认为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第一一六师团于动员后，在夔庭郊外进行了约一个月的训练，全面复习了战斗任务。反之，第一〇六师团则于动员后，立即向华中出动投入战斗。虽然都是曾经受过训练的士兵，但是，把在社会上工作了几年乃至十几年的人，直接送到前线来的做法有些欠妥。这也是中央的责任。

宫崎注：动员完了后，各级干部一起在野营地实施基本训练一事，极为重要。即使在平时，一周野营训练的结果，就可以取得在兵营训练一个月或者更大的效果。欧洲列强的兵营都是临建房屋，干部以下完全是野营式训练。在这次大战中，美国紧急组成的庞大军队也都是在帐幕野营中训练的。

为了出征进行动员或待命期间，处理杂乱事务，其繁忙程度是难以想象的。特别是应征官兵的心情复杂，因而在离开

都市的野营环境，通过贯彻各级指挥官的意志和最新战斗方法的训练所产生的信心，以及为加强上下同僚之间的密切联系等，在精神和物质方面都具有极大的效果。

“把在社会上工作了几年乃至十几年的人，直接送到前线来的做法，有些欠妥。这也是中央的责任”的结论，实在正确。对此，我自己也有责任，应该反省。主要是对质与量的关系认识不足，总认为一个师团就是一个师团，在用于初次作战之际，在使用上缺乏斟酌情况妥善考虑。

以上，主要是叙述第一〇六师团的情况。但在第十一军还有一个特设师团。这就是东京附近出身的第一〇一师团。这虽然不是草草新编的，但在前年夏季以来上海激战中，竟牺牲一万多人。大部分战斗员是杂有应召老兵的补充兵。其中，甲府、佐仓联队在联队长的统率下，取得了优秀的战果，但东京都内特别是工商业繁华地区出身的士兵，其军、风纪十分恶劣。盛夏之际，退伍老将军和田龟治中将（日俄战争时第一师团的大尉参谋，1923、1924年我在学时的陆大校长，后任第一师团长）为慰劳鼓励同乡出身的部队，曾来访问。当他视察了星子西南方地区的第一〇一师团的战场回到九江时，把担任作战参谋的我叫了去，严厉地斥责说：“那不是日本的军队。”这一印象，至今还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十六、勿蹈南京事件之覆辙

10月11、12两天，我偕同幕僚访问了江北岸广济的第六师团。其目的之一是，我一向主张每次访问前线部队，一定要听取军官、下士官以及士兵的实战经验。事实上，这两天共

听取了十一名下级军官的实战谈话。另一个重大目的是，在即将进入汉口之际，与该师团长、旅团长研究如何使在南京曾犯暴行罪的第六师团堂堂正正地进入汉口。然而，稻叶师团长和承担第一线的牛岛旅团长（后来任冲绳军司令官），已经就这一问题做出了方案。他们两人说：“我师团的兵，还未能杜绝强奸等犯罪，因此，我们计划除军风纪最好的都城联队（宫崎县）的两个大队进入汉口市外，其余全部不许入城，而向汉口北部前进。目前，正使都城联队逐步接替前卫部队，以便到达汉口时成为最前卫的部队。”另外，还就要求汉口唯一残存的意大利租界让出一条通道，由军司令部负责与意国方面进行交涉，以及在一定时间内将难民集中于一个地方等问题，进行了协商。

以后，按照预定实现了入城计划。10月25日都城联队由汉口东北角冲入市内，到27日午后（大本营公布为27日18时30分）完全占领汉口（包括汉阳）为止，幸未发生任何事故。但美中不足，26日进入武昌的波田支队，却发生了一件暴行。

另外，必须指出，在此期间，意大利领事曾给予我们很好的协助。

宫崎注：冈村军司令官广济之行，正如本标题所示，是其深谋远虑之处。而稻叶师团长及牛岛旅团长又与军司令官的想法不谋而合。在用兵上如此彻底、适当、具体的深思熟虑，使我不胜敬佩。我身为作战主任却未能考虑及此，深以为耻。

实际上，军司令官广济之行，有着如下经过。几天前司令官曾表示要去广济。但是，我以为只是为了去慰劳第六师团的官兵，因该师团从上月末苦战攻下田家镇要塞后，又在广济

受到敌军连日连夜顽强反攻，战斗甚为艰苦。由于我将此行目的看成是对前线例行视察，就想请求将行期暂缓数日。因为当时第一〇六师团在江南雷鸣鼓刘附近被大批敌军包围，危在旦夕（具体情况未向军司令官汇报），我正为此苦思对策；同时并担心司令官去广济途中的安全。不想二、三天后，司令官问一青年参谋：“我对宫崎说过要到广济去，怎么样啦？”当参谋向我传达司令官的询问时，我知道广济之行不能推迟。正巧因作战上的重要联络事项，我不能脱身，就请池谷中佐参谋代我随行。

此时，印象最深的是，我曾特别委托池谷参谋带信给第六师团参谋长重田德松大佐（后升中将，担任日本本土防卫师团长），通知他军司令部要求定出第六师团发起下次攻击的日期。其详细情况，刊登在1959年9月号干部学校记事上我的《战史杂谈——胜败之分歧与作战时机》一文中。其主要内容如下：

“当时，在第六师团北方的大别山中，友军第二军之左翼兵团（第十三师团），从九月下旬以来即对麻城（汉口东北方150公里）附近之顽敌，继续进行猛烈攻击，不断遭受损失，战况毫无进展。为减轻该兵团困境，希望我第六师团能尽快进入汉口北方平地，到达能威胁第十三师团正面的敌军背后地区，这是符合冈村将军一贯主张的‘对友邻兵团的武士道精神’的宗旨的。于是，我托池谷参谋带信给第六师团参谋长：‘第六师团在广济附近发起进击的日期，希望排除万难，务于10月17日左右开始。’

“后来（次年2月），我为南昌作战和第六师团重田参谋长

同乘渔船沿长江下航，在昏暗的灯光下，他谈到当时接到信后的心情时说：当时（10月初旬），第六师团各部队伤亡甚大，3,200名补充兵员尚在长江航运中，预计10月20日才能到达。等他们来到后开始进攻，最早要在23日。当接到军部的务期排除万难，于10月17日进攻的要求时，我对司令部这样苛刻的安排，悲愤地流下了眼泪。但军部的要求，不管怎样也要干下去。因此，每天晚上独自登上附近的小丘，眺望着前面不远的敌军阵地的地势，苦思苦虑。第一、二夜，一点好办法也没有想出来。到第三夜才想出了办法，确定了按时发起进攻的信念。现在想起来，正是由于军司令部的苛刻要求，才产生了一举长驱直入果敢行动的动机。作战真是微妙的事情。”

根据后来的情况判明，17日发起的攻势，正好赶上敌军刚要总退却，如果晚一、二天，在潮水般的总退却的大量敌纵队中，就会失去长驱直入的战机，也就无法实现如畑总司令官在嘉奖令中所说的“疾风扫落叶般的迅猛追击”，甚至可能使攻进汉口更为困难。

虽然事出偶然，但应该说，这是冈村司令官10月11、12两日访问广济的成果。

十七、军、风纪见闻之四

1938年10月10日，据庐山南侧屋子兵站司令官友清大佐报告，该地村长联名提出请愿书，要求如果禁止杀戮、强奸、放火、掠夺耕牛四件事，则对日军提出的一切要求均遵照办理。根据这一情况急派宪兵调查时，仅强奸暴行即已发生二十件而并未检举犯人。偶而抓到现行强奸犯，也被其所属队

长，以该犯屡立战功为名强行要走。当时到处盛行这种借口。

我的爱民方针未得到彻底贯彻，但自1939年后，这样的犯罪逐渐减少，而二、三年后，在中国南北全部战线上都大幅度减少。其最主要原因，与其说是努力刷新军纪的结果，莫如说老兵所剩无几，只有现役兵和年轻的补充兵。而后者还未染上社会的恶习。

宫崎注：有关东京师团军纪之松懈，前面略有叙述。但军、风纪的好坏，作为根本要素起作用的是各级指挥官的威令及部下的服从精神。如果军纪严肃，风纪也必定良好。

对于在第一线后方工作、经常接触当地居民，而且在干部看不到的地方分散行动的兵站部队，实行军、风纪的监督是很困难的问题。谈到屋子附近的话题，我想起了如下的传说：

浅草出身的某一等兵，是这一地区赌徒的大头目，在营的时候也是无法管理不可救药的坏蛋。据说在他势力范围内应征的在乡军人出身的少尉等，在他的面前象下人一样受他支使，并充当他的赌博的帮手。这虽然是听来的，是否确实不得而知，但却不能完全否定。激战场里的这种情形，实在可耻。看来好兵只能由良民来培育。

十八、占领下的汉口治安状况

当时中国人和外国人根据我军攻占南京时的暴行推断，似乎已想到攻占汉口后可能发生暴行。但是，意外地我军纪律严明，因此，民心大体安定。不过，入城后二、三天后，第六师团及其他部队却又发生了两、三起强奸案。受害者逃到外国传教士处，这些外国人向我宪兵控告，因此，各兵团、各部队

进一步严厉取缔，未至发生大的事件。

我于11月20日颁布了军的宣抚规定，又重新下达训令严禁非法行为。

汉口的大商店关门闭户逃到郊外避难，汉口陷落二、三周后陆续归来。11月25日武汉三镇成立了治安维持会，市内恢复了繁荣。

停战后，从重庆到南京来的中国老朋友，都异口同声说，中国方面绝对不能容忍攻陷南京时的暴行，徐州会战时在某地的暴行，以及第三次长沙作战时的暴行等三大暴行事件。冈村虽然专门在中国战线活动，但与此三大事件均无牵连，特别是进入汉口未发生事故，使人欣慰。为此大家互为庆幸。

十九、有关攻占武汉的日本国内舆论

攻占武汉后不久，截至11月3日，综合日本国内各界有关攻占武汉的舆论有：从长期战到长期建设；东亚协同体论；日、满、华提携等种种论调，但却没有任何人提到中国共产党，这使人非常不满。

中国事变爆发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唱彻底抗日，共军力量正逐渐扩大，其真正目的，显然是和苏联共同赤化世界。既然如此，我认为，我们日本人此际则应高瞻远瞩认真考虑中国共产党的现状及其与中国国民党的关系等问题。

宫崎注：占领汉口秩序极为良好，这当然是由于军司令官及进攻部队指挥官深思熟虑的妥善安排，但敌军提前撤退未展开激战也是主要原因之一。如果发生激烈战斗，出现惨痛场面时，双方部队则难免混战，我军牺牲也将增大。另外，残

留的居民比较少，因此，对于无辜居民几乎没有被杀害的。

原来第十一军的作战方针，主要目的是打击敌人军队。如果达到这一目的，自然即可占领武汉三镇。

我军进攻地区之彭泽、港口、九江等地居民中的仕绅富户，在我军进攻以前早已躲藏避难，剩下的不过是少数贫苦人家或老年人。汉口有各国租界，又是商业城市，一部分人和经营商业的没有走。但武昌为政治、军事的中心地，几乎全部撤退。大街上商店的门口、窗户，也都用砖堵死，值钱的东西也都搬走。我司令部住的省政府大厅，也空空如也。

这样的现象，可能是对先前日军在南京暴行的恐惧，也可能是经历几世纪战乱而积累的民族特性。中国领土辽阔，而日军进攻范围也只限于主要城镇、道路及其附近，也是原因之一。

由此使我想起，明治以来日本虽有多次战争经验，但都是出征外国。日本民族至今尚未遭受过异民族的蹂躏，没有尝到真正恐怖和悲惨的滋味。而欧洲各国人民的大部分则都是祖祖辈辈经历了几世纪极为悲惨的命运。

二十、我在攻占武汉时的心情

自10月27日晚大本营发表攻陷武汉以来，以参谋总长为首，贺电雪片飞来。日本国内也出现了庆祝胜利的各种舆论。我也为之感到放心。但是，我并不特别感到高兴。因为，这并不等于我军主力方面的战斗已经完成。

我军主力于10月29日占领金口镇及咸宁。据10月28日来九江访问的参谋本部桥本第一部长一行透露，大本营的

意图似乎是占领咸宁即可满足。但我从地形考虑，力主应予以追击并占领岳州、崇阳一线。另外根据过去经验，我认为在三百米以下的高地进击与平地无大差别，超过这一高度则相当困难，同时我也意欲追击，所以主张进入岳州、崇阳一线是比较容易的。我记得当时桥本少将笑而未答。

攻占武汉伤亡甚重，这也使我心情阴郁。在慰问九江各医院伤员时，特别是瑞昌野战医院的凄惨情景，使人久久难忘。

宫崎注：冈村军司令官有关主力方面战争尚未完成的心情，和我完全一样（这样说虽然有些放肆）。有关这一情况，我在日记中有如下记载：

10月27日

详细评论此一阶段各兵团之行动，最后总结为：“各方面之兵团，虽然极为疲惫，但忠诚服从军令，迅速采取行动（追击），军队统帅充满雄壮而畅快之感。”同时，上级给军司令官的贺电、贺词中，也有如下表扬：

（一）来自畑司令官（当时在九江战斗指挥所）

贵军麾下之精锐部队，以疾风扫落叶之势，一举攻占武汉，深表谢忱及庆贺之意。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签字

（二）来自闲院宫参谋总长

庆贺占领要地武汉。转战百里实跃进百数十里。其间，越过崇山峻岭，渡过大河湖沼，备尝艰辛，顽强战斗，终克顽敌，遂奏伟功。此诚圣上威严，然统帅有方，将士勇武，宣扬吾皇军之威武于天下。应继续压倒、歼灭顽敌，愈益扩大战果。值兹向彻底完成本作战目的迈进之秋，遥致庆贺之意，并祝武

运长久。

这一阶段，我(宫崎)头脑里充满了趁此战机“捕捉歼灭退却之敌”，并为此而“坚决进行猛烈追击”的想法。于10月29日要求下达“以第六师团一个有力支队溯长江向岳州，以第二十七师团、第九师团、铃木支队向南方的岳州、崇阳追击”的命令。我在起草这一命令后要求后方课会签时，后方主任二宫中佐参谋提出“运送补给极为困难，不能负责”的意见。二宫参谋的意见非常正确，只有高度责任感的人才能提出这样的意见。但是我说：“要排除万难，坚决追击”，并说：“责任由我宫崎来负，务请全力以赴。”二宫参谋含泪回答：“我尽最大努力一定照办。”我也含泪紧握二宫的手说：“谢谢，一切委托你了！”

但是，追击败退之敌只能沿着一、二条山路进行，因而，未获歼灭敌军之效果。敌军害怕我军猛烈追击，放火烧毁了南方要地长沙，使之化为灰烬。这却使我军易于向广大的南方扩大占领区域，为以后作战提供了便利条件。

在这期间的日记里还写了向军参谋长提出“不要大事庆祝武汉入城式”的意见。对此冈村司令官也有同感。由此，也可以充分了解冈村将军此时的心情。

总之，如果占领政治军事要地，就要仿效过去奉天作战满洲军总司令部的先例，大搞入城仪式，日本国内也举行提灯游行或放焰火等，在战争尚未结束之际，此种举动必将使精神涣散。此一般鉴并非遥远。

二十一、再谈今昔之感

(1938年10月—12月)

观察日本官兵的言行，在军风纪上比过去日俄战争、北清事变时下降之处，大体如下：

(一)对上级的服从性下降(表现于犯罪统计、言语态度、敬礼等)。

(二)性道德下降(表现于强奸、随军有慰问妇女)。

(三)公共道德更加缺乏(为图省事，将送往修械所修理的武器弃之路旁；偷盗其他部队的马匹成风；侵占送往前方的慰问品等等)。

(四)干部有犯强占、收贿罪者。

(五)有借口处理麻烦而杀害俘虏的野蛮作风。

然而，现在大部分官兵并非现役，一般都是应征后立刻上阵，因此，与其说是军队之罪，莫若说是日本国民之罪。事实上，受到刑事犯罪惩罚的大部是应征者。

至于对国家、对家庭、乡里，以及对战友的道义，与过去相比幸未下降，尚可差强人意。

有关上述之(三)，有以下数例：

(1) 如果自己部队的马匹不足，就乘黑夜偷盗他队之马，这已成为风气。第二军司令部军司令官亲王殿下的正副两匹乘马，也被盗走，一再搜查仍无下落。就连全军中军纪最好的第九师团，在马回岭附近转战别地时，也带走第一〇六师团的几匹马。更有甚者，竟以武力威胁看马士兵，强夺他队马匹。

(2) 偷取小包及补给品的也不少。

(3) 通信部队在建立的每一棵电线杆上都挂着“日本军用”的牌子，以防被他队盗走。

以前，在日俄战争后不久来日本的美拉尔德博士，曾在贵族会馆演说，盛赞日本国民战时所发挥的特质，曾举出以下四点：

1. 勇气特别是后方的勇气高昂。
2. 对战争的细心准备。
3. 国民全面的节制。
4. 对敌人的宽容精神。

现在我等所从事的战争，与举国一致的日俄战争相比，其性质虽略有差异，而发挥国民精神一点，则不应有很大差别，如将今昔情况对比，可以看出以上第1点，还算可以，第2点即有疑问，第3点则是不好，至于第4点则大为下降了。

另外，对上述第(五)项有关对待俘虏的问题，其后有改为让俘虏随军搬运部队行李或替软弱的士兵背背囊等倾向。因此，对这一问题还没有清醒的认识。

官崎注：服兵役中的好兵，在家时也是良民。好兵是由良民培养出来的。因而，士兵的非法行为，特别是军风纪的涣散，可以说是国民伦理观念下降和忽视教养的反映。维持严明的军风纪，当然主要依靠部队本身严格切实的指导与监督。但与直接掌握兵员的下级干部的素质，有着重要关系。

日俄战争、北清事变时的日本军队，从军者主要是现役兵（当时服役三年），联、大、中、小队长也几乎都是在营服役时期的干部。因此，保存了团结、服从以及军风纪各方面的优良风习。与此相反，在中日事变及以后的大东亚战争中，各种军队

数量急剧增多，伴随战争的长期化，传统的优良风气越来越少，新建或改编的部队，有如掺水的酒，军队传统的优良风气丧失殆尽。特别是应征的下级干部，除个别人外，在觉悟、信心及知识能力等方面，多数都不够格。

日俄战争不久来日本的美拉尔德博士曾赞扬日本国民之特质，与中日事变以来的实际情况相对照，冈村司令官和我都有不胜今昔之感。然而，追本溯源，下述重大问题必须深刻反省。日清、日俄之战，是关系到国家兴衰存亡的自卫战争。当时全国军民举国一致，斗志昂扬，成为强大的精神支柱。但是，满洲事变特别是中国事变后，随着国家财政的庞大化，资本主义弊端到处泛滥，黑市盛行，社会上好人受难。在这样的社会里要想得到优秀的士兵，无异缘木求鱼。

偷马和偷取补给品等非法行为，在军纪严明的部队中是不可想象的。频频发生此等事件，是军纪涣散的证明。下面所述是在事变中曾以公文通报的严重犯罪事例。上海战争结束向南京追击中，某汽车部队三名低级军官，奉命收拾遗留在上海郊外的行囊，他们在路上拾到了中国人丢弃的汽车，把汽车卖给了上海的中国商人，然后欺骗兵站司令部，搭乘开往长崎的运输船回到日本，在佐贺县的温泉等地恣意遨游，随后又要坐开往上海的运输船返回时，这一严重非法的犯罪行为才被发现。

在枪林弹雨中奋战的第一线部队所想象不到的非法行为，大多数发生在后方工作的部队，特别是在干部看不到的地方分散行动的时候。这充分说明兵员本身的觉悟和自我克制的能力是如何重要。由此可见一般国民的教养和社会道德的

重要意义。

擅自杀害或虐待俘虏，应视作现代的恶习。日俄战争时，绝对没有这种情况。这些问题的发生，可能由于满洲事变以来对中国人存有蔑视心理，加以认为俘虏可耻，因而产生了蔑视俘虏的情绪。从这些问题来看，值得反省的是，我们多么缺乏宽容和怜悯弱者的仁义教养。这一恶习，后来在菲律宾发展成“死亡进军”，严重损伤了日军的声誉。这虽然是由于作战上的要求及当时各种条件，不得已而产生的现象，但不可否认它超过了应有的限度。

同时，滥用取粮于敌的古代兵法，致使掠夺粮食及其他物资的恶行到处可见，这也是不容否认的。

如前所述，关于爱护武器及其他装备等问题，虽然平素一再强调教育，但由于激烈的活动和战争时间的拖长，应征士兵由于体力不佳、不能克服困难，就乱扔乱放甚至丢掉武器，而且习以为常，也是不可争辩的事实。

二十二、中国军队之道义

10月初，第27师团占领箬溪一带，检查缴获的敌军官兵致其亲友信件，其内容几乎全是有关我军情况以及他们誓死报国的决心，极少掺杂私事。同一时期，第一〇一师团检查反攻我阵地战死的敌军官兵遗体，发现死者的父母来信中，也都是鼓励他们为国家和民族奋勇献身的言词。这一点和我军的情况完全一样。

9月份，我一〇一师团在九江西南约三十公里的马鞍山附近，攻击凭借阵地顽强据守的敌军时，我一名大队长率十余

名部下冲入敌阵，受敌军集中炮火攻击全部战死。以后，我军占领该地打扫战场时，发现中国军队已将我战死官兵遗体及其全副武装包括军官的军刀及其他装备品完整地予以埋葬好。这使我军大为感动。

中国军队的道义，确实想象不到的使人敬佩。

满洲事变长城作战时，我步兵第17联队在古北口附近，郑重埋葬了战死的中国官兵的遗体，并立了“中国将士之墓”的墓标。后来，中国军队某旅长来至现地，对日军此举非常感激，为此特来日本访问秋田市，向第17联队表示感谢。这事已传为美谈。

宫崎注：有关第一〇六师团的上述情况，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因此，对其细节略加叙述如下：

马鞍山附近的敌军阵地是在庐山西方的水田地帯，系西自大天山、马鞍山到金家山等丘陵地带构筑的野战阵地。攻占九江不久，第一〇六师团于8月7日进行第一次攻击失败后（因无公路，师团的炮兵不得不留在后方），经过相当准备，并在精锐的海军航空部队的直接协助下，自8月27日到29日又进行了全力进攻。一部分勇敢的官兵攻入敌军阵地一角，遭遇敌军十字炮火射击，后援被切断又归失败。冈村将军指的就是这个勇敢的大队长以下十几名战死官兵的遗体。

其后，友军（第九师团的丸山支队），从侧面逼近第一〇六师团正面的敌人，顽强的敌人也不得不向南方马回岭撤退。

据情报，马鞍山附近敌军阵地是由苏联军官指导构筑的，敌人的抵抗也极为顽强。为了将来参考，特别进行了细致的调查，担当这一任务的是具有特殊装备的预备独立工兵中队。

中队长是石割平造少佐(陆士第十七期、陆大毕业。因健康原因入预备役,是冈村司令官陆士晚一期的后辈,与军内第九师团长吉积中将、第十三师团长荻洲中将是陆士、陆大同期生)。

经过详细调查判明,阵地是由大量单人陶罐式(类似捕鱼用的小口大肚罐——译注)掩体组成的战壕并接连着很深的交通沟,构成可以相互斜射、侧射的火力网。我空军虽然猛烈俯冲轰炸,但几乎无一命中。在进行调查时,发现了仔细埋葬着我冲入敌阵一角战死的大队长以下十几名官兵遗体的坟墓,他们的军刀及一切装备均整齐地带在身上。

石割老前辈详细地讲述着上述情况,在场的人无一不被深深感动。礼葬敌军勇敢战士的遗体,是我武将自古以来的教养,曾留有不少传说。只有具备使敌人也为之感动的武士道德,才能够称得上真正的胜者和勇者。

这使我想起了已故阿南惟几将军一贯强调的“道义即战斗力量”的这句名言。

二十三、俘虏

我在第一篇第五章中,具体叙述了战后从被俘官兵了解到的一些有关我军官兵俘虏的情况。在战争期中,我也经常综合各方面的情报,模模糊糊地了解到一些俘虏的情况。关于北京时期的情况,虽然写在第三篇里,但是,我最早知道有关俘虏的事情还是在1938年11月前后,那时所掌握的情况大致如下:

综合各方面的情报,确实有相当多的我军官兵被敌人俘虏,收容在俘虏收容所。大部是受伤的,但健康的似也不少。

日俄战争时期，因受重伤被俘的也有一些，但不管怎样审问也决不透露我军实情。而现在当了俘虏的，似有不少人很痛快地把把我军的编制、位置、指挥官姓名等，都告诉了敌人。

宫崎注：自1938年秋季以来，每天晚上重庆方面都广播对我军官兵的宣传节目，广播者中似乎有被敌人俘虏或被思想改造过的我军士兵。据说其领导者是从苏联潜入的某共产主义者。

当第一〇六师团在雷鸣鼓刘附近陷入敌军重围之际，在中国报纸大事宣传的材料中，几乎毫无差错地刊登了我师团各联队的番号和联队长以上干部的姓名。看到这些使我大为吃惊和悲愤（这份报纸夹在我的阵中志中，至今还保存着）。

攻占南昌以后（1939年夏），敌人以小部队奇袭，俘虏我警备某中队正在值勤中的负责给养的一名军曹，他向敌人提供了其所属部队的编制及全体人员名单。后来，经过思想改造从事资敌活动。几个月后，在华南战线的我军最前线上，出现了一个用扩音器喊话招唤我军投降的人。通过被我军抓获的这个军曹的供词，才判明真相。随后，把他送交军法会议。这虽属个别事例，但想到将来的形势，不禁使人寒心。因为，就算不提《战阵训》，耻于当俘虏的传统，原是我日本民族的性格，何况，对华作战总的看来，始终是积极的进攻作战，除特殊情况外，一般不会被敌人捕获。

诺蒙汗停战不久，我出任受到很大伤亡的步兵第二十六联队（第七师团）的联队长，担当处理战后和再建部队的任务。当时有四名士兵失踪，估计有被俘虏的可能。我用尽一切手段四处调查，也只能推定是负了重伤。最后，我负责按战死上

报。仅仅这件事情，我也充分体验到作为一个部队长是如何被这样的问题所苦恼。

在瓜达尔卡纳尔(所罗门群岛之一火山岛——译注)战斗中，接到撤退命令，不得不把相当多的不能步行的重伤病号留在岛上而撤退一事，至今使我有言语无法形容的痛苦。一般说来，在战局失利情况下的退却，不能收容重伤病号的情况居多。所罗门、新几内亚作战中，大部重伤病员最后自杀，一部分失掉撤离机会被敌人俘虏。

日本军队在任何场合下，也绝对没有如欧洲战场所见到的大部队和指挥官集体投降的情况。

与俘虏有关的值得我们反省的一个问题是，除俘虏外，敌人还从我军未能收容的战死官兵遗体上收集的记录、日记以及信件中，了解到我军情况，这样事例也不少。战后公开发表的美军战史中有如下记载：

“从日军官兵的遗体上，得到了作战的重要情报资料，美军对此点提起警惕，禁止官兵携带熟人日记信件等。万一被俘(特别是飞行员)时，应按预先准备好的要点答问外，一律不准透露。”事实上，从美军的遗体上，未得到过任何文字资料。

不应单纯提倡“勿受俘虏之耻”的《战阵训》，在某种程度上也应该注意到适应战场实际情况的合理、具体的措施和教养。

二十四、有关南昌作战

大本营及我第十一军，对攻占武汉以后的下次作战，都基

本定为攻占南昌。因此，自1939年1月中旬即逐步准备，1月31日决定了下次作战纲要。

此次作战需要考虑的重点事项大体如下：

(1) 占领南昌必须渡过三条河流。第一条是修水。河宽约三百米，河水很深，其右岸有敌军在半年前修筑的长约八公里极为坚固的阵地。其右翼是鄱阳湖，其左翼是险峻的山地，因此，只有以军之主力强渡修水突破其坚固阵地，别无他策。

(2) 第二条河流虽无重大障碍，但敌军阵地重迭，然而，以突破修水坚固阵地之势，此阵地也不难突破。

(3) 南昌城前之赣江是宽一千米以上的大河，敌军如顽强抵抗，则难以渡河。

(4) 根据综合情报，防守这一地区之敌军，是第一流的地方部队。我判断其战斗力远远低于共军，因此，有必胜之信心。

攻取南昌使用哪一师团担任军的主力，成为重大的议题，至于我为何决定使用迄今有弱兵之称的第一〇一、第一〇六两师团的情况，将在以后叙述。但这一问题一旦决定，我军参谋部门即研究采取一切手段，诸如将全军大部分火炮二百余门都集中在修水河畔，对准正面八公里长的敌军阵地；由军司令官亲自指挥强渡修水的作战；指导该两师团进行猛烈训练等等，以倾注全力争取此次艰巨作战的成功。我这最喜外出视察的人，在大约两个月的准备期间里，因参谋过于忙碌，抽不出随行人员也不能外出视察了。如前所述，我自己一面整理以前在南昌得到的五万分之一的地图摹本，一面等待着南昌作战的开始。但是，阴雨连绵、道路极为泥泞，各种准备特

别是炮兵群的进展迟缓，致使开始作战的日期一拖再拖。

3月15日，我也进驻到德安的战斗指挥所，视察了第一线的两个师团，见到他们正在紧张训练、士气大振的情况，大为安心。

3月20日作战开始。偏巧又下起小雨，午后三时由幕僚陪同登上两师团后方一个名叫军山的小山，开始指挥战斗。16时30分我炮群按预定准时开炮。二百多门火炮，在统一指挥下连续三小时进行轰击的火力，在我军说来，纵非绝后也属空前。翌晨，观察到我第一线部队及坦克等向敌阵纵深发展。10时接炮兵旅团司令部电话报告，敌军阵线崩溃开始退却的消息。11时下达了追击命令。至此，心神才真正安顿下来。

二十五、关于使用被称为弱兵的两师团

如前所述，1月中旬决定下次作战纲要之初，参谋之间就哪一师团应担任作战主力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议论。结果参谋长（参谋本部命令变动，第十一军参谋长吉本中将调任华中派遣军参谋长，遗缺由军参谋副长沼田多稼藏少将继任，军参谋副长由青木诚一大佐接任）提出了在修水北岸地区的第一〇一、第一〇六师团，战斗力薄弱，不能完成此项艰巨作战任务，应使警备后方，另调其他战斗力强的师团担任主攻的意见。当要求我最后决定时，我为挽回两师团的名誉，当场决定使用该两师团。并命令全军应采取一切手段予以协助，务必使其成功。

在战场上，大小指挥官都是站在这一方就不站在那一方，

站在那一方就不站在这一方。如果被夹在两个正当的要求之间，则常为决定取舍而苦恼。即为所谓“义务上的矛盾”而烦恼。对“义务上的矛盾”这一词汇和它的概念，当时我并不懂得。但是，战后我向某哲学家学习，以及读过某些书籍，我才知道：在所有的职业中，没有哪一种职业比得上军人那样容易受“义务上的矛盾”（义务的纠葛）的苦恼。回忆我本身的战场体验，才领悟到了这个道理。特别使我想起南昌作战之际使用上述两师团时的苦恼和决断。

以上两师团都是特设师团，如前所述，比其他现役师团其战斗力显著低劣。但是，我想这两师团也是日本人，在这里恢复他的名誉，是为了全体日本人。第一〇一师团，从上海战役以来历经多次战斗，军部如果给予大力支援，可能更大地发挥战斗力量。第一〇六师团，虽然前次受到全军复灭的严重打击，但这次却补充了大量的年轻士兵，因此，是塞翁失马还是得马，尚不得而知。

然而，南昌作战终究是极为艰巨的战斗。我也了解到有不少人对这两个师团缺乏信心。如何是好？我陷入必须使作战成功的职业伦理上的义务和同是日本人，就要挽回其弱兵污名的社会伦理的义务的矛盾之中，感到非常苦恼。但是，我也考虑了当面敌军的素质，坚定了必胜信念，因而作出了上述决定。

第一〇六师团和以全军第一精锐而著称的第六师团，同是南九州的士兵。我记得当时曾亲笔给留守在熊本的第六师团长武藤中将，发了一封快信。全文已记不清，只记得信中一开头就希望他特别转告熊本、大分、鹿儿岛、宫崎四县县知事：

“第六师团已成为日本第一的强大师团，第一〇六师团成了日本第一的软弱师团。”希望以此鼓励今后出征的士兵发奋自强。

对我使用该两师团，上级各方面也有很大的不安，从以下两件事例中也可得知。

3月28日，朝香宫鸠彦王殿下乘飞机前来视察，在德安机场降落时，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说：“南昌怎么样了？”我回答：“昨天已经占领了南昌。”殿下说：“那可太好了。我从东京出发前，去拜会闲院宫参谋总长殿下时，殿下说这次南昌作战，由于冈村使用了两个战斗力薄弱的特设师团，大家都非常担心。我在广东方面旅行中也是怀着不安而来的。”

3月31日，我回到汉口的军司令部，据留守的军参谋副长青木大佐透露（青木2月6日到任），他从参谋本部出发前，作战主任曾示意他说，南昌作战使用了两个特设师团，很不放心，所以你到任后无论如何也要设法改变。但是，他到任后，见到以军司令部为首全力进行准备，连插嘴的余地都没有。

另外，我排除了一部分幕僚的意见，决定使用该两师团的内情，幕僚自然会向两师团透露，两师团中也会广为传闻，师团官兵因而奋起，紧张地进行了夜间渡河训练等。这也是战场心理学之一例。

伊藤正德所著《军阀兴亡史》第3卷第138页载有：“修水渡河作战和攻占南昌，使弱兵转为强兵的统帅”一段文字，其中，除去对我的过奖部分外，大体是接近事实的。我断定这是沼田多稼藏中将（当时的军参谋长）提供的资料。但是，此文中提到参谋本部曾给予大力支援一点，却不是事实。

宫崎注：兹将“南昌作战”及“被称为弱兵的两师团”的情况，一并叙述如下：

冈村军司令官在他自己的体验中，直爽地说出了统帅者心中的苦恼。实际上，当时我丝毫没有察觉到，可见我是个不机敏的幕僚。这使我想到当幕僚者必须“以将之心为己之心”的难处。

我手边存有约二百页的有关准备并进行南昌作战的逐日作战日记。仅从幕僚的角度对作战的看法，将印象较深的若干事项摘记如下：

1. 攻占南昌的由来及过程

南昌是江西省的首府，是水陆交通要道，也是重要的航空基地（武汉作战时，敌机从此处起飞，屡屡来扬子江上空袭）。因此，武汉作战之初，我军也有“根据情况占领南昌”的任务。但由于第一〇一、第一〇六两师团的战况，进展不能如意，因此，暂缓执行。攻占武汉后的1938年年末，派遣军又下达了“来年阳春之际，攻占南昌”的命令。

2. 着手作战准备

由于武汉作战是长期艰巨的作战，因此，恢复各部队的战斗力量，尤其是补充干部、兵员；整備武器材料以及充实基本训练等，都成为当务之急。特别是重炮旅团（新式15榴弹炮、10加农炮）、坦克部队（坦克、装甲车二个大队），在武汉作战时，分别配属于各个方面，因受地形限制，未得到充分发挥威力的机会。另外，烟雾喷射器（催泪、喷嚏性毒气）的材料虽也相当丰富，但步炮兵尚未熟练在烟雾下战斗，因此，往往只能小规模使用。

军司令部制定了综合训练及整备器材等计划，并努力指导实施。旅团长澄田睐四郎少将（欧战后曾在法国学习统一运用炮兵群及新式观测通信方法等）负责训练重炮部队。受过训练的炮兵团观测班，在发起作战前一个月即进入战线，进行观测、通信及炮兵配置等准备工作。军司令部并发给了航空照片以及其他敌人资料。第六师团长今村少将（前习志野学校干事）担当在烟雾下步、炮协同作战的训练。对各部队负责烟雾喷射的军官、低级军官进行基本训练后，并举行了步、炮、烟雾实弹联合演习。在白烟笼罩下的步炮战斗，多数的见习人员手里捏着一把汗。以后，第一线师团各部队在准备攻击中，又在集结地附近的民宅设置了毒气室，进行使用防护面具的基础教育。并在附近的沼泽地带，带着防护面具使用折叠船等进行划渡和突击上岸的练习。

坦克和汽车的损坏很严重，在修整上煞费苦心。野战兵器厂存有的零件不够用时，特别派人到日本运来。随着坦克部队的整备，集中了选拔出的两个大队的官兵进行了基本训练，接着在大队长石井大佐领导下，编成了集成坦克团进行了干部训练。

以上整备训练从12月一直进行到翌年2月。各师团也分别增加了补充兵，努力进行基本训练。长期作战，最容易因基本原则的紊乱各自为政等而遭受不应有的损害。因此，特别需要对中、小分队长等下级干部，进行充分的训练。战时经常说：“一面教，一面作战”，可是，说着容易，做起来就难了。

3. 南昌作战以强渡修水并继续突破敌人阵地为开端。敌人的阵地是武汉作战末期以来经过约6个月的时间，沿着

接连河岸的斜坡构筑起来的，纵深达数公里。攻击的正面限制在被鄱阳湖和险峻山地包围着的十几公里的宽度。因此，必须集中力量攻击这一狭窄的正面地区。幸运的是我军除拥有重炮、坦克及烟雾喷射器等战斗力量以外，派遣军还给予了陆、海航空部队强有力的支持。

我和次级参谋天野正一中佐，几次乘飞机从空中侦察了主攻的正面地区，得出完全一致的攻击部署方案。空中侦察出发前，我对天野参谋说：“侦察飞行中谁也不要说话，回来后再提各人的看法。”侦察完了在汉口司令部房间里，听了天野参谋的意见后，我表示完全同意。就这样，一个庞大周密的攻击计划，通过有才干的天野参谋之手制订出来。

4. 使用第一〇六和第一〇一师团为主攻兵团的问题，早在一月份就在我脑海里开始酝酿。随着作战准备特别是兵团各部队整备训练的开展，越来越肯定。2月末经过参谋长的同意，得到军司令官裁决。这个决定是在吉本参谋长认为，“这样确信可获必胜”，冈村司令官说：“作战课长如有信心，就无问题”后立即批准的。前面我说过，当时我丝毫没有察觉到司令官的烦恼。估计是不是司令官在等待着我来提出这个意见呢？

第一〇六师团在武汉作战中始终处于不利地位，因而蒙受弱兵的污名，除师团本身应负一半责任外，军司令部特别是我身为作战课长，对新编特设师团的使用不当应负责任。对此，我无时不耿耿于怀。因此，如有机会就想使其打一次胜仗，以便挽回名誉。攻占南昌，正是不可多得的良机。正因为如此，重点集中了军所有的战斗力量，并在细致周密的计划

下尽最大努力进行作战。

集中全军二百几十门大炮进行二小时的准备轰击；二万只烟雾喷射器一齐发射；陆、海航空部队的有力轰炸（当日因天气不佳临时取消）；将渡河时间定为午后4时30分，这是为了即使不能摧毁河岸敌人的抵抗，继烟雾之后日没时分，也可以强行渡河。因此，对这次攻击实际上是加上了两层、三层乃至四层的保险。

5. 此次作战，第六师团不仅接受了从右翼师团（第一〇六）的西方箬溪附近渡过修水，突破位于险峻山地的敌军阵地，以牵制敌人的助攻任务，并且一开始就分出一部有力部队控制于第一〇六师团的后方。这种为恢复兄弟部队名誉而作出的努力，值得大书特书。在此次作战期间，各师团各部队始终为贯彻军的意图而积极行动，部队之间未出现任何不协调现象，我深深地感到这主要是由于军司令官的威信和统率有方。

以下，虽有某些自夸之嫌，多少也叙述一下我的回忆。

（1）军司令官决定攻击计划是在2月末。3月1日吉本军参谋长转任派遣军参谋长，我提出希望吉本中将在离开第十一军以前将攻击计划确定下来作为留下来的礼物。中将说：“我确信必胜，作战的时候，我一定来观阵。”果然，3月20日开始攻击时，他热心前来视察，当全部大炮猛烈射击的一刹那，他拍着我的肩头说：“祝贺你”，两眼里闪耀着感动的泪花。我虽然因压在肩头的重担一旦卸下，颇感轻松愉快，但想到突然遭到万炮轰击的敌军，一种不可言状的怜悯之情油然而生。我已经没有心绪去理会身边响彻云霄的欢呼声了。

会战后在德安的战斗指挥所庭院中举杯庆祝时，军司令官低声对我说：“宫崎，谢谢你！”使我深为感激，三个月的辛苦劳累一扫而光。

(2)石井坦克团单独前进。坦克团于20日晚安全渡河(我记得有二、三辆坦克沉没)。到22日夜，单独前进120公里，途中缴获炮30门，汽车10辆，马500匹。23日晨，军战斗指挥所接到石井团长“燃料用完，请火速空投”的紧急电报。幕僚们悲喜交集，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想到空投燃料的主意。到傍晚好不容易从各补给厂搜集了15个小桶(每桶装18公斤)，立即用运输机低空投到水田里。从飞机上看到士兵们欢呼着拾走油桶，装满了油的战车也陆续开动起来。但看到奉新南侧有大约40辆坦克和30辆装甲车还在等待时，负责补充燃料的幕僚们，却不得不告以“今天只能补充这些”，随即返回，那时的心情，实有难言之痛。甚至他们以后回到东京时，还痛切地谈起这个问题。

在这方面有以下的插曲。开始攻击的前几天，我交给石井团长一个研究课题：“坦克团不依靠后方的补充供应，采取特殊措施，一气能前进多远？”二、三天后得到的答复是：“如果在坦克的外面绑上小汽油桶，大体上能前进120公里。”于是，我在地图上标定“坦克团第一次目标”为奉新(到南昌250公里正中间的主要道路交叉点)，并以军的命令明确下达。

现代的坦克群首先出现在战场上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英军在堪布莱附近的进攻战斗。战后，英、法、德各国开始讨论使用坦克的问题，在欧洲列强军事界也对之极为重视。但是，大规模用于实际战斗中，则是在第二次大战初期，

德国装甲车师团群对波兰进攻时（1939年9月）开始的。接着是翌年5月有名的对法国的闪击战。1939年3月石井坦克团的单独进攻，比同年9月德军进攻波兰的闪击战还早半年。石井中佐大大显示了日军坦克的威风。

（3）作战的天数和牺牲。战争是一种气势。通过急袭成功地突破敌阵，必然发展成疾风般的猛烈追击。在正面的敌军将领罗卓英（第三十二军）下令重新把八个师部署在南昌北方地区重要阵地的当天（25日），我前线部队即已突破了这一重要阵地。第一线两个师团昼夜兼程，修水渡河后七昼夜即前进约250公里。27日傍晚，乘坐民船，在敌阵前横渡宽达一千米的赣江，完全占领了南昌。

这次作战不仅日期短，而且担任主攻的两个师团牺牲也比较小。我军死伤共960名，其中战死者约为四分之一。在这方面也有一段插话，作战开始前二、三天，第一〇一师团的作战主任E参谋，对于军的攻击计划向我提出了类似抗议性的意见，他说：“从那年上海作战的经验（这话我已听他说过几遍）来看，这次作战至少需要一个月。攻击敌军阵地，估计将有相当多的伤亡。因此，必须在作战中调整阵线和补充兵员。为此，我师团已向留守师团请求配备人员。军司令部在这方面是怎样考虑的？”这不是提意见，简直是质问。我当即清楚地回答说：“岂有此理，军司令部估计占领南昌，晴天需要七天，如有雨天，则一天按两天计算。”并大笑着把他支走。

另外，军经理部长网本主计少将（经常给予我们积极的协助）亲切地对我说：“前年武汉作战之初，因收容伤病员的设备不足，发生了不少麻烦。这次，在德安的兵站医院按收容一万

人左右，建筑了临时病房，请放心吧！”我说：“那可太感激了，可是这次最多也到不了一千人。”网本少将不相信地说：“我可讨厌人家哄我，不过我真希望那样啊。”我的话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但有一半也是我的愿望。至于完全说中，不过是巧合罢了。其中也可能包括我多年研究战史以及从武汉作战中体会到的“灵感”的因素。有关南昌作战，在我的《战史杂谈——统一各种作战力量进行阵地攻击》一文中，有详细记载。

二十六、襄东会战

兹将襄东会战中印象较深的若干事项记述如下：

一、会战计划的要点是对襄河东岸敌军最精锐的汤恩伯部队（武汉作战当时，曾在长江南岸地与我军主力交战，不知何时又转到长江北岸地区）以第三师团从正面进行猛攻，并以我军主力（第十三师团、第十六师团）攻击敌军右翼（因沿襄河西岸有大量敌军守卫），更重要的是将敌军从中间切断，骑兵团则压迫敌后。这是一个极为大胆的行动计划，但这不是由于我的意见，是参谋本部提出由我同意决定的。

二、我自就任军司令官以来，对步兵旅团长、联队长以及各级参谋指挥作战的作风，有以下的想法：

在平素战术研究中，对敌我战斗力的素质大体按同等条件考虑，但这次的实际情况是敌人的素质远不如我军，然而其兵力却经常比我军多十几倍。处此情况下，为完成作战任务必须大胆采取重点使用兵力的战术。尽管如此，却有不少指挥官（平时战术相当优秀）过分担心左、右以及后方，不能随机应变，以致不能获得战果。攻占武汉后，为了不伤害对这些人

的评价，我曾以其他理由请求调走了这样的几名旅团长和联队长。

从以上角度来衡量我军的参谋们，以具有战术教官经历的作战主任为首，大家都能适应现场实际情况大胆提出计划，因此使我非常信任。这次襄东会战计划完全符合我的意图，更加使我钦佩。

三、这次作战正如所料，由于第三师团进行了10天以上的猛烈攻击，牵制并包围了大批敌军。因此，5月10日下达了缩小包围圈命令。虽是空前快事，但第三师团连续艰苦的战斗，第十六师团从外侧的长途奔袭，都可谓劳苦至极。

四、由于飞机不足，使我不能视察战场，5月15日才搭乘大型飞机，由战斗机二架护航巡视各兵团。我未能发现兵团司令部。但只能和第十三师团、骑兵团争取了地空联系，投下了感谢信和慰劳品。当我看到我最挂念的横断敌军背后的骑兵团的行军队伍中，有用好象门板一类的东西抬着死伤者同行的情况，使我放下了心。中途在应山加油，前后在战场上空飞行了五个半小时。

五、这次作战中，并列于汤恩伯部队右侧的张自忠部队，由于受到我军主力从右侧背的猛烈袭击，几乎全军复灭，司令官张自忠也战死，令人惋惜。由此可见我军的作战是多么出乎敌人预料之外。

六、对这个大胆的作战，估计襄河西岸地区的敌军必然出击，为此，对不参加进攻作战的刘谷重炮兵联队，配属了一个步兵大队，守备岳口镇附近地区我军主力的中转要地。果然这个部队受到了优势敌军连续二十五天猛烈进攻，幸由该部

顽强死守，保住了这一要地。可是，这个指挥官默默地埋头苦干，几乎没有报告作战的艰苦情况。军司令部内只注意军主力方面的作战，几乎忘记了这个中转要地。我注意到这一点，前往视察了解到该部队的苦战情况。

有关指挥官的性格我将在以后叙述，作为上级指挥官这是应该注意的事。

注：汤恩伯是蒋介石最信任的将领之一，其部队是蒋介石嫡系的精锐部队。汤恩伯是非常勇敢的将军。我知道他的性格，如果他的一部受到攻击，便亲自率领大军进行反击。后来在1944年的河南作战中，我也利用他这一性格取得了成功。这一情况，我已在本书第三篇“北京的五年”中叙及。

我和汤恩伯曾四次作为敌我双方司令官进行了较量，战后结为莫逆之交。汤将军在东京病逝时，我为治丧委员会副委员长，为之安排了隆重的葬礼。我曾到台北参拜过他的坟墓，彼此有着深厚的友谊。

宫崎注：我很早就非常尊敬和相信军司令官，现在读了将军有关襄东会战的回忆，更加深了这一感觉。概括说来，将军在统率及作战方面都是罕见的名将。具体说来，他兼备明智、卓见、果断、意志坚强等优秀品质。当时的军参谋长、副长，虽然在人格及见识上，也是被大家公认为优秀人物，但与军司令官相比则相差悬殊。

军司令官对我等参谋非常信任，并多次给予口头表扬，使我深感惭愧。这些表扬不仅是对我，更主要的是对辅助我的具有卓越见解，意志顽强和才干出众的天野正一中佐参谋（后升少将，大本营作战课长）的表扬。

1. 一系列短促攻击的意义

南昌、襄东、赣湘连续不断的三次作战，并不是随机应变临时想起来的作战。武汉作战后，随着时间的转移，四周的敌人重新作了修整训练，特别是以武汉为中心在长江南北地区大肆活跃。我军如果只固守中央阵地而无所事事，则很有可能招来难以应付的被动局面。因此在攻占南昌之后，我就抱着春夏之交对汉水东岸的敌人进行短促的彻底打击，然后，到秋季再打击江南粤汉线地区之敌等一系列各个击破的设想。

一般说来军队如果停滞不动，就好象一潭死水一样会产生孳孳。然而如果没有目标，空喊强调训练，也不可能做到严肃认真。因此，必须适当确切地按照作战——休整——训练——作战的这一循环规律进行安排，这对维持军队本身的生存也是必要的。

在各个方面的这种作战，主要应该灵活运用急袭、包围等出奇制胜的谋略，在短时间内予敌人以极大打击。而且，一旦到达作战终止线，则必须及时迅速地返回到原战线。这种返回行动，对第一线部队来说，等于放弃已经付出相当牺牲和努力而占领的地区。同时还会给敌人以宣传击退日军的口实。但如不回到原来阵线，作战面积必然扩大，对其后的警备（作战）将会造成兵力不足。在此种作战中，必须考虑以上各点再确定会战计划。然而，还必须说明，如果只是反复进行此种自卫性质的小规模作战，势将拖向持久消耗战，只要敌人继续保持抗战意志，则无法取得决定性胜利。

2. 使用精锐部队适当兵力的机动作战

南昌的阵地进攻战，是一次果敢的机动作战。参战兵团

有第三师团(藤田进中将,与冈村将军在陆士、陆大同期)、第十六师团(藤江惠辅中将,后升大将,任日本本土防卫关东方面军司令官)、第十三师团(荻洲立兵中将,后任第六军司令官)、骑兵旅团(小岛少将)等,都是身经百战的精锐部队。各兵团长也都是赫赫有名的勇将,是一个完全可以采取果敢行动和出奇制胜的阵容。

3. 作战构思与奇袭猛进

军司令官以下首脑,在攻占南昌即将结束时,分乘三架轻运输机于3月31日返回汉口军司令部。在作战室匆匆庆贺后,立即着手考虑下期作战方案。其主要内容是,利用右翼第三师团前面大量敌军的活跃行动,从5月初开始采取各种手段牵制敌人,同时近日内将第十三师团、第十六师团、骑兵团完全集中于汉水东岸地带,于5月初旬沿汉水东岸开始急袭进攻。就是说,右手牵制、压迫敌人,左手从敌人侧背向右迂回将其紧紧包围。并使骑兵团沿第十六师团左外侧之汉水左(东)岸猛进,进行第二层包围。军司令官4月17日批准了根据上述意见提出的会战计划,并且信心百倍地表示完全同意这一计划。前几天向参谋长提出时,参谋长还因放弃已占地区的问题而犹豫不决,但对此,如前所述,我已做了充分研究的说明。

作战按以上计划顺利进行。发起攻势的各兵团,到处击破面临之敌,7天内几经战斗,迅猛进击(最左翼的骑兵团前进约300公里;左翼第十六师团前进约270公里;中央的第十三师团前进约200公里)给予敌人很大打击。这样,各兵团于5月12日左右,到达预定的终止线后即开始返回。约用8天

时间大体返回原出发地附近。此次会战于5月下旬结束，可说是一次短促果敢机动作战的典型。

4. 贯通上下意志与人和

此次会战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效果，当然是由于上述第一线各兵团的勇猛作战，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军司令官统率有方。原来，江北的这些兵团，在武汉作战时，属于第二军（东久迩军司令官属下），武汉作战后才改属第十一军。冈村将军屡次会见新近隶属自己部下的各将军，还亲自遍访第一线各兵团司令部，互相沟通思想。各兵团长也积极体会军司令官的意图，彼此紧密联系融洽无间。藤田师团长虽和司令官是陆士、陆大的同期生，但在公务上表现了使人敬慕的服从态度。藤江师团长精力充沛，学识渊博，荻洲师团长则以勇猛果敢而著名，能够掌握这些各有特长和个性的优秀将领，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藤江、荻洲将军是在陆大直接指导过我（宫崎）的教官，藤江师团的参谋长石田保忠大佐（有名的“石田战史讲义”作者保政大佐之弟）是我在陆大的同期生。藤田师团的参谋长远藤新一大佐是我在陆士的同期生。骑兵旅团参谋森茂树大佐也是我在陆士和陆大的同期生。彼此间关系极为亲密，在各个方面都能很好地与我合作。在幕僚同事之间也保持了良好的友谊关系。总之，平素善于识人、善交益友，一旦有事，特别是在战场上，便是巨大的无形力量。

附记：

（1）关于敌将汤恩伯

我对汤恩伯将军有较深的印象。将知将心，对于勇将，其

敌手也会表示敬意。我作为冈村司令官的作战参谋，在攻占武汉、襄东会战、桂柳作战（1944年秋）中，曾三次和汤恩伯将军交锋。将军经常出现在最激烈的战场上。武汉作战中，由于他在我军主攻阵地前，用优良装备的无线通信，每天向蒋介石报告战况，因此，我军曾一再轰炸汤恩伯的军事司令部。襄东会战时，我从飞机上看到趁我军渡过汉水时机，猛烈轰炸的情况。桂柳作战时，他从贵州省东部边境，曾威胁到我军的侧面。战争终了后，我每每想能得到和将军面谈的机会，以便表示歉意。

冈村将军“战争是战争，武将爱武将”的性格，敌人方面当然也会有此同感。因此，停战时以及其后被扣押中，受到汤将军及蒋介石方面的优厚待遇，也并非事出无因。

（2）冈村将军唯一的愤慨

5月14日（会战终了时），我的日记上有下述记载：

军司令官在午饭及晚饭时，对以下问题透露出极大愤慨。这是在过去或以后都没有的情况。他说，

“当这次会战时，大本营竟特别下达大陆命令，派遣军根据我们的计划于事后下达作战命令，这是表明对身负军事重任的军司令官冈村的不信任。会战过后，我不能对此置之不理。

“军当初即已言明本次会战达到预定目标后即返回原作战地区。尽管如此，仍以大陆命令发出同样指示，并以参谋总长名义指示返回原作战地区。似此做法，是把应由军司令官执行的任务不去委托军司令官，而由东京一一发出指示，这说明不需要军司令官。我从东京出发时，虽然和板垣（陆相，同

期生)约好今后不提任何不同意见,但反复出现这样问题,我只有称病告退。”军司令官的这一愤慨,我体会到也是向我们训示负有辅佐统帅之责的幕僚应该懂得的道理。身为幕僚者必须善于体察为将之心。

大本营和派遣军的幕僚,可能是鉴于以前的某些事例,为了提起注意再三关照。但是,这种关照却有损接受命令者的威信,甚至招来使发令者丧失威信的后果。这是辅佐大军统帅的幕僚必须特别注意的问题。

二十七、内地情报(其一)

从内地来战场慰问的人很多,有不少政界、财界人士,各府县代表等,谈到日本内地情况。其中,使我铭感最深的是初次见面即对我透露了机密事项,满怀忧国之情的前企画院总裁泷正雄氏(据称是近卫文麿公的亲信)的谈话。时间在1939年5月12日,主要内容如下:

1. 旧腊御前会议时,平沼男爵预先和我联系,在御前会议上将对是否有足够的物资支持长期战争的问题提出质询。为此,召开了内阁有关五大臣会议磋商如何回答。会上池田藏相说不能保证长期物资供应。但在御前会议上不能那样回答。因而决定另找遁词,只说与英国缔结友好关系以保持长期物资供应的方针,以此答复质询。

2. 近卫(三原则)再次声明的动机,主要是策应汪精卫的工作。

3. 有关物资动员计划,去年陆海军意见对立,甚至在会议中陆军的横山少将竟忿然离席而去,后经池田藏相调解,陆海

两相才在酒宴间举杯恳谈，逐步趋于解决。但进入今年以来，又处于对立状态无法解决。

4. 物资动员计划的前途，不容乐观。中日事变速决论高涨起来。在政界、财界亲英论抬头，而对陆军抱反感，以及反对接近德、意，特别是反对缔结德、意军事协定等论调也逐渐兴起。宛如明治初期征韩论时代及日俄战争前征俄论时代的再现。然而，持中日事变速决论者，却似乎并无妙策。

沈正雄氏征求我对上述问题的意见。我身处最前线，不了解内地情况，但以多年研究中国问题的资格，对沈氏的诚意，直率表达了以下看法：

(1) 帝国只要在大陆发展，结局就不可避免和英国势力冲突。但是，根据我国的实力，现今应暂时忍耐，与英国保持适当联系，设法迅速解决中日事变。但就华中而言我方应以比过去具有更优越地位为条件来与英国商榷。否则，我官兵白白牺牲，我等身处第一线者不能悦服。

(2) 近卫声明只不过说明将来的目标，对解决事变毫无用处（沈氏也以为然）。按照这一声明及现在的作战体制，如旷日持久，仅我占领地区以内，也很难收拾。满洲国尚未巩固，进而处理庞大的华北、华中、华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确是极大难题。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3) 此时，我等正面临必须作出抉择的重要关头，即或是断然进行一次大进攻作战，与重庆一决雌雄，或是决心作出一大让步，力求与重庆握手言和。

我认为汪精卫的工作，只不过玩弄小技，反而会造成与重庆解决事变的阻力。我心中虽然反对，但此时并未言明。

此外,就在这一时期,从日本内地传来了南进论抬头的情报。我相对地反对南进论,仍然站在北守论的一方。在不能确保本国后院——日本海和平的情况下,就去遥远的南方修建别墅,乃是本末倒置。在以舞鹤(日本京都西北的重要海港——译注)作为要塞或镇守府的形势下,我认为占领海南岛或属可取。但是,南进论则应在确保后院日本海的绝对安全后再为考虑。这就是我相对反对的道理。

二十八、反对汪精卫工作

1939年3月6日的感想

最近从重庆逃出的汪精卫发表了和平声明,似与我国的和平工作有关。但是,这对于我等处于第一线的人来说,在作战上无任何影响。

中国的政治,现在仍然是掌握武力实权的说了算,仅靠言论的汪精卫,能否导致和平确属疑问,毋宁说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

中国军队中,在兵力、素质、装备、团结等方面占绝对优势的是蒋介石嫡系黄埔系的部队。即使东北系、西北系、四川系、广西系、广东系等地方部队都联合起来(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也敌不过蒋的嫡系部队。共军虽然勇敢,团结巩固,其政策也博得青年人的好感,但其实力到底远不如蒋的嫡系部队。

我国指导战争的当局,满足于汪精卫的脱出重庆,并考虑将来以他为中心建立和平的中国政府。但以此等临时政府压迫重庆,不过是白日作梦。如果借此搞重庆和平妥协工作,不仅至为困难,还可能适得其反。

至于“不以蒋介石为对手”的近卫声明，只不过是懂中国国情，徒为解决事变增加困难而已。

另一方面，共军利用事变的长期化，必将更加强大。当前国共虽联合抗战，但冰炭本不相容，将来两者之对抗，事在必然。共产党背后的苏联，实乃日华两国共同之敌。

现在日本正处于应与重庆调整关系的时机，汪精卫工作反而不利于这一调整，我所以要反对。

如前所述，我在第一线从事作战，对传到前线的这些杂音，并非全不关心。在作战日志中时常记有我的感想。兹摘录一端如下：

9月27日偶感

身为指导国家战争的最高人物，必须不断研究19世纪以来，特别是最近战争的本质及其领导方法，使自己具有高度的信心。

对中国事变，从当初指导战争的根本方针，以及对作战的具体指导，均极不彻底，极不统一，而且缺乏主动性，这种情况显然越陷越深。

其一，事变爆发当初的不扩大主义。

其二，攻占南京后，不以蒋为对手的声明。

其三，攻占武汉后，近卫的声明。

其四，为拥汪建立新政权盲目奔走，并以此作为唯一目的建立总军司令部。

兹述若干感想如下，以供他日的研究。

(1) 全盘贯穿着对现今中国要求国家统一的觉醒判断错误——迄今未改变以过去的旧中国为对手的作法。

(2) 轻视对作战成果的期待，政治谋略的不统一，以及醉心于建立新政权的工作。

错误判断蒋的为人及其实力。日本政情不稳，特别是内阁更迭极为频繁和陆海军之不统一，在心理上给对方以自信。

(3) 由于陆军当局的强硬态度，丧失了早期解决事变的机会(即由于忽视了他们的所谓面子)。

事变进入第三年，在转向持久消耗战时，不得不发表以处理中国事变为第一的方针，尽管如此，只不过使对方认为是空口说白话而已。

宫崎注：有关“二十七 内地情报”及“二十八 反对汪精卫工作”等政治问题，司令官过去未曾透露，现在读了这些材料，对司令官的一心为国及其真知灼见，不胜敬佩。

关于汪精卫的工作，对我这个以战场为主，负责作战业务的人来说，并未特别关心。但在作战日志上经常记载自己简单的感想，因此，摘录一二如下：

“7月10日，最近到上海的汪精卫对南京总司令官的访问，以及为此而进行的狂热活动，听来不胜惊异。为何费尽心机要以汪为中心打开如此重大局面！？这样反使敌人看透我方的内情，而招致相反的结果。如果觉察到汪的主张，只不过是向重庆照搬日本方面解决事变的根本方针，日本最高首脑部则有再次检讨当今这一根本方针的必要。根据前者来汉口的派遣军铃木参谋副长透露，总理以下五位大臣都捧汪上台，陆军大臣甚至热情地表示将根据情况亲赴香港欢迎，想来实在可怜。这也可能是井蛙之见。

“7月10日，昨(9日)夜，汪精卫通过电台向重庆广播了

他的声明。今天创刊的《中华日报》上发表了第六次宣言的长文。其主要内容是述说他对中日关系的一贯意见及重庆方面的情况以及他对日中合作促进和平的抱负。毋庸置疑，声明内容是出自日人之手，重庆也完全清楚。声明冗长，缺乏气魄，不外是诉苦和自我辩解之词。汪的背叛对蒋来说虽是恨事，但蒋在强硬派的包围下，除更坚定地进行抗日外，别无他途。我等服务于第一线者，也只能更加奋战而已。”

二十九、对小学校长团的讲话

1939年5月17日有东部日本小学校长慰问团，同年5月26日有西部日本小学校长慰问团，6月11日有大阪市西区小学校长慰问团，6月13日有鹿儿岛县小学校长慰问团（少数）等，相继来前线慰问。他们要求我讲话，因为他们都是身负国民教育重任的人，所以，我根据自己先前对“战场上反映的国民精神”的论点，大体谈了以下几个方面：

1. 内地传说，我军官兵在战场上临死之际，都高呼天皇陛下万岁、日本帝国万岁。但实际上在战场没有喊日本帝国万岁的，只喊天皇陛下万岁。平时，内地认为此两者几乎是一回事，但在战场上只限于前者。对这一差异应有所认识。

2. 我官兵在进行总攻前夕，给家乡的父兄、恩师写信。如果问他们这时想些什么？他们的回答几乎都是，只想着母亲、家庭和家乡的事情。从家乡出发时受到盛大欢送的情景，始终萦回在他们的头脑中。这就是为了家乡，为了家庭名声，使他们怀有不能做出卑怯举动的心情。人在临终之际，浮上眼帘的是自己的母亲。

3. 一旦投身于激烈战斗的旋涡中,此时,没有了家乡也没有了家庭。士兵仰视着军官,军官注意着士兵,只是忘我地进行战斗。临死之际,高呼着自己最亲近的人物的代表天皇陛下万岁而死。也有率直地静静叫着“妈妈”而死的。

以上不是理论,而是传统的事实。也是我自日俄战争作为小队长从军以来40年的体验。

4. 在这40年中,我官兵这种视死如归的勇敢精神毫未减退,使人大为欣慰。但在战场上的道义,特别是对现地居民的道义,比过去显著降低,则是不应掩饰的缺点。日清战争、日俄战争、北清事变当时的日军,无任何掠夺、强奸行为,被誉为神兵,这是为许多外国人写的材料所证实的。然而,同样的日本人,现在却有不少人对当地居民有虐待行为。嘴上高喊“圣战”,高喊“八纮一宇”,但事实却与此相反。今昔对比,使人难以想象。

我们身为指挥官,固然责任重大,但大部分士兵是从内地社会直接到战场上来的,所以社会的责任也很重大。

5. 缺乏公共道德,虽说是日本人由来已久的通病,但现在越来越为严重,这种情况,不乏实例。

以上两项,我认为与其说是军队之罪,莫如说是国民之罪。

6. 与平时比,同心同德精神的加强,在生死与共的战场上,就更有必要。驻在汉口北方长轩岭村的某部队,听说家乡慰问演剧团要到来的消息,大为喜悦。但偏巧敌军来攻,部队出动将敌人击退,有四名士兵战死,当携带战死者遗体返回时,正逢慰问团到达。部队长叙述了以上情况,本想谢绝慰问团

演剧，但一会儿改变了想法，把战死者遗体摆好，好象他们还活着一样说：“你们早就盼望慰问团的到来了，所以还是演出吧。”就在事前预备好的简略的临时舞台上进行了演出。当慰问团来访问我时，流着眼泪报告说：“我们虽然演出了多少年，但在尸体面前演出这还是第一遭。”

7. 充满诚意的谎言

出征官兵如发生负轻伤或因病住院等情况，并不通知其家乡，而按健康服役中进行通信。家乡方面如有出征官兵的近亲发生不幸等情况，也决不通知出征者。互相说谎，这是可贵的谎言。攻占武汉不久，全军突然发生了二、三千名疟疾患者，实际不是突然发病，而是在攻占武汉以前就隐瞒下来的。

8. 根据我在战场的体验，我希望与其发扬国民精神的优点，莫如从教育上重视矫正其缺点。

对我以上的讲话，给我寄来感谢信的，不过一、二人而已。

三十、昔日之军队与今日之军队(今昔感之三)

我的今昔感已于第三、第二十节中有所叙述。但此事是我在战场生活的最大感触，因此，再将1939年6月末感想的重点叙述如下：

1. 思想道义上远不如昔日之缺点，已如前二节所述。

2. 优于过去之点是独断能力大见加强。过去是按照中、小队长的一声号令，多数士兵一齐活动的散开战法，下级官兵发挥其独断能力的范围极小。然而现在也是散开战法，可能由于文化上的提高，从而在战场上，下级官兵以自己的独断能力取得战功的情况也多了起来。如：

(一) 夜袭时沉着的某分队长，仔细观察到因我方故意喊话，诱敌猛烈射击的情况，确认其火力弱点，趁下次攻击时，单身突入该点，掌握了动摇敌阵的关键。

(二) 利用地形地物，单身潜入敌阵，进行成功的奇袭，夺取了最威胁我军前进的敌军侧面防御工事等等。这些在过去是没有的。

3.“不怕死”的忠心虽比过去似稍降低，但作为民族性的美德，大体上还无多大差别。

总之，现在的军队与过去的军队相比，在服从性、耐久力、战场室内工作及刚毅性等方面，均有所降低，而在个人战斗力方面则有所提高。

至于军队的战斗力，现在的军队虽略逊于过去的军队，但尚无多大差别。从日本全国的地方性格来看，还是东北兵和九州兵较强。

三十一、关于赣湘会战

关于军的作战指导问题，因宫崎中将的札记中已作了叙述，于此，仅就二、三琐事回忆如下：

1. 在大作战开始前夕，根据可能的条件，我遍访了各个兵团，进行训示和恳谈。这次，于9月13日首先飞往安义，访问了第一〇六师团；17日又乘飞机和汽艇到江岸的城陵矶访问了上村支队；并进入洞庭湖在岳州登陆，访问了第六师团；18日乘火车和汽车访问了较远的大沙坪的第三十三师团；19日午前乘汽车访问了桃林的奈良支队；当天午后到达咸宁的军战斗指挥所。

这些访问，使本来就忙碌的各兵团司令部费了时间，又使用了警备兵力。陆上行动时，派出了约一个中队的警卫部队加以保护，所有这些都给各兵团添了不少麻烦。但是，兵团长以下的官兵大体上都非常欢喜。我看到他们那士气旺盛的军容，也放下了心。虽然出巡访问给他们添了一些麻烦，但起到鼓舞军心的作用，收获还是很大的。

2. 9月21日第一〇六师团北川参谋来访，听取他对奉新、高安方面奇袭迂回作战经过的汇报。这次作战，损失很小，成果较大。过去曾被人指责不顶用的这个师团，从南昌作战以来，发生了与前判若两人的变化，使我愉快，也使我放心。

3. 此次会战，我最注意的是从驻在北方的第三师团抽出来的上村支队的行动。因为该部队既不熟悉江南的地形，又要进入洞庭湖在敌前登陆，而且要求他们采取大胆行动，楔入敌军侧背。最初还仰仗海军方面的协助，同时并将当时被免去关东军参谋转入我军司令部的辻政信中佐，派往该支队担任主要幕僚。9月23日拂晓，接到该支队在营田登陆成功的紧急报告时，才放了心。其后该支队以机动舟艇圆阵（将后方机关置于中央），突破敌阵等特殊战例，成功地切断了敌军主力的退路。12月21日，我飞往该支队驻地应山，亲手颁发了奖状。

4. 9月29日，我照例乘大型机，遍访了战斗中的第一线兵团长。飞行中与第三十三师团长、奈良支队长、上村支队长取得了联系，投下了奖励、感谢辞和慰劳品。在飞机上，虽然看到了第六师团长长的行军队伍，但对方未展示对空联络信号，终于未能同该师团长取得联系。

5. 军的主力既已进入长沙平地，长沙又在眼前，如乘势进攻，占领长沙并不困难。但根据本次会战之目的，在大量击溃敌军后，不得不回师原地。

本会战期间，最早任军司令部作战主任参谋的宫崎周一大佐，调任为联队长，自第十一军建立并出动以来，曾参与本军作战的幕僚，至此已全部调走，使我有不胜寂寞之感。

宫崎注：“赣湘”会战，是在东至江西省（赣）的赣江，西至湖南省（湘）的湘江，约 250 公里的地区内进行的作战。因此，命名为赣湘会战。作战发动前夕，军司令官乘飞机、汽车、汽艇遍访了各作战兵团支队，这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唯有将军那样自发的热情和不减壮年的体力，才能作到这一点。

根据作战日志，摘录本次作战特点如下，

(1) 作战目的和投入兵力

作战目的与襄东会战相同，在于急促彻底打击逐渐活跃的江南敌军，以保证我军的安全，即所谓自卫战斗。

参加作战兵力为三个师团（自西排列为第六、第三十六、第一〇六）和两个支队（各自以步兵一个联队、炮兵一个大队为基干，即由江北师团抽出的上村支队和奈良支队）。据判断，敌兵力最初约有二十五个师。

(2) 地形、道路网与作战的特点

纵观地形，沿洞庭湖东岸粤汉铁路线以外地区，比地面高千米以上的山地连绵不断。特别是湖南、江西省境的万洋山脉纵贯南北走向战场的中央，其东部山岳地带更为险峻。而且通向南北的辐重车辆的大车道只有到长沙的和通往东西的两条，此外，可以说别无他路。山地通道多是驮马道，辐重车

辆只能勉强通行。

敌军自武汉作战末期，即在各要地构筑阵地，特别在粤汉路西侧地区，其纵深阵地占据新墙河南岸（岳州南方约 30 公里，迫近我警备地区南端）及其南方约 40 公里的汨罗江南岸。后者在其阵地西端迂回于营田附近（流入洞庭湖的湘江沿岸），以防备日军从水上登岸。

从地形及敌军阵地构筑情况观察，除西面洞庭湖畔局部地区外，我军不得不向凭借山地的敌阵进攻。襄东会战是对企图向我进攻的敌军进行机动作战，故有较多机会采取急袭或包围战术；但此次作战却只能强攻挡在山地进口的敌军阵地。这恰似日俄战争时，我第一军渡过鸭绿江向山地进击的情况。唯一的妙策就是用一部有力部队，利用水路（扬子江、洞庭湖、湘江）向粤汉路沿线（敌防卫重点）的敌军阵地背后突击上岸。上村支队（从第三师团抽出）承担了这一重大任务。

如前所述，作战正面中央的约 200 公里的地区，全是连绵不断的险峻山地，不宜用大兵团作战。因此，作战部署当然要分为两方面，即西面的军主力方面及东面的奉新附近的一部（第一〇六师团）方面。

（3）会战的设想及准备概要

会战的设想及经过大要，分别按西面军主力方面及东面的一部方面叙述如下：

（一）军主力方面

第六师团与其东翼的奈良支队，并列指向岳州南方粤汉路东侧地区（敌防守重点）的中枢地带。与此相配合，左右两侧各以一部兵力切断敌军主力退路。即，右侧的上村支队自洞

庭湖由水上南下在营田强行上岸，突破迎面敌阵向东南方旋转。中枢左（东）方的第三十三师团突破通城前面敌军阵地，自西南方汨罗江河谷向西方旋转。主要是采取对正面中枢与两岸的旋转进击相配合的方法，以取得包围的效果。预定9月下旬发起攻击。

（二）一部（第一〇六师团）方面

奉新附近的第一〇六师团，以主力部队第一次战斗突破迎面敌军阵地，向南方高安方向进击。紧跟着进行第二次战斗，师团主力返转回头，击破西北山岳地带之敌向三都（修水河畔）方向突进。第一次战斗预定在军主力方面发起攻势之前一周左右。

（4）会战经过及成果

各方面的进攻，自9月末（军主力）至10月初（第一〇六师团）达到终止点，其后各兵团大体于10月10日（军主力）至15日返回原驻地附近。

敌军的抵抗，除上村支队在营田附近的战斗外，均不甚激烈。此次战斗，敌军的退却较早，敌军将领似欲避免兵力的消耗。结合一、两个月后敌人发起的“冬季攻势”来分析，证明敌人的抵抗意志不容低估。

（5）准备会战的经过

根据作战日志，简要摘记本次作战的有关事项：

（一）7月18日，南方敌军呈现活跃，有必要先发制人，予以打击。

（二）7月26、27日，第六师团前面的敌军蠢动状态显著，9月左右应打击一下。

(三) 8月1日,向上级提出攻击江南敌军的意见,取得同意。

(四) 8月9日,设想会战方案。预定9月中旬发起攻势。天野参谋积极协助提供意见。大致确定参加的兵团、支队及配合部队(海军、空军、船舶部队等)。

(五) 8月15日,决定会战指导方针纲要,16日,军司令官予以批准。17日,向参谋长以下参谋及各部部长,主要部员,说明准备要项(保密及作战资材、后方供应等)及具体细节。

(六) 8月18日,有关师团参谋长及作战主任集会,说明并协商会战主要事项。

(七) 8月19日,飞往南京,向派遣军司令官报告及联系请求事项(空军配合及配备船舶等)。感谢吉杰参谋长及公平参谋的积极协助。

(八) 8月21日,估计会战前景、进度及伤亡情况(估计各兵团伤亡各约四、五百人)。据日后调查,战死约850名,负伤约2,700名。

(九) 8月26日,完成军会战方案文件及准备的联合命令。获得批准。

9月1日各师团参谋长、支队长集会,传达方案和命令,并予说明。

(十) 9月11日,决定陆海军作战协定。

(十一) 9月13日,随军司令官去安义(第一〇六师团),进行说明。

(十二) 9月14日,设立咸宁战斗指挥所。

(十三) 9月15日,第一〇六师团发起攻势。23日待机的军主力部队(上村支队、第六师团、奈良支队、第三十三师团)发动攻击。

(6) 会战主要经过

各兵团的战斗、追击及返回原驻地的详细经过,不加赘述,仅摘记二、三特殊行动如下:

(一) 上村支队,活动于洞庭湖、湘江水上,击破据守阵地的有力敌人深入敌军主力背后的企图,是冒险行动。在迫近发起攻势时,洞庭湖水位剧降,当接到上岸地点附近水深约为一尺的报告时,甚为焦虑。势必减少摩托艇的装载量或依靠空中侦察沿弯曲的航道前进。

9月25日天明,从飞机上看到船队的先头部队已到上岸地点(营田)并开始战斗的情况,心中甚为感动。

支队突破敌军前线,排除来自左右两方面的反攻,将伤员与后方部队集中一起,全力以赴继续突进。28日进入东南方80公里的上杉市,切断了敌军主力的退路。敌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阵营,就在其南方仅30公里的长沙。

支队由于此次会战的功绩,会战后不久军司令官授与感谢奖状。

(二) 第三十三师团(甘粕重太郎中将)

第三十三师团是新编师团,4月初到达汉口地区,由军主力方面的东翼通城附近出发,击破迎面据守阵地的约四个师的敌军,向汨罗江上流河谷西南方追击。其后,与从东南突进的奈良支队在献钟会师(9月30日)。继之,转回东方在三都与从南方北进中的第一〇六师团会师(10月6日)。进而,转

进北方山地击破辛潭铺附近的残敌（10月15日）。虽无大的激烈战斗，但在22天时间里，踏破山地，纵横超过300公里，作为新编师团的初次战斗，确是大好成绩。

（三）第一〇六师团（中井良太郎中将）南昌作战面目一新的这一师团，结合新师团长的积极意图，第一次由奉新附近向西南方旋转攻击，击破敌军约六个师（9月15日到19日）进入高安。继之，主力回转击破敌军约三个师，进入西北方之三都，与东进而来的第三十三师团会师。

以上是有关作战事项。再将有关军司令官的体验，附记一、二如下：

（一）冈村将军随时随地注意作战焦点，并于事前事后前往视察。或与兵团长及官兵亲切会面，或说明意图鼓舞士气，或对勇敢善战部队表示感谢、慰问，或倾听官兵特别是下级官兵的实战谈话，受到感动引以为快。关于这方面的体验，将军屡有记载，我在业务许可的范围内，每次都争取随行，通过学习将军的实战经验，我受益颇大。

我想起了过去读过的书中拿破仑说过：“我去，我还要看。”他在四十多次的战斗中，驰骋在战斗焦点，亲自用眼观察。据说，前线的老兵齐声欢呼迎接这位骑白马的将军的出现。

（二）将军在这一期间的最后记述有关我（宫崎）的调出，使我深有感慨。

在军司令部与冈村将军离别，使我感到孤单。但是，从战斗指挥所直接调任北满诺蒙汗战后不久的联队长，多少使我得到安慰。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我对联队长这一职务期待已久。不用说和寝食与共，曾给我很大帮助的同事们分手，就是

和过去八年来亲近的爱马“民桐”分别，也很痛苦。

在老百姓家里的蜡烛灯光下，由军司令官为首的指挥所全体军官参加的送别宴会，也非常富有野战风味。与我的立场和性格也很相称。

在送别会上军司令官的讲话，使我感激不尽，仅从日志中印象最深的事项摘录一、二如下：

“本军建立以来，宫崎是名副其实的中坚分子……其辉煌战功已是众所周知。”

“你干得太好啦！谢谢，至死难忘。”

“王爷（冈村将军给我起的绰号）叱责我说，军司令官不应在那样的地方露面。”冈村将军一边说，一边大笑。大家也哄堂大笑。

对此，有必要稍加说明和解释。所谓“王爷”是将军因为我固执，坚持己见、任性而给我起的绰号。将军虽然没有直接这样叫过我，但年轻的人们却经常从军司令官处听到他这样称呼我。

所谓“那样的地方”是指拥有很多漂亮姑娘的名叫“曙”的高级餐厅。那是在一次师团长集会后，军司令官准备在“曙”餐厅设宴招待时发生的事情。我因为这次宴会还要讨论公务问题不同意在该餐厅举行，但并没有直接向司令官提出，而是向参谋长提出的。当然，不会有叱责等冒犯之事。可能我的意见被采纳，宴会是在作为我等幕僚宿舍的汉口饭店举行的。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记得满洲事变时，曾听到某将军在装甲车护卫下，住在哈尔滨豪华饭店的传闻，大家对这种恶行极为愤怒。同时，我一直认为幕僚应当坚守有言必谏的

信条。现在想来，当年自己年轻气盛，冥顽不灵，确实值得反省。

三十二、人事局长来访

1939年12月5日，野田人事局长来访，就军内人事及高级人事问题秘密谈话约一小时。他特别问我有无担任下届陆相的意思。我认为按就任的顺序比较妥当，故而推荐了梅津氏。但局长还是执拗地劝我出马。因此我说，如实不得已愿效犬马之劳。这不过是由于局长过于热心，我在礼节上的回答而已。正如我在“反对汪精卫工作”一节中所述，我从根本上反对中央的政治和军事的政策。即使我就任陆相，靠我一人之力，要想改变现今中央的风气，是根本办不到的。如果到那时，我也要预先做好坚决辞退的打算。

三十三、关于1939年冬季作战

第十一军的各兵团在攻占武汉后，部分进行改编、替换。1939年末，军将七个师团及两个混成旅团以武汉为中心，配置在长江南北一带。当时处于被一百多个师的敌军包围的形势之中。

敌军的战斗力尽管低劣，但在这一有利形势下，完全可以预料敌军将试图发动大规模攻势。果然，从1939年12月上旬末到一月中旬末，敌军发动了约40天的冬季大攻势。敌军出动的部队，江北约39个师，江南约32个师，共约71个师。我军在局部地区虽也陷于苦战，但由于敌军统帅无能，到处被我军击退，蒙受重大损失。兹将这一期间印象较深事项，略述

如下：

1. 为视察第十三师团，我于12月13日由汉口出发飞往应城。此时，我也听到沿汉水的第一线已发生战斗。但认为是常有的情况并未介意。14日，在卫兵保护下，与田中师团长乘汽车到达第一线安陆。在瞭望对岸敌军阵地时，据旅团长报告，在南方地区正与渡河进犯之敌战斗中。在该地野战医院进行慰问时，也听到了枪炮的声音。但当时认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就在该地住宿。

次日(15)到南方的旧口镇时，才知道立花联队长，从前天即去南方几里的战线与来攻的敌人作战，不在营中。在枪炮声中，慰问了前天以来住进野战医院的30多名伤员，发现其中有几人受的是刺刀伤。我立即对田中师团长以及随行的幕僚说：根据平时的调查，中国军队中受过拚刺刀训练的只有中央嫡系的精锐部队，这证明驻在宜昌附近的中央嫡系部队已经出动，我军也必须全力以赴。

当日午后东行到天门后，奈良旅团长报告，这一地区自前天以来受到敌军的进攻，大队长战死，另外还伤亡百余名。当夜宿于此处。就在这天夜间，我归途中的后方联络线上的两座桥梁，被敌人游击队破坏。通过这两天对第一线视察的结果，我判断敌人的大攻势即将开始。果然，当我16日回到汉口时，我军全面受到敌军进攻的报告，已雪片似地飞来。

2. 军司令部对各兵团的战斗力的信心，认为敌人来攻，没有什么了不起，并不过于紧张。12日以来，敌人从各方面的进攻，到17日左右暂时都被击退。其后，敌军以波浪状态持续了约一个月的顽强进攻。到12月末敌我伤亡累计，我方

死伤约 2,000, 敌遗弃尸体超过 11,000 具。

3. 到最后受到敌军顽强、频繁反复进攻的是第三师团的信阳和应山方面, 第十三师团的襄河河畔及第六师团的崇阳和通城方面。

各兵团或将敌引至阵前予以歼灭, 或运用谋略将敌消灭于阵地之内, 或隐忍待机猛然反攻, 或以少数兵力转战南北挫败敌军各个进攻, 或远出阵外机动捕捉歼灭敌人。这样, 采用各种临机应变的谋略, 坚持 50 天之久, 勇敢善战, 终于挫败了敌军的企图。

各兵团是非常辛苦的。

4. 军司令部也根据各方面的战况, 以航空兵团和直辖部队对各兵团予以支援, 并指示兵团间相互增援。工作虽紧张忙碌, 但士气极为旺盛。连续的晴天, 有利空军的支援, 也是一大幸事。海军照例也给予了大力协助。

5. 敌人统帅无能, 在如此大攻势中, 缺乏战略联系而各自为战, 此亦我军的一大幸事。

6. 1 月 16 日左右, 敌人的所谓冬季攻势, 终于结束。

关于敌人的冬季攻势, 天皇陛下曾有训示赐与参谋总长及军令部总长。在接获这一内容的来电后, 1 月 20 日军司令部全体举行了奉读仪式。这时, 我才得知敌人的冬季攻势已引起圣上虑念, 并使中央不安。

三十四、内地情报(其二, 并附感想)

除军务联络外, 来军中慰问的政界、财界、教育界、舆论界各方面人士颇多。这些来访者, 几乎无人考虑到不应向第一

线战士诉说内地情况，以免产生后顾之忧等问题，相反，全都泄露了令人不愉快的内地情况。

至1939年秋冬之交，综合这些来访者所诉说的内地情况，概要如下：

1. 农村一般比较紧张，但大城市中看不到战时的紧张情况。百货店、娱乐场所、花街柳巷等，反而繁荣起来。

2. 由于经济统制及物价统制，国民生活相当穷困。但黑市猖獗，贪图私利的奸商到处横行。

3. 战争已两年有半，财界及知识分子阶层内部厌战情绪逐渐浓厚，怀疑当局解决事变的能力，结合诺蒙汗战败的谣言，反陆军的风潮逐渐抬头。

4. 国民精神动员未获成果。国民本身自主的团结运动也未兴起。不少人非难政府：“由于政府不把事实真象告诉国民，因而国民无法与政府合作。”

5. 欧洲大战爆发后的对外政策，表面上还处于原来状态，但从内部动向来看，则有主张与英美接近的传统派，有主张与苏联结合解决中日事变的一派，有主张与德、意轴心合并的一派等，各派对立，意见不一。

6. 各界特别是政界，缺乏卓越人物，在内外形势紧迫下，缺乏定见。对现在和将来抱悲观态度者甚多。

我们身处于第一线者，迫切希望国民的大团结，但听到的却是国内一片混乱的情况，当然很不愉快。

1939年12月号《文艺春秋》的“话篓”栏的一节中有如下一段，实有同感。

“最近从海外归来的友人说，恐怕没有任何国家象日本的

报纸、杂志那样专挑内阁毛病的。不管内阁如何变化，在似无可能出现更有力的内阁的现状下，如何支持鞭策现内阁，使之担起解决中日事变的重任，这才是顺应国策的道路。在事变中内阁几度更迭，其本身就是向世界暴露了日本的虚弱。”

果然，本月30日接到的日本内地报纸，传出了政局动摇的消息。我作为第一线的人，实感痛苦。

翌年1月8日的内阁会议，发表了决定关于建立中国新中央政府的基本方针的报道（我个人反对这一方针的情况，前已述及）。我原以为以此为转折，工作可能大有进展。不料六天以后的1月14日，阿部内阁又总辞职了。16日米内阁成立，内中实情，第一线人士实不易理解。

在此以前，一月元旦泽田参谋次长来访，第二天他告诉我，事变不易速决，一方面政局动荡不稳，下任首相却无适当人选，如今切望克列孟梭（法政治家，曾两次出任首相，有“老虎”之称号——译注）能者出现，而苦无这样的能人。

3日阿南陆军次官来访，因系老友故交，秘密谈话约一小时。该次官提出应同重庆联系，急速解决事变问题的意见，与我的意见相同。因此，颇为愉快。但事到如今，该次官已无能为力。

三十五、指挥官的性格

军司令官洞悉部下兵团长、指挥官（包括其参谋长）的性格，是统帅所需要的。此点，是我在陆军大学学生时期，战术战史教官（他们多是日俄战争中担任军参谋的有经验者）教导我的。现在我自己成了司令官，根据多次指导作战和视察战

斗的经验，完全具有同感。

据我所见，兵团长、指挥官的性格虽多种多样，但从其特点区分，大致有五种类型。

- (一) 喜好汇报型，
- (二) 默默实干型，
- (三) 慎重型，
- (四) 大胆型，
- (五) 中庸型。

为防止影响，多数不具体指名，略加说明如下：

第一类是具有喜好汇报的性格，有时也有些好的意见。但是也有不少是本来并不需要特意汇报的意见。这类人中多以考虑自己兵团的利益为主。但他们具有汇报积极、行动也积极的优点。不过他们给公务繁忙的军参谋部添了不少麻烦。

第二类与前者相反，他们在战场上的作用非常重要，但是有忽略汇报的缺点。长时间无音信时，军司令部如不及时弄清情况，则有濒临危机之虞。

第三类，慎重在某种程度上虽属必要，但在对华作战中，敌方兵员虽处于绝对优势，然而素质低劣。因此，这一类型指挥官在这样的作战中，未能获得成果。

第四类，大体上适合于此时的作战。但他们多是战斗第一主义的贯彻执行者，更由于官兵征募地区民族性关系，多有轻视战场军风纪的弊病。第六师团、波田支队等皆属此类型。如果说这是兵团长的性格，莫如说是兵团的性格。

第五类是以上各类平均的中庸性类型。也是最不给军司

令部添麻烦的类型。幸亏大部分兵团长都属此一类型。

宫崎注：军司令官根据丰富的经验，对属下的兵团长（包括参谋长）、主要指挥官的性格所作的观察，是中肯的。

我作为军的作战主任，日夜接触大量的报告、通报及情况、意见汇报等，有着大量的实际例子足资证明冈村将军观察的正确。对各级指挥官的优点，我对军司令官报告的很清楚。但对其缺点方面，我当然不能过于明确地报告。

各兵团都有着自己的性格。这一兵团性格，不用说兵团长，甚至参谋长（有时是作战主任参谋）的性格和见识，也充分反映在兵团之中。在司令部主要人员的组成上，对这一点不可不加以考虑。这虽然是实际战斗中的体验，但也是内外战史上所教导的问题。当然最理想的是，处于最高地位的领导者本身，应当取得与地位相称的人和。至于参谋长和作战主任，更不应仅对上级唯唯诺诺，而是在作战上或统率上必须具有自己的见识和信念。否则，很可能堕入所谓帮闲的地位。

对于兵团长，参谋长（有时是作战主任）的性格、见识的观察，应防止先入为主的偏见。通过经常不断地深入观察，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得出结论。而且，应当考虑其特点，在答对和使用语言上，也都应加以周密注意。

三十六、爱民方针的彻底程度

1940年2月23日，师团长、参谋长集会时，某参谋长有如下报告：

“即使为了战斗的需要，在焚毁了居民住房的地方，不管事后如何努力进行宣抚工作，也毫无效果。与此相反，不烧民

房，无掠夺、强奸等行为，并能很好进行宣抚的地区，即使在敌人进攻时，居民也继续对我表示好意，帮助搬运物资等等。不用说，在前者的情况下，敌人来袭时，居民就会与敌相通，对我不利。因此，深深感到现在更应当切实遵守军司令官的爱民方针。”

今后确实应当进一步贯彻执行这一方针，因为这是一年半以前就再三要求的事情。

时至今日，强奸似乎仍未杜绝。有不少报告似经宪兵从中调解而成为和奸，然而，其调解的条件却一律为15日元，南北相隔百日里（一日里等于7.85华里——译注），而调解的条件竟能如此统一，宁非怪事？

由于爱民方针的严格执行，各部队最近逐渐在自己警备区域内，不仅是对房屋，就连砍树、折树枝等也注意起来，但是，一遇作战或出动到其他地区，仍经常有砍伐树木等行为。

三十七、听取实战谈话

听取实战谈话是有助于鼓舞士气的一种方法，甚至可以说是我的一种嗜好，但是，这一嗜好几乎没有使我感到愉快，往往是因受感动而流泪。

关于此事，曾有如下记载：

“这好象已成规定，作战一旦終了，即巡视激战遗迹，并以在战地倾听战功显著的勇士们谈实战情况，为无上乐趣。将军带着浓厚的趣味，倾听年轻的军官和下级官兵诚实和不加修饰的谈话。这些战况视察和遍访部队，经常是将军自己的提议并确定访问对象和时间。”

听取实战谈话，不仅限于作战終了，在访问所属部队时，只要有机会就这样作。听取的总人数，约有170人。其中，大队长一人，中队人一、二人，下余是小队长、分队长和士兵，人数大体相等。

他们的谈话，感人肺腑。对小部队作战有很大参考价值。今将模糊记忆的几点，列举如下：

1. 南昌作战第一天在修水敌前渡河时，某工兵上等兵，连续约十八小时，不吃不喝用小船摆渡友军官兵。在此期间，也不顾敌军射击，忘我工作，在任务全部完成时，立即晕倒。

2. 南昌作战后不久，为修复被敌人破坏的南昌大桥（长一千米以上）需要水上高空作业，幸亏第一〇六师团赤羽工兵联队有不少三十岁左右的消防队员，承担了这一任务，如是现役的工兵，恐怕不能胜任。

3. 拂晓攻击之前，攀登敌阵旁的悬崖，抢占敌人上风头，趁拂晓到来，发射喷烟器，使敌人惊慌失措，而我大队主力不损一兵一卒，夺取了敌阵。

4. 某知识分子士兵的感想：

“回顾一个月来的战斗，无限感慨。士兵纯洁之心，只有含泪思念战友之情。我是一名士兵，正因为是兵，所以感到自己就是支撑一切的一分子。在严肃的使命面前，感到自己是一个尊严而英勇的日本人。在任何困难情况下也没有办不到的事情。好象有一种神必定会帮助我们的类似自信的信念在我心里已经扎根成长。没有痛苦、悲伤、高兴等感情，唯有当完成某一任务时情不自禁发自内心的微笑。这或许是幼稚的满足感，但我却感到完全满意。”

5. 步兵第十三联队某上等兵札记的一节。

“我在每次站岗之前，必先巡视哪里是东方，然后暂时瞑目，心中便浮起微妙的愉快感。我没有什么信仰，但出征两年来，唯有坚持向东方遥拜的这一信仰。每当站在岗位上时，就把那里看做我的坟墓，无论何时都要使之保持清洁整齐。由于这样心情，就随时把阵地打扫得干干净净。”

该上等兵以后战死，临死时嘱托战友代其向东方遥拜，随后从容地闭上眼睛。

除以上外，我每有机会就到各医院慰问视察。曾多次在枪炮声中去访问生气勃勃的野战医院的伤兵。并于所到之处了解他们受伤的地点和作战情况，习以为常。受伤的官兵们好象忘记了创口的疼痛，大家都欢欣愉快地告诉我当时的情景。在野战医院曾有一被截去一条腿的某少尉恳切要求不要把他送回后方去，而使我为难的情况。

宫崎注：“听取实战谈话……甚至可以说是我的一种嗜好，但是，这一嗜好几乎没有使我感到愉快，而往往是因受感动而流泪。”这是多么崇高的语言。为将者怜惜部下，体察遗族的心情而落泪，这的确称得起为将之道。

司令官每到各司令部、部队、医院等地巡视慰问时，只要我没有放不下手的工作，便要求伴随前往。这不仅可以使我知道一些与我工作有关的有形无形的情况，而且还想学习司令官统率的实际榜样。本项所记载的事例，多数我也有幸在场。

年轻纯真的军官和下级官兵的朴实的语言，充满了真情，使人感动。然而，也有个别人在请上级给写汇报情节时，过于

高谈阔论，喋喋不休，使人听起来，从感激当中产生一种不快之感。我的日记中，就记载有见到东京地区某一城市出身者的此类事例。有关这些听取实战谈话的概要，我都记在日记里，其中有不少小战斗故事。

三十八、授与战功奖状

我对授与战功奖状，采取如下方针。

1. 严格检查战果，压缩各兵团申请数字，掌握严格选择的精神。

2. 详细调查部队行动的内容，压缩到真正值得颁发战功奖状的部分小部队。

攻占武汉时，曾有过对第九师团全体授与战功奖状的特例。这是因为上级司令部仅授与第六师团战功奖状，为了取得平衡，我特别授与在战功上不相上下的第九师团的。

3. 授与战功奖状时，不管是多小部队甚至个人，我尽量设法亲赴现场，亲手颁发。

宫崎注：战功奖状授与规则，制定于明治时代（大约在20年代）。据记忆，其主要精神大体与本节所述相同。

日俄战争及攻占青岛时期，坚持了这一精神，其后，特别是中国事变以后，似有过宽之嫌。这可能是由于自己属下得到的战功奖状越多，其兵团功绩也越大的心理作用所造成的。

战功奖状主要是授与战功显著、堪称模范的小部队或个人，对兵团（师团或军等）单位一包在内授与战功奖状是特殊情况。上海附近战斗时，因伤亡严重曾对军内四个师团一律授与部队战功奖状。对此，我当时百思不解。认为，这是自己

给自己颁发奖状。虽然，海军方面有不少对舰(战)队或对某舰授与战功奖状的例子，但我认为那是由于陆战和海战有着本质上差异的缘故。

作战后，审查各兵团提出的授与战功奖状的的意见的是幕僚的任务。根据战功奖状规定，适当、公平地进行严格选择，是辅佐统帅之道。因此，在战斗期间，必须密切注意此点而掌握真实情况。

三十九、日本人的国际感

在四面环海的岛国成长起来的日本人的缺点之一，是缺乏国际感。这次出征华中时，我更加痛感日本人对国际感的迟钝。其原因前已述及，今补充说明如下：

军队进行猛烈训练，几十年来都是在外国的土地上与敌人作战。然而对外国居民应有的思想准备却几乎未进行教导。“战阵训”的内容虽然是很好的，但对这一思想准备也不够强调。前述关于战地强奸罪的规定，实在为时太晚，攻占南京后的大暴行等等，其根本原因或许就是日本国民的缺点造成的。

1939年6月中旬，我南京总领事馆的中国仆役，在宴会开始时在酒中放了毒药后逃走，因而，造成主客死亡及病害事件。那仆役逃到上海后给南京总领事馆寄来的信说，“我长年在总领事馆工作，多蒙亲切关怀，实不胜感激。但在攻占南京作战时，我的亲属等遭到强奸暴行，使我恨入骨髓，所以，当我知道当天来客中有日军司令官时，就进行了报复。”

军队尚且如此，至于一般日本侨民对中国人的不道德行

为自属不少。就连我这个高高在上的人，也听到了一些情况。

攻占汉口后，有人随意侵占中国商店，当商店主归来时，强索保管费；也有人将商店金字牌匾藏起来，以后卖了三百元。在其他城市中，也有的在战斗中随便进入中国商店，简单的做些修理，店主归来时，即勒索几千元的修理费，更有甚者，店主归来后，只给极少数的房钱，仍然强行占住。

四十、离阵心情

我于1940年3月9日转任军事参议官。3月17日对集中在汉口的各兵团长致词告别，致词时不禁泪下。

我任第十一军司令官21个月，领导过几次大规模作战，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虽然人们都来对我表示慰劳，但我本身并无特别辛苦可言，无一日不愉快，无一夜不得安眠，甚至连在九江敌前上岸之夜也得以通宵安眠。一来是我生来的乐天性格，二来也是沾了为我信赖的优秀幕僚们的光。我的幕僚运气很好。

唯一的遗憾是未能摧毁敌人的抗战企图，却将众多官兵留在战场而离去，这是一种“圣战未息，残躯独归”的心情。

曾辅佐过我的参谋副长、参谋长沼田稼藏少将，从其新任地给我发来了贺电：“此战结束前，誓不返故乡”，到底是他识破了我的心情。

二万阵亡（战死一万三千）、三万七千负伤之事，将终生萦回于我的脑海中。我将一生坚持对阵亡者表彰追悼。

四十一、复命

3月26日晋宫，呈上军状，其他由皇室所赐优厚待遇等，在日记中均有记载（已寄赠战史室），这里补记其遗漏者以供参考。

当时一般凯旋进宫觐见的惯例是前夜宿于湘南（在东京附近一译注）某指定地点，次日乘特别挂在火车后的头等车到东京车站，再在东京车站搭乘宫内省特别差遣的马车，经二重桥进宫觐见呈上军状。我曾三次沐此光荣。第一次1932年6月24日，上海事变结束凯旋时，作为前参谋副长随同植田代军司令官觐见；第二次是1935年1月7日，前关东军司令官菱刈大将归还之际，作为前参谋副长随行进宫。这次是自己蒙受复命上奏的光荣。

奉上军状后，蒙圣上赐以优渥慰问：“此次多多辛苦”，并拜领御赐银制带有皇室纹章的大花瓶一个，现金3,000元。随即拜谒皇后陛下，又蒙慰勉：“长时奋战，实属辛劳，祝贺凯旋，望愈加自爱奉公。”并赐银杯一个，现金七百元。又于3月29日拜谒皇太后陛下，蒙赐慰劳之言：“任职军司令官长期奋战战场，祝贺今日荣归。先日呈上军状，闻圣上颇为满意。战场工作谅多劳苦，甚是感激。”并于别室赐酒饌，及赐银制烟盒一个，现金三百元。

3月26日向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殿下报告军状后，殿下宣读了如下表扬文件：

“前者尊官奉命任第十一军司令官，从事华中征战以来，克服天然和人为障碍，果敢大胆领导作战。或于武汉，或于南

昌、襄东及其他作战中，取得赫赫战果。更且先发制人，挫败敌之冬季攻势。

“恭奉圣旨，谅亦为尊官之本意。当兹完成大任、阙下复命之机，得睹壮容，衷心欣慰，深感尊官之多劳。

“惟今正处于诸般形势愈益严重之秋，宜自珍爱，更加为邦家尽瘁，是所期望。”

宫崎注：“幕僚应以将心为己心”，确信此乃幕僚之道，我对后辈也如此倡导。所谓将心即为将之心，真正为将之心（心情），不身居为将（指挥官）之位者，则不能有所体会。玩味将军之离阵心情，更深有所感。

不知是幸还是不幸，我除有中队长、联队长各一年的体验外，其余始终从事幕僚工作。我的畏友，已故藤室良辅少将，对第一次大战的高级统帅深入研究之后，主张高级指挥官应从平时即作为指挥官（队附）进行培育。任何国家的军队，对于优秀人物，往往都要作幕僚工作，这已是一种倾向。

我也认为必须重视队附工作。

孙子列举智、信、仁、勇、严五事作为为将者应具备的性格。将与幕僚应具有共同的希望。但“信”与“仁”，应主要是为将者品德。而“智”与“严”主要是幕僚的任务。我以前曾提到有关司令部人事的配合问题，作为司令部如具备此等特长，值得庆幸。关于“勇”字，我想说的是为将之勇，在于自觉一身承担重大责任，但应经常伴之以谨慎。与此相反，幕僚则动辄有陷于冒险蛮干的倾向。在我们的体验中，被视作优秀的幕僚，也曾发生过此种情况。话虽离题，当我读到“阵亡者、负伤者之事将终生萦回在我脑海中……”这一行时，痛感这才是为

将之心。想起日俄战争中，乃木将军的心情，更使我无限感慨。

“运气好，沾了优越幕僚的光”等言词，使人于感激的同时，不能不想到司令官对幕僚的信任也即产生于此。“信”是来自相互之间的，为此，将军和幕僚互相信任，是真正的幸事。

第五篇(上) 关东军参谋副长时期

前 言

本篇本是记述满洲事变中，自1932年8月到1934年12月，我任关东军参谋副长时期的情况。但因这一期间的日记已预定将来寄赠战史室，同时有关这一期间的重要事项，我已向战史室编纂官稻叶正夫详细作了陈述，因此，本篇仅作点滴补遗。

一、参谋副长第一、第二号

战时编制上自有军参谋副长这一职位以来，凑巧得很，它的第一号和第二号实际职务，都是我担任的。其第一号是上海派遣军参谋副长，第二号是关东军参谋副长。

1932年1月，上海事变爆发，陆军出动。2月上旬第十二师团的混成旅团及第九师团出发。接着第十四师团增援。上海派遣军司令部也告成立。军司令官决定由首任军事参议官白川义则大将，军参谋长由已在上海的驻中国大使馆武官田代皖一郎少将担任。但参谋副长因无适当人选，未能决定。在我们“一夕会”同仁及上层人物中间，都以我熟悉上海附近情况最适合担任此职而加以推荐（提出推荐者以军令系统者为多），但军政系统多数人因我已确定在3月定期调动中补任课

长，故不同意调出，双方意见对立，结果，决定军司令部在参谋副长缺员的情况下出动。可是在2月25日晚由三长官主持在上野精养轩送别白川军司令官的宴会上，因白川军司令官强烈要求由我出任参谋副长，故荒木陆相及真崎参谋次长不得不表示同意，并即席向我下达密令。第二天发表了正式命令，使我大为忙乱了一阵。

关东军司令部由于种种情况，借1932年8月机构变更之机，为扩大编制，采取了关东军司令官兼任驻满全权大使及关东厅长官三位一体的体制。武藤信义大将被任命为军司令官，陆军次官小矶国昭中将被任命为军参谋长，而在参谋副长人选上又发生了赞成和反对的两种意见，结果还是再次任命由我担任该职。

所谓赞成论者的理由，似乎因为我是所谓的中国通，同时参谋总部调动时，容易被留在参谋部内，因而认为我是最适任者。

反对论者的理由，主要因曾是多年挚友的永田和小畑之间，有发生摩擦的迹象。在当前作为陆军中坚的中心的两者，如果分裂将成大问题。因此，截至目前作为三位一体的冈村，为维持永田和小畑的结合，是绝对不能离开东京的。这也是“一夕会”的同仁和上层人物之间所强调的主张，有关两者之间的问题，当于下节叙述之。

在参谋本部和人事局反复协商之后，因无其他适当人选，结果还是决定由我担任。7月14日，当时的补任课长矶谷廉介，把这个消息透露给我。

此外，这也是后来的话了，新京（伪满时的长春一译注），

有人歪曲军司令部内参谋长和参谋副长同屋办公是荒木和真崎为了监视小矶而让冈村为副长的。这确是极尽诬陷之能事，谁也没有向我提出监视小矶的要求。在军中多忙的情况下，参谋长和副长同屋办公是理所当然的。

二、永田、小畑两者间的不睦（“一夕会”的分裂）

首先，社会上各种刊物刊载我和永田铁山及小畑敏四郎的关系。因此，有必要将其真相阐明。

永田是我从15岁少年时代在东京陆军地方幼年学校第二期同班挚友，特别是在少尉任官后，又成为酒友，有着莫逆之交。

小畑和我是中央幼年学校同期同中队同学，我对他气节的某些方面表示赞同。同时，我二人一起进入步兵第四十九联队，日俄战争时出征共同担当北朝鲜警备任务，彼此间感情更加亲密。

我们三人从大尉到少将时期，一直对陆军的弊病非常愤慨，私自誓志革新。

此外，我自青年时代就怀着在中国大陆活动的理想，与怀有同样理想的土肥原、板垣、矶谷等同期生志趣相投。

我是拥有驻在欧洲特权的人（后来成为补任课长时，暗中偷看了有关这方面的秘密文件，才知道我当时因封锁而不能进入德国，改驻丹麦。现在看起来，当时幸亏没有去）。但强烈希望去中国出差。其后，临时受命去欧洲出差数月，住在当时任驻苏联武官，因不能进入苏联而停留在德国柏林的小畑处，那是1921年（原文为大正十年——译注）后半年的事

情。

当时，我二人都认为陆军中存在着两大弊端。其一是人事任命不公。尤其是所谓长州派独断专行；其二是闭守在统帅权的躯壳里，脱离了国民。因此必须改变这一情况，以进一步与国民同甘共苦。出于此点，我来欧洲看到各国情况，更感到有改革的必要。于是，与当时驻在瑞士的永田取得联系，这一年的10月27日，我们在巴登巴登集会，下榻于斯台佛尼旅馆大肆议论。翌日(28)，又改宿于福兰克福特·安曼的福兰克福鲁特·霍福旅馆继续讨论，其结果是回国后召集上述的同期生及第十五期，第十七、十八期等同志，组织了一个小组，为革新陆军、誓共进退而结盟。

这就是“一夕会”的开端。

中、少佐时代永田、小畑之间的友情，极为密切，正所谓敌血为盟的同志。我们三人经常在彼此家里集会聚餐和交谈，来往极为密切。永田在教育总监部工作的中、少佐时代虽然互相之间平安无事，但从大佐时代转入陆军省，大家都任课长以来，由于公务上的接触及关连到部下课员之间意见冲突等原因，以致率意直行的小畑和主张明断是非的永田之间在性格上的矛盾暴露出来。因此，大佐时代后期，两者之间出现了不睦的迹象。

1932年2月，我由补任课长转任上海派遣军参谋副长时，曾向荒木大臣和真崎参谋次长建议，“最近永田和小畑都预定要进级少将。但进级后绝对不要安排在一起工作。因为在一座山上，放置两只性格不同的猛虎是危险的。”

最初的方案，似乎是采取了 my 的意见。但是，由于“一夕

会”下层的推戴，4月人事变动的结果，永田任参谋本部第二部长，小畑任该部第三部长，我任陆军省军事调查委员长。6月份我回东京时，听到了在部长会议上永田和小畑已发生激烈争论的消息，我所耽心的问题，终于出现了。

7月中旬，小矶陆军次官私下对我说：“第十六期正是陆军的中坚，现在发生分裂迹象，确使人遗憾。充当这个调停人的非你不可，希望你努力做好。”所指第十六期，毫无疑问是指永田和小畑。从这一情况说明，次官对我转任关东军参谋副长一职，至少最初，似乎是站在反对论的一方。

两人之间虽然发生了裂痕，但在我离开东京为止，在“一夕会”的聚会时，永田和小畑仍然都来参加，进行畅谈。

我在关东军参谋副长任内，为向中央部联络或报告，每隔数月就去一趟东京。每到东京，就与“一夕会”的盟友共聚一宵。1933年8月我的日记中还记有当时我晋京时在某人招待宴会上和永田、小畑开怀畅谈的情况。但这时“一夕会”的下层人士中已透露出两人对立颇为严重的消息。

果然，1934年4月我晋京时，“一夕会”同仁于4月23日在赤羽桥春岱寮设宴招待，我去后只见永田、矶谷、板垣、东条、工藤五人，其他也只有小笠原一人。据说他们和小畑等已分道扬镳。我竭尽全力劝说有和睦团结的必要，但性格暴躁的东条等，毫无通融余地，竟说：“如果你感到不平，可以到他们那边去！”看来，决裂已成定局。当夜，我与抱中立态度的板垣进行了密谈，也未想出妙策。27日与小畑恳谈约三小时，他对永田一派的反感十分强烈，到底也未获得妥协余地。

我因多年的同志一旦决裂大为悲观，本来我睡眠极好，但

我在京期间，每晚为此而苦恼，难于成寐。28日离京前，托付抱中立态度的矶谷和板垣，为了重新团结再作最后的努力。

社会上称以永田为中心的一派为统制派，称以小畑为中心的一派为皇道派。我认为这是宣传机构随意制造的名称，实际上只不过是同志之间的分裂而已。

三、匪患猖獗

我作为参谋副长先期出发，8月19日到奉天上任，接管工作极为忙碌，甚至连日记也未得好好写。8月26日武藤军司令官、小矶参谋长到任后，决定由我出访第一线各兵团。8月30日访问了锦州方面的第八师团。从9月2日连续四天，巡访了驻在北满的各个兵团，在这四天中，就有三天从飞机上亲眼目睹三次成群的土匪的活动情况。

2日晨，在远藤（作战主任）参谋的陪同下，乘小型客机出发，巡视第一线兵团。10时到达洮南，访问了岩田守备队长。午后到达齐齐哈尔，与旅团长、省长恳谈后在该地住宿。上午离开洮南时，就在洮南近前的开通附近，碰到了成群的土匪。他们看到飞机后就四散逃窜，我觉得有趣，就让驾驶员盘旋了几圈。

3日访问了绥化的松木第十四师团长，午后到哈尔滨访问了广濑第十师团长，并于该地住宿。这天上午在安达——呼兰之间，从飞机上又看到二、三百土匪，但他们从容不迫，似乎知道我们的座机不是轰炸机。

4日根据电报命令变更了预定行程，改飞长春，在长春访问了国务总理郑孝胥，主要是对其辞职极力挽留。傍晚到达

吉林，访问了多门第二师团长，当晚，宿于该地。

5日清晨访问了敦化的长谷部旅团长后，随机将两名重伤军官运往吉林。午后向奉天归航中，又目睹土匪在伊通河谷各村放火抢夺的情况。

由于满洲政权崩溃，军队解体，以致本来就出名的土匪猖獗起来，数量也激增了，这是不难想象的。但是，仅在四天的旅行中，就看到三次土匪的猖獗活动，可想而知，这只不过是他们的一小部分，因此，我感到解决治安问题是当前的首要任务。

四、满铁社员理事问题

满铁向来是由总裁、副总裁各一名、理事数名掌握经营。总裁以下的高级干部，按惯例一般都是在国内每次政治变动时，由中央政府安排替换。两万满铁社员，不管有多大才能，也不能升任本社の理事（相当普通商社の董事）。对于这一不合理的制度，全体社员早已不满。

我们到任后，根据事实认为在现有满铁社员中，确有不少极有才干的，誓愿致力于大陆活动的优秀人物，深感有必要伺机加以改进，以便能够从社员中任命理事。

如下所述，这种时机终于提前到来。

1932年9月15日，日满协议书及日满军事协定（秘密），于长春签字后，我奉命向中央呈交上述文件。由花轮外务书记官等陪同，于16日出发前往东京，19日到东京后，因各方面联系事项颇多，共停留四天。9月22日荒木陆相通知马上来见，我即去陆相官邸。到后见正在东京的满铁总裁林博太

郎伯爵(贵族院议员)在座。三人即开始秘密谈话,陆相问我:“满洲流传着对林总裁不利的消息,风闻青年军官要对总裁进行突然袭击,因此总裁迟迟不愿回任,实际情况如何?”我回答说:“军部或青年军官中,绝对没有人想对总裁采取某些行动。不过,以我个人所见,满铁两万社员,无论如何努力,也无论有多大才干,都绝对不能成为本社的理事。他们对理事职位完全凭政治输入这一弊端早有不滿。事变爆发以来,不满呼声更为高涨,这是事实。如果总裁趁此机会打开任命社员为理事的途径,则社员士气将会大振,称颂总裁之英明果断,从而不满气氛将会一扫而空。”

对我的建议,总裁即席表示采纳,并提出任命几人恰当。我回答说:“近期改选中,照目前情况以理事之半数三名(事务方面二名、技术方面一名)较为妥当。总裁意下如何?”总裁因自己到任日浅,对人事情况尚不熟悉,因此答称要我与八田副总裁及军部协商后内部决定。我随即提出:“归任后立即着手与八田副总裁研究人选,然后向总裁报告请予裁可。”总裁表示同意。告别时,我向总裁表示,今后军部对总裁将给以大力支持。

9月25日,我回到奉天后,立即向小矶参谋长报告了这一情况。虽然这天是星期日,但参谋长认为越早越好,当晚即约请在奉天的八田副总裁前来,三人协商后,内定候补社员理事三名,随即报请军司令官批准并向陆军大臣拍发了电报。

不久即任命了三名社员为理事,估计一般社员的士气必将受到鼓舞。

正如我在本篇之后篇中写到的,当我就任第二师团长时,

为了警备任务再次赴满的途中，1937年4月14日曾在罗津上陆宿于雄基，当时附近的满铁社员20余人集会，设宴招待我。这些人我都不认识，据他们说是为了由于我的倡议及努力而产生了社员理事一事，表示谢意。这使我颇为惶恐。但也使我进一步认识到满铁社员是如何关心这一问题。

五、对华、对满根本政策之我见

如以前各篇所述，我在青年时代即与同志埋头研究中国问题，并有幸在职务上屡屡从事与中国有关的工作，也结交了不少中国朋友。因而，对中国的根本政策，我个人持有以下三点见解：

- (1) 与中国人紧密合作，以举睦邻之实。
- (2) 以中国为首，从远东地区驱逐欧洲势力。
- (3) (在后期)与中国共同排除国际共产党。

然而，陆军负责中国问题人士之间，虽同意我的第(2)(3)两点，但对第(1)点，却多持必须首先以武力镇压中国，打破中国的幻想的意见。他们称我及与我持同一意见者是软弱派。

近年来，日中之间纠纷不断，而每有纠纷，在强硬派与软弱派之间，就出现对立意见。但是，强硬派占据了优势，因此，事态就按照历史所表示的那样发展下去。

满洲事变爆发前，中央部为了探讨以满洲问题为主的对策、征询意见而设置了有关课长会议。教育总监部第一课长矶谷廉介和我(当时任陆军省补任课长)，在职务上虽无关系，但也以原来与中国有关为理由，被吸收为这一课长会议的成员。在课长会上讨论满洲事变爆发后，满洲政体是成立满洲

国还是限于建立满洲地方政权时，约半数的课长（包括我）都主张后者，但结果由于当地关东军的主张而成立了满洲国。

本篇前记之一，我任上海派遣军参谋副长时，5月5日停战协定签字后，忘记是那一天，南京打来电话，根据南京电话的要求，我在5月19日在日本旅馆东和洋行，会见老友王长春和他介绍的汪精卫的秘书长唐有壬，进行了会谈。当时并未谈及如何重大的问题，但随后我最亲密的朋友陈仪，以代理军政部长的身分，要求在没有日本人居住的地方与我秘密会见。因此，我火急定制了西装，在5月29日与南京来的陈仪秘密会见，当时谈话内容，完全是满洲问题。陈仪并没有绝对批评非难日本的行动，而是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权。但是，他指出现在与日本合作的中国人都不是适当的人选。当时陈仪给我的印象是：中国政府在满洲问题上还有协商的余地。

我回国后立即报告了这一情况。但事态已不断向建立满洲国方面发展，我的报告也无任何反应。

事态向建立满洲国发展，但我个人的意见，仍认为在指导方针上，应当实行所谓约法三章的政治，即日本人掌握根本大权，其具体执行则大体上由中国人自己去作。

我到任后，日系官员中有大藏省派来的优秀干部八名，并已成为当地所倚重的骨干，还有担当监察职务的品川主计氏，此人有强烈正义感，与我气味相投，故很为满意。当时我想现有日系官员已足够用。但其后从内地各省相继派来不少官员，这是和我的想法相反的。但是，我也是在组织中工作的一员，尽管反对，也无能为力。幸亏小矶参谋长对我说，已经规定由他负责政治、经济、文化等重要事项，让我专门负责作战、

治安、情报等工作,所以我是专门从事这等纯军事工作的。因为正当工作极度繁忙之际,故认为这样分工比较恰当。但是,实际上纯军事上的主要问题,都必须由参谋长决定。同时,有关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重要问题,我也被指定参加。

我已于第一篇、第二篇及第四篇中说明,我反对发动大东亚战争,反对扩大中国事变,反对树立汪精卫政权。但是我身为公职人员对上级领导部门所作出的决定,还必须服从和效忠。结果是两次担任参谋副长、师团长、四次担任军司令官,几次和所爱的中国人作战。这种事与愿违的情况,应当说是身为公职人员的悲哀。

我身为关东军参谋副长,虽是一心一意忠于职守,但如前所述,由于对根本政策持有不同意见,在言行上多少有些抵触之处,也不可否认。留在记忆中的虽然不多,但想举二、三实例如下:

1. 出差东京时,日本外交协会约请我作当地情况的报告。我曾指出政府对满洲政策的指导中心不明确,使关东军非常为难。还说满洲国虽然把大门和客厅建立得很好,但住房、厨房等还无半点眉目等等。这些话大大引起了听讲者的共鸣。

2. 对前述品川氏根据其强烈的正义感提出的谴责意见,日满两国官员及军幕僚等对之多有反感。但我几乎经常赞同他的意见。有关这一问题品川氏最近在杂志上也发表了文章。

3. 这是听人说的,我自己已经忘记了。1941年12月29日(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时)《大陆新报》的堀川记者来访时,

有如下一段谈话：

“前日赴上海与上海市参事会员冈本一策氏面谈时，该氏指出，当他任安东领事时，在一次全满领事会议上（1933年9月20日？）关东军参谋副长冈村少将以下军干部也参加了会议。在会上我豁出自己的职位，对关东军的态度和施政等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责难。但冈村副长却回答说，也有中肯之处，我们将研究改善。果然，此后逐步付诸实现。对此，确实值得钦佩。”

六、热河工作与作战

我等到任后，满洲国的形势极为紊乱。10月份虽然对大兴安岭西方呼伦贝尔的苏炳文部队，采取了措施（该部队终于逃入苏联境内），但从这年秋天到第二年春季治安作战上的最大问题，是热河工作及以后说到的突破长城线两个方面。我记得当时满洲的气氛是，如果不占有热河省则无法形成满洲国。而东京的气氛是，不需要把热河省拿到手，特别是不宜使用武力扩大地盘。两者之间争执不下。可以想象这时从东京最上层机关不断有人以私信或其他方式向武藤关东军司令官传送东京的意见，军司令官也须考虑到地方的必要性，而相当烦恼的。

军曾反复通过张海鹏及其他中国方面要人，尽最大努力使热河省圆满地纳入满洲国，但经过数月工作，终成泡影。武藤司令官乃决心以武力占领热河省。然而，军司令官严格规定断然不准超过长城一线。并特别命令我将这一规定重点亲自向各有关兵团长进行秘密训示。据此，我于热河作战开始

之前，1933年2月20日、21日飞往奉天、锦州、通辽，向各兵团长传达了军司令官的命令。

热河作战进展极为顺利，热河省很快平定。3月10日大体上进至长城一线。这一期间，军战斗指挥所进驻锦州，武藤军司令官也于3月3日到11日在锦州指挥作战。平素喜怒哀乐不形于色的武藤大将，3月10日也笑逐颜开，并放歌“一举平定热河省、长城万里御旗辉”一曲，神色颇为满意。

七、上奏要点

武藤军司令官到任后，由于最大的热河问题已获解决，为向中央上报与此有关的事项，命我晋京。3月13日将上述内容以电报向中央部报告后，3月17日接参谋本部庶务课长来电，内称：“24日陛下赐见，可能垂询热河作战问题，应作准备。”我推测并且直感到，由于热河作战已触到了东京最上级机关的痛处，因此，必须把不得已而行使武力这一点作为上奏重点。然而，工作多忙，已无暇研究上奏方案。3月19日出发，23日晋京。24日在参谋本部报到时，接到午后进宫上奏的紧急命令。上奏时，将自己带来已经污损了的地图，放在御案上，因无草稿，只好口头上奏。自午后3时10分开始，将热河工作及作战经过大要，上奏约二十分钟。其内容多已忘记，仅记得主要是热河工作以及万不得已才行使武力，并一再力陈军司令官坚决不准超出长城线一步的方针。

陛下并未下问，但颇为热心地听取了我的上奏。

八、突破长城线

关东军平定热河省后，3月中旬以长城线为第一线进入守备。在此期间，中国于迎面集结数十个师的大军，屡次前来进犯，自古北口至山海关一带约400公里的长城线，处处被破坏，不少地段可以自由通过。我军以第八、第六师团及混成一旅团守备这一漫长的第一线，对付敌军的来袭，兵力显然不足，处于不遑应战的状态。为此，迫不得已也曾屡以小部队越过长城线进行反击。但如此作战方法，使官兵疲惫不堪。因此，军参谋部内产生了莫若进行一次短暂的大规模进攻作战，给敌以彻底打击的议论。但是，这又违背不准越过长城线一步的方针，因此，军司令官难以采纳这一意见。为此，小矶参谋长于4月12日出发赴东京，就这一作战问题与中央部进行协商。5月3日小矶参谋长回到大连后，立即通过电话传达了突破长城线进攻作战的命令。

从大局来看，天津仍然有我天津驻屯军，北京也有我驻在武官，都与中国保持友好，唯独关东军与中国作战，由于当时处于这样的微妙形势，所以这次进攻作战并无占领地域目标，而是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使之丧失进攻能力即达到目的。然后，理当重新恢复警备满洲国的姿态。对于这一大局的观点，不一定要求在前线进行战斗的官兵都能理解，但是，必须严格要求最前线部队的指挥官理解这一点。同时，军司令官还顾虑仅靠军的命令指示停止作战线是不够的，因而派我去第八师团，斋藤第一课长去第六师团指导作战。

九、指导第八师团作战

开始进攻前的5月11日，在伊藤副官陪伴下，由长春出发到达奉天。由于要在战场附近古北口小溪的河畔降落，所以乘用蚊式轻轰炸机于12日晨由奉天起飞。午后2时许到达古北口上空。但由于风向不好，不能与小溪平行在河岸降落，同时，又因河岸狭窄，与小溪成直角降落也很困难。因此，驾驶员提议暂时飞回承德，等候天气好转。这使我非常为难。因为战斗已从昨天打响，所以我说服驾驶员慢慢地多转几圈，找个好机会降落。驾驶员终于理解了我想法，试着盘旋了七、八圈，才在离水边仅二、三米处停止滑行。

乘坐来迎接的汽车，午后三时半到达郝家台第八师团战斗指挥所。立即向西第八师团长和久纳参谋长传达了军司令官的指示。当时的战况是，对迎面2—4公里敌纵深阵地的攻击，从昨天以来，尚无大的进展，但迄今为止，对敌军频频反攻不准前进的我军官兵，由于这次开始准许进攻，所以斗志冲天，充满了“冲向北京”“冲向北京”的气氛，对军命令的停止线几乎毫不介意。见到这一情况，使我吃惊不小。因此，邀西师团长到战斗指挥所外田野上密谈。记得当时的谈话重点如下：

“阁下有担任侍从武官长的经验，定能拜察陛下对和平之关心。我本人3月中旬晋京时，陛下竟命我这一少将即时进宫觐见，我向陛下上奏了热河作战迫不得已的理由，并对陛下保证今后决不越过长城线。其后战况，阁下已经了解，这一次进攻是为了警备上的需要，好不容易取得中央谅解，这才发展

成这次作战。现在看到贵师团冲往北京的气氛，使我非常耽心，因此，无论如何务必严格遵守停止线的命令。”

西师团长当即回答说：“我非常理解。为了鼓舞士气说是冲向北京，但一定遵守停止线的命令，请放心！”

是夜，喝了小米粥和师团长一起和衣宿于民宅。

第二天(13日)越过通往北京的新开岭，师团战斗指挥所进驻白河洞，登高观察，此处虽不断遭到枪炮射击，但攻击已逐步展开。午后，敌军阵线动摇，似已开始退却。我为视察攻击进展情况，要求提供一辆汽车。久纳参谋长不同意说：“连这里都受到枪炮的攻击，再往前去非常危险，军幕僚来到这里，我们已感谢不尽。”但是，站在一傍的西师团长却默不作声，我强行要来汽车，和伊藤副官一起，开赴第一线。在第一条线访问了川原旅团长并眺望了坦克部队攻击石匣镇的情况。

午后3时左右，西师团长也来到川原旅团长处，和川原少将握手并高声说：“谢谢您，靠您取得了胜利。”川原只是默祷而泪下。我被这一戏剧性的情景所感动，又亲自进入最前线视察追击情况。是夜宿于石匣镇，14日踏上归途。

十、塘沽停战协定(1933年5月31日)

有关塘沽停战协定问题，我已向战史室稻叶编纂官作了口述，还曾向武藏大学教授岛田俊彦氏进行过详细叙述。后接该氏感谢信称，已收入他与各大学教授合著的《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一书中，故此处不再赘述，仅将一些琐事，附记如下：

塘沽停战协定，仅一天时间就高速度签了字，但是作为这

一协定的善后处理工作，为满洲和华北人民的幸福，在签定交通及其他事项时，由于我方以满洲国独立为前提，而中国方面则坚持满洲不过是中国领土之一部分或一个地区的立场，因而在确定内容的交涉上，旷费了时日。有关这一方面的要点，将于次项另述。

协定签字能够如此之快，其原因之一，是永津驻北京武官，趁平素交往密切的中国委员探询日方意图时，故意透露好象关东军要求的条件非常苛刻（这是采取的一种谋略手段）。但是，及至谈判条件内容时，出乎中国方面委员意料，条件并不过分苛刻。加之，作为我方随员也参加了会议的水田武官又从中说服，也有关系。由于这一功绩，水田武官后来被委任为关东军参谋，受到特殊功勋的恩赏。

塘沽停战协定，虽有自私之嫌，然而我却认为这是从满洲事变到太平洋战争，我国长期对外作战的最重要的境界点。如果能就此中止我国对外的积极政策，那就好了。不论当时或后来，我都认为应在此停止。如在第一篇所提到的，甚至连美国记者，停战后在东京也向我提出过相同的意见。（参照第一篇第四章 12月5日日记）

多年与我密切交往的殷同，作为华北政务委员长黄郛的密使，来到长春，并于5月24、25两日与我进行秘密商谈，彼此间疏通了大体的意见。可能是军司令官知道了这一情况，故而委任我为全权代表。本来，协定全文已经决定，任务只是迫使对方同意，因此可以说委任谁为全权代表都是一样。

如前所述，在当时只有关东军同中国军队作战，而我天津驻屯军和北京武官，仍然与中国军队保持友好关系，这种微妙

的现象，已如前述。5月30日拂晓，当我等全权代表一行，乘驱逐舰“朝颜号”溯白河河口而上时，两岸的战壕里，中国士兵做好射击准备，严阵以待，我“朝颜号”官兵，也各就炮位，在互相敌视中溯流而上，这种情景，给我极深的印象。当晚我宿于塘沽的日本旅馆，由中国警察和驻天津日军两方面予以警戒。

然而，31日签字后，我等与中国委员共乘其装甲列车去天津，蒙设晚宴招待，气氛和睦。于是，昨日之敌化为今日之友。

如前所述，我于3月24日上奏时，体会圣上意图，曾保证决不越过长城线一步。但归来后情况有变，终于突破了长城线。事关忠节，为此，两个月深感烦恼。指导第八师团作战时，进至最前线也是此种苦恼的表现之一端。6月1日在天津旅舍，反复沉思，由于签定了塘沽停战协定，使圣怀少安。

塘沽协定的签定，似对满洲国的中国官员心理上产生了极大影响。他们的心理就是虽然热心讨伐匪寇，但不希望中国人和中国人进行战争。因此由于停战，人们特别高兴。这是后来我才知道的。

当6月5日我回到长春时，意外地受到了满洲国高级官员及很多满洲国人的迎接。6月12日夜，国务院设宴招待我全体停战交涉委员时，除国务院高级官员外各部总长全体参议等，几乎满洲国的全体高级官员数十人都出席了宴会，使我十分惊讶。

十一、停战协定的善后处理

中国方面随着满洲国的成立，对邻近的华北提起了重视。任命黄郛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何应钦为华北军事委员

会委员长。

如前所述，停战协定之前，黄郛曾秘密派遣与我交往密切的殷同来长春，探询关东军的意向。5月24日及25日，我应殷同的邀请，单身前往他的住处密谈，并把我军有意缔结停战协定的想法告诉了他。当时，殷同表示最为关心的是丁强军的问题。

对于丁强军，我已记忆不清，但是我知道满洲有一个叫李际春的将级军官。在满洲国军事顾问部的谅解下，成立了保安队一类的素质不太好的部队。趁兵荒马乱之际，越过山海关，侵入并盘据于华北东北部，对当地居民进行骚扰。因此，协定签定后6月3日，我还在天津时，中国参加协定的委员熊斌主任和雷寿荣来访，要求丁强军撤走。对此，我大致予以谅解。我军本来也有只要协定签字，便强制撤退丁强军之意。满洲国军方也同意丁强军不得不撤。因此，6月14日在长春设慰劳宴会招待李际春，我也参加了宴会。

6月22、23日与来长春的华北代表雷寿荣、殷同就丁强军善后处理及为满洲、华北双方居民利益恢复交通、通信等问题进行了密谈。关于这些善后问题的交涉，上级命我和第三课课长喜多大佐、茂川大尉负责。

善后处理的第一次交涉在大连进行，就丁强军问题及恢复奉天与北京之间的铁路通车问题，进行协商。7月2日，我等在大连集合，3日在辽东饭店开始交涉。会议并未公开，但当时各报称之为大连会议，大事报道。

关于丁强军问题，当事者李际春本人与雷寿荣、殷同之间，就军队的整理等进行了直接商谈。我们以列席的形式参

加，多少有些曲折，又因中国方面向北京请示等原因，略有拖延，但在5日上午终于妥善解决。

有关铁路问题，除双方代表外，奉天铁路局长和北宁铁路局长也参加了会议。虽然存在着不少技术问题，但在满铁嘱托后宫大佐及安达中佐的协助下，交涉大体进展顺利，于4日傍晚获得解决。

7月5日午后3时，全体谈判人员集合，检查议事记录，达成一致意见，共以香槟酒举杯祝贺谈判成功，所谓大连会议，到此告终。

9月16日，华北政权派玉棋（骑兵上校，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时，我是他的区队长。其后，我驻在中国时，曾与他屡次会谈）到长春来访。我方也于10月初旬派喜多大佐去北京与华北政权方面联系。通过这些往来联系，说明双方为了满洲和华北居民的利益，都有恢复邮政、电报以及航空交通等的愿望。我军参谋部也就此等问题与满洲国国务院当局研究，并已作出了与华北方面的协商方案。于是，根据命令我与喜多大佐、花轮书记官（因多少也含有一些政治问题，故大使馆令该书记官同行）等，乘飞机于11月6日到达北京。从第二天到9日的三天间，主要与黄郛、何应钦，以我方方案为基础进行了谈判，由于谈判相当难于取得进展，我决定，无论谈判成功与否，要于10日离京。而于9日夜在大使馆武官室招待黄郛、何应钦会餐时，他们接到南京发来的训令，协议终于成立。这一情景至今还在我记忆之中。总的说来，我们的头脑里把满洲作为一个国家来考虑，而对方则坚持满洲是中国的被称为东北的一个地方，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因而，在形式或面

子上，议论很难取得一致。8日夜，我也接到由长春发来修订协议方案的训电，在11月9日的日记上，我还写了想起8月在叶山上奏时，陛下训示的：“日本人和中国人都是好计较形式的国民”这句话。（参照下第十三节）而对这次交涉稍感不快。殷同也屡次对我说：“象您这样的中国通，难道连中国人爱面子也不明白吗？”

有关上述铁路问题，我们认为按照常识可以从奉天一路直通北京，但是这一希望到底落空，最后的决定是必须在山海关下车后再换车。

这次在北京的谈判，日本报纸称之为北京会议。通过前述大连会议和这次北京会议，使塘沽停战协定的善后处理工作，大体完毕。有关铁路问题，由于其后反复交涉的结果，第二年（1934）7月1日，奉天和北京（当时称北平）之间的直达列车也开始通车。

十二、何应钦的预言

如上所述，在北京会议上的正式交涉，虽然进展不快，但一般气氛颇为和睦。特别是黄郛、何应钦和我三人，在没有其他人参加的情况下，得到了推心置腹谈心的机会。

黄郛甚至把中国政府内部亲美派和亲日派的斗争等情况都告诉给我。我们就今后日华问题，充分地交换了意见。

何应钦是亲日派巨头之一，他对日华两国的将来甚为忧虑。在他的言谈中，使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是：“实际上我国现在最难办的是共产党势力的抬头，故而不愿引起对外问题。如果日本不就此停止对我国的压迫，其结果中日两国都将给

共产党以可乘之机。”

经过 12 年之后，我在南京陷入向何应钦投降的窘境，何的预言，果然言中。

最好就此停止，这是我的一贯想法。因此，当时我对何应钦的说法，立即表示同感。但是时局却向另一个方向展开了。此外，在战争中何应钦派遣使者来到我处的情况，我在第二篇中已有叙述。

十三、再次上奏

1933 年 8 月初，我护送故武藤元帅的灵柩上京。7 日葬仪完了之后，为登记圣上对故元帅恩赐礼物，预定进宫参拜叶山御用宫邸，恰好接奉上奏当地情况的命令。因此，8 日午后在叶山御用宫邸，对停战协定、大连会议等内情，上奏约十五分钟。上奏完后，本庄侍从武官长对我说：“此次上奏陛下非常满意。陛下说日本人和中国人都是好计较形式的国民，这次关东军的作法，是避虚名而获实利的，所以很好。”

我联想到上次 3 月 24 日上奏的情况，由于能够补偿了几分罪过而感到自慰，归任后向全体幕僚进行了传达。

我深知命令一个少将再次即时上奏的情况是罕见的，自此，天皇陛下是如何爱好和平一事，深深印在我的头脑之中。尽管如此，当我在北京时，却得到了大东亚战争爆发的消息，正如我在第三篇之三所述，使我大为震惊。

十四、形势的缓和

身兼三任、三位一体的武藤司令官上任后，最大的热河问

题已经解决。塘沽停战协定签定后的善后处理工作也基本结束。治安方面，虽然北满大部分地区匪寇仍然横行，治安状况不佳。但其东部国境方面地区以及南满各地区甚为平定，满洲国建设事业也大体纳入轨道。因此，1933年秋季前后，形势大为缓和。曾经极度繁忙的军事参谋部，工作也轻松起来，星期日大体上可以得到休息。

部队除上述治安不佳地区外，专门从事军事训练。军部也安排了军司令官对部队的检阅（有时也由参谋长、参谋副长代替军司令官检阅及巡视）。

1934年2月13日，中央部下达以3月31日为审核功绩截止日期，我考虑这也可能是形势缓和的反映。

今年2月1日小藤人事补任课长来访时，曾大体上暗示小矶参谋长将在3月人事变动期，我将在本年8月变动期调动工作的秘密消息。后来，我的调动延期到年末。

十五、帝制

希望推戴溥仪执政为皇帝，复辟是满洲国高级官员所渴望的。由于得到我中央部的谅解，乃于1933年12月19日晚，将满洲国要人召集到总司令官官邸，由军司令官向全体人员宣告实行帝制。听到这一消息后，他们皆大欢喜，张景惠将军等声泪俱下，郑孝胥总理本来滴酒不进，这时也连干三杯。

那以后，我在日记中记载了小矶参谋长、我、原田大佐及满洲国日籍要人五、六人，经常在国务顾问宇佐美官邸里，夜间举行重要会议的情况。所谓重要会议是指专门研究实行帝制的程序和方法而言。结果，1934年3月1日，举行了登极仪

式，皇帝宣告即位。

我本来对中国本土问题的重视远远超过满洲国的问题。1933年11月上旬，在北京和黄郛、何应钦推心置腹地讨论了日华两国的将来以后，我更认为应当把驱逐欧美在华势力和阻止共产党的扩大，作为最重要的问题来考虑。但是，现在我又考虑到作为对苏据点，为了维护日本在满洲的权益，并且有助于阻止共产党势力的扩大，满洲国的建设也很重要。然而，每当我到地方出差，目睹居民极端贫困的情况，正如我在第五节说的那样，满洲国依然只把大门和客厅盖得很好，住房和厨房则空空如也，纵然建立帝制也无济于事。

为庆祝帝制，秩父宫殿下作为代表来满洲时，发生了一个奇迹。那就是满洲国皇后，原来因患歇斯底里症从不出头露面，满洲国要人中也无一人见过她。然而，6月12日满洲国皇帝招待殿下午餐时，皇后竟然临席。这真使大家吃了一惊。据说是病情突然好转。

我日记中有“培养人员”一语，这是指我曾秘密托付大阪外国语学校校长：“征得家长同意，把身体健康，排行第三、四的志愿学俄语、蒙古语的男青年各5名，共10名给我送来”，并规定好薪金等这件事说的。当符合这些条件的10名青年到来后，我把他们安置在一个不显眼的旅馆里，我也换穿西装前去指导他们。随后分别让他们住在便利学习语言的国境附近，并时常把他们集中到新京来，鼓励他们，让他们娱乐，备加爱抚，以备来日之需。我离任时，又把他们托付给我的继任者板垣少将。

注：后来田中隆吉关东军参谋（军要地志主任），实行激烈

的对蒙工作时，使用了这10名青年，致使7名战死。此外，我在军务局的谅解下，曾把对苏特别机密费作为其他项目储金，并确实交代清楚。听说这些款项也被滥用于蒙古工作。当以后我就任第二师团长再次来满洲时，曾就这一问题责问板垣，但板垣却以“那家伙(田中)，不给他点玩的东西，就叫人讨厌”而岔开了。

十六、在满行政机构改革问题

1934年最大的问题是在满行政机构的改革问题。从8月到12月之间，我日记上就有22处记载了这个问题。但实际上，这一问题是从前年秋季前后开始的。

1932年8月武藤军司令官身兼驻满大使、关东厅长官，以三位一体的长官名义到任，大体看来，这种体制似乎完备，但局长级以下，帮派意识仍然无法解决。

随着满洲日侨的激增，大使馆方面计划建立大使馆警务部。警务部长也可由军宪兵司令兼任。但是，1933年10月23日在新京大使馆官邸，谷大使馆参事官、大场关东厅警务局长、田代宪兵司令官、小矶参谋长和我共五人，对该计划进行协商时，大场以与关东厅警务工作传统相矛盾，坚决反对，致未达成协议，只有分别向本省上报。转年(1934)1月6日，趁拓务省管理局长、警务课长来满之机，上述人员(课长级也参加)再次举行会议，从上午讨论到下午，众议纷纭，未能解决。1月27日看来似乎有妥协的可能，但结局只是报请中央，由陆军、外务、拓务三省进行审议。中央折冲的真相虽不得而知，但8月下旬报纸分别刊载了三省有关这一问题的方案，消息

传到满洲，也引起各方面议论纷纷。

9月12日以来，满洲各地警察采取一致行动，公然发表支持拓务省方案，反对政府折衷方案的声明。警官们群情激愤不惜辞职，呈现了类似工人运动的状态。9月21日夜，关东军的高山和泉两警视（日本警察官级别名称，在“警部”之上——译注）秘密到我官舍来访，说明警官对宪兵抱有极大反感。10月3日，关东厅青木课长和拓务省八田课长来访，向我报告全体警官一致强烈反对宪兵司令官兼任警务部长职位。

兼任关东厅长官的菱刈军司令官对此形势虽极为忧虑，但作为军司令官也不能一味压制警官。10月5日曾对我表示拟提出在警务部长之下增设文职次长一职的方案。但此案也属于阁议决定范围之外，也不能立即起草。10月6日拓务大臣电令，应以关东厅长官名义平定警官的激烈运动。在这种情形下，三位一体反而难以处理。菱刈军司令官更陷入窘境。

一个月已经过去了，全满警官罢工性的反对运动，愈演愈烈，宪兵和青年军官逐渐呈现不稳形势。军幕僚察知军司令官的窘境，大体上采取了静观态度。10月15日召开参谋会议，讨论军部对这一问题的对策。会上对我起草的“不应静观，应采取断然态度”的声明，进行修正决议通过，经向军司令官报告并取得许可后，于当晚8时发表。

声明的目的在于尽可能缓和军内的险恶气氛。果然，当天深夜，有十五、六名青年军官频频来访，对军部的决心表示欢迎。

10月17日，东京不顾当地关东厅职员的坚决反对，发来了决定强制实行原方案的急电。军部也定于19日再次发表军的

正式声明。18日性格坚实、威信颇高的关东厅盐原秘书官来访。他表示以死相赌决心妥善处理这一问题，要求给以合作支持。因此，当场召开参谋会议，作出了等待盐原工作进展情况再采取行动的決定，并停止发表上述声明。后来，警官的骚动逐渐消沉。

这样到了10月23日，关东厅的三位局长来访，要求与西尾参谋长和我面谈。在长达三小时的谈话中，并无一言触及警官的大骚动，而是专就有关新机构的运用交换了意见。

11月3日、4日，陆军次官也来电，作为关东厅长官的菱刈军司令官的责任问题，也不得不与关东厅方面进行协议。

11月14日左右，我被告知陆军大臣对菱刈军司令官发来亲启函件，预定在新机构发表前，调动军司令官的职务。

12月3日接到这一调动的密电，紧跟着在10日发表了命令。12月26日新机构公布的当日，菱刈大将离开新京。

注：在这一调动中，我同时转任参谋本部附，随同菱刈大将归国。1935年1月7日，大将进宫上奏军状之后，才向我透露了退职的决心，我敬佩他真不愧为军人。

结论

我担任军参谋副长的战时职务，同时还补任驻满大使馆武官的平时职务。军司令官也同样，每当举行仪式时，就得一一换穿正式服装，真感到麻烦。但是军和大使馆之间极为和睦，毫无左右为难之处。作为大使馆武官并非无可写之事，但在此处予以省略。

我在最初多忙之际，患了赤痢。既吃不下，又不能休息。后期稍闲时，又因参谋长调动工作，仍然极为忙碌。因此健康

受到相当损害，当转为参谋本部定员外人员时，约3个月时间，完全无事可作，这是天赐给的休息机会。

关于石井机关，因为我对该机关从创设到停战后，直到石井四郎晚年的情况，都知之甚详，虽然有关石井机关的内容和历史，也许是永久不应发表的事实，但我还是写出来附录于下：

附录 石井极密机关

关于石井机关的创建这件所谓极密中的极密事项，在陆军省只有大臣、次官、军务局长、军事课长及医务局长，在关东军也只有小矶参谋长和我知道，而且只有我负责直接与石井秘密会面并与中央联系。因此，只有我一个人了解该机关的情况。但是，日久天长，由于当地现实存在着这一秘密机关，尽管不知其内容，而这一机关的存在，却为不少军内人士所知晓。

由于是超极密事项，所以我在日记中丝毫没有记载，现仅根据记忆，追述其概要如下：

石井四郎出生于千叶县大地主之家，自幼头脑聪敏，作为陆军的委托学生就学于京都帝国大学，石井四郎夫人是当时京大总长的女儿。从这一点也足资证明石井是最优秀的学生。

时间约在1933年的某月某日，在哈尔滨东南方靠近拉宾路车站的背阴河（距哈尔滨约80公里——译注）设立了石井研究机关，与关押被捕匪寇的看守所为邻。机关长石井军医少佐被命令使用步兵少佐军装，其部下军医亦被命令使用相当

官衔的步兵军装。其勤杂人员，大部是由石井家乡挑选来的可靠青年，以加强防备。由于严禁外出，石井对青年们的娱乐煞费了苦心，石井每月一至二次来长春参谋副长官舍进行必要的联系。我还记得招待他的点心和水果，他一口也不吃，全部带走的情况。

由于使用了真正的人代替土拨鼠作试验，取得成效乃是理所当然的。我原来对于他顺利地取得医学成果的具体内容并不太清楚，但是在停战以后，据他亲自透露，仅获有专利权的成果就达二百多件以上。

当然，取得这样惊人成果的原因，除了上述用真人作试验材料外，还由于石井头脑聪敏并具有热情和勇气以及部下助手军医忘我工作所取得的。从事这一工作的两名军医大尉，为马痘病及其他实验而殉职。我记得在中央的谅解下，我曾虚报战况为两名死者申请了特殊功勋。

石井极为勇敢，在上级许可下，经常在大的战斗时，到步兵最前线拍摄战死者的镜头。也有为了便于对他升级的原因，石井时常被命令从事其他普通军务。我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时，他曾在山西省就任第一军军医部长，即使在此时，他也在完成本职工作外，从事特别研究的使命，并获得很多成果。特别对于治疗冻伤，他得出了用摄氏37°的温水浸泡患处是最好方法的结论。这些都是根据使用人体进行种种宝贵试验，或让他活，或让他死，或让他再生等等所取得的成果。然而，不知根据什么事实，中央不加采用，因此，我只在华北军采用了这个方法。譬如出外讨伐的步兵小队发生冻伤患者时，立即收集全小队的小便，洗浴患者伤处，即可治愈初期冻伤。就连

进入第二期冻伤、患部溃疡变形的患者，如果耐心采用这一方法也可痊愈。

停战后，石井也遇到了不少问题。

停战以前，1937年春我任第二师团长到哈尔滨上任时，石井机关已在哈尔滨南郊，拥有相当漂亮的房屋。由于石井军医中将也兼任军医学校教官，所以当苏军迫近哈尔滨之前，他把研究资料的精华装入三个皮包，乘飞机飞回东京，把资料藏在牛込户山町自己家里。

停战后，苏美两国之间对细菌战的权威石井的研究资料，演出了一出激烈的争夺战。与满洲关系密切的苏联，知道石井机关的存在并不足为奇。但是，美军对石井机关的重视，却说明了美军情报工作的优越性。

停战后有一天，占领军司令部当局让负责联络的有末精三中将，将石井四郎军医中将带来。有末问占领军当局是作为战犯还是要利用他。回答说是后者。因此，有末放心地把石井带到占领军司令部，以后，通过种种交涉，并赠与石井金钱等，结果，这三皮包贵重的研究资料，终于全部被带到美国去。后来，美国把没收的陆海军文件，大部分都还给了日本，唯独这三皮包资料没有退还。

苏联为取得石井的研究资料，进行了极为紧张的活动，苏联军官最初访问石井，遵守规定由占领军司令部的有关官员陪同前往，但其后即抛开占领军司令部官员，单独在深夜访问石井。当时石井以自家住房经营旅馆业务，因此，无法谢绝来客。苏联军官对石井或威胁或乞求，甚至让步到给一部分资料也好。由于苏联军官频频来访，纠缠不休，终于使石井患了

神经病而迁居到乡村。

美国自不必说，就是苏联最初也没有指定石井为战犯。但是当苏联得知从石井那里任何资料也不能弄到手后，在大大晚于一般战犯审判之后，于1948年秋季，才将山田关东军司令官等与石井机关有关连者，作为战犯审理。

我国医学界特别是与传染病研究所有关的人士，对石井的研究给予很高的评价。有的人认为，已经是得出结论的资料，不妨用土拨鼠和其他动物进行再试验后向学术界发表，并以此鼓励石井。石井本人对之也满怀希望，但不幸病故，确属可惜。

石井生前曾告诉我，他的直属部下为解决生活问题，有人曾出卖了一小部分资料，例如血液的结晶等。

注：此外，不仅石井，我任关东军参谋副长时，有某国立大学外科教授二、三人来访，他们在陆军省的谅解下，秘密向我要求，想实际考察一下在处决土匪，用刀砍下脑袋的其断面的情况。并且说这是难得的好机会，希望尽量给他们这个机会。我把他们介绍给吉林部队了。

第五篇(下) 第二师团长时期

前 言

1937年春,我在第二师团长任内,奉命由新潟出航在罗津上岸进入关东军属下,4月19日担任中部防卫地区司令官,从事维持滨江省一带地区的治安工作。其后于1938年6月移防东部国境地区,不久(6月下旬)即调任第十一军司令官。本篇即叙述这一时期约一年零两个月间的体验。由于保存有正式的记录,同时,我的日记也预定要赠与战史室。因此,这里仅记述未记入日记的感想以及对写过的情况加以分析,并回忆这一期间所发生的重要事项。

第二师团司令部设在哈尔滨,师团步兵部队分散布署于管内各地,从事讨伐匪寇与战斗训练。特种部队大体都驻在哈尔滨附近,专门进行训练。同时并再次组成混合旅团开往华北进行作战。

当时管界内的土匪大体分为七帮,其兵力约一千人。接近哈尔滨的北方地区,其南部治安比较良好,但其他地区则土匪猖獗,特别是松花江下游两岸地区,以一面坡为中心的滨绥县东北地区,治安状况最为紊乱。1937年5月5日初次巡视通河驻军时,当日日记曾有如下记载:“匪寇横行。与1932年—1933年(注:我任关东军参谋副长时期)的情况颇为相似,

大为吃惊。”

一、破例从新潟港口出航

我于1936年3月23日转任第二师团长，当年秋季已接到赴满的秘密指示。从来的惯例，师团在运送代表及代表部队中途要在东京下车，于宫城前遥拜后西下，在陆军船舶运输基地宇品港出航。这次预定也是如此，在设备齐全的宇品港出航是理所当然的。然而，我重视出征部队与家乡的精神联系；同时，师管关系的宫城、福岛、新潟三县的县知事，也恳求从家乡的港口出征。因此，向中央部请求免去宫城遥拜，而从盐釜或新潟出航。因系破例未能立即得到同意，但是，负责这项工作的参谋本部第三部，似乎喜欢这一别开生面的新方式，给予很大同情，因此，比较容易地决定由新潟港出航。

果然，三县官民大为满意，大批代表齐集新潟港，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仪式，大大鼓舞了官兵的士气。

二、与苏军的冲突

1937年6月25日夜，由于苏军占领了黑龙江奇克（逊克，爱辉东南约100公里——译注）上游的江中岛（森奴哈岛，波里居岛），因此，第一师团预定近日内予以攻击，关东军密令第二师团也准备应急派兵支援。第二师团当时正在临时检阅中，遂即停止检阅进行准备。6月30日满洲电台广播了“本日午后3时30分北方边境黑龙江畔森奴哈岛附近，苏联军舰三艘向我炮击，我方当即应战，击沉苏舰一艘”的消息。同时，也传说日苏两国正在莫斯科就苏军侵入江中岛事件进行交涉，

事态逐渐引起了世界的重视。但在7月2日有电报称，苏联已同意从该两岛撤兵，因此，7月3日解除了出兵的准备。

我一开始即从国际形势上判断，苏军当前不会与我军挑起战端，不致发展成为大的问题，故而，我虽根据命令进行了派兵准备，但除临时检阅外其他预定的例行公事一律照常进行。

三、芦沟桥事件爆发时的感想

我在临时检阅松花江沿岸驻军时，1937年7月9日在通河接到电报报告，得知7日突然发生了芦沟桥事件。13日回到哈尔滨后，通过各方面的情报和报纸，大体知道了事件的内容。我虽然肯定中央部和军部的措施（在我所知道的范围内），但有如下感想。

回想7月14日及22日在日记中所写的要点并加以综合，得出如下结论：“在这一事件的背面，蒋介石对第二十九军这一地方部队的实力因受外力而削弱，可能是高兴的（这是中国人自古常用的手段），同时，国际共产党和斯大林对日军在满洲以外地区消耗兵力，也可能是欢迎的。果真如此，可以说这一事件恰如他们所愿。因此，必须万分注意收尾方法，迅速予以解决。事件继续发展虽属势不得已，但深陷下去，当为苏联所喜。”

此外，7月23日的日记记载，虽然一时阴云消散，似乎出现就地解决的可能性。但还不是彻底处理办法，估计今后同样事件将要频频发生。

我的预言不幸言中，终于发展成为全面战争。

我从来反对与中国进行长期战争，反对汪精卫工作，也不赞成开始太平洋战争。这一些，我在以前屡有记叙。芦沟桥事件爆发之时，我就想到日本从此将进入多事之秋。

注：我虽然有如此想法，但此后却始终在中国战线，并四次出任军司令官，这种与友为敌的命运，真使人啼笑皆非。

四、共产党的暗中活动

我任关东军参谋副长时，就知道在北满各地活动的匪群中，有几股显然与伯力有无线电报往来。这次来满洲后，发现第二师团管界通河附近的匪群中，也有类似的活动，因此，加强了警备。

1937年7月22日夜，南满干线满井附近铁桥上的路轨被破坏，发生了快车翻车事件，大批人员伤亡（禁止报纸刊载）。此外，这一时期在其他地方，估计是由共产党干的小事件也为数不少。因此，师团于7月21日决定将准备从明天开始的检阅和团队长会议延期，指令各部队加紧讨伐和检举不法之徒。

五、地方文化程度和运输工具

截至1937年7月末，我巡视、检阅了分散配备在各地的所属部队。这一期间，由于交通道路的关系，使用了各种运输工具。作为了解当时地方文化程度的一个方面，兹将所用运输工具列举如下：

飞机、火车、装甲列车、装甲轨道车、汽船、摩托艇、汽车、卡车、军马、满洲马车、满洲马。

六、紧急派兵的服装问题

1937年8月18日午后4时，师团接到了军机电报。电报主要内容是：以篠原少将为旅团长组成混成旅团，派往华北（察哈尔方面）。

当时的天气相当炎热，一般的想法当然是穿用夏季服装。但是，我在下达这一出动命令的同时，特别指示穿用冬季服装。因此，旅团长和副官多次来访，以全体官兵的意见来恳求穿用夏季服装。我断然予以拒绝，并指出：察哈尔方面是高原地带，不久就会冷起来。另外，从奉天经北京到察哈尔，只有一条兵站线，不能指望及时供应冬装。于是，部队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穿着冬装出发了。

当年12月，篠原支队长取得辉煌战果，胜利归来。支队的军官们说，察哈尔的秋天，严寒逼人，其他部队均因穿夏季服装而挨冻，只有我们穿冬装才没有挨冻。这都要感谢师团长的先见之明。

我从壮年时代就屡屡驻在中国，从兵要地志上也得知察哈尔的气候情况，更了解奉天——北京——察哈尔之间的铁路运输情况。所以断然采取了这一措施。这使我更想到平时研究的重要性。

七、石原莞尔的论点

我得知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石原莞尔少将和军务局长后宫淳少将二人，都到任不久即先后于1937年10月2日及6日分别调动了工作的情况后，就感觉到可能是由于中央部内发

生了对立意见，有不好统制的情况。

我就任关东军参谋副长不久，10月30日石原少将即特地到哈尔滨来访，详细述说了他辞去第一部长的经过。其主要内容是：中央部主要的气氛是轻视满洲国的成长，一味想在中国大陆扩张。作为日莲宗信徒，信念坚强、旗帜鲜明的石原，对这一气氛进行了强烈的指责，并对反对论者发起了激烈的攻击。

石原的这一论点，大体上和我在第四篇所述的主张北守反对向南扩张的意见接近。因此，在晤谈时我非常赞成他的意见。

然而，当时在陆军省工作的石原，正是动员三个师团的罪魁祸首。扩大是石原定的方向，而他又对之非难，其真相如何？我出差在外，无从知晓。

八、战斗与训练的配合

当时驻在北满的师团，多数处于分散部署的状态。除对管界内外相当多数匪群不断进行讨伐，加强治安工作外，真正的任务，是进行对苏联军队作战的训练。

如何把讨伐战斗和训练妥善配合起来，使师团长和部队长煞费了苦心。驻扎在国境线的部队，尤其必须实战训练。在这一点上，除师团司令部外，几乎所有的官兵都再次出动华北参加了实战，倒是有不少帮助。

关于实弹射击这一课目，在中、小队中有战斗射击的训练，但这是以指挥射击作为重点，对一般战斗指挥这一点来说，我认为是不够的，因此，为有助于实战训练，我时常规定实

施“对敌阵地进行步兵中队攻击”的课目，特别指示“一律使用实弹射击”。结果使官兵的动作确实认真起来，使用砖瓦等材料作为敌人目标，练出了逐一命中、消灭的本领，取得了相当的效果。但是，据幕僚们研究，这一训练方法与当时的教令略有抵触。我以扩大射击战斗为理由，坚决命令执行。

1938年6月，师团移驻东部国境地区，也就是从分散部署转向集中部署。其后，即专门从事训练。不久，如第四篇开头所述，我也调任其他工作。

九、适应地方民性的教育

我继第二师团长后连续四次被任命为军司令官，在长期戎马生活中，能够实际看到全国各地壮年在战场上的精神特点，对各府县民性在战场上的反映也有所观察。这一问题在第四篇中曾有记载。我任第二师团长统率东北三县（宫城、福岛、新潟）出生的士兵驻在北满时，使我对这一问题感触颇深。兹将记忆中的两个实例记述如下：

（1）在讨伐土匪中，接到我某机关枪分队全部牺牲的报告，当即命令再行调查，原来是我军射手被从远处巧妙狙击的敌匪射中头部，立即死亡。按照平素训练的方法，分队长、小队长只知高喊“替换射手”“替换射手”，而缺乏交换机枪阵地的机动灵活性。因此，在很短时间内全部战死。

（2）1938年春，松花江解冻开化前不久，某持有一挺机枪的步兵分队，乘一辆卡车渡江时，陷入刚开冻的冰窟中，卡车沉没。此时，多数士兵从车上跳下获救，唯独机枪射手，具有彻底爱护武器的精神，紧紧抱着机枪和卡车一起沉没水中。

人命应比武器更为注重。分队长为什么不作“扔掉机枪，跳下来！”的指示呢？

对具有纯朴、驯顺美德的东北士兵，特别对其下级干部，应强调要求机敏灵活性。如果下级干部迟钝，则很不好办，因此，我一直训示部下，要重视下级干部的教育。

十、北满河、湖冻结的情况

在日本气温很低的地区的湖泊和河流，进入严寒季节时会一下子突然结冰，冰面平滑，成为滑冰娱乐的场所。但是，北满的河流和湖泊并不是一下子都结冰的，而是逐渐冻结。因此，表面呈现严重的凹凸不平状态。从河流来说，随着气候寒冷，先是出现冰块，顺水流去，而后逐渐增多，自然地冻结在一起覆满水面直到全河冻结。从出现冰块到全面结冻平均需要两周左右。这时，既不能行船，冰上也不能通行。必须选择较平的地方作为通道。因此往往要沿着河两岸反复地找道走。我任关东军参谋副长时期，有一位刚从日本内地调来不久的参谋，他根据在日本諏访湖滑冰的情况，拟定了一个冬季从哈尔滨到佳木斯之间河面上通行汽车的计划。这种十足的“闭门造车”，真使我大为吃惊。

在牡丹江上游的山中，有一个风景美丽的镜泊湖。湖的北端有一瀑布，是注入牡丹江一条支流的源头。严冬时从飞机上看，瀑布、湖泊和这个支流，都结了冰，只有这条瀑布脚下的潭眼没有结冻，水在流动。我问同行者这是什么缘故，没有得到确切的答复。

如果你看到前述河流逐渐冻结的情况，这个问题自然不

在话下。因为湖面的冰块逐次垂直滚落到瀑布的表面从而堆垒起来,从外表看来,好象瀑布冻结了,但在冰堆的里面,瀑布仍然在流泻,潭眼部分由于冰块急速滚落,所以不能冻结。

从冰块开始流动直到看不到冰块全部封冻为止,也需要二周时间,在这期间,交通就被断绝。

解冻时有发生异常变化的情况,如果上下游同时解冻或者从下游开始解冻,那倒没有问题。但是,由于气候或其他原因,有时下游尚未解冻而上游先行解冻,就很少有冰块流出。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冰块即以猛烈之势,涌向下游还未解冻的冰面,并且横溢两岸造成冰块氾滥。虽说冰块不致扩散太远,却对两岸的村庄房屋造成很大的损害。我在第二师团长任内时,由北朝鲜上岸乘火车去新京途中,在吉林附近曾目睹冰块氾滥的凄惨痕迹。

满洲的文化人称前者为“牝解”,称后者为“牡解”。

十一、全开管界内匪寇

我在关东军参谋副长时期,根据小矶参谋长指示,他专门负责政治、经济、文化等有关事项,指导满洲国;我专门负责作战、治安、情报等纯军事方面的工作。因此,我对治安问题有过相当的研究。我强烈主张采取匪民分离和充分使用满洲国军警的方法。

土匪(共产系统匪寇因有政治目的,另当别论)大体是农民及其他不法分子、不劳而食的赌徒,总之是社会的渣滓。但他们和一般良民都有着联系,因此,必须把匪民分离作为一个重要的目标。

然而，要想通过从国外来的日军的手来达到这一目标是极端困难的。不如使用当地人，他们熟悉情况，因此，必须首先使满洲国军警，切实地靠拢我们。并给以方便，使他们易于进行工作。

我在参谋副长时期的这个意见，当时未能在各兵团彻底贯彻，这次就任师团长，并负责滨江省一带地区的治安工作，于是根据这一意见，确定了方针，贯彻执行。

首先，我把过去分配给师团的对匪谍报机密费，全部交给省警察署，由他们负责报告土匪情报。当时不少人认为满洲国官员腐败不足信赖，但我坚持这样去做。

在我的管界内，驻有两个旅的满洲国军队，与师团共同讨伐土匪。我以诚意和爱抚相待，邀请两位旅长等高级干部会餐并与之恳切交谈。有时我把他们不值勤的军官都请到哈尔滨，和我驻哈尔滨的全体军官共同开怀畅谈，使满洲国军官大为欢喜。军司令部负责指导治安军的最高领导平林盛人中将，特意来哈尔滨观察这种欢聚的场面，甚为感叹。

在新京（长春）召开的兵团长联席会上，各兵团长都指摘自己管下的满洲国军队不起作用。东条军参谋长说：“可是，第二师团说是好的。”因此，我在联席会上讲了我师管下两个满洲国的旅是好的，是起作用的，只是给养太坏，有改善的必要等等。实际上，我管下的满洲国军，都积极勇敢地与我军共事。

1937年12月严冬，接到管界内全部土匪六、七股共八百多人（隐藏在通河附近山地的赵尚志共产党系统除外）躲藏在老岭山脉的确切情报。这正是一网打尽的好机会，但是，对盘

据在这个广大险峻的老岭山脉的匪群，由于地形及其他原因，几乎不可能使用武力去讨伐。因此，我采取了断其粮道、待其自毙的方针，把发现粮道，封锁粮秣移动等任务让熟悉当地情况的满洲国军（增加一部警察）负责，我师团各部队则集中部署于其后方负责堵截，间接予以协助，同时专门进行训练工作。

但是，在这样偏僻的老岭山麓广大地区遍布封锁网，从现在满洲国军队的给养补充来看，是近乎不可能的大问题，而且时间要快。

根据当时军司令部的规定，在这种情形下，首先应由该两个满洲国军旅向满洲国治安部提出申请，经治安部支给所需经费，然后再由我军司令部批准，才能由我军交付粮秣。经过这样程序，一来时间来不及，二来对平素爱如部下的该两个旅也采取这一套手续，显得不够亲切，一时使我非常为难。

恰好大塚师团经理部长提出紧急措施意见：由师团长和经理部长负责，从被委托保管的哈尔滨军需仓库的粮秣中，作为废品处理赠给该两个旅，是否可以。我采纳了这个意见，立即赠与该两旅3个月以上的粮秣。

两旅士气大振，以自己的力量进行讨伐，使群匪逃入深山老林中。其后，在山中继续分散部署长期露营，终于全部断绝了匪群的粮道。

1938年3月9日，上述全部股匪提出投降归顺的要求，4月初，我去通河将这些土匪头目，请到某一饭馆进行了恳切谈话并暂时安排他们实行兵营式的集体生活。

至此，除共产党系统外，管内土匪遂被全部消灭。

该两旅由于这一辉煌战功，受到了关东军司令的优厚褒奖。

为独断处理粮秣问题，我向军引咎自责，但是，石原参谋副长说可从军机密费中通融，进行善后处理。因而未追究我的责任。